

中原突围史



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前 言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战，打败了美国当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给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解放战争为中国与世界近现代史谱写了一部壮丽辉煌的史诗，那么，中原突围则是这部史诗雄壮激昂的开篇。本书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鲜明观点，采用比较恰当的独特的布局和写法，完整系统地再现了中原突围这一伟大开端的前前后后。它记叙的是，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和王震任副司令员（王震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后任质斌接任）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英勇顽强地在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进行战略坚持，牵制蒋介石“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30余万国民党军队；又毅然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出奇制胜地杀出国民党军重围，一举粉碎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围歼”计划，出色地完成战略牵制和战略转移重任，并由此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继而艰苦卓绝地在豫鄂陕、鄂西北敌后创建两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坚持与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敌后战场，再次完成了“外线牵敌”重任；后又多方准备反攻中原，直至投入战略进攻，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恢复中原河山的全部战斗历程，以及由此所建树的卓著功勋。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主席、王震副主席于1992年6月21日、1993年3月12日相继逝世。为了表达对两位当年指挥中原军区部队的主要领导者的深切悼念和缅怀之情，我们特地将李主席生前所谈的《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王副主席生前所作的《李先念与中原突围》，收入本书作为两篇“代序”。读者从这两篇文稿中，可以更真切地看到中原突围前后的大体历史面目，以及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从而更好地领悟全国解放战争伟大开端的真谛。

我们还将任质斌同志的《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列为本书的“代序之三”；并将他的被李先念主席生前肯定为“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的《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一文、也特意采取“附录”的形式收入了本书。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中原突围的来龙去脉。

正如李先念主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也正如王震副主席所说：“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系列有关的电报、文稿、谈话及报告中，早

就对中原突围等作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原突围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决定了应该将这段历史列为一大重点研究课题，单独撰写成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原突围同其他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研究总结工作一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共湖北省委对编修中原突围史的工作很重视。1979年7月30日，湖北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关于成立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定编辑室从回忆录入手，广泛征集包括中原突围在内的有关历史资料。1983年5月6日，湖北省委正式下达了必须写好包括《中原突围史》在内的三部史书等任务。为此，成立了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请李先念、王震、王首道、任质斌同志作名誉主任。编审委员会由审议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组成，编委会下设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5年7月8日，湖北省委进一步强调包括《中原突围史》在内的“收集和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慰先烈、昭后人的光荣而重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确定编辑部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省直机关党委领导、编辑部机关工作归省委办公厅管理等。1986年3月5日，湖北省委同意关于编写《中原突围史》等方面的意见，确定依托湖北省军区组织征编各路突围的专题资料，并请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分任各路专题撰写工作的指导人。为此，湖北省军区于1986年8月组建起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负责完成省委下达的各路专题立资任务。这样，使我们的撰写工作既有得力的上级领导，又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

首先，立准立好史料，求实求真，进而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把《中原突围史》撰写成一部具有真实性和可读性的史书，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由于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极为艰苦的战略转移，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未能保存下来，这给我们的编史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立准立好这段历史资料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在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时，就已开始征集有关资料，并编辑了《中原突围》丛书第一、第二辑，分别于1983年、1984年出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下达编写《中原突围史》的任务后，编辑部又抓了这方面史料的征集汇编工作。特别是1984年8月6日李先念主席作出“请帮助他们解决找资料问题”的指示，编辑部派人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军委档案馆，征集到一批珍贵史料。1985年3月，编辑部整理出“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中原军区部队战斗序列”等，印发征求意见。1986年纪念中原突围40周年之际，编辑部又编辑出版了《中原突围》丛书第三辑。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组建后，根据中原军区部队分路突围的特点，组织开展了各路专题立资工作。在各路专题指导人和有关老领导、老同志的指导与帮助下，编纂室经与编辑部、陕西省商洛地委党史办、南京军区一八一师军史办等单位通力协作，在“广征、核准、精编”上反复下功夫，先后形成了“中原军区部队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原军区部队南路突围与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掩护主力突围与东进苏皖解放区”、“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突围与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等4个专题的文章、大事记和组织序列。其间，编辑部、编纂室于1988年1月正式成立中原突围史课题组，分工协作，共同承担撰写《中原突围史》的有关任务。课题组首先编写出了简要的《中原突围纪事》，在1988年至1989年的《地方革命史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征求意见。后又按照任质斌等老领导、老同志关于修改补充《纪事》、单独成书出版的提议

和要求，于1990年至1991年，对《中原突围纪事》书稿作了5个回合的编修，并有重点地沿中原突围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该书已于1992年10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西征》、《旌指武当》、《鏖战大别》等专辑。这些都为《中原突围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研究中原突围前后的历史，充分反映在深入研究中所获得的一切新成果，亦是我們着力使《中原突围史》能够正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及其经验、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征集和立准立好这段历史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工作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早在198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和中原突围35周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经过初步征研史料，并到北京向有关老领导、老同志求教，撰写了《胜利的中原突围》一文，从解放战争全局来考察论证中原战略坚持和战略转移，得出了中原突围是伟大胜利的突围这一鲜明的科学结论。这篇论文，首载于1981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后在中共党史学会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举办的全国首届党史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在此期间，李先念主席于1982年，1983年作了《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李先念文选》亦于198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均有关于中原突围前后的论述，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和编写这段历史提供了极重要的指导与依据。1991年，编辑部根据李先念主席《谈话》、《文选》中的精神和有关老领导的指示，又撰写了《胜利来自非凡的革命胆略——纪念中原突围45周年》一文，着重阐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识与胆略，接受挑战，力挽狂澜的大无畏精神，作出中原突围与迎击国民党全面进攻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全国解放战争开辟了胜利道路。此文于7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这表明，对中原突围的研究工作有了新发展。在此前后，编辑部、编纂室及中原突围史课题组发扬知难而进的精神，对一些重大学术观点不执偏见，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攻克重点。解决难题，开展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例如，我们既从解放战争全局的高度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战略作用，同时又从战役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分析认为，1946年6月26日晚，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脑机关主动撤离驻地宣化店为标志，是中原突围战役的开始；到7月31日，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先后实现了战略转移，并肩负起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等重任，标志着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参加突围作战的5万英雄儿女，杀出了国民党30余万大军的重围，在历时36天的战役中牵制国民党兵力达32个旅，并给其以重大杀伤，自己的军力仍保存了4万余人。通过对中原突围战役时限问题的科学界定及对战役本身的具体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中原突围战役不仅从战略上取得了牵制大量国民党军的胜利，而且其战役本身亦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从而揭示了中原突围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之首战，夺得了全面胜利。我们在研究豫鄂陕和鄂西北这两块敌后新根据地的创建时，对李先念司令员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一部亲手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全过程作了重点剖析，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李先念是这一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对中原军区主力另一部在鄂西北敌后创建根据地，也从战略转移路线的改变、战略牵制任务的急需、战略探索行动的取舍、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兴利除弊、是非评说上作了探讨，

从而论证了选择在鄂西北敌后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一个伟大的历史选择。我们还就中原坚持与突围之战略方针的演变，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中原停战谈判斗争，中原突围战役对战略转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经验，中原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态势及兵力变化，从中原突围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研究和探讨。其他诸如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与江汉军区的关系，一纵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第二纵队中的三五九旅返回延安，西进路上的干部旅，鄂东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鄂西北军区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等有关难点问题，都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和表述。《中原突围纪事》、《西征》、《族指武当入《鏖战大别》等书稿的编成，亦是大量研究工作的成果。在本书中，我们博采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

为了完整系统、真实准确、生动形象地再现中原突围前后的历史面貌，我们在撰写这部史书时力求科学地运用准确可靠的史料，精心构思，合理布局，采用比较恰当的体例和写作方法，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即将写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前后的战斗历程与解放战争全局的大形势相结合；将写分路突围后各路部队的战斗历程与中原突围前后的整体过程相结合，同时，既史论结合，又文史结合。

我们曾在《中原突围纪事》一书中，把中原突围前后划分为5个阶段：一是中原战略坚持与突围准备（1945年8月10日—1946年6月25日）；二是中原突围战役（1946年6月26日—7月31日）；三是创造新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8月—1947年1月）；四是主力北渡黄河与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2月—7月）；五是投入战略进攻与恢复中原河山（1947年8月—12月）。这5个总体阶段，也贯穿在《中原突围史》中；但本书与《纪事》的体例、结构又不相同。《中原突围史》的正文部分，由中原突围的历史背景；中原突围的战略部署；中原军区北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突围，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北渡黄河；中原军区南路军、江汉军区部队突围，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第一纵队第一旅掩护主力突围，东进苏皖解放区；鄂东独立第二旅掩护主力突围，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中原突围的历史功绩及其经验等7章组成。很明显，《纪事》中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在本书中则分成第一、第二两章；本书中的第三至第六等4章，虽然突出了各路部队自身的连贯性，但也贯穿着《纪事》中所划分的第二至第四这3个阶段的总体阶段性；本书的第七章中，亦包含着《纪事》里所划分的第五阶段，并以“中原部队保存下来的基本骨干力量投入战略进攻，恢复中原河山”为题专写了一节。本书的这一布局与结构，是经过1985年4月、1986年4月、1987年4月和7月、1989年5月、1991年5月先后5易其纲目，并广泛征求意见，从撰写本书的有关实际情况出发的产物，有利于做到上述“四个结合”，具有独特的风格。

我们还在本书中编入了7个附件，即：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中原军区战斗序列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序列表；参与围攻中原军区之国民党军序列表；中原突围部队及有关根据地地区营以上烈士名录；中原突围部队及有关根据地县团以上干部名册；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各时期主要战役战斗战果统计表，以及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主要战斗战果一览表；13幅附图。此外，还收入了20幅照片。这些附件，是我们作为本书的“基础工程”而逐一完成的，它们与正文相配套，使本书

显得更为完整。

1996年6月26日，是胜利举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原突围50周年纪念日，值此光辉的历史时刻，本书的问世更富有特殊意义。希望它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启示录，进一步深入研究解放战争之伟大开端的“必备书”。这是我们撰著与出版本书的心愿。

作者

1995年12月

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 (代序之三)

任质斌

我想了一下，说五个问题：（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我说的虽然是些空泛的议论，但不是没有针对性的。

（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

1946年6月底，我中原部队分路突破了国民党30余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实现了战略转移。应该肯定，这个突围是正确的。

自1945年8月日寇投降起，到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五师及中原部队英勇顽强地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拖住了国民党“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30余万大军，的确起了把守中原大门、大量牵制蒋军的战略作用，为华北、华东的兄弟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胜利后，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同新四军第五师于1945年10月下旬在桐柏地区会师，组成了6万余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并以位老（即郑位三）和先念同志为首，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之后，我党按照协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的部队都陆续地撤到了华北和苏皖边区。只有中原部队尚未撤离。

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了湖阳、双沟、祁仪等较大战斗。由于这几次作战没有达到全歼犯我之敌的预期目的，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步步向我紧逼，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日益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中央曾同意中原部队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以大部主力去皖东。中原军区当时确定，王树声部3个旅、三五九旅转移到皖东去，与新四军二师会合；同时由王震、周志坚同志和我带第十三旅护送，能回则回，不能回也留在皖东。五师的其余部队由先念同志和位老、陈大姐（即陈少敏）率领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我们到了平汉路东，刚打下了光山，党中央发来了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说国共两党签订了就地停战的协定。于是，先念、位老发电报给我们，要我们到宣化店开中原局会议。在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能走了。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老根据地。后来有人说：当时如果不管就地停战的命令，继续进军到皖东，那就可以保存四五个旅，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对全局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我看，不应该这样提问题。对于党中央发出的事关全局的命令，怎么可以拒不执行呢？

停战期间，国民党对我在战略地位上比较突出的中原部队，逐步包围压缩，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又曾在1946年二三月间

这是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创立豫鄂陕根据地时协助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工作的任质斌同志，1984年6月24日在北京“豫鄂陕边区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示中原军区力争合法北移。为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曾经进行过争取部队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文，数度向国民党交涉中原部队转移至苏皖解放区。王震同志去和国民党谈判，主要就是谈和平转移问题。但国民党认为我们已经是他就要吃到口里的东西，我们要和平转移，他不干。他们继续调兵遣将，以 30 万之众重重包围，妄图发动“皖南事变”那样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然后再向我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在这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对于国民党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全面内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挺起胸膛接受敌人的挑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当时严峻的实际出发，以无比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指示中原部队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向其他解放区转移。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的战略决策，很像解放后的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

根据中央指示正式作出突围的具体部署，是在 1946 年 6 月 20、21 日。当时确定大小分七路突围，主力是两路。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 6 月 23 日关于“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复电后，我们行动很快。蒋介石的部署是，7 月 1 日向我中原部队发动总攻；我中原部队于 6 月 26 日晚分路举行突围，比他早了几天。

这时进行突围转移，完全应该。不然，就会成为新的“皖南事变”。人家 30 余万大军，我们只有 5 万人（原有 6 万部队已复员了 1 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了；加之我们处在他的心脏要害地区，他是势在必争的。即使我中原部队能在根据地周围打几个大胜仗，也无法保住原有的根据地不丢。这从 1946 年秋华中部队在苏皖地区虽曾“七战七捷”，但仍不得不转移到山东的战例中，即可得到旁证。

中原突围虽然有损失，但中原部队的基于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杀伤了大量敌人，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其预定时间里集中兵力转向对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进攻。

这些都说明，中原突围是正确的。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原部队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区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正是以这一壮举为起点，展开了伟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

在部署中原突围时，我军选定了“主力向西”的战略转移方向。主力向西突围究竟对不对？有人议论说，当时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掉队落伍的不多，力量没有大的损失，你主力部队若是不向西而向东突围，是不是也会好些？

关于突围转移的方向，当时的计划是主力经鄂西北、陕南，走陇东到陕甘宁边区。在正式确定这个突围转移计划时，中原局的委员们是一致同意的。

为什么主力不向东突围转移呢？一是因为：王震同志在同国民党谈判我军合法转移时，就是讲的要转移到皖东地区，所以国民党对我向东转移防范较严，他们的兵力部署的重点就是防我向东转移。二是因为：淮河与长江中间有个巢湖，如果主力向东，要么从长江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要么从淮河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当时广西军的战斗力较强，如果把两条狭窄地带封锁起来，我们的大部队就进退两难了。这个问题，当时曾经摆开地图研究过。

皮定均那个旅很顺利地到达皖东，很难说明若主力向东突围，也一定会很顺利。皮旅只几千人，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几个钟头即可通过上述狭窄地带；而中原部队的主力却是三四万人，行动就不那样灵便了。二者不可类比。因此，没有根据说主力向西突围是错误的。

当然，向西突围的具体部署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从领导思想讲，当时我们把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看得简单了一些，对于进行外线作战——特别是对于到鄂西北、豫鄂陕崇山峻岭中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

中原局的委员，多数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当时以为突围到陕甘宁边区不过两三千里的行程，来个 20 几天的急行军就到了。这有点经验主义。事实上，1946 年中原突围时的情况，同过去红军长征时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

第一，国民党的军令、政令相对统一了。红军长征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军阀割据。红军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部队就进不了四川；红军到了陕西，杨虎城的军队又不准四川部队进陕西。红军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而中原突围时，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虽然仍有一定的矛盾，但都脱离了自己的地盘，可以全国调动。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火力加强了。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军和红军都是两条腿走路，但国民党军队跑不过红军。而到中原突围时，国民党可以用汽车、公路运兵了。我们到浙川时，发现原被甩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却已利用公路汽车赶到我们前边了。这时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大大加强了，一个班就有一挺轻机枪，能组织起严密的交叉火力。

第三，国民党的地方保甲组织建立起来了。保公所里装有电话，我们的部队刚一出动，他的电话就打到前边去了，马上就搞坚壁清野。

这三点，我们在中原突围前都认识得不深。此外，当时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鄂西北、陕南是崇山峻岭、穷山恶水，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后来，部队过汉水、丹江后，在鄂西北和秦岭山间里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宿营都很困难，而且山高、路险、沟深，在一条沟里走几十里路，转过来、转过去必须过几十趟河。夏天过河，水也刺骨的凉。所以走几天，鞋子就磨烂了。以后打赤脚走，脚又磨破了。马掌也磨掉了，马也走不动了。那个境遇是很苦的。

如果我们在突围以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得足一些，准备得好一些，损失当然会减少一些。但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没摧毁之前，大兵团伸到敌人腹地作战，再强的指挥员也不可能使部队不受损失。1947 年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地区打了许多大胜仗以后，挺进到大别山，不是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么？那还是胜利的反攻呀！当时我们是突出重围、向西作战略转移的部队，不受一定损失是不可能的。

所以，对主力向西突围中的损失应当作具体分析。有些损失是可以减少的，有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突围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使可以减少的损失未能减少，这当然是失误，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突围方向的根据，不能说明主力向西突围是错了。

（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

我突围到陕南的部队，自 1946 年 8 月初在豫鄂陕边区建立几个军分区起，到北渡黄河止，又在豫鄂陕地区坚持斗争了半年多时间。这是遵照党中央发出的新的指示——在敌后就地创立根据地、继续在外线牵制反动派的指

示进行的。在半年多的坚持中，豫鄂陕军区部队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好几个旅，特别是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为其他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兄弟部队夺取胜利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意义是很大的。

这半年多的坚持是极为艰苦的，我军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当时党中央确定中原局的几个领导同志回延安，派汪锋同志到豫鄂陕边区主持工作。汪锋同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和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行署的几位同志，积极领导了这场艰苦斗争。

在这场艰苦斗争中，陕南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陕南地下党和巩德芳等同志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那我军就更困难了。现在写这段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当年的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

与突围到陕南的部队一样，突围到鄂西北的部队和留在鄂东、鄂中坚持的部队，也都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部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一直坚持到刘邓大军南下，用血和汗写成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张体学部最后几乎打光了，打光了也是胜利的。担负牵制任务的部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

1947年二三月间，豫鄂陕军区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

北渡黄河是正确的，把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从突围进陕南到北渡黄河，我军在豫鄂陕边区顽强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如果还继续坚持下去，再拖上半年，那损失恐怕更大了。

有人说，中央不是要你们在陕南坚持下去吗，怎么北渡黄河了？据我所知，当时不完全是这个情况。中原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到延安后，过了一段时间，曾经决定我仍回陕南去，协助豫鄂陕军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临行前，我到刘少奇同志那里请示，刘少奇同志确曾讲过：一定要在陕南坚持，不惜牺牲，牵制住胡宗南的部队，就是打光了也是有意义的。但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面吃饭一面对我说：看情况办事，部队能在那里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过黄河。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是同意和批准了豫鄂陕军区部队过黄河的（汪锋同志插话：我1959年到北京，在怀仁堂小房子里，周总理对我说：你们不过黄河也不行。主席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北渡黄河，正是为了保存“青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你再坚持下去，也拖不住胡宗南的部队使他不进攻延安。虽然可以分散他的一部分力量，但起不了根本改变局面的作用。

北渡黄河，就是从陕南撤退。1947年3月当国民党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时，党中央不是也断然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吗？这种撤退正是为了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从陕南撤退，到晋城休整一下，让部队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参加战略反攻，是对的。这已被后来挥师南下、重返中原的事实所证明。

（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

1947年六七月间，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于会议。这时，作为领导来讲，应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成就和意义，针对部队过了黄河后的一些失败情绪，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大家乡打气，多讲前途光明。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毛主席就曾高度评价长征的伟大胜利和意义，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这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这次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差不多。因而在这次高干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已存在的某些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的失败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有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的论断是出自中原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当时我是中原局的一个委员，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有责任的。后来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重返中原时，幸亏陈毅同志1947年11月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淮阳地区讲了话，从战略全局上充分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和五师部队的重大贡献，才把大家的劲重新鼓起来了。现在编写中原突围史，应该从正面的叙述中，来消除那些消极的影响。以上我讲的5个问题，对写豫鄂陕边区的历史，对写整个中原突围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帮助？我认为只要把这几个观点树立起来，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就不必扯谁是谁非了。

李先念与中原突围 (代序之二)

王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豪迈地宣告结束的。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先念同志在《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则首当其冲。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等同志率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南下，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并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前后，我军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继而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与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了 30 余万军队进攻包围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中原地区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曾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委派，于 1946 年 3 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要我记住告诉先念同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我于 4 月 9 日返回湖北宣化店后，即向先念同志等作了传达。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使我们当时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进行顽强的战略坚持，同时加紧了对付突然袭击与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后来突围，都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为迎击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制定了我军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并在拟出和调整南线作战方案与战略方针的前后，对中原军区主力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也分别作了最后选定，还对主力突围与原地坚持部队的战略牵制任务、分路突围的战略战术等均作了明确指示。正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中原军区部队面对蒋介石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发起的大举“围歼”，当日晚即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一举杀出了国民党 30 余万

大军的重围，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胜利地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早在 1946 年 7 月 15 日就曾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电报 指出“ 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 ”，“ 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 ”，“ 关系全局甚大 ”。10 月 1 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再次指出：“ 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这是对中原突围战役，以及随后迅速创建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新根据地，广泛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和正确的历史总结。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又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创造和积累了实行战略转移、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鲜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还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再后来，由原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即豫鄂陕军区主力）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重返中原；还有在中原敌后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各支部队和游击队，都一并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投入了恢复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所说的中原解放军“ 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 ”，即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和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等胜利返回延安，这亦是中原突围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率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受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三五九旅扩编为一个军，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斗争。后来，这支部队打到陇东、关中，消灭了胡宗南不少的军队，直至进军新疆，解放新疆，以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突进苏皖解放区的第一纵队第一旅，补充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后又改编为华东独立师，统一全军部队番号时又改为第一八一师，先后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临汾、太原等著名战役。如果没有胜利的中原突围，也就没有这两支部队后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先念同志在关于《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曾经说过：“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 ”记得 1946 年 10 月 3 日，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词时，也曾说过“ 这次我军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继中原突围之后的各路部队的转战，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历史事实，都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当年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所取得的胜利，是与李先念司令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先念同志是一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生

活所迫，离家到汉口学木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他受到很大影响。他毅然于1926年10月回到家乡，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翌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同年12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1931年10月，他率领陂安南县的一批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积累政治工作经验，在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各次“围剿”中，他率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显露了军事才华，并于1932年接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在西征转战中，他率部顽强奋战，多次承担重任，化解危局，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绩辉煌。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先念同志奉命率部迎接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并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通道。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先念同志率部在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6年11月，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受挫后，1937年3月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先念同志统一指挥军事。他以对革命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于1937年4月底到达星星峡。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表现出的坚强党性，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元帅也说：“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处险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木工，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成长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高级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初，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创建了由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区域，1942年7月，开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43年1月，他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经过7年奋战，他率领的五师部队发展成为5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摩擦，解放了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作战，同时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在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在1945年6月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念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豫鲁解放区，那都是较顺利的事，但他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全局出发，冒着巨大的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

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6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10个多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当国民党以30余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从容自如，指挥若定，与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选定敌人“7·1”发动总攻之前，于26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主力，斩关夺隘，冲破了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驱1000公里，胜利实现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他还指挥了其他各路部队的突围行动。突围战役后，他又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新决策，积极部署和指挥创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并且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党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后，他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先念同志作为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亲率第十二纵队投入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反攻的伟大构想。先念同志在中原突围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全局在胸、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雄韬伟略，娴熟高超、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挺起胸膛，艰苦奋斗，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最终实现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

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代序之一)

李先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准备，扬言要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我们党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自己的力量发展很快，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人民解放军已有120多万人，除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以外，形成了6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6大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中原解放军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组成的。1944年11月，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于1945年1月到达鄂豫边同五师会师。随后，又跨长江到湘鄂赣和湘粤赣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求达到北和鄂豫边区的五师、南和广东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南征北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和中央部署的变化，他们又北返，和我们在中原重逢。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也是经过艰苦奋斗才从嵩岳地区到达桐柏山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正式组成中原军区。这几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10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的五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5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准备让出的8个解放区，就有湖北和河南。随后，我们让王震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估计到中原解放军是要吃苦的，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

李先念同志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期间的1982年、1983年，曾三次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同志谈话。《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是这三次谈话的整理稿《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的第十个问题，即最后部分。节选自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第449至454页。

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1946年突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6月23日的电报中说：“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我们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又在7月15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我们打电报，对这次突围作了正确评价。他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中又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截至1947年2月，中原解放军又在敌后转战了8个月，继续牵制了国民党24个以上的正规师和大量保安团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持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在中原突围战役和创建新根据地中，广大指战员为了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英勇奋战，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重重包围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下来两万余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张才千、李人林同志率领千余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汉水，跨长江，进到湘鄂西部地区，王定烈同志也同他们一起转战大江南北。皮定均同志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后，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熊作芳等同志率部在大别山地区，罗厚福等同志率部在鄂西北地区，刘昌毅等同志率部从鄂西北到皖西地区，文建武、汪锋等同志率部在豫鄂陕地区，还有一些同志率领小股部队分散在中原地区，他们都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开展了游击战争。这些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党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后来又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当然，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30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

但如果离开历史实际，凭想象说东道西，就不妥当了，既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

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任质斌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工作过的健在的老同志很多，做编写工作的同志可以去人或去函了解，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

由于事隔几十年，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能回忆起来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上面讲的几个问题，供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

中原突围史

第一章 中原突围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中原解放区反对内战与争取 和平的斗争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原上空又罩上了内战阴云。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国投降。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尖锐的民族矛盾已被中国国内严重的阶级矛盾所代替。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则要坚决保卫人民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兵遣将，以“受降”为名疯狂抢夺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蒋介石集团要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尤其军事态势对其十分不利。国民党的44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中原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加之国际国内反对内战的声浪很高，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重庆和谈邀请，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欺骗人民，掩护其内战准备，并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

饱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和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共产党，迫切而真诚地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早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意愿，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8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再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和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在此重要关头，中原解放区军民坚守前哨阵地，牵制国民党军队向其他各解放区进犯的兵力，对实现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和战略意图，显得尤为重要。

中原解放区，亦称鄂豫皖解放区。它是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外围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五师及其根据地，自1942年7月下旬起即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43年底就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4年10月，中央军委划五师活动地区为湘鄂豫皖军区（后通称鄂豫皖或鄂豫皖湘赣军区，由五师首长兼军区首长）。当时，李先念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政治委员，任质斌为五师副政治委员，陈少敏为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位

三系 1943 年冬派到边区的华中局代表。1945 年春，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抵达这里，与五师部队会合；在五师大力配合下，向南扩展到湘鄂赣地区，后继续南征。截至日本投降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及江西的彭泽、瑞昌；西达湖北的襄樊、荆门、当阳、宜昌，南起湖南的南县及湖北的通城、通山，北抵河南的叶县、舞阳（均不含县城），跨越鄂、豫、皖、湘、赣 5 省交界的广阔地区，拥有人口 1300 余万，连同游击区全边区人口共约 2000 万。据郑位三、李先念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21 日向中央报告，边区行政区域的政权组织，有边区行政公署下辖的 7 个专员公署，38 个县政府；能征收粮赋区域（包括基本区和游击区）的人口 1085 万。边区的管辖范围，按原建制县共 64 个。另据鄂豫皖湘赣各省及有关地中中共组织史与地方史研究人员核计，日本投降时，鄂豫边区共有 8 个地方委员会、专员公署、军分区，11 个中心县，66 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五师兼鄂豫皖军区部队亦发展到 5 万余人，民兵达 30 余万。五师及其根据地所辖区域，地处中原腹地，并将通连 9 省的战略要地武汉包围其间，境内直通平汉、粤汉两大铁路，横贯长江、汉水两大水系，山岳连绵险阻，湖泊星罗棋布，地形复杂，林木丛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既是交通运输枢纽、又是屯兵掩军重地。国民党军事当局对此曾深感忧虑，认为，“中共踞此，可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枣，以控荆襄；并可切断我军平汉路中原之大动脉”。作为当时全国 6 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踞险地而扼要冲，既可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行直接抗衡，也可对其他解放区形成有力支持。

此时，中原局势，维系全国。

二、国民党军队进犯中原解放区。中原八路军、新四军加速实行战略转变

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迅速调动兵力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美国出动大批军舰，飞机，帮助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守护交通要道。甚至“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做守备队，直到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即 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进犯解放区；而命令汉奸、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 月 23 日，又命令侵华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收回”解放了的地区。侵华日军则表示“绝对确保”其所控制的地区，甚至汉奸、伪军也表示要将所在地区完整地“交还”给蒋介石。这就出现了美、蒋、日、伪合流，对解放区发动进攻的严重局势。

蒋介石欲控制全国，必先夺取中原。在抗日战争中从日军手中解放这一地区大片国土的新四军第五师暨鄂豫皖军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目标。8 月下旬，国民党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战区聚集重兵向新四军第五师辖区大举进犯，其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之第六十六军，经郝穴（江陵东南）、监利、沔阳向汉口开进；同日，第九十二军亦由湘北出动分两路向潜江、汉阳、武昌地区开进；8 月底第三十三集团军之第五十九军由孔家湾（宜城南）、流水沟（宜城东南）、张家集（钟祥东北）、洛阳店（随县南）出动，向应山、信阳地区开进；8 月 26 日，第三十九军和新五军分别自巴东和秭归、兴山地区出动，到达江陵、沙市、潜江一线。9 月 1 日第七十七军

由远安、枣阳、荆门地区出动，经京山、安陆、随县向花园地区开进；第二十六集团军为后方“绥靖”兵团，所辖之第七十五军由宜昌以西之南津关向宜昌、十里铺（江陵北）、沙洋（荆门东南）、天门，应城，汉川*《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文中所言“敌人”，系指日军。地区开进。国民党第五战区之第十五、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和新八军，则向豫中、豫西地区开进；第九战区之第七十二军，一部进至咸宁古田畈、汀泗桥和咸宁县城之线，一部进抵通山以北之咸宁马桥；新三军9月17日进入九江、柏敦地区；第十战区之第八十四军向鄂东、鄂北地区出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游击纵队等及鄂豫挺进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游击纵队等，亦配合正规军向鄂豫皖湘赣解放区进犯。他们不仅进占了鄂豫皖军区为避免内战而主动撤出的鄂皖边、鄂南和石（首）公（安）华（容）解放区，而且相继侵占了鄂中、襄西、襄南、豫南、豫中等大部解放区，抢占了早在新四军第五师战略包围之中的重镇武汉，以及河南的信阳、驻马店、郑州、洛阳、南阳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一战区和第十一战区执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方针，于8月下旬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数十万大军，纠合日伪军，向豫西、豫东、豫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活动在嵩岳地区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亦遭到重点“围剿”。这支部队是中共中央为了开辟河南工作，于1945年2月组建的一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当时称河南人民抗日军，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刘子久任副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支队，共1.5万余人。他们到河南后，建立了6个军分区、地委、行署和2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北抵黄河、南接伏牛（山）、西起崤山、东邻平汉（线）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将豫西地区划分7个“清剿区”，意欲置其于死地。其间，上官子平部侵占了渑池、孟津、新安；武庭麟部进犯洛宁、卢氏、宜阳、伊川解放区；刘献捷、曹福林等部强占登封、密县及禹县、神后镇、偃师、缙氏镇。伪军庞炳勋部占领民权等地。第十一战区第四十七军暂一师进犯大康、西华，第五战区第五十五军第八师侵占扶沟。还有国民党冀鲁豫边挺进军邵鸿基部开进封丘、延津，第八十五军进至原武，第五十五师侵犯武涉等。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七、第九战区还加紧围攻抗日南征刚刚到达湘赣粤边境五岭山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这支英雄劲旅于1944年10月由三五九旅为主组成，以“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的名义从延安出发，开始南下抗日。1945年1月27日在大悟山与新四军与第五师会合，作短暂休整后，于2月14日继续南下，和五师部队一部于1945年4月建立起湘鄂赣边根据地；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临时区党委和行署，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为副司令员、王恩茂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钧为行政公署主任。在此期间，南下支队为了实现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足点，逐步向南发展的方针，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的番号更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围攻，建立起1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7月，南下支队遵照毛泽东“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又奉命继续南征。国民党第九战区出动3个军的兵力，在湘东南的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及赣西南的莲花，永新、遂川、上犹、崇义、大厦等地区，实行围堵和追击。第七战

区余汉谋部则以曲江为中心，在粤北乐昌、仁化、始兴、南雄一带部署重兵迎击，企图趁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饥饿疲惫之机，将其“围歼”在湘赣粤边三角地区。

中国共产党早已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并针对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及时作出了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并有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决定》中还强调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团的同时，应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加强民兵建设。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表明：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既是迫令日本侵略军缴械投降的需要，又是为了战胜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需要。其中心内容是组织形式由以游击兵团为主体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转变为以正规兵团为主体的反内战战略力量；作战形式由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转变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实行这一转变，首先要集结力量，建立起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作出军事战略转变决策时，特别关注中原地区及南部战线，分别对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作了重要指示。8月10日，中共中央电示五师：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同一天，中共中央电示河南军区：你们应放手扩大地方，相机占领平汉线，陇海线，夺取武装，发动群众，坚持河南，迅速打通五师与水东（即新黄河以东）之间的联系，配合八路军夺取全华北。在蒋介石军队东进与北进时，应积极袭击侧翼与破坏其交通，尽量迟滞蒋军行动，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12日，中共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中央局，管理五师活动范围以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决定派徐向前往中央局书记，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未到前代理书记，并指定李先念、陈少敏、傅钟、任质斌、程世才、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为中央局委员。15日，毛泽东电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时局虽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能集中1至2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重要，能否在半月左右完成？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鄂豫皖湘赣）军区，开始加速实行战略转变，在日军宣布投降后，部队立即展开受降工作，在8月中下旬10余天内，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歼灭拒降日伪军3500余人，攻克中小城镇12处。由于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被其侵占，五师迫不得已，停止受降工作，立即集结部队，准备对付内战。在此期间，

五师积极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政治攻势，呼吁他们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一向受到国民党嫡系排斥、不愿打内战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道荣（即程耀德）率部 5000 余人，毅然于 8 月 15 日在河南确山陡沟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壮大了革命队伍。8 月 29 日，李先念于湖北浆溪店尹家湾主持欢迎该部的大会。9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给郑、李的电报中称赞说：你们争取程道荣部队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9 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豫皖边区领导机关、五师师部及主力一部，由平汉铁路东之大悟山，转移至平汉铁路西鄂豫两省交界的四望山机动位置，着手组训部队。9 月 15 日，李先念、任质斌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为适应目前环境变化，坚决打击顽固派之进攻，坚持和创造鄂豫皖根据地，五师决定成立野战军。由文建武任司令员，任质斌兼任政治委员，周志坚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程耀德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 3 个旅，共 1.6 万余人。各旅旅长，政委分别为：第十三旅吴世安、周志刚，第十四旅程耀德（兼）、杨焕民，第十五旅王海山、汤成功，每个旅辖 3 个团，各团番号依次为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五团。9 月 17 日，五师野战军在应山吴家大店河滩举行反内战誓师大会。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对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关于鄂东、鄂南合建一个区党委、襄河方面成立一个区党委（四望山南北 3 个地委因靠近师部，暂不成立区党委），拟集中 9 个正规团，和“请徐向前、傅钟、程世才快来”鄂豫皖等请示电作了回复。复电说：同意暂设两个区党委（即鄂东、江汉区党委）；同意集中 9 个团由你们直接指挥；鄂豫皖的工作，一切你们要自己负起责来，不要希望向前、傅钟、世才等同志很快到来，甚至根本不能来你们那里（后均未到职）。9 月 25 日，鄂豫皖中央局在应山县西北的浆溪店开始执行职务。

五师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抓紧进行了整训。针对当时部队中新成分较多，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和一部分指战员滋长了打败日寇回家安居乐业的和平麻痹思想，作了短期的军事、政治训练。经过大练兵，提高了指战员在射击、投弹、刺杀等方面的军事技术水平；通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美蒋反动派的本质，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部队政治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全体指战员表示：坚决站在自卫的立场，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鄂豫皖解放区。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为适应人民军队战略转变新形势的要求，避免国民党军对分散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击破，必须集中力量反击顽军。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于 9 月 22 日致电中共中央并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建议不等严重情况到来，早日会合王戴（河南军区）及王王（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主力，在桐柏山地区合力一战，以确立中原大局。王王与王戴部队在此之前亦曾数次电呈中共中央，要求与五师会合。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复电郑李并王戴刘，同意郑李意见，集结王戴、王王等主力，打几次歼灭战，以打开坚持中原的局面，配合华北、华东的斗争。

战略转变阶段的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处境十分危急。1945 年 8 月 13 日，中央军委指示河南区党委，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要东与水东部队联系，南与五师联系，将嵩山、水东、五师迅速打成一片。正当根据地

军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鼓舞下，继续向负隅顽抗的日伪武装发起猛攻时，国民党军 10 余万沿陇海、平汉两铁路线，分兵数路，像潮水一样涌向豫西根据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残暴至极。仅在伊川、宜阳、密县、登封、禹县等地，五六天内就屠杀了抗日部队伤病员、地方干部、军人家属及各阶层同胞 500 余人，逮捕 700 余人，烧毁民房、抢劫民物不计其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刚刚获得生机的豫西大地又沉浸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对此，各军分区部队与来犯之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对戴季英 9 月 8 日关于河南军区应选择适当时机，采取暂时退出嵩山基本区，向东南机动，与五师联系为第一步的请示电，复电给河南区党委并告郑位三、李先念，明确指出：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移动，与五师靠拢。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同意郑李陈任关于集结王戴和王王主力的意见后，河南军区各部队挥泪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嵩岳地区，踏上了南下鄂豫边的新征程。

处在同一境况的另一支部队，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1945 年 8 月下旬，主力到达湘赣粤边境的五岭山区，准备与坚持广东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会合。此时，国民党调动第九战区薛岳的 3 个军和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企图南北夹击，一举“围歼”这支南征部队。8 月 27 日，南征部队在广东南雄上沙坑村召开军政会议，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北返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8 月 29 日及 9 月 5 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日本投降，形势根本变化，我们在广东五岭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故建议北上与李先念部会合。9 月 7 日，中央军委电复王震、王首道：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三、桐柏山会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

自中央军委命令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北返，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靠拢后，两支部队即分别踏上会师中原的征程。

1945 年 9 月 8 日，奉命北返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岭南地区出发，沿湘赣边北上，渡过禾水。15 日，进至湘北浏阳通往江西铜鼓大道上的达浒，遇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密集的火枪火力封锁渡桥和街口，王震指挥部队强占桥头，冲破封锁。当日，部队急行军，翻越九岭，进入鄂南地区。20 日，顺利通过国民党军设置在通城至楠林的公路封锁线，接着越过咸（宁）楠（林桥）公路，准备在太和岭伺机北渡长江，向鄂豫皖边区推进。主力进入鄂南以后，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和新编第十三师沿九江至武汉一线、严密封锁全部长江渡口，国民党第九十九军之第九十二、第九十九和第十五师等分别从崇阳、咸宁、通山几个方向尾追逼近，妄想将南下支队一举消灭。23 日，南下支队主力在吴官堂与该部驻留在那里的第三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团会合，果断取道梁子湖水路。9 月 26 日下午至 27 日上午，部队趁着蒙蒙雨雾，穿过梁子湖，在段家店、樊口一线改乘大帆船渡过长江。

北返途中，国民党在湘赣粤边调集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各一部共 10 余万兵力，对南下支队“围剿”合击。南下支队英勇转战湘粤赣边，连续行军战斗，常以生甘薯、生南瓜、生豆角充饥，加之日晒雨淋，荒野露宿，饥饿疲惫交加，疟疾、痢疾、疥疮、烂脚等症流行，艰苦异常。然而，指战员们在极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友爱的光荣传统，勇往直前，创造过一夜行军 90 公里的惊人速度。9 月 29 日，中共

中央军委致电庆贺南下支队安全北渡长江，指示他们“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10月1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致电中共中央，提议王震，王首道暂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次日，中共中央同意此议。并指示第五师注意补充南下支队。10月3日，南下支队主力在黄安（今红安）县庙基湾与先行北撤的杨宗胜部会合。10月上旬，南下支队到达礼山（今大悟）县与五师部队会合。大悟山区的10月天气已凉，南下支队指战员还穿着破烂的单衣。见此情况，五师司令部令各部队一律暂停发棉衣，把已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先发给北返的部队。当南下支队到达五师部队驻地时，路上耸立着松柏扎成的凯旋门，张灯结彩，两旁用遒劲的大字写着一幅对联“南下抗日，日伪悲泣未路至；北上重聚，军民欢庆凯旋归”，横批是“胜利归来”。一路上，锣鼓声、乐曲声和鞭炮声不绝于耳，欢迎的人群连绵不断。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五师首长都前去迎接。10月中旬，南下支队在黄歧县孙家贩恢复“三五九”旅原名，完成整编工作，正式撤消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

在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北返期间，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部队自豫西向五师靠拢。9月24日，河南区党委决定集结1万部队，于月内南进，第一步到达豫中军分区，并令该分区大部力量仍留原地区坚持斗争，派一个团到南召、鲁山牵制敌人。26日，河南军区第三旅及偃师、巩县、汜水、荥阳、伊川等地方武装集结于登封以南地区，第四、第六支队集结于方山、唐庄一带，作好了南下准备。30日，王、戴所属之第一、第四、第六支队全部集结于登（封）临（汝）禹（县）间之唐庄东西的白里坪、方山一带。因连日暴雨，汝河水涨，待天晴出发。此时，王树声、戴季英所率军区机关、学校及各支队共1.2万余人。10月5日，部队强渡汝河，因遭国民党军队阻击，第一支队教导团副政委张恩贤身负重伤，中途牺牲。10日，到达喳蚜山西夷尉庙、孙城与豫中军分区陈先瑞部会合。12日，集结所有部队约1.5万余人转移到西平县之义封集、出山寨、武功镇一带休整，而后，继续南进。22日，其先头部队与正在桐柏山区作战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王戴部队于10月12日南下行进到舞阳县武功镇时，与活动在新黄河以西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会合。该团系冀鲁豫军区的老八团，团长王定烈，政委杨劲，参谋长常志义。曾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西（华）上（蔡）高（水）临（颖）郾（城）郾（陵）扶（沟）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形成了一块拥有4500平方公里、近100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挑动内战，步步进逼，迫使他们难以立足。10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该团南进，向五师靠拢，并指示其到达后，即归第五师指挥。该团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后，10月19日由遂平县西之槐树镇继续南下，经沙河店、竹沟镇，到达桐柏县之固县镇地区，靠拢了五师部队。

10月24日，王震、王首道所率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所率河南军区部队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与正在桐柏山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李先念、郑位三所率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于唐河祁仪、王田以南，枣阳鹿头镇、流域以北，桐柏程湾西南，随县三和店以西以北的随枣桐唐4县交界地区。在会师期间，五师野战军于10月20日和28日，先后解放桐柏和枣阳两个县城。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给三部首长发嘉勉电。电文说：“庆祝你们三部人民军队胜利的会师，庆祝你们占领枣阳。望你们团结一致，鼓励士气，加强纪律，使每个官兵明了自己的光荣任务，为占领七八个县城，

创造新局面，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伟大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争取全国和平局面而努力。”

这几支部队会师后，经中共中央 10 月 30 日批准，于 11 月上旬整编，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充实了鄂豫皖中央局的领导力量，明确了常委分工，随之改称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时，成立了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五人为常委，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为委员，郑位三代理书记。中原局下设江汉、鄂东和河南 3 个区党委，郑绍文任江汉区党委代理书记，聂鸿钧任鄂东区党委代理书记，刘子久任河南区党委书记。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由许子威任主席，杨经曲、涂云庵、刘子厚任副主席。

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 3 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江汉军区由贺炳炎任司令员，郑绍文任代理政治委员，辖独立第一旅及襄南、襄北、鄂中和洪山军分区。鄂东军区由张体学任代理司令员、聂鸿钧任代理政治委员，辖独立第二旅。河南军区由韩东山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辖独立第三旅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第一纵队由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编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由王树声兼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由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和八路军三五九旅编成，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和第三五九旅 4 个旅，共 1.6 万余人，由文建武任司令员，任质斌任政治委员，周志坚、程耀德任副司令员，方正平任参谋长，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的野战军和地方军达 6 万余人。

四、桐柏战役。中原军区主力东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沿平汉、同蒲、津浦、正太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企图打开通路，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屈服。为打破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铁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肃清日伪残点，控制一段铁路，开辟战场，并集中兵力，相机组织几个“有力战役”，打击国民党军的进犯，迟滞其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加强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为此，各解放区军民先后发起上党、绥远、邯郸、津浦路徐（州）济（南）段等战役。

1945 年 9 月 28 日，鄂豫皖中央局面对国民党军不断进攻，鄂豫根据地大部被侵占的严重局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桐柏山地处豫鄂要冲，我如打开这一局面，阵地即可大开展，河南、湖北之根据地也可连贯起来。同时，从战略上考虑，对华北、华东之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可起很大牵制作用。”为此，准备在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 3 部会合后，集中 2.5 万以上兵力，对进占桐柏山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等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为了夺取这一地区，特请示中央“这一战役行动，政治上是否可行”。10 月 1 日，中共中央电复鄂豫皖中央局，肯定了这一计划是正确的，并指出：集中主力，充分准备，能打几个胜仗，消灭六十九军主力，在桐柏山站住脚，这对于坚持中原斗争是重要的，对其他解放区也是有帮助的。复电中还说：王王、王戴与五

师靠拢后，似须有一个时期休整补充，并将部队整编就绪方能作战，所以不要打得太早，目前仍应集中力量整编部队。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方面为表示和平诚意，曾一再作出让步。其中包括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政府军队 1:6 的比例，缩编为 24 个师或至少 20 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 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诚意，他的既定方针是要消灭共产党。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就诬蔑共产党是“奸匪”，要“剿灭”之，急不可耐地于 10 月 13 日颁发“剿匪”密令，要各战区司令长官遵照《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15 日，蒋介石又发出密电，要刘峙负责围剿伏牛山平汉中段以西、黄河以南地区，将皮定均、王树声部歼灭之。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决不退让。中央军委于 10 月 16 日电示郑李及王戴：“因为国民党进攻王戴，使王戴被迫退出根据地，今又加以截击。此外，蒋介石动员了七十万大军，正向华北、华中进攻，因此，你们向顽军作战，消灭顽军，有充足的理由，对全国大局好转，只有帮助，决无妨害，望你们大胆作战。”再次表明中央确定坚守鄂豫解放区。11 月 3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更明确指出：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现人民自治。因为我们看到浙东、苏南、皖中、皖南解放区的军队退出后，人民遭受屠杀。

10 月 17 日，李先念率五师野战军 3 个旅向桐柏周围地区运动，并于 20 日发起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鄂东、江汉、河南军区所属部队亦奉命积极开展活动，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10 月 20 日下午，五师野战军第十三旅以优势兵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向桐柏县城的国民党第七游击纵队反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三十七团以凌厉攻势突入城内，国民党县长曲运铎弃城逃跑，桐柏县城即被解放。而后，连克固县、平氏两镇，计歼国民党军 1000 余人。21 日，第十四旅进逼随县以北之新城附近戴家仓屋，击溃国民党独立第一支队戴焕章部，歼其 800 余人，缴获军械弹药仓库 1 座。此后，五师野战军分两路向枣阳挺进。10 月 27 日，十四旅解放了枣阳东之刘升店，接着解放鹿头、吉河镇。10 月 28 日，第十三、第十四旅共同解放了枣阳县城，歼国民党守军 500 余人。继之，第十三旅进占双沟镇（枣阳西），第十四、第十五旅进占湖阳镇（唐河南），二纵领导机关进驻湖阳镇。11 月 3 日，第十四、第十五旅解放新野县城，歼国民党守军 300 余人，而后部队全部移至唐河、白河以东地区休整。桐柏山会师后，中原部队还解放了唐河县城。至此，由五师野战军发起的桐柏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经过半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 4 座县城，控制了桐柏山广大地区，共歼国民党军 2000 余人。

与此同时，江汉军区部队乘机收复了大洪山地区；鄂东军区部队占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4 县之东、西大山和商城之余集，以及三里城、东新店、大新店、王家店（宣化店西北）等地区。

在五师暨鄂豫皖军区控制了桐柏山地区及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成立期间，国民党军又重新调整部署。在北面，即调第六十九军之第一八一、第一二八师、暂二十八师；第四十一军之第一四、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师；第四十七军之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以南阳、唐河、泌阳、确山为第一线，

以方城、舞阳、遂平为第二线，逐步向南推进。在南面，集中第五十九、第七十五和第七十七军等3个军6个师的兵力，由信阳至钟祥一线，逐步向北推进，企图于11月内“肃清”中原解放军。

中原局、中原军区为了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改变局面，争取主力在桐柏山地区停留，得以休整补充，并相应使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加强起来，以便地方部队能够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野战部队机动作战，遂决定在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际，展开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

11月8日，国民党鄂豫挺进军第三游击纵队乘中原主动整编之机，侵占枣阳县城。9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三五九旅奔袭枣阳县城，连夜展开攻击，一举全歼国民党军2200余人，再度解放枣阳县城。此仗是中原军区成立之后，继续进行桐柏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开始。嗣后，国民党第五战区为牵制中原军区部队，以利早日与其第六战区部队造成夹击之势，先以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4个团的兵力，由唐河向湖阳镇进犯。中原部队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乘其远离主力，比较孤立，首先将其歼灭于黑龙潭、丁爬山（湖阳西北）地区。11月11日，中原军区以第二纵队第十四旅置于湖阳镇、丁爬山正面一线，以第十三、第三五九旅为迂回部队，第一纵队为预备队，位于祁仪地区，拟待国民党军进至丁爬山地区，将其包围歼灭。12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一二七师第三八一团进到了爬山以西地区，该师主力进至黑龙潭一线就停止不前。此时，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四旅乘国民党军第三八一团立足未稳之际，即对其正面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俘该团团长双宗海以下600余人，毙伤敌400余人，迫国民党军主力向新野、唐河方向逃窜。

湖阳战斗结束后，中原部队主力即于唐河以南之祁仪、湖阳、苍苔、枣阳西北及桐柏一带利用战斗空隙进行短期休整。11月25日，在中原军区前线指挥部驻地，为不愿打内战、全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第一二七师第三八一团官兵举行数千人参加的欢送晚会。该团代表在大会上表示，回去后一定劝告同僚，携起手来反对内战。

12月初，第五战区第十军第二十师侵占枣阳以西之双沟镇。12月6日，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军区部队依托桐柏山根据地相机作战的指示，决定以主力歼灭双沟镇之国民党军。由于该部较为孤立，中原军区决定以第二纵队（欠第十四旅）围攻之。命令第十三旅为主攻部队，位于双沟东北地区；第十五旅为助攻部队，位于双沟以南地区；第三五九旅为预备队。位于枣阳西北地区。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位于襄阳县之程家河、徐家集和枣阳之杨岗地区，控制唐、白两河，并向新野、唐河方向严密警戒；第十四旅守备湖阳、新城一线，阻击北面之国民党军，以保障主攻部队的安全。

12月6日，中原部队部署就绪。7日黄昏，对双沟外围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占领双沟以北一带阵地，第三十八团一部攻占双沟东北之赵家仓屋，第三十九团攻占双沟以东之周家岗，歼国民党军1个营500余人，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攻占双沟以南之三里庙、尚家庄等地，继对大黄庄、杨家庄等地进行攻击。至此，双沟外围之国民党军大部被肃清，双沟镇内守军依托上城工事固守待援。同时，第一纵队第三旅从祁仪出发，经杨岗、徐家寨，赶到程家河镇，歼国民党军1个营。8日上午，第二旅第四团在程家河西岸歼国民党军第一二五师先遣队两个连近300人。在围攻双沟的时候，中原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广大指战员高呼口号，决心活捉二十师师长。8日黄昏，向双沟镇内之国民党军发起总攻，第十三旅第三

十八、第三十七团先后从双沟东北面和西北面突破守军土城工事。三十七团二营歼其师部特务连两个排，击溃其机炮连，缴迫击炮 8 门。中原军区突人部队与国民党守军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此时，北面援救双沟之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及“绥靖”支队，第六十九军第一八一师、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第一四师等分别向程家河、杨岗、湖阳、祁仪、平氏等地进攻。国民党襄樊守军也向双沟增援。鉴此，中原部队遂撤出战斗，向唐河以南之祁仪转进。此战共歼国民党军 1000 余人。

双沟战斗后，中原军区又决定集结主力，歼灭进犯祁仪之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而后乘胜歼灭进犯杨岗之第一二七师。遂以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由程家河、徐家寨地区进至祁仪东南一线；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由双沟东北地区进至祁仪以西一线；第十四旅位于湖阳镇阻击新野、郭滩、杨岗方向之国民党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第十五旅由双沟以南进至湖阳西南之黄家岗、罗家围子，对双沟之国民党军第二十师严密警戒，并担负打援任务；第三五九旅为预备队，进至祁仪以南地区。

对歼灭祁仪之国民党军，当时中原军区拟有两个方案：一是待其第一八一师接近中原部队阵地前沿，一举将其歼灭；二是如其先头部队进到祁仪地区停止不前时，即乘其立足未稳而后续部队尚未赶到之前，迅速将其歼灭，再乘胜歼其全部。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作先头的第五四二团进至祁仪镇即停止不前，并就地构筑工事。中原军区部队即乘其立足未稳后续部队尚未赶到，于 12 月 14 日夜以第一纵队（欠第一旅）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向祁仪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第三旅第八团在镇东祁楼歼其 1 个连。第二旅第五团歼其两个排。15 日，国民党军主力赶到，当晚，中原部队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第三旅第八团已攻入祁仪镇，歼守军 1 个营，但国民党军据守该镇以北村庄进行顽抗。为避免消耗，部队遂撤出战斗。此战共歼国民党军 1000 余人。

在桐柏战役期间，中共中央于 11 月 28 日致电中原局，对这一战役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肯定。电报说：“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线北段的作战（即邯郸战役），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上作用是极大的。”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虽未达到预定的歼敌目的，但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使其在中原地区的兵力增加到计有第五战区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十五、第十、第六十九、第五十五军和第六战区第六十六、第七十五、第七十二、第十八、第七十六军等共 11 个军 24 个师，以及 8 个游击纵队。中原军区部队牵制了如此众多的国民党军，在整个战略配合上所起的作用则更大。

12 月中旬，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以主要兵力向桐柏山区推进，企图施行南北夹击。此时，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更加困难，中原军区军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为争取主动，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于 17 日开始向平汉铁路以东移动。至此，历时两个月的桐柏战役遂告结束，前后两个阶段共歼敌 9000 余人。

12 月 18 日，郑位三电告中共中央军委：“提议改变方针，以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19 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请示中共中央：“配合华北确为重要，但以莫大伤亡减员，再坚持时间，确有

不利。因此，提议主力靠拢军部，此地留五千到一万人的（部队坚持）游击战争。”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你们的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已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停战问题，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出停战希望之有无。……因此，你们转移到军部地区的行动，最好能在一个月之后再进行。”为实施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策应主力向东转移至苏皖地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合，确定江汉、河南两军区部队仍留原地坚持斗争，以牵制敌军；主力部队则分为北路和南路两个方向东进。第一纵队为北路，由桐柏驻地出发，于12月21日进至明港以西之祝林集地区稍事休整，即继续东进。25日在信阳以北越过平汉铁路，第一旅在行进间攻克正阳之汝南埠；

28日，第三旅解放息县县城，歼国民党挺进军1000余人。12月31日，中原局向中共中央提议：“王戴部全部转移，并带成千的干部走，原五师及三五九旅都留下坚持”。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此议。6日，第二旅于东进途中，在第一旅配合下，由第四团任主攻，第五团助攻，一举攻克光山县城，歼国民党军600余人。中原局、中原军区率第二纵队为南路，由唐河以南驻地出发，经过鹿头镇（枣阳东北）、安居（随县西），洛阳店（随县南）、接官厅（应山南）至王家店（孝感北），越过平汉铁路。8日，中原部队两路主力会师于光山、经扶以西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合击企图。当国民党军发觉中原军区主力东进后，其第五、第六战区即以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六十六军之第一四、第一二二、第一二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第一八五、第一九九师的兵力向平汉铁路以东跟进，企图消灭中原部队。

第二节中原军区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 与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

一、停战命令下达。中原军区部队就地集结待命

在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中原，组成中原军区，进行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前后，全国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分别加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坚决从日伪手中收复失地，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进行自卫反击，先后进行了上党、绥远、邯郸、津浦路等战役，阻滞了国民党军向华北等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人民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逐渐觉醒，反内战运动亦节节高涨。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要通过发动内战以控制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美国政府受其国力和民心所限，为维持同苏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实施它以争夺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也不希望蒋介石这时发动大规模内战。在对国际和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分析，权衡利弊之后，美国政府决定对国民党施加某种影响，尽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分，赴华“调处”国共争端。12月15日，马歇尔为执行美国政府的使命启程来华。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中又强调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的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国民军。”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争取时间部署其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基本立场和关于召开中国各党派会议的主张，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化，虽仍是援助蒋介石的，但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而决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奔走呼吁，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亦称三人小组、军事三人小组会），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

有关事项。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在重庆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简称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自1月13日24时起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为实行停战协定，同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郑介民为国民党代表，叶剑英为中共代表，罗伯逊为美方代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执行调处任务。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是一种限制，因而有利于人民。1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指示各级党组织、各部队、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停战命令，不得有误。但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地区除外，蓄意在东北大打；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于1月10日向国民党政府军队发布了停战命令，却又在此之前的1月7日密令其军队“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这就暴露了国民党对停战的虚伪态度。中国共产党毅然以“进行合法斗争”和“坚持自卫原则”的革命两手，与蒋介石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停战协定正式签订之前，中原局曾于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考虑到停战最近有很大可能，决定中原军区主力停止执行去华东或华北的计划，全部留原地坚持，大部分散游击，暂集结4个旅作游击性的运动战。1月9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告知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并肯定了“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下达停战今后，中共中央又于1月11日专电命令中原军区部队于13日24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当时在东进途中已到达平汉铁路以东的豫南、鄂东北一带的中原军区主力，接到停战命令，立即沿着罗山、光山以南一线停止下来。第一纵队在光山县南部白雀园、砖桥、泼陂河一带，第二纵队在罗山县周党畈、涩港店、定远店一带集结待命。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司令部驻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一纵司令部驻泼陂河，二纵司令部驻定远店。其下属各部亦就地停止待命。鄂东军区率独二旅驻扎在麻城、经扶（今河南省新县）间地区；江汉军区率独一旅驻扎在大洪山与澧潭间地区；河南军区机关驻扎在宣化店东北的墨斗关（后移驻涩港店），游击兵团分布在四望山地区。

停战命令下达时，自桐柏地区尾追中原军区东进主力的国民党3个军7个师已进犯到潢川、光山一带。其中第四十七军进入光山、罗山一线，第四十一军驻潢川、光山一线，第六十六军则进到平汉铁路南段信阳、罗山一带。原驻赣北修水、鄂南通城一带之第七十二军新十三师和新十五师此时亦调至长江以北黄陂、黄安（今红安）一线。这些国民党军按照蒋介石“迅速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1月11日，停战命令下达后第二天，国民党军即进占息县县城。1月13日，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第五五四、第五五五两个团向在定远店附近之黄家岩的中原军区二纵十五旅进攻，经激战，国民党军一部被歼，一部溃逃。1月14日，第四十一军第一四、第一二二师，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五、第一二七师，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九师第五九六团及罗山县潢川县保安团，三路猛攻光山，当晚进占光山县城。同日，第七十五军第六师第十六团及第十八团一部与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在大洪山地区侵占江汉军区之三里岗、三阳店、贯庄店、尚家店、

雷公店等地，并将中原军区留置平坝、人和店之伤病员 40 余名全部杀害。

面对国民党军一再破坏停战协定违约进攻，中原军区从停战的大局出发，一面节节退让，一面急电请求中共中央设法使中原地区真正实现停战。驻守光山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在国民党军进攻下，被迫撤出县城。江汉军区独一旅遭进攻时，先撤到桑树店，再撤到沙子岗，国民党军仍步步进逼，江汉部队被迫自卫，击溃来犯之敌，第三团政委熊式钧、第一团参谋长李秀峰及战士 50 多人在战斗中牺牲。1 月 17 日，中原军区司令部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调整防务的建议，要求国民党军停止进攻，合理划定中原军区部队原有根据地中六七个适中的县，作为主力集结驻防地区。中原局为适应停战后的新形势，准备有计划地由长江线、淮河线、信阳至蚌埠线分散干部至其他地区工作，指定了各线带队人员，部分干部已开始转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还对部队和群众广泛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一心一意“就地建国”。但国民党军不但不给中原部队划定防区，反而向其现有驻地进犯。驻商城西南之国民党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驻黄肢之第四十八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军新十五师等，分别向中原军区部队驻地金家集、洪界山、陂安南等地进攻，并扬言将实行“围剿”。1 月 19 日，国民党新十五师师长公然致电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声称该部已奉蒋介石命令进驻礼山之吕王城（亦称禹王城）、河口一带，要驻在该地的中原部队撤出。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

二、国民党调集大军包围中原军区部队。中原地区出现又打又谈局面

1946 年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军区，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之基础上，而不能寄托在停战和平之希望上，一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瓦解对方内战图谋，同时要坚持自卫原则，防止与打击对方的突然袭击。中原军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面反击来犯的国民党军，一面请求调处军事冲突。自此，中原地区开始了国共双方进行谈判、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局面。

1 月 13 日至 23 日，国民党第四十一、第四十八、第六十六、第七十二军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驻地周围的大小村镇大部占去，战事无日不有。1 月 19 日，应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军事调处执行部在重庆组建了第九执行小组（即第五、第六战区小组，又称汉口小组），当日指派小组成员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美国代表福特前往中原地区执行调处任务。

1 月 23 日，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在罗山举行谈判。王震严厉斥责国民党军破坏停战协定，强占光山县城，挑起新的军事冲突，要求国民党军立即撤出光山县城。经过激烈交锋，当日双方签订了《罗山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停留于当时各自所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国民党军方面同意中共军队得在其所在地区之间运输给养，绝不阻挠或干涉。

1 月 29 日，第九执行小组由汉口到吕王城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会谈，达成《中原临时停战协议》，明确规定：由于《罗山协议》所包括区域中现时存在的特殊情况，该地区将履行《罗山协议》，暂不执行军调部令国共双方军队由现驻地后撤 60 里之和字第二号命令。

3 月 5 日，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继张群之后任国民党政府代表）、马歇尔在赴各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途中，于中午 12 时由延安飞抵

汉口，与程潜、李先念磋商中原地区停战事宜。同行的还有叶剑英、郑介民等。6日上午10时离汉飞渝。在汉期间，中原地区国共双方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承认《罗山协议》和《中原临时停战协议》有效，中原地区国共双方军队应限制在原有区域内，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同意在汉口设立中原军区办事处。根据这一协议，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于3月12日成立（驻汉口德明饭店），处长郑绍文。

罗山谈判和汉口谈判并未能阻止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自1月23日至3月28日，国民党军除继续在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驻地的边界扩伸蚕食外，重点进攻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企图首先搞垮3个军区，进而一举歼灭中原部队主力。其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伙同国民党应山县大队，自1月至3月，逐步推进，筑碉抢粮，侵占了江汉军区应山县吉羊区之张杨店、刘家店、闵家冲，吉羊山等地，邻近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所在地赵家棚之洪庙冲亦被强占。鄂中军分区安应指挥长余孝礼带一部前去交涉，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团与黄保山乡公所武装竟开枪射击，余部被迫还击，造成流血事件。经中原军区强烈要求，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薛子正、邓为仁、葛雷莫夫于3月25日到应山调处。26日到张杨店、太平镇等地调查，28日邀集双方谈判并口头达成《应山协议》，当即下令双方部队后撤，国民党军撤至张杨店及其以北地区，中原军区部队撤至太平镇及其以南地区，张杨店与太平镇间，双方不得驻兵。

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在谈判的掩护下，不遗余力地加紧进行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成立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二三月

间，撤消只能指挥局部兵力之第六战区司令部，成立华中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机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统一指挥第五、第六绥靖区武装力量，强化进攻中原军区部队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大力调兵遣将，先后将原属第九战区驻浠水之第二十六军及驻宋埠、应城之第七十二军，原属第十战区驻立煌（今金寨）之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统统划归武汉行营指挥。将驻陕南汉中之第十军军部调老河口，其第二十师调至鄂中，又调第七十六军新一师配属第十军，准备参加围攻中原部队。武汉行营又于3月份将第七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由阳新偷运至鄂东麻城一带。这就在中原部队驻地的西方、南方、东方形成强大的军事包围力量。同时又将驻光山、罗山之第四十七军，原属第一战区驻泌阳之第十五军，驻漯河、确山之第四十一军，驻灵宝之第五十五军，统归郑州绥靖公署指挥，在中原军区部队驻地的北方构成压倒之威胁。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亦密切配合，于1月29日召开第526次会议，宣布所辖枣阳、光化、南漳、保康、应山、随县、安陆、京山、钟祥，荆门、宜城、远安、当阳、宜昌、江陵、潜江、天门等县县长及党团，在绥靖期间统归第五、第六绥靖区指挥。配合大军压境，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又在中原部队驻地周

围各县日夜抢修碉堡与工事。仅第七十二军新十三、新十五师配合经扶县政府，强迫民众，甚至强令拆毁民间砖房祠堂庙宇作筑碉器材，在停战令后一个多月，就在七里坪、檀树岗等地抢修碉堡80余座。

3月上旬，鉴于国民党军加紧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和蚕食，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原军区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

了整编。撤消第二纵队第十四旅，所属各团编入第一纵队第一、

第二、第三旅，分别为第三、第六、第九团；河南军区独立第三旅与第二纵队第十五旅合并，撤消独立第三旅番号；撤消江汉军

区独立第一旅旅部，所辖各团归江汉军区直接指挥；撤消鄂东军区，组建鄂东军分区，保留独立第二旅建制；江汉军区之襄北、襄南、洪山等军分区及河南军区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亦先后撤消。

王首道奉命于3月初离开中原军区后，由任质斌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型代政治部主任。

三、中原军区力争主力合法转移。国民党当局横加拒绝

处在国民党军层层包围中的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驻地系遭战争严重破坏、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小地区，给养极度困难。且国民党军不顾停战协议，以优势兵力步步进逼，致使中原部队的供给困难日甚一日。据此，中原军区接连电报中共中央，请求迅速接济，并一再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使中原部队转移到皖东或华北解放区。中共中央对此极为关注，一面电告华中、太行等解放区为中原军区部队筹款，一面与国民党谈判中原军区主力的转移问题。但是，国民党欲置中原军区部队于死地，对转移之事横加阻挠，无理拒绝。

早在中原军区主力到达罗山、光山一带之初，国民党军围攻光山县城时，中原军区即电中共中央军委：“孙震令四十七军，即（使）停战时间已到，不但应继续执行清剿光山城之任务，并强占光山城。请向政协会议提议，我们有二、三纵队、独二、三旅和军区干部四五万人应往何地区就食为宜，因粮食极端困难，经费奇缺……”。中共中央当即将此电转给周恩来、叶剑英，并指示他们：“移地就粮可提出交涉”。1月14日，李先念、郑位三以急电报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军于是日强占光山县城，中原部队“数万人处在经扶、光山、罗山、礼山四县间狭小地区，财政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请求中央帮助解决财政困难并制止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动。1月17日，中原军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调整防务及实行转移之建议书时，要求合理划定六七个县作为中原部队驻地，否则中原军区部队将实行向东转移。1月26日，中原局报告中央，鉴于数万人“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提议早日将主力移动一部到华北。2月10日，中原局致电中央并周（恩来）叶（剑英）饶（漱石），再次提出粮食太难，部队拟迅速转移，最好是由周（恩来）在渝交涉好后合法转移。否则就以停战命令第二条（此条规定部队换防不在禁止调动之列）为由，只通知对方，不等允许即行转移。2月14日，中共中央电复中原局：“你们部队转移已由周交涉，不到最后不要非法转移。”后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李先念部要求调华北就食，国民党方面答以“饬中共部队缓调”，“在未奉得协定命令前不得北调”，使中共中央及中原军区为争取部队合法转移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

2月20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到达宣化店与中原军区会谈。会谈中，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又郑重向第九执行小组提出：中原部队2.5万人要转移到安徽五河就食。这一提议虽与第九小组获致协议，但第九小组国民党代表又以此事须转北平军调部请示为由，搪塞拖延，不了了之。

3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饶漱石：“现争取五师合法转移，请周考虑即在北平再向马（歇尔）张（治中）提出，作出最后决定，即交执行部派小组去监督执行。”3月5日，周恩来趁与张治中、马歇尔一同到汉口巡视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之机，面告中原军区负责人

谓将于回渝后数日内讨论中原部队转移问题。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汉口与报界人士谈话时亦表示：“湖北中共军以驻扎地区粮食不定（足）为理由要求将全军四万人调往安徽之五河，决定返渝后再谋解决。”但是，回渝后，这一提议即遭国民党蒋介石拒绝，又一次使中原军区部队合法转移的希望成为泡影。3月14日，军调部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等将此情况电告中原局并报中央，请周恩来在徽再作争取。

在此前后，国民党军在东北以“接收领土”为口实，抢占了沈阳、抚顺、营口等大片地盘，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地方，国民党也要攫取据为己有。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歼灭伪军及日寇残余势力共2万余人。国民党蛮横地要共产党将长春等地拱手相让，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国民党恼羞成怒，在重庆会谈中，蒋介石让马歇尔转致周恩来，“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将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它若干要求。”

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已调集30余万兵力即将对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围歼”的计划，于4月29日由发言人在延安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此种行径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再次郑重提出应迅速允许李先念部安全转移与复员，5月4日，一再践踏停战协定之国民党武汉行营，公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拒绝中共的这一要求，还冠冕堂皇地表示：“吾人为遵守停止冲突命令及罗山协议之规定，不能听其向指定区域之外任意转移”。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愈益加紧，对江汉、河南军区及鄂东地区已由“蚕食”转入“清剿”。3月中旬，刘峙与程潜分别以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第四十一军一个师、第六十六军一部及豫南保安队，进攻中原部队驻地回龙寺、郭山冲、竹沟等处，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向应山刘家店进攻，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攻占了距中原部队驻地中心地带吕王城仅一里许的王子圩。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10日停战令下达至4月13日，国民党军进攻中原部队共225次，侵占城镇村庄124处，打死800余人，打伤2300余人，俘去200余人。国民党军在中原解放区四周大肆构筑碉堡工事，并在驻马店、漯河、花园，潢川、商城设立高级将领指挥所，中原形势箭拔肾张。

5月8日，周恩来偕国、美代表赴宣化店谈判中原地区停战问题时，再次郑重重申应准许中原军区部队转移。国民党方面和美方代表当时不予回答。5月10日下午离开汉口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对这一问题极力回避，美方代表白鲁德在谈到中共中原军区部队之移动问题时则云：“此事之大，须至京后（注：国民党政府于5月5日还都南京），再作商讨。”同前几次如出一辙，他们回南京后，即将此事置之不理，使中原军区部队的合理要求一再受阻，无法实现。

中共中央和中原军区虽以让出这块根据地为代价，换取6万将士之生存，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许，他们认为中原军区部队已是落入其口中的一块美食，必欲吞没消灭而后快。

四、中原军区部队坚持苦熬。董必武到宣化店慰问

无理拒绝中原军区主力合法转移的国民党当局，还在大军压境不断进攻的同时，对中原部队极力进行政治破坏与经济封锁。国民党军每占一地即大肆搜捕屠杀中共之区乡干部、部队伤病员及家属、复员军人和群众。1946年

1月14日至16日，在江汉军区驻地即捕杀150余人。4月14日，袭击安陆财政机关，打死乡长，抢走粮食。4月26日，又将安陆新民乡农教会主席刘秀玉割耳挖鼻剁手而后杀死。国民党并多次派遣特务投毒破坏。2月中旬一次就使中原军民500余人中毒。第七十二军军部于3月中旬派出便衣80余人混入中原地区投毒。商城县县长顾敬之派特务周尚发等11人混入泼陂河、砖桥等地投放毒药52包，中原军民1200余人中毒，30余人被毒死。经济封锁更是严密。各路口均派兵把守，禁止粮食及一切生活物资进入中原军区部队驻地，并在边缘地区逼粮、索款、抢劫，故意抬高粮价，吸引中原解放区的粮食外流。对中原军区部队派出之购粮人员，屋在谈判桌上一再表示“绝对不加阻拦”，而实际上则百般阻挠，甚至拘捕打杀。同意中原部队“得在其所在地区之间运输给养”的《罗山协议》签订后，中原军区派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赴汉口商议购粮事，王震以罗山、礼山、光山3县产粮有限，要求派人到皖东运盐换粮，国民党拒不同意。2月16日，中原军区粮秣科长张树廉（时名李光华）等21人，在募粮途中于河口土门岗被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无理扣押。后张树廉被杀害。3月28日，夏店国民党军新十五师竟以机枪截击中原独二旅第六团运粮人员，又造成伤亡12人的惨案。

3月15日，中原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认真研讨如何战胜困难，摆脱困境。会议认为，中原军区部队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当地购粮至多能坚持一个月；当前无合法转移之势，尽可能在原地苦熬一个月，以后仍无合法转移可能时，只有“非法”转移之。并围绕苦熬与转移之方针，决定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复员2万人，但保持主力，保持精华。早在2月1日，当中原局派出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任质斌到达延安时，刘少奇听了汇报后，就解决财政困难和部队复员等作了指示，提出中原部队复员2万人，第一步，先复员1万人。根据这一指示，中原局在此次高干会议上正式确定复员2万人。会前已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二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号召全体人员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三是分散一批干部，运用各种方法转移至华北或其他地区隐蔽，以利于部队苦熬和转移。3月16日，中原局将会议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根据中原局会议精神，中原部队千方百计坚持苦熬，全军上下，一手持枪，抗击国民党军，一手拿锄，生产自救。将士们把在生产上流汗看成与在战场上流血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以顽强的意志团结自己，依靠民众，克服困难。全军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各连队成立经济生产委员会，干部战士发扬工农子弟兵的劳动本色，挖野菜，捕鱼虾，磨豆腐，生豆芽，开荒种菜，改吃稀饭，以战胜缺粮的困难。第十三旅自3月16日起停止领取油盐菜金及办公费用。第三五九旅重振当年大战南泥湾的雄风，努力生产。许多单位做到了柴菜、伙食自给。第一纵队第二旅等单位还开展了编篾货、卷烟、打草鞋等手工生产，和贩盐、贩布、贩猪等商业经营活动，以换取生活费用。一时间，驻地附近大山小

山上到处都可以听到砍柴声。傍晚，塘边田埂遍布捕鱼捉虾的人群。边区民主建国大学一名饲养员写诗表示：“困难越多越生产，封锁越紧越坚强，咱们大家一条心，哪怕反动小儿郎！”第三十九团第三连战士挖野菜捉虾慰问团首长。某部战士挖来二三十种野菜邀请老百姓一起会餐。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还把各部队、机关送来的飞禽走兽、水产品、野菜上百种陈列出来，举办野菜展览会。值此艰难岁月，中原军区和行政公署联合发出布告；为减

轻民众负担，自4月1日起，停止部队向民众借粮。子弟兵不畏强敌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节衣缩食支援军队，开

明士绅李华廷提议“缸里匀米，锅里匀饭”，新民乡万家河居民就匀米300斤送给部队，军民亲如一家。4月上旬，中原军区召开军民万人大会，把郑位三政委亲笔题写的一块“民为邦本”的金字匾额赠给当地群众。

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区军民时刻关注中原局势。3月14日，

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各中央（分）局，指示他们迅即筹款4.4亿元援救中原部队。3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带着各解放区筹措的3亿元法币到达宣化店，深情慰

问被围困中的6万中原将士。董必武向郑位三、李先念等传达了

中央对中原地区斗争方针的指示，和他们一起讨论了战胜危局的办法。3月31日，中原局、中原军区举行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央代表董必武。郑位三致欢迎词，一个文工团员朗诵了《七七日报》刊登的长诗《祝福你，董老》，董必武在掌声中热情讲话，亲切慰问被国民党军封锁围困、受苦受饿的中原部队将士，号召他们团结战斗，克服困难。4月1日，董必武在宣化店致电周恩来、叶剑英，陈述中原部队的财政困难，请他们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解决。并请他们速催汉口小组（即第九小组）详定中原部队1000余名伤病员的运送计划。4月7日，董必武在中原将士夹道欢送中离开宣化店。

3月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派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对王震说，蒋介石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王震于4月9日返回宣化店后，向李先念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而增强了中原军区部队牺牲局部、顾全大局、从战略高度继续坚持中原斗争的决心。

三四月间，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为新四军五师呼吁》、《急救五万抗战有功的将士》和《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等社论和特讯，又走访中原军区派往重庆的代表郑绍文，以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国民党调集大军围困进攻中原军区部队的真相，痛斥其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企图挑起内战的种种行径，呼吁军事三人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社会各方行动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的罪恶阴谋，急救被困绝粮的中原将士。3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全体职工致函李先念司令员，亲切慰问中原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重庆市的一些工人、公务人员、学生等纷纷捐款并写信慰问中原军区将士。

中原局、中原军区和行政公署还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的“三不分”（即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和“只要有难，就要帮助”的原则，利用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副署长杨显东、顾问李范一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关系较好，以及分署内有地下党员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联系，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取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给中国的救济物资，以缓解缺粮缺衣缺药的困难。在中原行署派员力争，国民党湖北分署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力支持策应下，湖北救济分署先后多次将联合国救济总署分配的面粉、罐头等食物拨给中原解放区。1946年3月，由中原行署副秘书长李实赴汉交涉，经李范一从中帮助、周苍柏批准，一列车面

粉共 980 吨在平汉铁路杨家寨车站卸车全部运到了中原解放区。4 月，湖北救济分署在宣化店设立办事处，由分署专员、地下共产党员吴显忠任主任，此后更是千方百计争取了一批又一批善后救济物资，用十轮大卡车冲破国民党哨兵阻拦开往中原解放区；还在离宣化店 20 里处设立兰田善后救济医院，为中原军民治伤治病；并成立了社会服务部，为农民（包括复员军人）发放小本贷款；还开了一家农具厂，把部队库存的破损枪械改制成铁锹、钉耙和犁铧，留下了“化于戈为玉帛”的美谈。

6 月 13 日，中原军区召开财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战胜财经困难。各旅团及有关行政首长出席了会议。军区政委郑位三作报告，肯定了干部战士在反围困斗争中英勇奋战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果，指出团结自己，依靠民众，加强制度是克服困难的基本办法。

五、周恩来敦促国共两方代表同赴宣化店视察。挫败国民党军“五·五围歼计划”

1946 年 4 月底，国民党当局决心在中原地区发动内战，计划于 5 月 5 日至 5 月 9 日一举歼灭中原军区部队。蒋介石借还都南京之行于 5 月 1 日到西安，5 月 2 日抵武汉策划此举。这一计划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还派陆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奔走于徐州、开封、郑州、新乡间，部署行动。其部署是：以第四十一军 3 个师、第六十六军 3 个师封锁许昌至花园段平汉铁路线，切断路东、路西中原部队之联系，并对宣化店之西方、西北、西南方进行严密封锁；以第七十二军 3 个师、第四十七军两个师及第四十八军两个师分布于罗山、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立煌、经扶、麻城、黄安一线，加强对宣化店东方、东北、东南方之封锁；以第十八军两个师布置在长江沿岸新春至监利段以封锁长江，该军另一个师封锁花园至汉口平汉铁路；以第七十五军两个师控制安陆、天门、京山、钟祥、应城一线；第七十六军两个师控制枣阳、随县一线；第十五军两个师、第六十九军两个师控制泌阳、枣阳、桐柏、唐河、随县一线；第十军两个师控制南阳、老河口一线，加紧对大洪山、四望山、桐柏山地区进行分割封锁。参加“围歼”的国民党军共达 11 个军 26 个师 30 余万人。为实施“围歼”计划，国民党军还在宣化店外围不惜代价地抢占军事要点，如 4 月 25 日第七十二军即以新十三师全师兵力抢占了能有效控制宣化店的小界岭。

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军“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计划后，于 4 月 29 日由发言人发表严正声明予以揭露，指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国民党当局应采取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允许李先念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如纵容挑战分子掀起中原血战，其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当局负责。新华通讯社并对上述国民党军“围歼”计划进行了揭露。

5 月 1 日，中共中央三次电告中原局：国民党有 5 月 5 日至 9 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 5 月 5 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向东向北行动均很困难，国民党军已有周密准备，似应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分散坚持游击，主力向西到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为适宜。中原局两次电复中共中央：如国民党大举进攻，拟在原地打两仗，不轻易走。万不得已时则突围，拟向西不向东，因东方国民党有重兵，地区狭窄。中原局还表示：决心从死里求生，力求保存精华。

中共代表周恩来获知国民党这一阴谋计划后，5 月 1 日晚 9 时半，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两小时，同时致电美方代表马歇尔，指出据极可

靠情报，国民党政府已秘密下令“围歼”中原军区部队，这是反动派有计划的阴谋，企图在东北未能攻陷长春以前，突然发动全国性的大内战。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6万人之众，如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周恩来并敦促徐永昌与马歇尔立即同往宣化店视察，有效地制止这一流血阴谋。5月3日，鉴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亦由重庆飞抵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即发表谈话，随即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事实真相，呼吁国内外进步舆论、一切民主力量和全国人民起来制止中原流血阴谋的实现，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5月5日，中原军区发表声明，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不断进犯及妄图“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指出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不要玩火自焚。如果国民党军敢于进攻，中原将士将坚决还击。在中原内战一触即发的关头，经周恩来一再敦促，马歇尔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会同周恩来，于5月5日分别从北平与南京飞抵汉口，6日上午转赴宣化店视察。到汉口后，徐永昌托病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为代表赴宣。同行的还有第九执行小组人员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途中由于大雨山洪冲毁了黄歧县十棵松澍水支流上的桥梁，行程受阻，周恩来毅然赤脚涉过齐腰深的河水，其他代表和随行人员由当地农民背或抬过河，至8日上午11时始抵达宣化店。此前，中共中央已于5月4日电告郑位三、李先念：周恩来、白鲁德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将到宣化店调查中原部队受围攻情况并解决有关问题，请速准备充分材料，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要求合法转移，在未转移前，请求与国民党军隔离并供给粮食。中原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作好了充分准备，《七七日报》还以《我们希望于军事小组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原问题的全国性，希望三人小组迅速、实际、根本地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撤退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或者同意中原部队转移。

8日下午，在宣化店镇西一所会馆里，三方代表举行军事调处会议。会上，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历数国民党军进犯中原部

队、抢占村镇、杀害军民的种种暴行，警告国民党军不要玩火自焚。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理屈词穷，只好虚伪地保证决无准备“围歼”中原部队之情事。周恩来在会上严正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

晚间，中原军区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了文艺晚会。李先念代表中原军区致词，恳切表明中原军区绝对希望团结，希望和平建国，深恐内战重新爆发。他说，内战一爆发，不但是中原军区的不幸。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不幸，因为由于中原内战的爆发，可能引起东北乃至全国内战的爆发。白鲁德表示，他来此是执行协议方案的，决不干涉中国的内政。王天鸣再次声称，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中原军区的意图，武汉行营也未奉到任何命令。接着，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他说，万一不幸此间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

周恩来在宣化店还听取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关于中原将士思想情绪、中原地区粮食情况的汇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原部队的有关指示。周恩来说：同志们在宣化店坚持斗争，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

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

5月9日上午，周恩来一行回到汉口。5月10日，三方代表签署了《汉口协议》。协议规定国共双方指挥官立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立即停止违反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工事之建筑；双方应派联络军官与执行小组取得联系，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同意遣返中共伤病人员连同眷属及医护人员共1160人到华北解放区；双方被俘人员应在6月1日前释放；保证中原部队复员人员在途中及到达目的地后之安全。

在此期间，第九执行小组于5月9日成立一附属小组，即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亦称光山小组），常驻于光山、宣化店一带监督停战。第三十二小组中共代表为任士舜中校，国民党代表为陈谦上校，美方代表为哈斯克上校。

在中共中央和中原军区进行充分揭露以及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弃原定5月5日至9日“围歼”中原部队的计划，从而推迟了中原与全面内战的爆发时间。但从5月13日起国民党军又紧缩包围圈，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更为频繁猛烈。中原军区部队的处境则更为艰险。

第二章

中原突围的战略部署

第一节突围决策的确定和组织准备

一、全面内战爆发时的形势。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校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66万人。与国民党军相比，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处于1：3.4的劣势。

在装备上，国民党军更是占尽优势。它在美国的援助下，有22个整编师改为美械或半美械装备，还接收了100万投降日军的全部装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数量很少的火炮。加以国民党军一个精锐的整编师与人民军队当时装备最强的一个纵队（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前者的自动火器是后者的26倍，火炮是9.5倍，且国民党军的火炮多系口径大、射程远的榴弹炮，人民军队多属轻型的步兵炮。另外，国民党军还拥有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坦克和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这些都是人民军队所不具备的。

除了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外，国民党还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的援助下，将其大量军队抢运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统治国土面积达到7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39亿，并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解放区的国土面积只有约230万平方公里，人口1.36亿。

到1946年5月底，国民党调往全国内战前线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达到193个旅（师）160多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200万人的80%。在北线，国民党军部署了65万余人，用于进攻东北及关内的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并准备随时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南线，部署在中原、晋冀鲁豫及华东解放区的兵力，总数达101万人（用于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解放区的7.5万人未计在内），与上述3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总数92万人相比为1.1：1，国民党军占优势。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将其在黄河以南地区未担负大规模作战任务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每旅一般编两个团。蒋军名为缩编，实为扩编，如第六十六军和第七十二军，整编前每军仅万余人，整编后每师达3万人以上，且装备、火力、摩托化程度大为增强。部署在中原军区防地周围的国民党军亦先后整编：原第七十二军改为整编第七十二师，率新十三、新十五、第三十四3个整编旅；原第四十八军改为整编第四十八师，率第一三八、第一七四、第一七六3个整编旅；原第四十七军改为整编第四十七师，率第一二五、第一二七两个整编旅；原第四十一军改为整编第四十一师，率第一四、第一二二、第一二四3个整编旅；原第六十六军改为整编第六十六师，率第十三、第一八五、第一九九3个整编旅；原第十五军改为整编第十五师，率第六十四、第一三五两个整编旅；原第十军改为整编第三师，率第三、第二十两个整编旅（欠新一旅）；原第七十五军改为整编第七十五师，率第六、第十六两个整编旅（欠第十三旅）；原第十八

军改为整编第十一师，率第十一、第十八、第一一八3个整编旅；加上6月下旬新调来的原第二十六军改编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率第四十四、第一六九两个整编旅；原第五十八军改编的整编第五十八师，率整编新十旅（欠新一一、第一八三旅）。以上准备直接参加围攻中原部队的国民党军，总数达11个整编师、26个整编旅，共30余万人。此外，还有原第七十六军改编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率第二十四、第一四四两个整编旅；原第四军改编的整编第四师，率整编第一二旅（欠第五十九、第九十旅），部署在第二线作为机动部队（原第六十九军同第五十五军合编为整编第五十五师，调离中原地区）。此时，中原军区有两个野战纵队辖6个旅，加上地方部队3个旅，共5万余人，与国民党军参加直接围攻的30余万人相比为6:1，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

这时的中原解放区，已从抗日战争胜利时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拥有60多个县近2000万人口的根据地，被压缩到只有1500万人口且被分割成数块的地区；而主力部队所在地则只有以礼山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只有40多万的狭长地带，处于被国民党军四面层层包围之中。

国民党自恃其兵力装备的优势和战争资源雄厚，又有美国政府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海空运输等方面的援助，便肆无忌惮的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在东北，国民党政府坚持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把停战排除在外，靠美国第七舰队提供的运输舰将精锐的新一军、新六军等5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关外，继3月份进驻沈阳之后，又于5月19日、23日、28日相继占据了四平、长春、吉林，并向四平以北发动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消灭之。在关内，国民党阴谋策划先“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然后分兵会同驻扎在华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附近的国民党军，沿主要铁路线由南向北进攻，夺取或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 and 交通线，歼灭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或将黄河以南的人民军队逐步压到黄河以北聚而歼之。

为了首先“围歼”中原军区部队，打通东进和北上的交通要道，国民党第五、第六绥靖区在全国停战令生效后，仍然密令所属部队“为紧缩共军活动范围，应将驻军地区酌量扩伸”，指挥各部从四面八方向中原军区部队所在地区推进，并计划地蚕食、进攻，逐步紧缩包围圈。5月10日签订的《汉口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一个团即进攻陂安南地区。5月16日，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又兵分六路向江汉军区应山西南之寿山地区进攻。同日，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向陂安南地区进攻。5月17日至21日，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第三十七团、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第三七团和地方部队分别向桐柏、江汉、经扶、信阳等地发动进攻。尤其以6月2日至6日集中整编第四十一师的一个旅及确山、桐柏、泌阳三县保安团共万人对河南军区之信（阳）桐（柏）确（山）泌（阳）中心区的“清剿”，6月12日集中整编第七十五师的一个旅、整编第三师的一个旅及桐柏、泌阳两县保安团共数万人对江汉军区的进攻，最为激烈。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13日起至6月25日止，进攻达120余次，动用兵力在10万人以上。中原军区下属的河南、江汉军区及鄂东地区的40余处城镇、村寨等重要阵地先后被侵占。这些地点是：确山之王岗、刘楼、郭山冲、百沙岭、佳冲、尚和庄；信阳之西双河、祭尾；随（县）桐（柏）之草店、三道河、吴城、照家山；应山之寿山、浆溪店、大邦店、

唐家湾、屈家咀、新街、万家咀、笔架山、矢山；泌阳之山店；礼山之阳平口、郑店；天门之赖家场、郑家滩子，刘家店；汉川之汧汉湖、鲜鱼沟、孙家田、生青山；经扶（今新县）之犀牛望月山、浒湾镇；黄陂之应家砦等。

在国民党军加紧进攻解放区的同时，美国逐渐撕破了伪善的调停面孔，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继3月份相继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之后，又于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使得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恣意发动全面内战。

6月中下旬，国民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即分别密令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所属部队，对中原军区部队“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并在密令中称，为避免美方代表为难，“着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指挥出击”。刘峙为执行上述命令，于6月20日14时将“围歼”计划下达各部。即以第五、第六绥区所属部队，分由豫南、鄂东对信阳，经扶、潢川间之“共军”，尤其对宣化店、泼陂河方向，集结优势兵力。为达其“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的目的，刘峙决定依各部队驻扎重点的形成，将平汉铁路以东划为3个“围剿区”。即以定远店、文殊寺、朱堂店、三里城之间为第一“围剿区”；以泼陂河、刘家湾、白雀园、沙窝之间为第二“围剿区”；以宣化店、阳平口、吕王城之间为第三“围剿区”。其具体部署为：

整编第四十一师占领罗山以南龙升镇东西一线，会同占领信阳至柳林一线的整编第十五师，向宣化店及其以北地区“进剿”；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占领礼山的夏店至大新店一线，重点指向宣化店南端；预期攻击开始二日后，三部在宣化店会师，协同“围歼第一区之共军”。

整编第四十七师占领光山的的东西一线，向泼陂河及其以北以东地区“进剿”；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附独一团划归整编第四十七师指挥，占领商城以西付流店至双门栏（亦说为双门岗）南北一线，向泼陂河及其以东地区“进剿”；整编第七十二师（欠新十五旅）占领双门栏至经扶东西一线，右与第一七四旅确保联系，并与整编第四十七师相呼应，重点指向泼陂河，预计攻击开始一口后，各路在泼陂河会师，协同“围歼第二区之共军”。

整编第七十二师之新十五旅占领黄安的七里坪经礼山的河口至刘家集的东西一线，重点指向吕王城，与左翼之整编第六十六师联系；整编第六十六师除与整编第十五师、整编第四十一师在第一区协力“进剿”外，并与新十五旅协同“围歼第三区之共军”。

除上述3处重点以外，刘峙还对其他方面作了部署：新十五旅另以一部位于大小金山，对“柿子树店之共军严密监视”，并与整编第十一师第十八旅由黄陂向木兰山方向进击的部队协同，“夹击木兰山附近共军而歼灭之”。整编第六十六师另以一部“监视（平汉）路西共军，并任花园至信阳间交通之维护”。整编第七十五师以一部控制于广水，主力仍在原阵地“担任对平汉线西共军之监视”。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六九旅由稀水推进至麻城以北，作为第六绥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截击突围之共军”。整编第三师率所属第三旅（欠驻安康之一营）及第二十旅之一部，集结信阳，作为郑州绥署之预备队。并规定进攻开始时，以驻汉口和驻西安的空军，“对共军猛烈轰炸和扫射”，“紧密侦察共军之情况，及时通报各绥区之作战部队”。

在发动进攻的当日，刘峙又补令整编第六十六师及整编第十五师的主力，加强信阳、柳林、武胜关、广水一线的封锁，并抽调整编第七十五师一

个旅及整编第四十一师一个旅，至该线封堵，另抽调整编第五十八师一个旅，由阜阳向商城集结，由整编第十一师抽调第十八旅的一个团，由黄陂向黄安集结，以加强对平汉路东中原解放区的“清剿”。

国民党军部署就绪后，即企图于6月26日大举围攻，7月1日发起总攻，像制造“皖南事变”那样，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蒋介石曾就此得意忘形地吹嘘说，中国将有“惊人之举”。

对于国民党从中原解放区下手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早已洞察其奸，在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巨大优势，及其后台经济实力强大且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所吓倒，而是挺起胸膛，准备进行自卫作战，迎击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国民党要从中原解放区开刀，共产党针锋相对，把中原解放区的安危，作为一个极端严重的足以牵动全国大局的问题对待。中共中央一方面警告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另一方面，积极谋划扭转中原局势，并作出必要时进行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凭借其军事和经济优势，狂妄地宣称：6月份用48小时歼灭中原部队，7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3个星期打通津浦线，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关内后东北，3至6个月摧毁所有解放区。中共中央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改变人民军队处于被动守势的局面，同时使中原军区部队摆脱困境，于1946年6月中下旬拟定了一个与蒋介石的“着重向北”相反的“着重向南”，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北、南两线作战计划。北线作战计划，要求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夺取平汉（北段）、正太、同蒲3条铁路，并相机夺取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4座城市。南线作战计划，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进击，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作为策应。尔后，如形势有利即以晋冀鲁豫、山东两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推进。南线作战计划规定中原军区主力向北机动，以钳制河南之敌，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这样，中原军区部队就同南线各野战集团在战略上构成一个整体，互相策应，互相配合，一存俱存，一胜俱胜。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北进和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对晋冀鲁豫和山东、华中野战集团的作战，是有力的支援，而上述三集团聚歼蒋军，攻城掠地，必然迫使国民党军不敢集中大量兵力围攻中原部队，使中原部队能在机动中甩掉敌人，脱离险境。正如毛泽东主席为该作战计划亲自拟稿的电报中所指出的：“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指中原军区部队）不致被消灭和吃大亏。”后来，南线作战计划因敌情有变而更改。中共中央在得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的部署后，即决定将外线出击改为先在内线打几仗消灭敌有生力量，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向北机动钳制河南之敌的配合行动亦相应改变。

中共中央在构思南线作战计划的同时，慎密地考虑和下达了万一局势有变，中原军区部队须机动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应变部署。6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电告郑位三、李先念：“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中央作出的中原突围战略决策，开始部署

突围前的组织准备、确定突围方向、选择突围时机、制定分路突围计划等一系列紧张繁忙的工作。

二、突围前的组织准备

中原局、中原军区在部署突围时，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军区部队在突围前先后复员了一批老弱人员还乡生产，将部分干部化装转移，按照《汉口协议》转送了一批伤病员到晋冀鲁豫解放区，还做了其他的准备工作。

军队整编复员

此项工作是在 1946 年 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确定的。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为了实施政协协议，军事三人小组又经过多次会议和会外协商，于 2 月 25 日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全国陆军为 108 个师（每师不超过 1.4 万人），其中中共部队 18 个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 12 个月内全部复员等。虽然在这个方案中关于国共军队 5:1 的比例规定和中国军队要经过美国装备的规定，对于人民军队是一种束缚；但方案中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部分人民武装可借助这个原则得到一定的保护。2 月 26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整军方案》的签订，是继停战协议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后又一重大成功。这个协议说明，中国共产党以异常重大的让步，表示了自己的诚意。社论还指出，这个协议在实现的过程中将会遭到异常严重的困难，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阴谋分子方面的阻碍和破坏。后来，中原军区部队在整编复员实施中遭到种种阻碍和破坏的事实，证实了社论的判断。

在《整军方案》尚未达成之前，中共中央根据政协协议的有关精神和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军紧缩包围而地区狭窄导致财政十分困难的实际情况，即于 2 月上旬指示中原军区部队准备复员两万人，第一步先复员 1 万。《整军方案》签订后，中原局于 3 月 8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提议将八路军的 4 个旅（即原嵩岳军区王、戴部和三五九旅）转移到华北，留下原五师部队就地整编为 1 个师，并复员万余人。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的谈判形势，估计国民党不会允许中共军队有 1 个师在汉口附近，且这 1 个师的供给也很困难，故以大局为重，于 3 月 10 日复电中原局，指示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仍争取合法转移到皖东整编就食，并立即复员两

万人。可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野心不小，认为中原军区部队已是他囊中之物，唾手可得。因此虽经数次谈判，合法转移的提议一再遭到拒绝。

面对此种危险局势，中原局高干会议分析认为，国民党企图在“有机可乘时向我包围袭击，达其歼灭我之目的”的阴谋已昭然若揭，当即决定，在保存主力、保持精华的前提下，立即复员两万人，运用各种方法将多余干部分散转移到华北或其他地区隐蔽，并彻底去掉笨重装备、物资，以便突围时部队行动自如。3 月 16 日和 18 日，中原局将上述内容相继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的精简计划，并强调“应迅速复员两万人，送走三千干部及外籍伤病老弱人员，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同时加紧整训部队，经常作战斗准备，提高警惕，以防顽军之突然袭击。”

中原军区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指示，于 3 月上旬部

队整编的基础上，在直属队及两个纵队、3个下属军区又先后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各级领导亲自抓这项工作。截至4月中旬，已将非战斗人员及部队中老年体弱人员复员8000余人，仅军区直属队即复员650人。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中原军区的整编复员工作进行大肆破坏。他们到处设置哨卡，搜查捕捉甚至杀害中原军区的复员人员，3月29日，第一纵队教导团17名复员返乡人员行至罗山县孙铁铺时，被国民党驻军诬为“间谍”，捆绑吊打。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三五三团三营驻黄陂长轩岭的七连，于3月23日将鄂东军区复员返乡的郑玉怀、余长生等8人捕去，郑、余2人惨遭杀害，其余6人被扣，生死不明。对于国民党军破坏《整军方案》，扣留甚至残杀复员人员的残暴行为，中原军区给予了揭露，并提出严正抗议。到4月底5月初，中原军区为对付国民党的“围歼”阴谋，被迫停止执行复员计划，实际复员人数在万人左

北运伤员、家属

突围前夕，中原军区部队有伤病员1000余人。这些在抗日战争中和后来对国民党军的自卫斗争中负伤及患病的将士，在中原解放区因受医疗及经济条件等限制，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急需转运到华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在做好部队复员工作的同时，应尽快送走这批伤病人员及家属。经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与美、蒋代表进行多次交涉，于1946年3月28日正式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将这批伤病员及家属经由铁路运至河南安阳（晋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方面同意对于此项调动，得给予协助”，同意中原部队“加派专门人员沿途担任伤病员所需之适当照料，此行之人，皆不让携带武器。于抵安阳时，共方应负管理伤病员之安全责任”。并规定由第九执行小组负责制定北运伤员的详细计划，直接负责此计划之执行。国民党当局尽管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在行动上却设置重重障碍，伤病员及家属早于4月底即在安陆赵家棚等地集中，但对方以各种借口故意延搁。直至5月10日《汉口协议》签订后才开始行动。但当王震与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商洽此事时，国民党代表陈谦又公然无理拒绝讨论，扬言武汉行营“要将该项人员遣送汉口医治”。中原局当即于5月12日将此事报告中共中央，要求让第九执行小组到伤病员登车现场保证上车事宜，并争取小组三方派员护送，以防国民党方面对北运伤员的刁难及加害。经中共代表在北平军调部的交涉，5月14日汉口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及工作人员，奉命乘专车抵达广水车站，“从事监督中共伤患病兵与家属登车及护送至安阳事宜。”

国民党方面阻挠伤员北运之事未成，又在其他方面故意刁难，派出的列车只有极少数闷罐车，其余大多是运货的敞车，许多车皮刚装运过牲畜家禽而沾满粪便，未经清扫，而且平均每节车里要挤60多人。与此相对照，另一列遣返日本战俘的却是客车。在人员上车时，国民党利用《协议》上的“该项伤病员撤前，应加以检查，以便确定确系有疾病或受伤者”的规定，大肆刁难。本来按三人小组的规定，应由执行小组成员担任检查，而国民党方面竟要派他们的部队来“检查”。在“检查”时，他们不论轻重伤员都要揭开纱布敷料看伤口，给伤员制造痛苦。中共执行小组成员同他们据理力争，并根据在“患者是否合格发生疑问”而争执不下时“由美国医师加以鉴定”的规定，多次向美方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国民党方面有所收敛。虽然经过多方斗争，但仍有许多人未能登车。按双方协定，原准运1200人，结果，据6月9日《解放日报》载新华社邯郸6日电，伤病员及家属中，只有740余人

登车，还有 400 余人被阻回。

为了安全妥善地北运伤员，中原局、军区作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工作。事前，李先念司令员召开会议动员，讲明意义，布置任务，指定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袁文带队。袁文以卫生部上校副部长的身分，身着国民党军衣，负责将伤病员护送到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所在地邯郸。在伤病员上下火车及列车运行途中，与第九执行小组派出的护送小组中的中共代表薛子正密切联系，配合工作。伤病员和家属的车厢里，都有执行小组中的工作人员照顾。晋冀鲁豫军区为接应中原部队伤病员和家属，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于 5 月 15 日致电中央军委、北平军调部（叶剑英）转李先念司令员，说明晋冀鲁豫军区为接应伤病员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电文说：“明日派员带 500 万元法币到安阳接应”，“伤病员到安阳后，由（边区）雇胶轮大车送到洪河，（由）我在洪河村设置的（医）诊站转送临水及武安西医院”。列车于 5 月 15 日 6 时 8 分启程，1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安全抵达安阳，在两军岗哨相对的中间地方停住。大家搀扶重伤员先下车，带孩子的母亲们随后。下车完毕，工作人员一节节车厢检查，确保不留下一人。晋冀鲁豫边区组织的民工担架、马车早就等候多时了。列车停下后，他们热情洋溢地先将重伤员扶上担架，轻伤员和带孩子的妇女上了马车或牛车，其余跟着沿铁路步行前进，浩浩荡荡开向冀南著名集镇——观台镇。晋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在沿途热烈欢迎，经过安阳河清村时，天色已晚，群众燃灯夹道欢迎，绵延 4 余里，抵达观台镇时，更是灯火通明，男女老幼齐集街头，争着送上茶水、豆汤、馍馍、大饼。镇上各小学、商号、居民自动让出房间供伤病员和家属住宿，学生们组织慰问队给伤员喂饭、送水、读报、代写家信。漳滨中学男女同学 30 余人自 70 里外赶来慰问。次日午后，该镇各界又召开了欢迎晚会。所有伤病员按计划在洪河村医疗站接受护理，逗留数天后即分批转往医院休养，其余人员去邯郸东北 10 余里的苏漕镇招待所稍事休整后，即辗转分配到华北、东北等解放区工作。护送伤病员的工作人员，则于 18 日下午 4 时 55 分在安阳与第九小组同车抵广水，返回原部。

干部化装转移

早在 1946 年 2 月，即已提出干部转移问题。停战协定生效后，边区范围缩小，地方上无处任职的干部及部队整编后富余的干部数量很大。据此，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的“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各地省委准备公开活动的指示精神，于 2 月 10 日向中央建议送大批干部到大城市和国民党区工作。2 月 14 日，中央复电，“同意对干部的处理，即有计划地送大批干部到大城市和国民党区去工作（包括湖南、河南、江西）”。但由于蒋介石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国人民憧憬的和平民主新生活的愿望无法实现，安置大批干部的计划亦被搁浅。3 月 14 日，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建议中原部队在复员两万人的同时，“由北平交涉”将多余干部分送外地工作，如公开转移不成，即化装转移到其他解放区。3 月 16 日，中原局电报中央并叶、饶，为减少部队在突围时的负担，准备立即着手分散多余干部，运用各种方法转移至华北或其他地区隐蔽。

化装转移工作是由中原局组织部负责，以各种形式和多条渠道进行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建立化装转移站，具体实施干部的化装转移工作。大多数地旅、

县团级干部都是由这个站安排转移出去的。转移站设在罗山县定远店以西的长塘埂村。该村南距宣化店 30 里，北距罗山县周党贩约 40 里，紧靠中共豫东南地委。该站的主要负责人即由地委组织部长吴皓担任，有 50 多名工作人员，设化妆、材料、交通保卫及总务 4 个小组。准备转移的干部到站后，先由化妆组根据各人的年龄、口音、肤色、长相、文化素养、本人气质、原任职务等特点确定装扮的身分。当时装扮的类型有商贩、传道士、教员、探亲者、访友谋事的、串馆（去私塾卖笔墨纸砚）的等。身分确定后，由材料组提供假经历、假证件、答辩词，各人先做 10 天至半月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熟悉假历史和答辩词，将长期带军帽而发白的额头晒黑，再经过各组负责人联合组成的审查组进行严格的盘问演习，确认毫无破绽后即由交通保卫组的人员负责护送转移。交通保卫员共有 20 多人，都是区、县级干部。他们多是长期在豫东南或皖北做地下交通工作的，政治上坚定可靠，有地下斗争经验，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各种社会势力，有可靠社会关系。每个交通员一次可带四五人，多至 10 余人，但在路上则三三两两地分开行动，不公开联系。护送的路程有三类：一是短距离的，把转移的干部送到蒋管区和中原区交界处的周党贩，亲眼看到被送的干部越过国民党岗哨区再转回来；二是中距离的，把干部送到去豫皖苏解放区的中途，即新蔡、临泉一带就转回来；三是远距离的，把干部一直送到新四军第四师师部（豫皖苏边区第八军分区）接上关系，休息两天即打回转。转移的路线：通常是经周党贩、罗山县、新蔡县、再走界首集，亳县、涡县，或经新蔡走临泉县、太和县到豫皖苏。有些干部则走水路，到新四军军部或华东局，路线是：在边区境内的潢河搭乘竹排，经光山县、潢川县到乌龙集（原属息县，后改属淮滨县），转乘帆船沿淮河而下，经正阳关、蚌埠，再从淮阴一带进入苏北解放区。通过转移站转走的干部有 400 余人。

第二，由中共信罗县委负责掩护向北转移数百人。他们或装扮成回乡的夫妻、贩运的商人，或化妆国民党军官、国际救济总署的官员、新闻记者、医生，或利用社会关系佯称是当地社会名流士绅的亲戚，行走路线有两条，按各人装扮的身分不同，或经秘密路线，从宣化店、杨万店、涩港店到柳林站上火车，或大摇大摆地走公开路线，由汉（口）罗（山）公路到信阳火车站上车。

第三，用湖北救济分署的名义印制一批职员证，发给一批转移的干部作为掩护手段，转往其他解放区。有些伤病干部、战士，在救济分署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住进分署办的医院就医，愈后由救济分署安排转移。

第四，利用各种机会转移。如利用国民党恢复黄河故道，原先从豫东逃亡到豫南的难民陆续返乡的机会，与难民掺杂在一起，混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再如原驻川鄂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调到苏北鲁南一带后，许多家眷陆续北上，利用此机会也转移了一批女同志。还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零零星星转移到各解放区的。

由于无职干部数量较大，到突围前夕，仍有不少干部未能转移，加上非战斗单位的人员，约达千人。后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将这些人员编成干部旅，跟随主力突围。

突围前夕，在进行整编复员，北运伤员，转移干部等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必要的准备和善后工作：

一是安顿驻汉办事处。突围前夕，为了安顿好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李

先念于6月20日电召办事处处长郑绍文回宣化店，当面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主力部队准备向西突围的决定，以及为了使突围意图不致过早泄密，驻汉办事处在突围前就地坚持工作并做好应变准备的指示。郑于次日返汉后作了相应的布置，还在武汉地下党的协助下为军区购买了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由办事处派卡车送到宣化店。6月26日晚，中原部队撤高宣化店后，国民党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搜查了办事处，抢走了电台和假密码，在住房门口派了许多哨兵。经郑绍文向美蒋代表及到武汉行辕严正抗议和交涉后，终于撤走了哨兵，退还了电台。几天后，国民党又声称在武汉只承认共方在执行小组的代表及工作人员，不承认办事处的合法地位，办事处将此情况报告南京中共代表团后，周恩来于7月10日派专机将郑等接到南京。

二是停办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该校是1946年春天在宣化店附近成立的。学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四川和云南）的知识青年，共300多人。他们是1945年响应中共“七大”关于到敌后去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敌占区，按照地下党设置的秘密交通路线及接头暗号，投奔到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1946年1月停战协定下达后，中原局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把这批已分配到部队和地方作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由郑位三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李昌为教育长。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于3月正式开学，学员以学习中共“七大”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到4月份，在国民党准备“围歼”中原部队的紧急形势下，中原局决定建国大学停办，全校师生员工，除少数病号和女学员随伤病员乘火车北上晋冀鲁豫解放区，及少数人化装转移外，其余大部分分到部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员，准备随军突围。该校于5月底停办。

三是停止出版《七七日报》。《七七日报》是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委的喉舌——《七七报》。《七七报》于1939年7月7日创刊，开始是不定期的四开油印小报，以后定为5至7天一期，遇情况紧急临时转移时暂停出刊或出简短的号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时，《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办的《挺进报》合并，仍称《七七报》。1946年1月改为《七七日报》，期数仍与《七七报》相衔接（总序号为第374期），每天按时出刊两大版（四开纸）。1946年6月24日突围前夕，《七七日报》出版最后一期（总序号为第535期），发表了停刊启事。随后，报社同志忍痛毁掉印刷设备，准备投入突围战斗。

四是部署湖北救济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的应变措施。突围前夕，中原局领导对分署机构的应变措施作了部署，派顾大椿向在分署任专员兼宣化店办事处主任的地下党员吴显忠，交待了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法。他们按照中原局的指示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认为办事处是“三不分”的产物，是分署的派出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在中原部队离开宣化店后，仍可在一段时间留在原处。他们在主力突围前坚持工作，协助转移干部。在执行小组撤离宣化店之前，分署办事处写了一个通知，向执行小组说明办事处的立场，同时附上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名单，要求三方代表予以保护，并要三方代表在通知上签名，以备国民党军进驻宣化店时免遭迫害。国民党部队进占宣化店后，分署办事处考虑到工作人员中中原行署推荐的人居多，长期滞留在此，安全无法保障，于是决定将办事处缩编为分署鄂东（第三）工作队，

将中原行署推荐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转走，只留隐藏较深的地下党员及分署推荐来的工作人员。

五是护送第三十二执行小组。6月24日，中原局对突围前仍留在宣化店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颇感棘手，“留去都难”，请示中央如何处理。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于25日复电指示：“务必保护三十二小组的安全，或留置现地交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返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中原军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将护送第三十二小组的任务交给了在宣化店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的鄂东独立第二旅。该小组于6月30日抵达汉口。

第二节突围方向、时机的选择及具体部署

一、突围方向的确定

194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获得可靠情报，国民党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围歼”，当即于4月30日电询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假如顽军破裂（‘和谈’），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益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

关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突围的方向，中原局、中原军区曾经反复考虑过向东、向北和向西等方案；其间还考虑过以一部分主力向南渡过长江，游击于大西南的计划。

向东转移到苏皖解放区是1945年底提出来的。当时，桐柏战役第二阶段未能取得预定的歼敌目的，国民党军以6个师另5个团的兵力向桐柏地区推进，企图夹击歼灭中原军区两个纵队。加之中原军区部队在非根据地作战，财粮短缺问题十分严重，伤病员难以安置。因此，中原局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将两个纵队转移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大别山地区作战，并准备将下一步的转移方向定为皖东。12月18日，郑位三致电中央军委说，由于敌军大兵团积极围攻，我军4个战斗都未能取得大胜以改变战局，反而被迫从路西撤退，伤病员2000人安置颇感困难，估计去路东后困难更会加多，因此提议过路东后“以主力靠拢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电报中共中央，再次提议“主力靠拢军部，此地留五千到一万人坚持游击战争”。12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郑、李、王并告王（树声）戴（季英）：同意中原军区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的计划。并指示说，你们主力转移时，须先向东北行动，到正阳、新蔡方向，作欲渡黄河之态势，以便迷惑和吸引敌人向北，然后看情况再向东行动到皖东地区。

在准备向东行动的同时，向北转移的方向亦随之提出。中央军委接到华中军区的电报称，国民党桂系军队尚有两个师在大别山，其一部已向淮南铁路以东及津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地区进攻，华中军区在该地区的主力即将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因此，建议中原军区部队不要经大别山向东转移，而应向北经新黄河以东到冀鲁豫地区。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电示中原军区：主力转移或向东到新四军，或向北到冀鲁豫，由郑、李自己考虑决定。同电指示华中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均须作接应中原军区部队的准备。电报强调指出：向东，华中部队须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向北，则需刘、邓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这次战略转移未按原定计划实施。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中外各方的同情，国民党亦只好拖延而不敢贸然加以拒绝。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29日电示郑、李并中原局：为“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皖地区一定的地位”，中原军区主力在转移时，万不可全部开走，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争者）在各根据地坚持。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原新

四军第五师及八路军三五九旅组成的第二纵队留下坚持鄂豫皖地区，只将原河南（嵩岳）军区王、戴部组成的第一纵队作战略转移，转移的路线定为尽可能争取渡新黄河经水东到华北，如果黄河走不过则改道走皖东。并决定王、戴部转移时将中原地区的军队和地方上未任职的成千干部带走，原五师派两个旅护送第一纵队转移，如到华北护送到黄河边，如到皖东则护送到安徽六安。此时，已进入河南息县的第一纵队，仍倾向于走皖东。王、戴在 1946 年 1 月 1 日致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中说，关于部队向东或向北转移的问题，我们认为向北转移困难较多。如从界首（安徽与河南交界处）以北至河南中牟一带过新黄河，因距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平汉铁路较近（最窄处只有 30 多公里），我大部队不可能在此地行动，而且估计这一带的渡口已均被敌占领，如从界首以东至正阳关过新黄河，则要涉过 10 余里宽的黄河泛滥区，并且还有沙河与涡河之隔，均要船渡。即使渡过新黄河后，还要穿过皖北平原，再过陇海铁路才能到达冀鲁豫解放区。同时，对界首至正阳关一段之新黄河两岸及沙河、涡河两岸情况均不明，对皖北情况也不清楚，故从界首以东渡河北进也很不利。电报在分析上述情况之后建议：“如实行战略大转移，我们主张从淮河以南走大别山再东进皖东为好。因路途较近及山地对我们作战有利，又无河流阻隔，并能取得苏皖新四军之直接有力接应。”1 月 2 日，王、戴部再次电述主张东进的理由说：从息县出发到扶沟过新黄河，有 18 天的行程，而且对扶沟渡口没有把握抢到手，占领了该渡口船只不多也难以很快渡过。如从界首及界首以东阜阳以西渡河，亦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而且估计界首、周家口（今周口市）系国民党军所必占领的要点。除界首外，其他渡处船只亦少。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北渡敌情不明及无把握的冒险，不如南进大别山再向皖东东进”，“如华东新四军对我接引有力，桂军一两个师不可能完全阻止我们东进。”

第一纵队单独向东或向北转移的打算，也因国内形势的转变而暂时放弃。1 月 6 日，中原局、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进入光山、经扶之西部，第一纵队从息县出发南进，准备在 7、8 两日与第二纵队会合。此时，国共和谈已有结果，中原局在有很大可能实现停战及王、戴部队到华北和华东都没有把握走通的情况下，决定放弃部分主力作战略转移的打算，全部留原地坚持。1 月 8 日，中原局将上述决定电报中共中央，得到中共中央的应允，1 月 9 日中共中央复电说，停战命令可在日内下达，“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由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是在战略转移行进间驻扎防地，而且在从桐柏山向平汉路东转移的过程中，已吸引国民党 11 个军在其周围，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控制较大地区。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时，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集结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过 100 公里的狭小地区。这样，部队给养更趋紧张，虽有中央和兄弟解放区的慷慨支援，仍难以为继，因而提出建议，请中央向北平军调部交涉，给中原军区部队调整防地或准予移地就食。中原军区司令部于 1 月 17 日提出的建议书内容为：要国民党军让出原鄂豫解放区的七八个县，归中原军区部队驻防就食，周围的封锁部队必须撤退。如不可能争取国民党军让出防地，则提出移地就食。转移的方向是向东到苏北、皖北，具体路线为“由现地（宣化店、光山地区）出发，经经扶、光山、商城、固始之间，自颖上、阜阳渡黄河，再取道凤台、怀远、蒙城之间，于宿县、固镇间

过津浦铁路进入我灵璧解放区。或自现地取道正阳、息县、新蔡，于太和、阜阳上下渡黄河，再经蒙城、涡阳、亳县间进入我永城根据地。或分成几个纵队由以上所提出之地区同时移动。

尽管估计到北上或东移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在1至3月份仍未放弃这两个方向。1月26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说，中原军区数万人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如不可能交涉七八个县作为临时防地，中共中央又无力每月供给3亿元经费，则建议将移地就食问题“提前个别谈判，早日将主力移动一部到华北”。2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将转移路线定为“拟（从）界首、临泉、太和渡过涡河而东去”。2月14日，中原局鉴于“财粮已到穷途末路”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在10天内（计3万多人）向北转移”。15日，又致电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称：决定由王树声率领6个旅（3万人），本月25日左右由此动身向苏皖开进。2月18日，中共中央电示郑、李，指出中原军区的行动方针应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北移，因此中原军区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2月22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在宣化店与中原军区会谈达成协议，由该小组致电北平执行部，要求准许中原部队2.5万人移往安徽五河地区就食。

执意要把中原军区主力悉数歼灭的国民党当局，不仅无理拒绝了中原军区部队多次提出向东、向北转移的要求，而且进一步调兵遣将，在上述两个方向加强配置兵力，紧缩其包围圈。除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靖区及武汉行营所属第六绥靖区所部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周围各县配置第一线攻击部队外，徐州绥署之第八绥靖区在淮河以北的阜南、阜阳、太和一线布防了整编第五十八师一旅。另将伪孙良诚部由滁（县）明（明光今嘉山）开往寿县整编，借以增强惟北防务。在淮河以南则设置了巢（县）合（肥）、桐（城）庐（江）和六（安）立（煌）堵击区。显然，中原军区部队如向东或向北作战略转移均更加困难。况且在地理上亦有障碍，向东要通过长江与巢湖或淮河与巢湖之间的狭窄通道，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向北或东北要通过黄淮平原的黄泛区和水网地带，连续渡河亦很艰难。因此，在4月下旬得悉国民党军阴谋于5月5日至9日围歼中原军区部队，需要紧急强行转移时，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均把突围方向选定在向西行动上。5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3份电报给中原局，在第一份电报中指示：“情况危急，你们应在5月5日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行动方向另告”。第二份电报具体指示突围方向说：“你们向东或向北行动均很困难，顽方已有周密准备，似应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分散坚持游击，主力向西到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为适宜”。第三份电报详细阐明向西突围的理由说：国民党军“在津浦路上二月以来即秘密加强碉堡与封锁沟”，向东突围则国民党军将“以强大兵力分路由西向东追击，压迫我于津浦路以西附近狭小地区歼灭我军。如果不能战胜黄河、淮河水网及津浦路上封锁，其危险性是很严重的。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并说如果到时候在上述地区坚持不住时，“亦可出敌不意，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转移”。中原局亦倾向于向西突围，当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万不得已时突围走，我们拟向西不向东，因东面敌人很大”。同日的另一份电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决心向西转移”，“东方敌人有重兵，地区狭，敌人有充分准备，不能向东转移。向西第一步（是到）陕南”。

5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肯定了“向西突围方针正好”。

国民党军在5月上旬未敢贸然大举围攻中原军区，中原部队突围的时间亦相应推迟。此后，突围的方向除向东已基本否定外，亦考虑过向西南和向北的可能性，最后仍然确定向西。6月2日，郑位三向中央提出，拟以大部主力进武当山（鄂西北），将来相机进入四川；另以一部分主力向西南，在沙市、宜昌至巴东之间南渡长江，经湖南到大西南打游击。6月14日，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将突围方案定为两案，前一案经嵩岳地区越陇海路在垣曲、济源之间渡过黄河，后一案经陕南或经武当山、川北到甘南、再到陕甘宁边区，在两案中倾向前一案。6月17日，郑、李、王（震）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军委，“假使中原内战爆发，我主力王、戴部要过陇海路，在济源垣曲之间渡河”，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秘密多造船只，控制渡口，随时予以接应。对此，中央于19日复电要中原局作两手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依照中央指示，中原局于6月20日和2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向西突围的最后决心。中原局在电报中说：我们原谋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铁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经豫西南、鄂中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计划。

二、突围时机的选择

中原军区部队主力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时机选择，事关全国大局。

为了大量牵制国民党军，支援华北、华东作战及东北的战略展开，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30余万人的重重围困和给养万分困难的危境中坚持斗争，直到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并首先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围攻之际，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突出重围。

1946年1月至4月间，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主要是争取合法转移。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转移，同时准备在国民党故意为难不让转移，情况危急万不得已时，实行“非法”转移。后一行动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

在争取合法转移经多次谈判、多方交涉，均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的情况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只好率部就地坚持“苦熬”。同时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实行突围转移。特别是派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行动方针的王震返回宣化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后，更使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人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立足于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而，既加紧对付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与自身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同时也更为审慎地对待转移时机的选择，只要国民党不使大局逆转，就不实行自动转移，而在原地进行战略坚持。

当得知国民党将在5月5日至9日围歼中原部队的计划时，中共中央于5月1日3次发报，紧急命令中原军区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中原局和军区受令后，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积极备战，并于5月1日连发两报，向中共中央表示准备为制止内战在原地打一仗，不轻易走，万不得已时再突围向西转移。这一决心，与中共中央的为不使国民党有借口发动全国内战，而要“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的策略正相符合。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如不能推迟半年，则推迟3个月、两个月以至1个月，“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5月2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局，赞允说：“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易）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国民党的阴谋在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国内进步舆论的谴责下，未能实现。为掩盖其阴谋和缓和人人心，不得不同意签订《汉口协议》。

6月，蒋介石在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和部署之后，于17日通过美国特使马歇尔向共产党提交立即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以及东北大部地区的无理条件作为最后通牒。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分析面临的严重情况及对策，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我军必须战胜国民党军的进攻。

蒋介石在向共产党提出最后通牒时，声称“延长休战至本（6）月30日”，但一向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不信守诺言，一面声明“延长休战”，一面在中原军区主力周围增加兵力，紧缩其包围圈。中原局据此作出判断：“局势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即于6月21日请示中共中央，要求在6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中原局在电报中分析当时防地周围敌情发展时说，国民党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包围与封锁，最近愈益加强，除北面的潢川至罗山一线仍为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未增加兵力外，其他方向均有增加。在东面与东南面的黄陂至商城一线，除原有的整编第七十二师两个旅、整编第十八师1个旅及整编第四十八师4个团外，现武汉行营已将整编第七十二师原在鄂皖边的另1个旅也调至麻城前线（其鄂皖边防务改由原在江南之整编第二十六师的1个旅接替）。在西面及西北面，除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十一师主力仍分布于信阳至武汉的铁路线上外，郑州绥靖公署最近将整编第四十一师、整编第十五师调至许昌及确山段铁路线上集结，以备机动使用。并于最近将第十一军由襄樊调至随县、枣阳前线。中原局的请示电报说，国民党在增加兵力的同时，还加紧紧缩对中原军区主力防地的包围圈，整编第七十二师在本月中旬已将我黄陂北部、黄安南部完全占领，企图将我压至黄安、河口以北地区；第四十五军及第十一军各一部将我确山、桐柏、随县、信（阳）南的乡村根据地全部攻占。在鄂中，最近顽军又有以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七十五师各一部攻占我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的部署与企图。

中原局在分析上述敌情后说，目前转移方向比较安全的是经豫西南和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但其中经豫西南的一条路已因最近顽军占信（阳）、随（县）而失去，如顽军再将鄂中之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以纵队为单位突围的路线将完全丧失。因此，“就时间及情况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虽可能遭到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6月22日，中原局又将截获的国民党蒋介石致郑州绥靖区的密情报告中央，蒋介石已于21日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刘峙即在驻马店设置指挥所，统一指挥第五、第六两绥区的兵力，命令担任攻击中原解放区的各路部队“统于己月养日（即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根据以上情况，中原局建议主力在6月30日前实施突围。

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复中原局：“二十一日电悉。

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使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敌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主动掌握突围时机，复电特别强调：“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

至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了在敌人发动全面围攻前的分路突围的紧张部署。

三、分路突围的部署

分路突围的计划，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的。早在5月初，中共中央就曾在有关电报中提示中原军区部队应准备分路突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电示中原局“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的同时，又专电指出：你们有分散行动的可能，为使各单独行动部队不致与中央断绝联络起见，除保留中原局电台外，另将可能单独行动的部队如王震部、王戴部、皮徐部（一纵一旅）、陈先瑞部、张体学部配好电台。6月20日中原局向中央报告了突围的计划，其要点是：主力向西突围，而后直逼内乡、浙川、荆紫关地区，经伏牛山，越陇海路，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万一不成，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甘（肃）南创建根据地，或到陕甘宁边区会师。同时亦准备渡襄河，进到武当山创建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鄂东、鄂中两区部队（约万人）留当地打游击。万一立足不住，鄂东部队向皖东突围，鄂中部队转入武当山打游击。21日，中原局向中央请示月底实施主力突围计划时，又确定了“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于23日电复同意后，25日又电示中原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路突出包围圈；若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

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了以下分路突围的具体部署：

——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的四十五团、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对外称第十四旅）为北路军，经豫南向西突围，计划于26日黄昏在宣化店隐蔽出发，沿豫鄂交界地前进，预期于29日晚在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地区突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为迅速穿越铁路，还确定北路军第十三旅、第十五旅之四十五团为一翼，在军区首长率领下，于信阳之柳林车站以南地段突过平汉线；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为另一翼，从武胜关以北之李家寨突过平汉线。

——由第一纵队（欠第一旅）为南路军，经鄂中向西突围，计划于25日黄昏由泼陂河等地出发，向西南移动，预期于29日晚在广水以花园以北地区突过平汉铁路。

——以第十五旅（欠第四十五团）担任掩护接应第一纵队的任务，旅部率第四十三团于26日从定远店出发，向西南方向运动，计划于27日在汪洋店西南与第一纵队会合，在路东掩护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该旅驻安陆赵家棚之第四十四团在路西接应，待第一纵队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旅部及其两个团于河南省唐河县以南之祁仪镇归还二纵建制。

——以第一纵队第一旅原地抗击，向东佯动，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待主力于29日越过平汉铁路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向自行突围。

——鄂东独立第二旅坚守宣化店之南大门——吕王城、佛塔山一带阵地，向河口方向之敌警戒，另以精干之一部，于主力开始向西转移之前接替宣化店之警备任务，造成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仍在宣化店驻地的假象，掩护首脑机关和直属部队秘密撤离宣化店，待主力于29日越过平汉铁路送走

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后，再分路向东突围。并重组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斗争。

——江汉军区部队主力向襄河以西地区转移，进入武当山区，相机入川。留下一部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河南军区部队在原地积极出击，袭扰敌人，在北路军突越平汉铁路时，派3支部队到信阳南部的青石桥一带，接应和掩护北路军西进。尔后，该军区在桐柏地区坚持斗争。

突围具体部署下达后，中原军区各路部队即按军区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6月23日，李先念、王震在司令部作战室，向鄂东独立第二旅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副政委熊作芳交待任务。指出：已确定主力向西突围，29日晚越过平汉铁路，独二旅的任务是配合一纵一旅掩护向西突围的主力，保障南翼安全，待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再转移。李先念特别强调要严密监视河口方向之敌，坚决守住佛塔山。指出：佛塔山一丢，吕王城不稳；吕王城一丢，宣化店就会直接受到威胁。受领任务后，吴诚忠先赶回旅部进行部署，张体学、熊作芳又接受了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交

6月25日，中原行署副主席刘子厚受李先念的派遣，赶往安陆桑树店江汉军区驻地，传达中原局、中原军区对江汉军区行动的指示。江汉区党委和军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决定立即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和轻装，并派一支先遣部队提前一天行动，先期赶到襄河边侦察敌情，控制船只，迎接主力部队渡河。另外，对成立江汉中心县委及江汉支队坚持原地斗争作了紧急部署。

为保证部队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北路军在突围前夕派出了小分队侦察行进路线，选择冲锋发起之前的部队集结点。在突越平汉线的前几天，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还率领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靠近平汉铁路，监视平汉线上的敌军，选择部队突围的路线和突破口。第三五九旅在一周前，即按照中原军区的部署，派出侦察部队化装成商人、农民、樵夫、牧童等，在预定的突破地段内，进行敌情、地形和道路的详细侦察，在选定的行进路线上，设定一批夜间也能看得清的地物作为部队沿途行进的路标，为突越平汉铁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中原突围战役开始

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分4路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二旅由信阳出动，整编第四十七师由光山、罗山方面出动，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由商城方面出动，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新十五旅由经扶、黄安方面出动，共8万余人，分由北、东、南3个方向指向宣化店地区；另以整编第十五、第六十六师在平汉铁路的广水、武胜关、柳林、信阳一线加强封锁，并抽调整编第七十五师1个旅，整编第四十一师1个旅至该线加强堵击；另抽调整编第五十八师1个旅由安徽阜阳向河南商城集结，抽调整编第十一师第十八旅的1个团，由黄陂向黄安集结，企图于7月1日进行总攻，实现其在待的一项特殊任务，即由张体学带一支精干部队，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警备任务，掩护中原首脑机关和军区警卫部队隐蔽撤离宣化店，并适时送走第三十二执行小组。24日上午，独二旅在吕王城旅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区首长的指示，研究如何保证完成掩护任务，而后分路突围的路线，以及全旅会合的地点等问题。决定坚持到29日主力突越平汉铁路后，分三路向东突围，第一个会合点是安徽岳（西）太

(湖)边境的冶溪河，第二个会合点是岳西的鹞落坪，然后向安徽五河地区转进。并决定以新四军第七师派到宣化店执行任务的沿江团三营七连，提前于26日晚出发，到蕲春桐山冲隐蔽侦察鄂皖边地区的敌情。25日，张体学、熊作芳在吕王城召见刘名榜，向他传达了中原军区首长关于组织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6月24日下午，王树声向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传达了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下达了一旅原地抗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的命令，指出，要用一切办法拖住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在3天内找不到我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坚持到29日军区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选择突围方向，自行突围。一旅受命后，即在白雀园旅部连夜召开旅党委会议，传达中原军区的命令，分析敌我态势，研究制定完成掩护任务的具体作战方案和自行突围的方向。经研究决定：以白雀园为中心，用第一、第二团的部分兵力，在正面吸引和牵制敌人，以一部兵力白天向东佯动，迷惑敌人，造成主力向东突围的假象，保障中原军区主力出其不意地向西突围。自行突围的方向，经反复研究，确定向东，走与中原军区主力完全相反的路线，以减轻军区主力西进的压力。具体方案是：待军区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先向西佯动，造成跟随主力向西突围的假象，然后隐蔽起来，避敌锋芒，随即向南跳到敌整编第七十二师的后方，再突然挥师向东，穿越大别山，向苏皖解放区挺进。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主力“围歼”于平汉铁路以东之宣化店地区的狂妄计划。

国民党军进攻开始时，先以猛烈炮火轰击。接着，其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缓慢地试探性进攻，下午进攻行动逐渐加剧。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附第三十四旅第一团，除留一部守备其原阵地外，主力沿沙窝南侧及经扶之线向第一纵队防地泼陂河方向进犯，整编第四十七师及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附独立第一团，分北、东两面向一纵一旅防地白雀园方向进犯；驻河口之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于当日拂晓出动，向鄂东独二旅防地——宣化店之南大门佛塔山、吕王城猛烈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中原军区各掩护部队立即进行坚决抗击。中原局、中原军区按预定部署分别下达了紧急行动的命令。当日晚，以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秘密撤离宣化店为标志，主动开始作战略转移，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

自此，以中原突围为起点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胜利地拉开了序幕！

第三章

中原军区北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突围。

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北渡黄河

第一节北路军从宣化店到秦岭

一、首战柳林、李家寨，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

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兵分四路，以宣化店为目标，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当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战略转移计划，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

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三五九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及中原军区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1.5万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下，按预定部署秘密集结，于26日晚撤离礼山（今湖北大悟）宣化店等地，向平汉铁路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至信阳柳林东侧地区开进。

平汉铁路武胜关至柳林段，是国民党军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重点防线之一。这里地处大别山脉的西麓，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势十分险要。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就在此构筑了许多碉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竭力准备内战，又在原基础上构筑了大量集团工事。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命令兵分四路围攻宣化店地区的同时，还将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五师部署在平汉铁路湖北广水至河南信阳沿线，于6月26日严饬这两个师加强对柳林、武胜关等地的封锁，并抽调整编第七十五师1个旅及整编第四十一师1个旅开赴该线配合行动，以防中原军区主力西进。

北路军向西突围，必须首先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平汉路封锁线，跳出其内层包围圈。中原军区和第二纵队经过详细侦察，确定北路军兵分两支跨越平汉铁路封锁线：中原局、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领导机关和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从柳林车站以北地段突过；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从柳林以南、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过。

中原军区和第二纵队将打开柳林车站以北地段突破口、掩护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通过平汉线的任务，交给了骁勇善战的第十二旅第三十七团。三十七团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是原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团之一，在坚持中原敌后的抗战中，屡屡建战功、威名远播，突围前夕，李先念亲自到三十七团下达任务，并作了战斗动员。

中原局、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领导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一部，经罗山杨店、万店，于6月29日到达平汉铁路东侧之信阳周家塘埂。二纵副司令员周志坚，率领担任突破任务的三十七团营以上干部，登上柳林车站东北、距平汉铁路仅五六华里的戴家庙山上勘测地形，侦察敌情，最后选定突破点。当时，在戴家庙的山脚下，平汉铁路东侧，分布着国民党的5个集团工事，大小碉堡十五六个；铁路西侧，有一条宽约300米的河道，在河西岸的何家店，驻有国民党的两个辐重连；戴家庙山的南北两翼分别是柳林车站和黄庄，都是国民党军设在平汉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黄庄至柳林一线的守军是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第四四团，团部设在柳林车站。

在进一步了解敌情和地形之后，二纵、十三旅和三十七团首长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从柳林至黄庄之间打开突破口。具体部署是：第二营从正面攻击国民党军的集团工事，并占领何家店；第一营往南攻打柳林车站，担任左翼警戒；第三营往北攻打黄庄，并负责阻击信阳方面来援的国民党军。

6月29日下午，第三十七团各营以迅速隐蔽的动作进入攻击出发地。黄昏，进攻令下达，三十七团3个营沿柳林至黄庄一线展开，以突然、迅猛的行动同时向国民党守军发动攻击。第二营在夏世厚团长的指挥下，很快接近守军的集团工事，战士们抬出事先在群众配合下用水浸透的棉絮裹着大方桌制成的“土坦克”，向“洋碉堡”发起冲击，仅半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5个集团工事，并乘胜占领了何家店。第一营由政委丁先国率领，向柳林车站发动猛攻。第三连首先攻占了车站北边的一座小山，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国民党军第四四团团部发起攻击，第一、第二连亦同时向车站发起进攻。柳林守军仓皇向南溃逃，第一营迅速占领该车站，并向南派出警戒。与此同时，第三营亦与黄庄之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三营以第八、第九连佯攻守军据点，吸引其火力，第七连和机枪排趁势冲过铁路，抢占了路西紧靠铁路的几个山包。黄庄守军两翼不支，向信阳方向撤退，三营胜利地控制了黄庄南端的铁路口道。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第三十七团打垮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第四四团，毙伤其一部，俘600余人，缴获骡马牲口54匹、枪300枝及大量军用物资，控制了柳林至黄庄一线的铁铁路，为主力通过平汉铁路打开了一条通道。

通道打开后，北路军主力以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为前卫，自戴家庙长冲下山，从柳林车站至黄庄之间兵分三路通过平汉铁路。当部队开始过路不久，从信阳方向增援的国民党军就赶到了，并以猛烈的火力向第三十七团阵地攻击，第三营坚守在阵地上进行阻击。这时在柳林、何家店方向，第一、第二营也与反扑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向三十七团阵地发起冲锋。三十七团指战员为掩护主力安全过路，浴血奋战，坚守阵地达10余小时，至6月30日上午9时胜利完成任务才撤出阵地。

在第三十七团向柳林至黄庄一线的国民党军展开猛烈攻击的同时，北路军的另一支劲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中原军区干部旅，亦按预定计划向武胜关以北李家寨附近的国民党军封锁线展开突破。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神速、秘密地进入封锁线，向北面的柳林及南面的辛店方向派出警戒，主力同时将李家寨附近的国民党军据点包围，趁其毫无察觉，突然发起猛攻，占领了3个据点。前卫第七一七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国民党军，占领了制高点，打开了主力前进的道路。七一八团坚守在李家寨附近阵地上阻击国民党军，直到主力安全通过平汉铁路，才于30日凌晨3时左右撤出阵地。

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半年之久的平汉铁路封锁线，在中原军区北路军勇猛顽强的攻击下，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北路军抢在国民党军发动“七·一”总攻之前撕开了封锁线，彻底粉碎其“一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的计划，取得了中原突围战役的首战胜利。

二、抢渡唐河、白河。李先念在突围路上发表谈话

蒋介石获悉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后，大为震惊，急令刘峙所部全力追击。刘峙判断北路军将在平汉路以西的桐柏山区立足，遂于1946年7月2日命令整编第十五师、第四十一师（欠1个旅）向太平镇（今属枣阳市）。枣阳、吴家店地区猛烈追击，并以主力一部挺进桐柏，防止北路军北进；以整编第四十七师附第一七四旅，在平汉铁路以东之罗山定远店、周党畈、涩港店、朱堂店地区进行“清剿”；令整编第三师向随县（今随州市）天河口方向前进，于厉山镇、高城镇、天河口地区堵击北路军西进，企图在空军配

合下，将北路军一举围歼于天河口、高城地区。

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畏天候，冒雨前进，同国民党军追堵部队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6月30日，北路军到达信阳西南35公里的大庙贩、平靖关；7月1日，进抵湖北应山（今广水市）西北的泉口店、浆溪店、吴家大店之线，部队在此进行轻装和休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对干部旅进行整编，充实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的保卫工作。7月4日，北路军进至天河口以西的青苔镇，遇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第三旅一部阻击，前卫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当即将其击溃。7月5日，北路军先头部队进抵枣阳县城以东吴山镇，新集一线；7月6日，北路军胜利地越过天河口、高城，进至枣阳以北地区。此时，奉命“追剿”北路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欠第一二四旅）及整编第十五师主力始抵桐柏及信阳西双河、谭家河地区；奉命前往天河口执行堵击任务的整编第三师主力，在仓促进至枣阳后，仅派出1个营于唐王营、刘店堵击，并当即被北路军击溃。至此，国民党军在天河口、高城地区“围歼”北路军的计划失败，北路军取得了“竞赛”的初步胜利。

北路军的神速行动，使国民党军追堵部队痛感“望尘莫及”、“永无追及之日”。蒋介石则一面斥责刘峙“作战不力”，一面下令务于白河东岸地区寻找战机，全歼北路军主力。7月7日，刘峙部署第三次追堵，令整编第四十一师（欠第一二四旅）及整编第十五师继续向苍苔（属唐河县）方向追击；第一二四旅即由明港开赴南阳担任阻击。令整编第三师主力分三路向苍苔方向前进，以第三旅（欠第八团）为右路，从太平镇向苍苔镇；以师部率第二十旅第五十八团为中路，从刘家寨直奔苍苔；以第八团为左路，经程河口向苍苔附近前进。同时命令以5个保安团分驻邓县、新野，以两个支队驻守唐河，企图于白河东岸之苍苔地区“围歼”北路军。

北路军洞悉国民党军的阴谋，乘胜前进。7月正值雨季，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部队克服疲劳，昼夜兼程，以日行180里的速度强行军，决心抢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渡过唐河、白河，脱离豫西南平原、河网地带。7月6日，第三五九旅前卫第七一七团率先抢占了位于唐河县程家河的唐河渡口，7日占领位于新野县朱家集的白河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架设浮桥，掩护三五九旅主力和干部旅渡过了唐河、白河。

与此同时，中原局、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领导机关和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亦进至唐河东岸地区。前卫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于7日抢占唐河郭滩渡口，次日抢占白河樊集渡口。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预先拆毁了唐河、白河上的民用便桥，并将渡口船只放到下游。三十八团沿河发动群众，收集到大量木船、木梯、门板和桌椅，并在群众的帮助下，在唐河、白河上架设了浮桥。当北路军首脑机关和大部队过河时，国民党军12架飞机进行轮番俯冲轰炸。北路军一面组织机枪火力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扫射；一面及时抢修炸坏的浮桥，强行渡河，终于在7、8两日胜利渡过唐河、白河，进入邓县、镇平之线。至此，国民党军“围歼”北路军于白河东岸地区的阴谋遂告破产。

北路军及中原军区其他各路突围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围歼”阴谋，不仅从军事上显示了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而且从政治上将蒋介石国民党置于不利地位。国民党企图掩盖其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竟置铁证如山的事实于不顾，诬称中原军区部队“主动进攻”，欺骗人民。为进一步揭露

国民党的阴谋和丑行，李先念司令员于7月7日在突围途中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谈话。李先念列举了抗战胜利到突围前夕，中原军区全体将士为和平忍让求全，而国民党军却变本加厉，以30余万大军重重包围中原部队，步步紧逼，不断违约进攻，企图置6万抗日有功将士于死地的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对我中原军区部队穷凶极恶的‘围歼’计划，蓄谋已在10个月以上”。他一针见血地驳斥国民党蒋介石：“世人皆知，蒋军兵力五六倍于我，我方处于被蒋方包围封锁状态。且我解放区在1月10日以来的6个月中，月月缩小，日日被占，一个五百万人口的解放区几乎被占殆尽。究竟谁守约和平，谁在违约进攻，这还不十分明白吗？这还有丝毫狡赖诈骗的余地吗？”李先念代表中原军区部队严正声明：“只要蒋介石实行去年九月间的协议，允许我军和平撤往华北解放区，并保护中原解放区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则我方对于蒋介石背信弃义、灭绝人道的滔天罪行，仍可曲予原有，维护和平大局。否则，我六万官兵誓当不惜一切，死里求生，并坚信我全国解放区军民决不就此干休，其一切严重后果，惟由蒋介石本人负其全责。”李先念的谈话，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受到进步舆论的关注。

三、分兵左右两翼行动。强渡丹江

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北路军合围追堵计划接二连三地落空后，蒋介石对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等以“行动迟缓，未能阻歼共军”而“勒令查办”，并严令刘峙督促所部“跟踪追击”，务于1946年7月20日前寻找有利战场，全歼北路军，刘峙遂下令将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十五、第三师，分别置于河南南阳、镇平、内乡以南及丹江沿岸之淅川、马蹬铺，李官桥和邓县以东以北地区，并以内乡4个保安团在师岗（今内乡西南）地区堵击，企图将北路军“围歼”于丹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还同时密令胡宗南部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及驻关中地区之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连夜赶至豫鄂陕三省交界之咽喉荆紫关地区，参加堵歼并防北路军入陕。

跨过唐、白二河的中原军区北路军，继续挥师西进。7月9日，经邓县白牛进至镇平黑龙集、太山庙一带，当地人民群众主动聚集村头、路旁，给部队送水、送粮。当夜，第十三旅部队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袭入贾宋镇、进击马庄街，烧毁国民党守军炮楼，打开豪绅的粮仓，补充部队，救济贫民。10日，从马庄等地出发，夜渡湍河，穿越内乡——邓县公路，经邓县张村、十林等地西进。11日，北路军进至内乡西南师岗，内乡国民党聂国政、靳少华的4个保安团，利用师岗西南及西北的山冈丘陵进行阻击，企图迟滞北路军行动。前卫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采取分队行动，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出击，将保安团打得四处逃窜，歼敌200余人，为主力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鉴于国民党军追堵日急，为分散其兵力，中原局、中原军区及时于7月11日作出了“北路军决心分两（路）纵队向西挺进”的决定，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首脑机关及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中原军区警卫团一部为左翼，经湖北郧县南化塘、陕西山阳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由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右翼，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分兵后，部队连夜沿内乡—淅川公路向西挺进。

内乡、邓县、淅川一带，原为土顽别廷芳统治的地盘，这里民团众多，保甲森严。北路军所经村寨，不仅时常受到土顽骚扰，而且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大都空室清野，逃离躲避，给部队行动带来极大困难。北路

军及时加强政治工作，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政治主张，一方面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借用民房，走时打扫得干干净净；借吃百姓的粮食，一律留款附言，表示感谢。北路军爱护人民、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给沿途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12日，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进抵浙川地区，即以第七一七团和第七一九团第二营围攻浙川县城。国民党浙川民团副司令任泰升率常备营400余人，据高墙深沟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因无重火器，加之大雨滂沱，攻至13日未克。与此同时，第七一八团奉命抢占人陕咽喉荆紫关，进至寺湾时，与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一部激战，从俘虏的国民党军参谋口中得知，整编第九十师已抢先占领荆紫关，并正沿丹江向浙川方向推进。其时，尾追之整编第三、第十五、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各一部，已抵达马蹬铺附近。鉴于此情，为迅速摆脱追堵的国民党军，中原军区领导果断地改变原拟右翼部队取道荆紫关、走捷径入陕的计划，决定迅速抢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向陕南挺进。

丹江系汉水支流，全年多数时节水深不过膝，可以徒涉。但当时正值夏季，连日暴雨，山洪突发，丹江水位骤涨。浑浊的江水，卷着断树草渣，翻腾咆哮，巨浪撞击着江边的岩石，卷起数尺高的浪花。7月13日下午，北路军右翼部队以第七一七、第七一八团阻击由荆紫关赶来进攻的国民党军，第三五九旅旅直、第七一九团和干部旅即开始从大石桥、娘娘洞等地抢渡丹江。指战员们将收割的电线扭成绳索系于丹江两岸，然后分批抓住绳索渡江。由于水急浪大，绳索一度被冲断，300多名指战员牺牲在江水之中。

同在7月13日，北路军左翼部队亦进抵丹江东岸。前卫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迅速包围马蹬铺，击溃马蹬铺外围白兴周、贾店华等数股民团，并于浙川城东之屿山主峰歼国民党军1个连，为主力渡江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李先念派出警卫队和身边的参谋人员，四处寻找渡点。在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数小时的紧张试渡，在距浙川城以西约1.5公里的人字坎城，找到了能够徒涉的渡江点，而后，在李先念等指挥下，部队精心组织，于13日夜间开始渡江。指战员们团结一心，互相帮助，年轻力壮的背着伤员和孩子，会水的搀着不会水的，顶着激流，艰难徒涉。

7月14日，北路军左、右两翼主力胜利渡过丹江；后卫部队于15日亦安全过江。当尾追的国民党军进至丹江东岸时，北路军已进抵浙川以西之郧县梅家铺地区，并乘胜西进。

四、右翼部队激战鲍鱼岭。左翼部队血战南化塘

当中原军区北路军突破国民党军的丹江防线后，蒋介石接连3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刘峙遂于1946年7月15日作出部署：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五旅沿滔河南岸追击北路军主力；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二旅主力由浙川大石桥渡丹江，第三六六团于丹江沿岸掩护该旅主力侧背，并经浙川西北之西坪、荆紫关南下与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配合，堵击北路军北上；整编第三师两个旅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位于郧县西北地区防北路军西进；整编第三师第三旅位于郧县东北之白桑关地区，整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四旅位于李官桥及谷城以西石花街一线，防北路军南渡，企图于滔河南岸的郧县狐狸坝、白桑关地区堵歼北路军。但国民党军尚未到达指定地区，北路军已迅速进至荆紫关、

南化塘之线。刘峙遂又令整编第三师等部至郟县东北鲍鱼岭、南化塘之线，企图与整编第四十一师及胡宗南部配合行动，歼灭北路军主力于荆紫关、南化塘地区。

荆紫关、南化塘地区，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人陕之门户。这里山岭连绵、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胡宗南在接到蒋介石“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的命令后，即令整编第一、第九十师等部赶至荆紫关、南化塘、鲍鱼岭等地，据险构筑工事。当北路军右翼部队进至荆紫关地区时，即遭阻击，加之山路崎岖，大雨之后，部队行动尤为困难。右翼部队遂以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第七一八团为第一梯队，抵御正面之国民党军；第三五九旅旅直、干部旅和第七一九团为第二梯队，向西疾进，拟首先通过荆（紫关）南（化塘）大道，抢占湘河街。

7月17日晨，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二梯队向南化塘东北之玉皇山前进。前卫部队进至郟县白家沟，受到国民党军阻击，于是改变行进路线，绕玉皇山以北前进，又遇整编第九十师第五十三旅一部阻击。第七一九团第一营当即展开，与其激战，连克数山头，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三旅一部击溃，缴获重机枪5挺，接着，一营继续追击前进，为主力开辟通道。当一营追至玉皇山东北之鲍鱼岭时，又遇国民党军据险阻击。一营数度组织攻击，但由于缺乏重火器而屡攻不克，于是经郟县竹扒沟翻山，此时原为后卫的第二营变成前卫。当部队进至山腰时，又遇国民党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阻击。这时，整编第九十师第五十三、第六十一旅亦相继赶到，将北路军右翼部队包围在竹扒沟至鲍鱼岭地区。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七一九团以第一、第三营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以第二营主攻正面国民党军阵地。二营在团长颜龙斌的指挥下，以六连居中，四连为左翼，五连为右翼，同时向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六连副连长张龙，率队数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五连连长贾书经身负重伤，双臂被子弹打穿，仍奋力指挥战斗，坚持不下火线，也英勇牺牲，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震副司令员、郭鹏旅长、王恩茂政委组织旅直干部和勤杂人员参加战斗，一鼓作气，拼死杀开一个缺口，迅速突出重围。三五九旅刚一突过，国民党军又组织兵力将缺口合拢，干部旅后续部队一部又被围堵。在情况危急中，干部们拿起武器和警卫团一部奋起向国民党军冲击，终于再次突破围堵。当天，部队进至郟县王家店、郝家庄一线，与此同时，右翼部队第一梯队第七一七、第七一八团在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后，转向湘河街方向前进。7月18日，右翼部队第一、第二梯队在商南县乔坡会合。

当北路军右翼部队于鲍鱼岭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时，李先念、郑位三率北路军左翼部队亦进抵南化塘地区。7月17日上午，部队到达南化塘东北之玉皇顶附近，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已抢先占领玉皇顶及其西南一线山梁，构筑工事，进行堵击。中原局、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领导机关所在的北路军左翼部队，被压在玉皇顶右侧的深沟内，左右两侧均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尾追的国民党军又源源扑来，处于四面围攻之中，面临覆灭的危险。

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文建武、周志坚等军区及纵队首长冷静地分析敌情，果断地作出了强攻部署：命令军区警卫团1个营佯攻玉皇顶，吸引国民党军火力，阻止其下山；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从正面强攻玉皇顶西南一线阵地，杀开主力突围的血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担任侧翼掩

护，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断后；号召全军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下午3时，强攻开始。北路军左翼部队集中数十挺轻重机枪和仅有的4门“八二”迫击炮及数十发炮弹，向国民党军主阵地猛烈攻击。在火力的掩护下，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政委丁先国和副团长邹顺华分率该团的3个营，同时向国民党军发起冲锋。指战员们虽经长途行军作战，饥饿疲劳，但一听到作战命令，顿时精神抖擞，勇如猛虎，一鼓作气扑向国民党军阵地。

当时，国民党军在玉皇顶西南的主阵地与三十七团阵地之间有一深山沟相隔，三十七团欲夺取其阵地，必须首先进入到沟底。当三十七团发起向沟底冲锋时，国民党军立即组织起猛烈的火力射击。子弹雨点般地倾泻而来，炮弹在山腰、山沟开花。三十七团的勇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活着的继续往前冲。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中弹，肠子从伤口流出来，仍坚持不下火线。躺在地上高喊：“同志们快冲呀！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二营营长李俊山头部负重伤，仍忍着巨痛，指挥部队向敌人攻击，不少伤员拒绝战友的抢救，高喊：“不要管我，快冲，快冲呀！”三十七团的指战员们，就是这样不惜牺牲，前仆后继，进入到山沟底部。

接着，三十七团又向国民党军构筑的梯形阵地发起了强攻。由于国民党军阵地上树少坡陡，攀登极为困难。战士们有的用刺刀铲，有的用枪托捣，有的干脆用手挖，弄出一个个小坎子，一步一步地向上逼近。当距阵地上的国民党军只有10多米远时，指战员们一齐投出一排手榴弹，在一阵隆隆的爆炸声中，大家呐喊着冲入国民党军阵地，与其展开肉搏战。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国民党军开始溃退。三十七团的勇士们乘胜追击，俘国民党军100多人。随后，部队又坚守阵地10多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的数次冲锋，掩护首脑机关和大部队突出了重围。在这场血战中，左翼部队伤亡200多人。三十七团一营教导员薛国斌、二营营长李俊山因伤势过重，不久牺牲。三十九团副团长欧阳藩，在率部阻击敌人时，亦英勇牺牲。

鲍鱼岭、南化塘之战，是北路军在突围战役中经历的一场最危急的战斗。北路军指战员在处于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困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于荆紫关以南地区全歼北路军主力的阴谋，得以继续西进，直指陕南。

五、右翼部队转战口头坪、长沟口，解放镇安县城

中原军区北路军突进陕西南部地区后，蒋介石惟恐其在陕南立足，又调集兵力构成多层次、大纵深的堵击网，企图在陕南崇山峻岭之中全歼北路军。其具体部署是：以整编第一师进至山阳、竹林关一线；以整编第七十六师进至板岩镇、漫川关一线；以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进至照川镇一线，并向漫川关推进；以整编第九十师一部置于竹林关至荆紫关之间，并以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及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控制此地区所有南北道路，构成强大的堵击纵深；以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师主力从荆紫关，鲍鱼岭和南化塘一线继续向西猛追。

1946年7月20日，北路军右翼部队经山阳县辘子沟进至山阳县口头坪，遇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阻击。国民党军占领口头坪附近制高点，以密集的火力居高临下向行进中的右翼部队射击。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团长沙颜斌奉命率部出击。他将一部兵力置于河谷中牵制国民党军，自率主力绕道抢占国民党军阵地的后山头，向其发起攻击。经激战，七一九团击溃国民党军，

夺取了阵地。战斗中，颜龙斌冲锋在前，右臂被打断。当晚，医务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他作了断臂截肢手术。手术后，颜龙斌忍着巨大伤痛，拒绝极度疲劳下的战士为他抬担架，坚持同大家一起行军，两三天后，他又在小河口战斗中，捂着断臂，忍受巨痛，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直至壮烈牺牲。临终前，颜龙斌还以自己为党做的工作太少而感到惋惜。

口头坪战斗后，北路军右翼部队全体指战员，忍受着极度饥饿和疲劳，昼夜冒雨行进，连续在山阳漫川关至洛峪街、漫川关至高坝店的大道各要点，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阻击。7月23日，部队在向山阳小河口开进途中，又遇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第四三团阻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经两小时激战，毙伤其一部，俘其10余名，缴获重机枪4挺。在这次战斗中，七一九团团团长颜龙斌壮烈牺牲，政委蒋洪钧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参谋长朱佐夫亦壮烈牺牲。

7月24日至25日，北路军右翼部队进至山阳长沟口、土地岭、三宫殿地区时，又一次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国民党军几次发动猛烈进攻，企图一举歼灭右翼部队。右翼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坚决还击，指战员们虽然连日处于半饥饿状态，日夜行军苦战，仍然斗志昂扬，精神饱满。七一八团与整编第七十六师一部激战两日，以反复冲杀将其击溃，主力迅速跨过山（阳）荆（紫关）大道，进至山阳赵家河地区。七一七团、七一九团和干部旅，亦同时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七一七团二营四连、五连迂回到国民党军阵地后面实施攻击，正面部队亦同时发起猛攻，将国民党军击溃，主力亦迅速跨过山荆大道，进至赵家河地区。

鉴于敌情严重，战斗频繁，为减轻部队的掩护任务，同时更有效地保存干部，北路军右翼部队领导决定将干部旅分散行动：一部随三五九旅继续西进；一部组成若干游击支队，就地坚持斗争；一部化装转移。7月26日，王震即将此情况电告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并报中央，指出：为精干部队，且为其自己生存计，已（将干部）分股潜伏游击或化装走，请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收容。

7月27日，在赵家河一线稍事休整后的右翼部队继续向西挺进，于山阳三十里铺、石门关等地击溃阻击之敌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主力，强越山（阳）商（县）公路。28日，进至商县黑山街、安武一带。国民党军两个团追踪而至，三五九旅主力一边抗击，一边转移，在杀伤国民党军200余人后，于29日进至柞水县葫芦湾一带宿营。30日，三五九旅向柞水、镇安方向转进。31日，部队进入镇安县境。

8月1日，三五九旅为解决给养，决定进占镇安县城。当时，镇安城内驻有国民党保警大队两个中队，共300余人。三五九旅进入镇安县境后，国民党保警队闻风丧胆，县长赵文彬将保警队分别置于虹化亭、营盘梁、十八盘、北城坡等地防守，自己带上随从弃城逃往安康。三五九旅七一八、七一九两团，由午峪沟过乾佑河，经王家坪等地占领了镇安城后的北城坡，并于当夜进占镇安城。2日，王震率七一七团及直属机关进入城内。部队进城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并开仓济贫。

六、左翼部队奋战东赵川、梁家坟，与陕南游击队会师

1946年7月19日，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军区北路军左翼部队，经商南县万青、花家沟、大阴坡等地进至赵川镇以东地区，前卫部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奉命进入赵川镇，开辟前进道路。

此时，因围堵突围部队不力而被蒋介石严厉斥责，并决心“戴罪立功”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亲率第三旅（欠第八团），第二十旅第五十八团及第五十九团一部，实行“超前追击”，已进占赵川镇。并在赵川镇北面的福耳岭、南面的老园坟设下重兵，空出赵川镇，企图将北路军左翼部队诱人镇内一举歼灭。

四十五团进入赵川镇后，及时识破了赵锡田的阴谋，前卫三营当即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一、二营同时抢占了赵川镇东南面的前坡岭，九道岭一线阵地。前坡岭是一条马蹄形的山岭，其东面约3里处有一条山沟，是左翼部队主力西进的必经之道。对于突围部队来说，前坡岭阵地的得失，至为重要。李先念命令四十五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前坡岭主阵地，保证主力安全通过赵川地区。

国民党军企图抢夺前坡岭主阵地，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前坡岭进行了疯狂的进攻。英雄的四十五团一营指战员沉着应战，顽强抗击，许多伤员挣扎着投入战斗，直至英勇牺牲。战斗从19日中午持续到20日上午，四十五团一营坚守阵地达16个小时之久，打退国民党军的17次进攻，毙其700余人，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安全通过赵川的任务。四十五团亦伤亡400余人，团长汪世才在战斗最激烈时，赶赴前沿指挥作战，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赵川战斗后，李先念等鉴于陕南山大人稀，大部队行动困难的情况，决定将左翼部队分为两路继续向陕南前进：李先念、郑位三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警卫团一部，经商南、龙驹寨以南、镇安往宁陕；第二纵队参谋长方正平率第二纵队机关和第十三旅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各一部及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经山阳、镇安、柞水往宁陕，两路部队拟于宁陕会合。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部继续西进。7月20日凌晨，部队进至商南县石柱河地区，与国民党整编第三师第三旅八团遭遇。山梁上的国民党军，发现突围部队后，蜂拥而下，高叫“捉活的”。李先念泰然自若，一边派人火速通知后续部队增援，一边指挥三十七团第一营沿山沟展开阻击。第一营的战士们把机枪架在肩上朝上射击，将国民党军压制在山梁上。当国民党军企图重新组织进攻时，三十七团后续部队赶到了，指战员们一齐出击，把国民党军赶下后山梁。接着，三十六团坚守在山梁上，掩护首脑机关和大部队通过了石柱河地区。

7月21日，北路军左翼部队经商南县店坊河、松树沟、冷水河继续向西挺进。正午，部队到达商南县梁家坟南侧的椴树垭，又突然与胡宗南部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遭遇。当时，在北路军左翼部队的正前方，是一道南北向的横断山梁，紧挨山梁的是一条数十米宽的山沟。国民党军第六十一旅正沿山沟由北向南开进。北路军左翼部队由东向西，横插山沟，与国民党军运动方向成“十”字交叉状，前卫三十七团第一营已穿过山沟。正当中原局、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机关和三十七团二营通过山沟时，突然遭到山沟内国民党军第六十一旅先头部队的袭击。子弹、炮弹打在山沟内，激起满沟泥石。首脑机关人员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面临着极大危险，一颗哑弹落在郑位三政委跟前。

李先念司令员冷静地观察地形，果断命令三十七团第一、第二营抢占山沟右侧山梁制高点，第三营和警卫团一部抢占山沟左侧的几个山头，并亲自指挥警卫部队，在山沟内阻击国民党军。

接受命令后，三十七团第一营在政委丁先国的率领下，迅速折回，抢占

两个山头。接着，第二营亦抢占了几个山头。国民党军发现北路军左翼部队抢先占据横断山梁制高点后，以一部兵力展开进攻，主力则转向山沟右侧，企图抢占制高点，截断北路军左翼部队。三十七团团团长夏世厚率第三营和军区警卫团一个营，与国民党军展开争夺战。三营七连一排冲在最前边，抢先登上了一个较高的山头。当他们刚刚登上山顶时，发现大股国民党军正在从另一侧向山顶爬来。一排几十名战士，用刺刀、手榴弹和石头，将国民党军打下阵地，第三营和警卫团一个营迅速赶到，占领了山沟左侧制高点，接着，三十七团和军区警卫团一个营居高临下，向山沟内的国民党军展开猛烈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败退下去。这一仗，北路军左翼部队及时抓住战机，控制了制高点，将优势的对方置于被动地位，从而以少胜多，打败了国民党军。

梁家坟战斗，是北路军左翼部队入陕的最后一次较大战斗。此后，部队顺利北上，经商南大竹园，于23日到达商南白鲁础。

在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工委积极部署接应工作。1946年6月初，陕西省工委陕南籍干部韩彬等人，受省工委派遣到达陕南，向中共商洛工委传达了省工委关于积极组织游击队活动、准备接应中原部队突围的指示。6月中旬，西北局统战部科长刘庚，亦受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的派遣，赴商洛地区布置迎接中原突围部队的工作。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根据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的指示，认真研究和布置了接应工作，并派出多股小分队，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具体负责，到丹江以南寻找、迎接中原突围部队，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副指挥薛兴军负责筹备粮款。

李先念率部抵达白鲁础的当天，即与陕南游击队中队长刘占山（刘山）取得联系。7月24日，部队进抵山阳龙山地区。此时，中原局遵照中共中央新的指示，对北路军左翼部队的分散游击作了部署；根据郑位三、陈少敏身体状况，决定二人离队休息养病，请陕南游击队负责掩护；由任质斌协助李先念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随后，李先念、任质斌等率三十七团经山阳桂竹园等地，于26日进抵山阳竹林关西南之红岩沟。后因漫川关至山阳之线国民党军有重兵堵截，李先念、任质斌等决定改道北上，与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会合。部队在游击队和群众的帮助下，于27日顺利通过山（阳）竹（林关）大道；当进至毛里岗埡（今属丹凤县）时，又与前来迎接的陕南游击队分队长张青山取得联系。在张青山的带领下，李先念率部于29日抵达花园岭油房村（今属丹凤县），会见了王力。随后，部队由王力带领，于8月1日进入商洛中心地域，从万家湾西沟口（今属丹凤县）渡过丹江，通过西（安）荆（紫关）公路，8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率部在留仙坪（今属丹凤县）与巩德芳及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

从6月26日至8月2日，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历时36天，行程近2000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和一次又一次的追堵计划，胜利实现了从宣化店到秦岭的伟大战略转移。

第二节 河南军区部队挺进豫陕边。

南路军一部从流水沟转道北上

一、掩护北路军突过平汉铁路。从随北西进

为了使中原军区北路军顺利突过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平汉铁路封锁线，并保障部队进抵路西后的安全，中原局、中原军区指示在桐柏地区坚持斗争的河南军区部队，对路西的国民党军实行警戒与牵制。

早在1945年12月，中原军区主力东进大别山后，河南军区部队就受命留在路西进行坚持。半年多来，他们在桐柏山地区的随县、信阳、桐柏、确山、泌阳诸县坚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筹款征粮，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进攻中原的一部分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以宣化店为中心地区的战略坚持。1946年6月下旬，河南军区受命接应掩护中原军区北路军过路，6月27日即令所辖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头秘密向平汉铁路边运动。6月28日下午，各支队均到达指定位置，很快占领山头有利阵地，布设简易工事，做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河南行政专署专员张旺午率武装工作队，在朱堂店、吴家大店、浆溪店等地，发动群众，备粮筹款，为北路军准备财政给养。

6月29日晚，中原军区北路军突越平汉铁路时，在路西既设阵地待命接应掩护的河南军区部队和信（阳）随（县）、信（阳）桐（柏）、桐柏、确山、泌阳等地方武装，已完全控制了西双河一带的大庙贩、火烧寺、青石桥等交通要道。北路军突袭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的战斗打响后，河南军区部队从路西配合作战，形成与北路军夹击平汉路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同时，向北对信阳之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四旅、第一二二旅实行警戒。在河南军区部队的接护下，北路军全部突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以神奇的速度，继续向西疾进。而担负接护任务的河南军区部队，则留下地方武装继续坚守在西双河一带的交通要道，以袭扰、迟滞尾追的国民党军，为北路军迅速西进争取时间。7月2日上午，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先头部队蹑踪追至青石桥，在此候敌的信（阳）随（县）地方部队当即以后高临下的有利之势，集中火力突袭阻击，迫其仓皇应战，迟滞了该旅追击北路军的行动。信、随地方部队战至下午3时半，乘该旅主力尚未到来之际，隐蔽撤出阵地。在此期间，河南军区主力按既定计划到湖北随县朱家店一带集结，准备实施开展豫鄂边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计划。

7月3日，河南区党委、军区接到中原局、中原军区的电示，决定河南军区由就地坚持改为战略转移，部队立即尾随中原军区北路军西进。根据这一情况变化，河南区党委、军区于7月4日在随县草店的石家湾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中原局、中原军区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战略转移的具体事宜。会议对部队行进路线、方向提出了两案：一是尾随北路军西进，一是沿主力北部侧翼西进。大家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认为：若随主力跟进，必定要遭受国民党军的追堵夹击；而且部队就食困难，向导难找，伤病员亦难安置。如果走侧翼，国民党兵力较空虚，则可乘虚而进，给养、向导、伤病员安置等问题均易解决，同时还可与北路军互相策应。经过权衡利弊，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部队行动路线走主力北部侧翼，顺着桐柏，泌阳以东，方城以北，从南召西南进入伏牛山区，到秦岭与北路军会合，恰在这时，中原军区亦驰电指示部队行进路线，与上述决定吻合。这次会议，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决定留下近千人的地方武装组成豫

鄂边独立游击支队，由宁淮任支队长、张波任政委；并成立中共豫鄂边工委（亦称路西工委），由张波任工委书记，领导留下坚持的武装力量，开展豫鄂边地区的游击战争。

7月5日，河南区党委、军区机关直属队、第七团、军区警卫营，干部大队共2000余人，集结在随（县）桐（柏）边祝林店附近的观土店，整装待发。黄林司令员站在山坡高处进行战前动员说：“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越过平汉铁路，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现在上级指示我们河南军区部队立即行动，甩掉敌人，兜大圈子，打大游击……”部队干部和战士都清楚“兜大圈子”、“打大游击”的含义，因而精神振奋，士气高昂。黄昏，部队奉命从随（县）北出发，当晚进至信（阳）桐（柏）公路边的庙湾，正遇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部队由东向西而过。军区首长分析该师连夜赶路势必是尾追北路军，当即决定进行骚扰性出击，迟滞其行动，为北路军迅速开进争取时间，担负骚扰任务的第七

团，在庙湾路边一线拉开，待该师所部大部过后，集中火力照后尾部队一阵猛打。该师后尾部队不摸底细，慌忙停止行进，仓促应战。七团则乘其混乱之机，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主动撤离战斗，跟随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干部大队，迅速穿过公路，而后强行军，一鼓作气于当晚渡过淮河，抵达桐柏地区的花古店。

二、夺取羊册粮仓。伏击辎重车队

河南军区部队日夜兼程，长驱直入，先后突过泌阳县的尖山沟、马古田、王店，于1946年7月9日进抵羊册镇。

羊册镇位于泌阳西北，地势险要，为拱卫县城的重要据点。根据侦察得知，羊册镇里有国民党粮仓一座，储军粮3000余石小麦，而守军只有两个保安大队，获悉这一情报后，河南军区决定袭击该据点，夺取粮仓。由于部队接受战略转移任务的时间紧，经费筹集有限，另外因安置伤病员、干部化装转移和留下坚持部队等活动经费的开支，河南军区给养经费已十分困难，筹粮筹款、补充给养已迫在眉睫。因而命令一下达，部队就做好了攻城准备。

河南军区部队早在抗战时期就在这一带活动过，对地形、民情、敌情都较熟悉。军区首长判断：国民党两个保安大队猬集该镇，固守困难，但若对其围困过紧，亦可能作困兽之斗，据此，作出“围三阙一”的部署，从东北方向发起进攻，而在西南方“网开一面”，逼其溃逃，以减少战斗损失。果然，当河南军区部队发起进攻后，国民党守军就弃镇朝西南方向花山寨逃窜。河南军区部队迅速开进羊册镇，夺取国民党粮仓，部队给养得到补充。然后，开仓济贫，利用宣传队，开群众会、贴标语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翌日，部队经赊旗镇（今社旗县）东北，按预定计划向方城县的拐河前进，在方城之东南处又“顺手牵丰”，缴获了国民党方城县政府的一批物资。

此时，中原军区北路军已神速地跨越唐河、白河，穿过豫西南平原，到达内乡以南的师岗一线，并决定兵分两路向西挺进。国民党尚未发现在北路军右翼行进的河南军区部队，因而把全部兵力都用来对付北路军，使主力受到很大压力。根据这一情况，河南军区研究决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既要注意避开锋芒，减少战斗损失，又要尽可能地抓住有利战机打击国民党军，迟滞其行动，牵制其兵力，以策应北路军。7月11日，河南军区部队大部已跨过南阳—方城—许昌公路；当断后的军区警卫营第三连和第七团第八连正

在独树一带准备过路时，追击中原军区北路军的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一二四旅辎重车队，正由许昌方向急驰而来。军区首长当即指挥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青纱帐里，做好战斗准备，待机行动。不一会，国民党军用车队驶近。一声令下，埋伏在青纱帐里的战士，用机枪、步枪等一齐开火，该车队顿时乱作一团，司机和护兵死的死，伤的伤，”仅少数弃车而逃。经一个多小时战斗，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和七八箱钞票、金条。是役，还生俘了国民党军 50 余名营团级军官。他们是从老河口军官训练队毕业，借道四十一师车队，经南阳去开封所部任职的，不想尚未到职就当成了俘虏。军区首长鉴于这些军官均表示不愿参加内战，又考虑到部队行军不便携带俘虏，于是，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后全部释放。河南军区部队连续两次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既使经费给养困难基本得到解决，又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

三、奔袭南河店。抢渡白河

河南军区部队的行动，打乱了国民党军围追中原军区北路军的计划。蒋介石、刘峙急忙调整兵力部署，令整编第四十一师主力一部寻踪追击河南军区部队，同时组织河南南阳、内乡、山阳和陕西商南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进行堵击。

7月13日下午，河南军区部队行进到南召的南河店附近，这里离白河有五六公里。部队原打算经南河店附近，到三里寨渡口，而后抢渡白河，进入伏牛山区。此时，国民党南阳保安团已采取“超前行动”，占领了南河店川道两边山头阵地，扼险堵截；尾追的整编第四十一师主力一部，离南河店仅15公里，加之有两架国民党飞机在上空盘旋助战，并有汛期中的白河屏障，河南军区部队如不迅速渡过白河，将面临腹背受敌、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紧急情况下，军区领导向部队发出指示，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前方堵截的保安团击溃，杀开一条通道，而对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则挫其锐气，伺机甩脱，部队连夜抢渡白河。

第七团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令第三营强攻被国民党保安团占据的板山店山头阵地。担任前卫的第八连指战员，在七连和九连的火力掩护下，冒着密集的弹雨，率先抢占山头制高点，用机枪压住了保安团的火力，后续部队迅速跟进，夺取了这一山头阵地。国民党保安团退到三里寨负隅顽抗。山寨前是一块开阔地。该保安团以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网，使河南军区机关、部队被迫，停止前进，前卫第八连发起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十几个战士倒在保安团的火力网下。一排排长萧慎鸣和机枪手陈义生目睹此情，怒火满腔，他们以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跳出掩体，抱着机枪，一左一右，相互掩护，冲到山寨前，近距离朝山寨火力点猛烈扫射，使保安团的机枪顿时哑了。战士们乘机冲过开阔地，一举攻下山寨。是役，俘保安团100余人，缴枪170余枝。

河南军区部队来到三里寨渡口时，正值汛期，白河河床比平时一下子拉宽了10几米，急流翻滚，河面上不见一只渡船。据三里寨百姓介绍，上游连续大雨，更大的洪峰将很快通过这一水域，到时候就是插上双翅亦难飞过白河。而此时后卫已与尾追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接火。部队只有迅速渡过白河，才能摆脱险境。军区首长立即下令：徒涉白河。部队群情激昂，战士们将绑带连接起来，由会水的先洒过对岸，在河面上拉起了一根根长索。而后，以班为单位徒涉。当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追击部队赶到三里寨渡口时，河

南军区部队已全部过河，进入伏牛山区。

四、挺进伏牛山。二郎庙、九条岭、桑坪战斗。同北路军会合。

伏牛山位于河南西部，重峦叠嶂，山高路险。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依山筑寨，据关建堡。根据这些情况，河南军区指示各部：缩短部队间隔距离，以防国民党军偷袭；对拦截的保安团等，则采取速战速决战术，快速突过伏牛山区，向豫陕边靠拢，与北路军会合。

1946年7月17日，河南军区部队行至南召境内伏牛山主峰摩天岭附近的二郎庙。这里是淮河与汉水两条水系的分水岭，山高林深，悬崖峭壁，山路崎岖险峻。为保证行进速度，部队在出发前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轻装，把所有骡马和笨重的行李都甩到山沟里，每人只留一枝枪和一床夹被单。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先头部队于翌日清晨接近山顶。此时，太阳尚未出来，漫山遍野，晨风呼呼，云雾缭绕。疲惫不堪的战士正欲休息，突闻枪声大作，满山吆喝，国民党南召保安团已堵住去路。战士们虽疲惫至极，但闻敌情，精神顿作，他们刀出鞘，弹上膛，毫不犹豫，立即迎战。冲锋号一响，一个个如猛虎下山般扑向保安团阵地，南召保安团顿时乱了阵脚，一窝蜂地向山下逃窜。部队奋勇追击，闯过了这道关口。

河南军区部队翻过连绵不断的山岭，于7月21日黄昏抵达

河南奕川西南的黑烟镇。镇内国民党守军慑于八路军、新四军声威，早已逃之夭夭。部队稍作休息后，又连夜行动，于22日拂

晓来到九条岭山脚，据侦察报告，国民党内乡保安团已先期占领了山头阵地，封锁了部队前进道路。军区首长亲临前线阵地，指挥第七团第一营从正面进攻，第二营从右翼迂回进击。第一营迅速实施主攻，前卫连指战员用集束手榴弹消灭其两个火力点。正待后续部队冲上去时，又被保安团另外的火力点所阻，攻击部队被迫停止前进。此时太阳已经升起，山峦渐渐显出轮廓。如果不迅速拿下这个阵地，待晨雾散尽，部队将全部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为保证部队安全，前卫连以山雾作掩护强攻保安团阵地。排长尚官廷手托机枪，一股劲地射击，终于压住了保安团的火力。这时，迂回到保安团右翼的第二营也发起了进攻，第一营抓住战机，发起冲锋，保安团受到前后夹击，招架不住，死伤近百人，其余的如丧家之犬仓皇而逃。此役毙伤国民党保安团近100人。

七团指战员继续追踪，连续翻过了九条岭，将保安团逼迫到桑坪镇及其东面的大山。

河南军区决定乘胜打下桑坪镇。此时，国民党援兵赶到，枪炮声响成一片，去桑坪的大路被其堵住。根据新的敌情，河南军

区部队展开全线突击，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冲杀。堵击的国民党军4个保安团，见势不妙，慌忙溃逃。与此同时，第七团第三营向桑坪东大山发起冲锋，很快夺占阵地。桑坪镇的国民党守军怕被吃掉，弃城逃进深山。河南军区部队于22日晚进入桑坪镇。

7月23日凌晨，河南军区部队从桑坪镇出发，不顾疲劳，克服天气恶劣、道路泥泞等困难，兼程向伏牛山纵深疾进。经河南之卢氏与陕西商南间的瓦窑街地区，于7月26日到达豫陕边

的两岔河，这里是伏牛山与秦岭的交界处，山势险峻，道路狭窄，人烟

稀少，2000 多人的部队行军就食十分困难。军区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兵分两路前进：由司令员黄林、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水泉率领军区直属队、警卫营和第七团第三营为右翼。继续往西北方向行进；由第七团团团长胡玉堂、政治委员邵敏、副政治委员张生文率领七团团直及第一、第二营、军区干部大队为左翼，过西（安）荆（紫关）公路，向中原军区北路军靠拢。两岔河分兵后，右翼部队经卢氏官坡、五里川，于 7 月 29 日抵达木桐沟。7 月 27 日，河南军区左翼部队从武关附近穿过西荆公路，进入陕南。部队沿着秦岭蜿蜒陡峭的山间小路继续西进。7 月 28 日晚，在竹林关东北 5 公里处渡过丹江，进入山阳县境内的轱辘沟。7 月 29 日凌晨，部队正欲行动，突然发现周围山头都被国民党军占领。原来，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第五十八团，以及山阳、商县两个保安团发觉河南军区部队有向西与中原军区北路军会师意图，即向丹江沿线运兵回堵，与胡玉堂、邵敏所部遭遇，便令正规军抢占西边山头，在正面进行堵击，将两个保安团摆到南北两翼，并令一部迂回到靠丹江的东长岭岗截其后路，企图“围歼”河南军区部队。面对严重的敌情，河南军区左翼部队决定放弃继续西进、寻找中原军区北路军的意图，避开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向东跳出其包围圈，重返豫陕边界。部队很快调整部署，集中火力猛攻东长岭岗。国民党保安团仅抵挡一阵，即退到南面的一个山寨。胡玉堂率警卫连与通讯排攻上去，占领了山头，与南面山寨保安团形成对峙态势。邵敏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令副政委张生文率第二营第五连抢先回渡丹江，在丹江东岸控制住制高点，并与占领东长岭岗的部队相策应，扼守川道，掩护团直机关和干部大队突围。此时，第一营在营长孙万祥率领下，从正面一举杀出重围，吸引国民党军一部西去。尽管如此，但由于占据山头阵地的国民党军兵力多，并组成密集的火力封锁网，故战斗仍异常激烈。经过反复冲击，到下午 4 时，左翼部队方才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随即东渡丹江，摆脱其尾追。这次战斗，军区干部大队遭受了较大损失，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顽强作战，亦重创围堵的国民党军。在撤退路上，第一营与国民党的一个侦察连遭遇，将其全歼。在陕南游击队的配合下，河南军区左翼部队经过辗转战斗，不久在豫西卢氏县的木桐沟与右翼部队

会合。

此时，中原军区北路军已到达豫鄂陕边，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执行新的战略任务。河南军区部队于 7 月底进入商州、山阳地区，亦奉命在豫陕边停止西进；8 月初与北路军会合，投入了新的斗争。

五、南路军一部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

在河南军区部队从随北出发向豫陕边挺进的时候，中原军区南路军一部 2500 余人因过襄河受阻，在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闵学胜率领下亦转道北上，向伏牛山转移。

南路军在突围中，于 1946 年 7 月 11 日抵达雅口、流水沟，西渡襄河。第一纵队第三旅第八团、第二旅第六团两个营由闵学胜指挥、奉命在襄河东岸流水沟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掩护南路军一纵与第二纵队第十五旅主力强渡襄河，至 13 日下午 5 时。完成了阻击任务。但此时渡口被敌严密封锁，船只已失，阻击部队已无法渡河。为此，闵学胜即召集旅、团干部举行战地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部队于当日黄昏先向北突围，然后迂回西进。是日夜，八团二营在一营和六团 1 个营的配合下，从无名高地两侧发起猛烈攻击，迅速夺占了据守的北边山冈和无名高地。打开了向北突围的缺口。随即，八

团和六团1个营撤出阵地，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按计划连夜向北疾进。

该部转道北上后，刘峙即调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跟踪尾追并令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和第一九九旅第五九五团由两河口速向田家集西北襄河东岸挺进堵截。7月14日，南路军一部北上途中，在宜城之新街、枣阳之耿集、随县之李家坝等地，先后与国民党军遭遇，经数次激战，将其甩掉，他们昼夜兼程，走金马店、随阳店，经唐王店、吴山镇，向西北方向疾进，于7月16日抵随县西北三合集与唐河以南祁仪之间的钱家岗。部队在此进行了短暂休整，将未渡河的所有战斗人员全部编入第六、第八团，加强旅部指挥机关力量，补充了后勤给养。并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形势，研究决定部队从南阳与邓县之间西进豫陕边。

7月17日，闵学胜率南路军一部越过唐（河）枣（阳）公路，顺利涉过唐河，于18日午后进至白河东岸。时值傍晚大雨，山洪猛涨，白河水深流急。部队即派出侦察队察看地形，并向当地群众了解有关情况。当日傍晚，部队开始涉渡白河。第八团一、三营组织水性好的战士在前，由当地群众领渡，第六团跟进。第八团二营为后卫，担任警戒后涉渡。干部战士5至10人一组，用绑带连接，手挽着手向白河西岸前进。担任前卫的第八团一营涉渡至白河西岸后，遇到国民党邓县驻守河防和公路的保安大队300多人的堵截。一营迅即抢占有利地形，全力迎战，毙伤保安大队100余人，其余部狼狈逃窜。天黑时，部队除几匹牲口被洪水冲走外，全部顺利渡过白河。

当夜，南路军一部冒着大雨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第五九五团已进至白牛、王集等一带村庄，修筑工事，部署堵截防线。根据敌情，部队即绕道行进，避开了堵截的五九五团，于7月19日拂晓前到达黑龙集。部队连续急行军，已疲惫不堪，决定在此稍作休息。正准备吃饭时，东、南、北三个方向突然枪声大作。原来由南阳、邓县跟踪追来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和邓县保安团等部已将黑龙集包围。南路军一部首长即令第八团一、三营和第六团一个营投入战斗。指战员们以猛烈的火力，打退了国民党先头部队的进攻。黑龙集地势平坦，处在三条公路之间，地形不利于久战。西进有丹江险阻和国民党军重兵堵截，徒涉困难，不易通过。旅部决定部队先从正北方向突出去，进入伏牛山区，然后进至豫陕边。国民党军调整兵力后，又重新发起进攻。第八团一、三营和第六团一个营集中火力，顽强抗击，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而后以八团二营为前卫，六团随后跟进、八团一、三营亦边打边撤，以迅猛的行动，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合围。指战员们顶着烈日酷暑，忍受着干渴与饥饿，急行军直插西（峡）南（阳）公路。前卫八团二营进至公路边后迅速展开，占据有利地势，向西峡、南阳方向警戒，掩护部队通过公路。这时，从西峡方面开来3辆国民党的汽车，二营利用有利地形，击毁汽车2辆，毙俘国民党军20余人，缴获部分物资弹药。部队在内乡、镇平之间顺利地越过西南公路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于黄昏时进至通往伏牛山的马山口附近，遇占据两侧高地的内乡保安团两个大队的堵击，八团一、二营乘黑夜分别发起偷袭，将这两个保安大队击溃，毙伤俘其50余人，夺占了马山口两侧高地。与此同时，八团三营与六团一部包围攻打马山口的国民党乡公所，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和物资。

南路军一部挥师北进，使蒋介石、刘峙十分震惊，急忙调整编第四十一

师第一二五旅由陕南向内乡、邓县东进，回堵南路军北上部队，并令其地方保安部队配合作战，沿途堵截。据此，南路军北上部队决定，在国民党回堵强兵尚未抵达之际，挺进豫陕边，与中原军区北路军会合。

7月25日，南路军一部经内乡东北的七里坪，继续向西行进。当进至内乡、奕川、嵩县3县交界的合裕集时，又遭国民党内乡保安团堵截。内乡保安团先期占据南面和西侧高地，企图布阵合击。南路军北上部队迅速迎战，八团一营猛攻其西侧并抢占南面高地，二营向西侧高地迂回并发起攻击。保安团装备有小炮和轻重机枪等武器，固守山头顽强堵击，战斗异常激烈。南路军北上部队以勇猛顽强的精神，连续发动强攻，迫使保安团弃阵而逃，部队迅速通过该地。

7月27日，南路军北上部队经庙子绕过柔川县城西进。又昼夜兼程，经栾川之三川和卢氏之五里川、双槐树等地，于8月4日抵达陕西洛南庚家河大石门，与先期到达此地的河南军区部队会合。

南路军一部在襄河东岸受阻、面临全军覆没的紧急关头，当机立断，转道北上，经过辗转战斗，一路艰辛，进至豫陕边，从而化险为夷，完整地保存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胜利地完成了自身突围的任务。

第三节 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一、中共中央调整南线战略部署，指示中原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

早在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中共中央于 1940 年 6 月 19 日致电各解放区，就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从这个估计出发，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其中在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进攻，着重在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作为策应。而后，如形势有利，以晋冀鲁豫、山东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推进。在此期间，中原军区主力在豫鄂西吸引国民党军，一部在原地吸引国民党军。其战略意图，一是“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二是“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指中原军区部队)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国民党蒋介石在大举围攻中原军区部队后，调动了约 58 个旅、计 46.3 万人的兵力，欲发起对华中、山东解放区的多路进攻，企图用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渐压缩、南北夹击等办法，逼迫共产党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其决战，从而消灭华中、山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在获悉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后，即于 7 月 4 日发出指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敌情变化，及时对原拟计划中原南线作战部分进行调整，将外线出击改变为实行内线歼敌的方针。根据这一调整，亦相应地对正在突围途中的中原军区部队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7 月 5 日，中央军委电告郑位三、李先念：“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

己，同时牵制大量敌人，这对全局贡献极大。”7 月 13 日，中央军委又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对“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方针，作了进一步明确的指示，并强调说：“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此时，华中野战军已根据这一方针，着手在内线立即发起苏中战役，形势的发展亦需要有外线部队的牵制和配合。故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于当日电示郑位三、李先念：“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其攻苏皖之计划定于数日行动，分为三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东，一路由江边向北，同时向苏皖边区进攻，总兵力在二十个师以上。”“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7 月 15 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局，进一步指出：“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中原军全部应“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从而对中原军区主力之战略转移终点的选择，作出了新决断。这些调整使南线的作战地位更加有利，同时也使中原军区部队在南线的战略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报告，于 7 月 19 日向中原军

区通报陕南游击队的情况，指出中共陕西工委在商县、洛南、山阳、柞水、卢氏之间“今年搞起数部非法武装，现统一归巩德芳（党员）指挥，已由边区派去50余名干部，帮助发展，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根据地。”并于同日具体指示“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7月22日，中共中央向中原局再次通报陕南游击队三个大队的活动地域，指出：“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在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对于你们在鄂、豫、陕、川、甘边创造根据地，陕南地位是很重要的。”并指示中原部队以一部份队伍编入游击武装中作为骨干，“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这时，中原军区北路军已进入豫鄂陕边，南路军亦进入鄂西北地区。这里地处秦岭、巴山之间，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丹江、汉水，洛河横贯其中，是秦、楚之间的重要战略要地。控制这一地区，既可与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军区相呼应，又可随时进出中原以策应华东、华北及东北部队的作战，并直接威胁国民党之战略要地西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战局形势变化，及时地调整有关作战部署，最后选择与确定了中原军区部队战略转移的终点，指示中原军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域内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创立根据地。中原局、中原军区从全局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了在解放战争初期创建敌后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作出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部署。豫鄂陕边建立四个军分区

早在北路军突破丹江防线后，中原局就曾在浙川城西地区召开过一次有部分中原局委员参加的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问题，因国民党军追兵迫近，会议中途而散，北路军进入陕南后，中原局又于1946年7月23日在商南县白鲁础开会，对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打击民团小股部队，建立根据地。并对北路军左翼部队的分散游击作了具体部署：（一）方正平、张树才率第三十八团两个营向镇安方向活动；（二）周光策、萧元礼率第四十五团两个营向郧西县西部活动；（三）周志坚、杨焕民率第三十九团随中原局，中原军区前进，但已被隔断于赵川以东、荆紫关以西地区；（四）中原局、中原军区率第三十七团全部到竹林关以南之龙山地区与巩德芳会合；（五）秦振率第三十八团第一营在商南县打游击；（六）齐勇率第四十五团一个营在山阳县东部打游击；（七）魏国运、吴杰率警卫团第二营掩护技术侦察处人员向山阳以北行动，准备相机归还陕甘宁边区。会后各部即开始实施。7月24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就二纵主力“实行分散游击”电报中央，指出：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为克服困难，除王震已率三五九旅等单独行动外，决定将直接率领的十三旅及四十五团分7支分散游击。7月25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分散行动的布置”，并指出：“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从敌人包围圈内分股伸出圈外，如此方能生存”。

李先念率部在山阳和丹凤边境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并与中共商洛工委、陕南游击队领导人王力、巩德芳等一起对创建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8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向中央建议：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及区党委并划分三个军分区。

8月3日，中原局在丹凤县留仙坪附近小王沟召开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队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李先念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并就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和军队纪律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会上还宣布了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合编的决定。同日，中原局依据中央精神发出指示，决心在豫鄂陕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求得在外线有力地配合华北、华东作战，并初步划分了三个军分区，以第三五九旅分散于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地区作为一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委；以河南军区部队，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两个大队活动于西荆公路以北、陇海路以南，作为二分区，巩德芳任司令员、黄林任政委；以汉水以北、丹江以南为三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政委，统一指挥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一个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和陕南游击队一部。

早在7月27日，中央军委就电示王震：“你部或北渡丹江，在商县、洛南、卢氏地区分散打游击，该区有地方党配合，最为有利；或经山阳北部向西在柞水、镇安，宁陕等县分散游击，亦可存身。”王震率北路军右翼部队于7月28日进至商县黑山街、安武岭一带时，即在黑山街召开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散，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在安武岭、黑山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王震亲率一个团返回接应北路军左翼部队。会议尚未结束，尾追的国民党整编第一师第一旅两个团从山阳、上下官坊方向逼至。经抗击后，部队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按照黑山街会议精神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此间，西北局亦电示刘庚、巩德芳、王力，要求中共商洛工委立即派一批干部去柞水、镇安。帮助王震部建立根据地，同时提议陕南游击队派一个大队去镇、柞归王震指挥。

8月2日，王震率部进占镇安县城，在县城主持召开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讨论部队分散游击的问题，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第七一七团在柞水、蓝田、西安、卢县、佛坪间活动；第七一九团在镇安、旬阳、汉阴、宁陕间活动；第七一八团及直属队则在中间地区活动。部队在镇安进行了短暂休整，宣布取消中原军区干部旅番号，将干部旅部分未分散人员和三五九旅的旅，团机关直属队人员进行战斗编组，同时将中原军区警卫团剩余部队编入三五九旅。8月3日，尾追三五九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逼近镇安，王震率部主动撤离县城，从云盖寺，三官庙等地，向宁陕、佛坪转进，相机分散游击。

中原军区干部旅在分散游击和化装转移的过程中，有部分重要领导干部不幸遇难。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旅政治委员张成台、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吴先元、中原局副秘书长李其祥等一行5人，8月7日从镇安县杨汛庙、泰山庙出发，化装赴延安。10日行至文家乡文家庙时，被当地土顽活埋在石灰窑中。

由于王震部西进，中原局于8月4日对第一，第三地委和军分区的干部配备作了调整：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吴世安，地委书记兼政委张树才；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周光策，地委书记兼政委方正平。8月6日，中共中央电复中原局：“同意鄂豫陕边成立军区及区党委，并划分三个军分区的建议”，并指出：“区党委可待汪锋到达后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一切均由你们负责”。

此时，在襄河东岸流水沟担负阻击任务后转道北上的南路军一部，在闵学胜的率领下到达豫陕边境的卢氏县五里川、双槐树、洛南厦家河地区，与

黄林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会合，中央军委即指示其两部合并，并于8月6日组成第四军分区及地委。任命黄林（实为闵学胜）为司令员，闵学胜（实为黄林）为地委书记兼政委。并重新任命刘庚为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巩德芳仍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为迅速渡过开创根据地的困难时期，转入主动地位，中原局，中原军区在建立4个军分区的同时，即采取了有力的保障措施。严令并鼓励各部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依照计划迅速到达指定地区展开各种活动，以站稳脚跟。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采取隐蔽指挥办法，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险恶环境。并向中央提议，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陕甘宁边区及陕西工委展开更有效的行动进行策应，牵制一部分进犯的国民党军，以造成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同时建议太岳军区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工作，并派一部游击部队渡河发展，打通华北解放区与豫鄂陕边区的联系。

三、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原军区谈判代表被害事件

中原局，中原军区在率部先后胜利举行中原突围战役和重新部署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还继续同国民党展开了和平谈判的斗争，进一步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早在1946年7月7日李先念在突围途中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反对蒋军违约进攻》谈话的前后，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分别于7月2日和8日约见蒋介石，马歇尔，对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全面内战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平、坚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亦相继发表消息和评论，披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行径。7月11日，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还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大规模内战的真相，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军“悬崖勒马、停止追击、堵截、‘清剿’，立即允许我军合法转移华北，以免事态扩大，影响全局”。并要求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立即赴冲突前线，调查事实真相，制止内战之扩大。

迫于进步舆论的压力，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歼”计划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重开中原停战谈判，并企图以此赢得重新部署兵力的时间，“围歼”中原军区部队。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就曾密示国民党军“勿为第九、第三十二小组签订的协议限制，否则，各师长、军长就要受到军法处分”。7月中旬，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先后飞赴老河口调查、调处。他们分别于7月14日、15日、16日派飞机投掷了第一、第二、第三号函，邀李先念或“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员”于16日前到老河口协商，“18日前至浙川晤面”。此后，又散发了第四号函，请中原军区派代表于7月24日前到龙驹寨找三十二小组联络。

在第九小组和第三十二小组不断向中原军区部队投掷信函之时，国民党军不仅毫无停战之意，而且加紧调兵遣将对中原军区突围部队进行追堵。7月14日、15日，即军调部执行小组投出“一号函”、“二号函”的时候，蒋介石就3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刘峙，胡宗南则调集重兵追堵已突破其丹江防线的中原军区北路军，企图在地势险要的荆紫关、南化塘地区，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所在的北路军歼灭。由于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堵，中原军区无法派出代表如期前往指定地

点谈判。7月24日，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飞机于23日撒下三十二小组之“四号函”的内容；表明我们很想利用这个时机与国民党“谈判鄂豫陕地区的停战问题”；申述“我们现在离龙驹寨有三天的路程，不能按日赶到”；并提出“我们要求中央即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替我们与三十二小组及九小组谈判”。25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李、文、任：“已电西安办事处周子健代表先念与三十二小组接洽，声明愿意调处，要求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

7月25日，第三十二小组到达西安；同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往联络，西安谈判开始。31日，第三十二小组三方代表召开预备会议，周子健参加会议并代表李先念正式提出停战声明。预备会议决议：俟胡宗南派出代表后，即召开正式会议。并另致电李先念：“请予作停止行进之准备，一俟停战时间及办法商定后再行通知”，并请求“最好由中原部队中再派出一正式代表参加协商”。

此间，仍在湖北老河口的第九执行小组，经三方代表商谈，于7月27日达成《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即“老河口协议”）。协议规定自8月2日午夜起至8月20日止，双方停战，在战线上的双方军队均自现实位置后撤20英里（约32公里）；李先念将军需于8月9日前派代表到达西安与第九或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会谈等。后北平军调部认可并于8月9日公布了《中原临时休战协议》，正式通知国共双方执行。《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签订后，第九执行小组即赴西安参加调处。

根据《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第九、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及周子健等在西安商谈具体实施办法。但国民党方面并无谈判诚意，处处刁难周子健及中共谈判代表。在8月6日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周子健建议讨论中原部队的给养问题，国民党代表却提出中原部队必须先集中点验方可解决给响，办法是只发款项不发粮食，同时不允许中原部队就地筹集。中共代表任士舜当即提出不能接受。国民党代表卢济时竟拍案大骂，粗暴地举椅行凶。胡宗南派出的代表亦强迫周子健离会，并警告周子健离会后不能保障他的人身安全，果然，周子健在返回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途中遭到特务袭击，随身所带文件、衣物被洗劫。这一事件，遭到了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及一些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自此，西安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表示中原部队的和谈诚意，根据《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及第九、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要求，8月7日，中原军区正式委派原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中原军区干部旅（对外称第十四旅）旅长张文津及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3人，携带军调部证件并打着第九执行小组旗帜、佩戴其标志符号，由新入伍的陕西籍战士萧善义做向导，从镇安杨泗庙出发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并致电通知北平军调部。张文津一行4人，经月河、大堰沟、沙坪，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第一八一团无理扣押。一八一团团长在获得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的指令后，将张文津等4人残酷杀害。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在获悉中原军区谈判代表中途被扣之后，分别在南京、北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题，报道了张文津等人被扣的消息。第九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任士舜也在西安强烈要求第九执行小组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并获得了美方代表的认同。对张文津等被扣事实，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对调查工作

拖延搪塞，造成中共谈判代表失踪之“谜”。

此时，西安谈判步履维艰。在中共代表的一再要求下，8月14日，第九执行小组恢复调处，召集会议商谈停战事宜。国民党代表强词夺理，认为中原部队已被打散，有组织的行动已不存在，要求结束调处。后又借口李先念将军的谈判代表未按时到达，延安8月15日广播周子健遭劫一事妨碍调处工作等，拒绝进行谈判。8月24日，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竟单方面宣布在老河口签订的《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失效，公开拒绝再作任何调处。由于国民党代表单方面退出，调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北平军调部随后不得不撤回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至此，中原停战谈判完全破裂。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即彻底暴露。

四、晋冀鲁豫军区和西北局进行武装策应。豫鄂陕边各军分区趁机开辟根据地

在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战役中，国民党军程潜所属 13 个旅，刘峙所属 13 个旅，胡宗南所属 6 个旅，重庆行营所属 5 个旅及桂军 2 个旅，共计 39 个旅，其中除 1 个旅入晋，6 个旅守备洛阳、潼关、西安外，全部用于对付中原军。中原军区部队在外线牵制国民党军多达 32 个旅，给内线正在进行苏中战役的华东部队和正在进行战略展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极大的帮助；但同时亦承担着数倍于己之国民党军的压力，急需援助。为减轻中原军的压力，策应中原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中共中央根据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提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1946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未灰至申灰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一则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二则新黄河受我军威胁，这两点均将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调至少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

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央指示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国民党军陇海路开封、徐州段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日，先后攻克砀山、兰封和柳河集、杨集等车站。随后，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向杞县、通许进攻；一部兵力围攻柳河集以西地区之敌。至21日，一举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攻克县城5座及车站12个，占领铁路线150余公里，迫使蒋介石将豫南、豫西的整编第四十七、第四十一师和陕南的整编第三师东调开封。

与此同时，陈质纵队由山西绛县、曲沃地区挥师北上，先后攻占洪洞、霍县（今霍州市）、灵石、汾西、富家滩5座城镇，控制同蒲路100余公里，吸引了胡宗南部7个整编旅，并歼灭其

中的1个旅。太岳军区与大行军区组成若干武工队渡河发展，以打通与豫鄂陕边区的联系。陕甘宁边区部队在陇东、关中两区发动攻势，也吸引了胡宗南军一部。

中共西北局为配合陕南的斗争，指示中共陕、甘工委有计划的派干部到陇南、西府、渭华一带，发动和领导有关武装积极行动。到8月上旬，第一、第二批干部已达目的地。并已经策动岐

山南、眉县万家原、扶风麟游山、礼泉北径水畔、西府汉麟山一带武装力量起来牵制国民党军。陕西省工委派严丕显（尤超）等赴长安、柞水一带，建立了中共长柞工委和游击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在豫鄂陕边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各方面的武装策应，调动与牵制了国民党军，从而减轻了在豫鄂陕边创建根据地的中原军区北路军的压力。中原局趁此有利时机，指示豫鄂陕边各军分区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区，打击国民党的乡保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在群众中站稳脚跟。这期间，干部旅疏散后组成的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和各游击队，先后与北路军主力会合。一大批经过长期锻炼、具有丰富建党建政经验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成为各地委及军分区开创根据地的中坚骨干力量。

根据中原局的部署，各军分区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区，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建立人民的武装与政权。第一军分区于8月8日在镇安县七里峡以第三十八团为基础成立。三十八团即按中原局指示将3个营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三路向指定活动区域镇安、柞水、安康一带前进。在进军途

中，他们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开辟根据地。二支队袭击了板岩镇，一、三支队沿途打击了山阳、郧西、旬阳的地方保甲。并采取政治攻势，分别打开了山阳南宽坪、镇安米粮川一带的姚家寨、清水寨、白塔寨、大坪新寨等国民党乡公所固守盘踞的山寨。随即，在米粮川、七里峡周围的山上，又打下七八个围子，还主动向凤凰嘴仍滔河、白河一带出击，在武装斗争中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仅1个多月时间，就先后建立了

中共南宽坪工委和山（阳）郧（西）镇办事处，由曾宪荣任书记，王泽民任主任；镇（安）郧（西）旬（阳）县工委与县办事处，由秦振任书记，张听任主任；镇（安）柞（水）工委和办事处，由黄德钦任书记，李景展任主任；商（县）山（阳）蓝（田）镇（安）柞（水）中心县委，由曾馄任书记；商（县）山（阳）蓝（田）工委与办事处，由谢华任书记兼主任。共1个中心县委，4个县工委和办事处，还建立了7个区21个乡。

第二军分区于8月3日建立，随后将所属第三十六团与陕南游击队合编，组成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三支队和分区警卫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8月5日，二分区在商县北宽坪召开进军蓝（田）洛（南）的誓师大会。会后，副司令员夏世厚率领二十二支队（即蓝洛支队）挺进蓝洛地区。8月3日，二十二支队在进至洛南县阎山时与国民党的1个保安团遭遇，经1个小时激战，击溃该保安团1个营，全歼1个连，俘敌40余人。旋即经木子沟、龙王庙、两岔河、华岔，直抵灞龙庙、青岗坪。蓝洛支队以此为中心区，西向厚子头、许家庙、西荆公路之线发展，东向两岔河以东洛南北部的黄龙铺和华县的金堆城之线展开，把蓝（田）、渭（南）、洛（南）、商（县）、华（阴）边境连成一片，对西安造成威逼之势。二十一、二十三支队亦进驻指定地区，采取有力措施，摧毁与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与乡保武装。8至9月，二分区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商南县委和县政府，由刘英才任书记兼县长；商（县）洛（南）县委和县政府，由刘丹东任书记，文范任县长；卢（氏）洛（南）县委和县政府，由邹顺华任书记，鲁孚若任县长；商县县委和县政府，由黄金轩任书记，刘彭渤任县长；山（阳）商（南）县委和县政府，由孙石任书记，张子明任县长。共计5个县委和县政府，下辖有11个区。

第三军分区以第四十五团和警卫团、第三十九团各一部为基础成立，8

月3日在山阳县中村吴家坟园召开3000人参加的军民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共山阳县委和县政府，由宋孟邻任书记兼县长；鄖（西）商（南）县委和县政府，由陆诚任书记兼县长；鄖（西）山（阳）县委和县政府，由周映渠任书记，谭道鹏任县长；商（南）山（阳）县委和县政府，由方正平任书记，张子明任县长。共计4个县委和县政府。在原商洛工委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山阳县在会后20余天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银花、中村、洛峪、孤山、高坝、过风楼6个乡政权。银花、中村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在4天内就建立了百余人的地方武装。8月中旬，山阳游击大队发展到3个中队，旧政权的人员也回来了一部分，国民党山阳县中村乡乡长席学孔率部30余人、枪10余枝投诚，后被任命为山阳县副县长。8月18日和22日，方正平、张树才向中央报告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等情况。中央于8月25日发出指示，要求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的经验通知各部照办，“愈快愈好”。并请将此经验通报鄂西北地区。中共鄖商、鄖山、商山县委和县政府，亦积极率部在1个多月时间里，相继摧毁国民党4个乡公所、1个保政权及其武装，很快在这3个县内建立了15个区，所建乡政权则更多了。此外，中原突围部队一部于9月2日建立的鄖（县）均（县）县政府，黄波为县长。后划归第三军分区，使三分区所辖县级组织共达5个。

第四军分区于8月6日成立后，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辟根据地。8月中旬，国民党军驻陕州独立旅和灵陕保安团向灵宝与洛南地区进犯，四分区决定以第六、第七、第八团各一部，在朱阳镇东靠山设伏。当国民党军进至伏击圈后，四分区部队突然开火，勇猛出击。国民党军突遭打击，仓促应战。激战一天，毙伤俘国民党军250余人，缴获机枪5挺、长枪200余枝。国民党军向洛南方向溃逃时，八团一营乘胜追击，又歼其50余人，首战告捷。而后，七团袭击了朱阳镇西的国民党仓库，缴获一批布、棉花等，使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八团二营进至上戈地区活动，宣传发动群众，配合党政干部组建了卢（氏）灵（宝）洛（南）县、区政府。8月21日，国民党洛宁两个保安大队分两路向上戈进犯，企图摧毁新建的政权。为诱其深入，县、区政府机关向西转移，八团二营由驻地出发，分两路由柏树咀、娘娘庙迂回，将来犯的保安大队包围后，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歼其大部，毙26人，俘129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1%枝，弹药、物资一批。为扩大战果，分区决定部队乘胜攻打横涧的国民党1个保安团团部及其1个营，当夜，七团和八团一、三营发起偷袭，八团一营首先攻占了西北高地，三营从龙驹镇迂回攻占其西侧高地，七团插至东面，断其后路后发起猛攻，激战一夜，全歼保安团团部和1个营，毙伤俘其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枝，粮食、弹药各一批。四分区连续作战，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仅1个月，就先后建立了中共卢（氏）灵（宝）洛（南）县委和县政府，由郭纶任书记，陈韧为县长；卢（氏）嵩（县）县委和县政府，由鲁持久任书记，曹志坚任县长；卢（氏）洛（南）灵（宝）县委和县政府，由戴克明任书记，王英先任县长。共计3个县委和县政府，下辖17个区。

到8月中下旬，豫鄂陕边各分区已按计划完成分散游击的部署，所辖部队大部已顺利地到达指定地区活动。中原军区北路军主力得到休整，并与陕南游击队相配合，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取得了开创豫鄂陕根据地的初步胜利。

五、中原局制定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方针、原则和方法

为了在豫鄂陕边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使部队尽快生根立足，逐步步入人大发展及创建正规根据地的阶段，中原局于1946年8月22日向北路军各部发出了《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系统地阐明了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主要是：

（一）目前摆在北路军各部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鄂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以此来争取生存，掩护南路军在川鄂陕地区创造根据地的行动，以此来支持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其实现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是：豫鄂陕边区山大地险，我党我军在群众中影响很深，有党的基础和游击根据地，接近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可以经常得到他们的配合等。

（二）创造根据地的前提条件，是在目前敌人过于强大，我军过于疲惫，且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一两个月内应该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以此取得休息补充，并个别扩军，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开展统战工作，熟悉地形、敌情，并在这个基础上先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站稳脚跟，等一两个月以后，敌人分散“清剿”时，再化零为整，以分区为单位集中优势兵力来各个击破敌之“清剿”部队，打通各游击区之联系，并使这些游击区逐渐巩固起来。

（三）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与依靠群众，是创造与发展根据地的基本问题。必须以较大的决心与最有效的办法，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动员部队在可能时帮助群众劳动。同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捐、抗税、抗丁、抗差等宣传，以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并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民兵自卫队，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四）迅速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游击队活动已久地区，应即建立正规政权；在我军立足未稳地区，应该建立两面政权。

（五）要使根据地迅速建立，必须用大力来培植地方武装。要在已有的地方武装中，大力发展党员，培养根据地武装中党的骨干，开展政治工作；要帮助地方武装解决武器弹药及干部问题，迅速提高其军政素质。同时，正规部队要尊重地方武装，学习地方武装的各种长处。在没有地方武装的地区，各独立活动的部队及地方领导机关，应抽出一定的干部及一定的武器迅速建立起地方武装，使将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时，各地区仍有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是部队生根立足的重要环节，各独立活动的部队，对于一切自发武装与国民党基层武装，均应迅速展开联络工作。应尽量争取其能与我结成统一战线或与我暗通消息、互不侵犯。避免到处都打，到处树敌，致使我军陷于孤立地位。此外，对地方上的士绅名流与国民党政权机关之行政人员，亦应多方联络，以争取其暗中和我们联络或保持中立。即便对坚决反动的人，亦应尽可能做到先礼后兵，以扩大我之社会基础，尽量减少反对者。

（七）关于部队的给养，现阶段的解决方法是：劫夺国民党之物资；在通商要道处，对来往客商征税；通过统战工作，要国民党的乡保政权和两面政权，从给国民党筹办的钱粮中抽出一部分；对少数群众不满的地主恶霸进行罚款；在不得已时，可用七分说服三分勉强的方式向富户筹募

一部分粮款。其基本精神应是不使基本群众增加负担，并使地方富户的负担尽量合理公平。

（八）创造根据地需要大批干部来进行工作。各部队要将多余的干部分别配备于各独立活动的部队中，去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武装与创造根据地。对流散于各地的干部，应将其收容起来，分配工作或安置于地方休息，使党的这一部分宝贵财富不轻易损失。对于某些干部中存在着的悲观失望、不负责任、逃避困难的思想，应给予严肃地批评教育。各部还应有计划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一大批做地方工作的本地干部。

中原局对上述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后，强调指出：“现敌我双方都在重新部署，谁能抢得时间首先完成自己的布置，谁就会取得主动。局面严重，时间紧迫，望各部立即依照以上指示，毫不犹豫地布置工作，争取迅速站稳脚跟，以备进行即将到来的斗争。只要我们一心一意，团结奋斗，则困难的最高峰即将过去，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局面是一定会改善的。”在发出此重要指示的头一天，即8月21日，中原局已致电北路军各部并报中央；各部队已顺利到达指定地区，获得相当的休息，这是创造根据地的第一步的胜利；各部队应迅速转入以解决财政给养为中心的第二步的工作，务使部队的给养与冬装能在9月中旬获得全部解决，以便从9月下旬开始进行第三步，加强豫鄂陕根据地建设与发展工作。继8月22日发出重要指示后，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又于8月27日电报中央军委：我们现正督促各部加紧根据地建设，拟发动小规模反攻，扫荡土顽，扩大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开展地方工作；建立与扩大地方武装；解决财政给养、冬装问题；开展统战工作等。这些主要方针、原则、方法和步骤，是中原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思想，结合中原军区部队及其豫鄂陕边区的实际而制定的。这为中原军区部队在豫鄂陕边区生根立足，开展广大而持久的游击战争，创立和不断巩固、发展豫鄂陕根据地指明了方向。8月28日，中共中央就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27日电复示：很好很正确。望以陕南各部活动之经验通知王树声等部，鼓励他们建立根据地。

六、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

中原军区北路军各部，根据中原局作出的部署，特别是1946年8月下旬发出的重要指示，加紧豫鄂陕根据地的建设，使各项主要工作迅速展开。

积极发动与依靠群众。北路军各部实行分散游击后，即在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第一分区镇郟旬工委组成宣传队在七里峡一带演出自编的节目，使部队与群众的关系很快融洽起来。第二分区各级政权机关，广泛召开群众大会，书写标语，张贴布告，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激发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情绪。高耀乡经宣传后，不少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在各级政权基本建立之后，还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各县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二五”减租或“四六”减租。第三分区的商山县190多户共减租400多石。减租减息以后，从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的基础，使贫雇农真正得到了利益，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翻身后的农民群众，踊跃送子送郎参军，仅商山县柳树乡一次参军70多人。只有34户人家的山阳县叶家湾村，就有26人参军。全分区四县一乡参军（包括乡自卫队）人数约1600人。第四分区还在洛河两岸建立了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放手发动群众，为部队筹粮、筹物，掩护伤病员，动员青年

报名参军，支援前线等等，工作有声有色。

迅速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组织。豫鄂陕边区先后成立的 4 个地委和军分区，分别采取措施，在游击队活动已久的地区，由有社会地位的党外正直人士和党的干部共同组织政权，公开委任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等，以发挥各级政权的作用；在部队刚刚

到达立足未稳的地区，主要是建立两面政权，要求地方上原有的

乡保长，一面应付国民党，一面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办事，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给以秘密委任。到 9 月中下旬止，4 个分区已建立了南宽坪（山郟镇）、镇郟甸、镇柞、商山蓝镇柞、商山蓝、商洛、卢洛、商县、山商、商南、山阳、郟商、郟山、商

山、卢灵洛、卢嵩、卢洛灵等 16 个县委（工委）和县政府（办事处），以及商山蓝镇柞 1 个中心县委。另有郟均县政府未计人。还建立了 50 个区和数十个乡的党政组织。

建立与发展地方武装。1946 年 8 月以前，陕南游击队员只有七八百人。各分区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帮助地方武装解决武器弹药及干部问题，以各种方法来影响他们，使地方武装的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同时抽调一定的干部与武器到新区去建立地方武装，各分区的地方武装得到较快发展。到 9 月底，全边区地方武装已扩大到 3000 余人，各县、区都建有武装组织，有些乡还建有游击队。南宽坪工委和山郟镇办事处仅两个月时间，就在漫川关、长沟、松树坪、南宽坪一带建立了两个大队计 500 余人的地方武装，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近 30 次，消灭了国民党板岩、南宽坪乡公所和郟西小心川艾家洞反动地主民团，活动地域达 100 多平方公里。第二十二支队组建时只有 2 个大队、200 多人，进军蓝洛地区后，迅速扩大到 4 个大队、1000 多人。仅蓝洛工委就发展地方武装 800 多人。蓝洛县除了建立有县大队外，所属的 6 个区都建立有四五十人的区中队。第三分区自 8 月初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后，4 天内就建立地方武装 100 余人。在商山县先后有 600 人参加了商山支队，使该支队发展为下辖 2 个大队、8 个中队，共 800 余人的武装。郟山支队在 8 月初组建时只有 100 余人，4 个中队，到 9 月初人数猛增到 800 人。他们以广泛的游击战争，骚扰和打击敌乡保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卫了新生政权。

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原军区北路军和陕南游击队合编后，从一开始创建根据地就很重视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并充分利用原陕南党的统战工作基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结成反对胡宗南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统一战线；中原局在 8 月 22 日发出的指示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中共中央于 9 月 3 日电示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更明确地提出“陕西人像一个民族似的反对胡宗南，要宣传团结全陕西人反对胡宗南，团结十六路军军人反对胡宗南”等重要原则之后，豫鄂陕边区的统战工作则开展得更广泛、更有力。各军分区部队“以坚决的军事进攻与统一战线之配合”来瓦解国民党军，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国民党不承认的地方武装，尽量争取其与人民政权缔结成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的乡保武装，尽量争取其与人民军队暗通消息，互不侵犯；对即使坚持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先礼后兵，做到仁至义尽，有理有节。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民主政权，一般只派县长、区长、乡长，对保长、甲长则主要是教育利用，使其为新政权服务。中心区外围建立两面政权，要求其“只要能暗为

我，明可支应事故”，这就避免使人民政权及其武装陷入孤立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地位，为人民政权和军队筹集粮秣，安置伤病员等有益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还采取写信、上门动员等方法，做国民党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国民党山阳县中村乡乡长席学孔率部投诚，担任山阳县副县长兼中村乡乡长后，即动员各保长筹集粮食 100 余石，给当地士绅保甲写信，动员参加新政权工作。原北宽坪团总姚吉乔担任商洛县副县长后，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民党商县黑龙口镇镇长王祥生主动与新生政权建立联系。国民党保安武装周寿娃部，统治着商县北乡大荆、腰市和黑龙口等地域，第二分区曾两次派人与之谈判，达成互不侵犯 6 条协议，从而开通了由根据地腹地留仙坪经大荆、腰市到关中的地下交通线。

全力解决部队的财政给养问题。部队初到陕南和边区初创时期，财政十分困难，给养不足。尤其是进入秋冬季节，被服与冬装的危机直接威胁着部队在边区生根立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分区采取了下列办法和措施：劫夺国民党之物资，如袭击仓库、合作社、银行、公共机关；通知国民党的乡保政权，从给国民党筹办的钱粮中抽出一部分送交人民军队；对有民愤的地富和恶霸采用罚款的形式，处罚他们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钱；在通商要道处对来往客商征收游击税；通过旧的基层组织进行“摊派”，但教育他们必须实行粮钱多者多出，粮钱少者少出，贫苦者不出的原则。蓝洛县在长坪公路流峪地区袭击国民党军车，夺取枪支弹药、面粉、衣物等大批军用物资。其中有一次截击 4 辆军车，夺取棉衣 2000 多套，解决了部队的冬装困难。郧山支队袭击占领了郧西夹河关金兰山的国民党后方医院被服仓库，缴获了 1400 多套军衣。卢嵩县通过地方绅士曹培元的关系，利用旧的乡镇保甲等基层政权“摊派”，仅 3 个月就筹集土布 100 多匹，军鞋 600 多双。边区还组织了八九个各有 200 人的手枪队到洛南地区，对恶霸地主以“武请文谈”的办法，亦解决了部分粮款，到 9 月中下旬，各分区部队的财政给养与冬装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七、十五旅主力入陕归建，决定建立第五军分区

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直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接应掩护南路军突过平汉铁路后，因敌情严重，无法按原计划归建第二纵队，仍随第一纵队主力行动，西渡襄河，进入武当山，接着投入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在成立鄂西北军区时，奉命组建第三军分区（即武当分区），部队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大队。1946 年 9 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原局、中原军区为减轻鄂西北军区的压力，加强豫鄂陕边区的力量，决定将十五旅主力转移到陕南，归第二纵队建制。

第十五旅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详细地研究行动计划，决定除第九大队继续留在鄂西北坚持斗争外，由王海山、陈先瑞率领旅直和第三、第六大队共 1300 人，北上入陕归建。会后，所辖部队按计划于 9 月中旬相继开至房县大木场地区集结。

在大木场进行了两大休整后，王海山、陈先瑞即率部秘密地由武当山地区向汉水边挺进。部队渡过堵河，跨越老白公路，继续向北疾进。经过两天一夜行军，于 9 月 19 日到达陕西省白河县冷水滩渡口。由第四十三团团长沙光带领的侦察连已先期到达，对汉水渡口一带情况进行了侦察，并收集了 4 亲大帆船和 5 只小划子，为十五旅主力渡江做好了准备。

由于部队行动秘密神速，国民党军对十五旅调陕南归建的意图无丝毫察觉，在汉水白河一带未作提防。十五旅乘此机会，连夜北渡。先头部队渡过汉水后迅速布置了警戒，以掩护主力渡河。到次日天亮时，部队全部渡过汉水，进入湖北郧西的双牛铺地区。此时，接到中原局电令，要其迅速开进到米粮川附近地区活动。

第十五旅接到命令后，部队的情绪格外高涨。十五旅主力一部是原红七十四师的一部分，许多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转战陕南，在这里创建根据地，进行过游击战争，对陕南的地理人情比较了解，与陕南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部队中还有许多陕南籍老战士，重返故乡，大家心里格外高兴。因而行进速度很快，部队自郧西县双牛铺，进到一天门。这里山势险要，陡峭的高山左右壁立，道路狭窄如带，向西延伸，两壁都是千米以上的险峰，似合非合，望上去只见“一线天”。山关要隘，都是由鄂入陕的必经之地。当部队通过一天门接近二天门时，山谷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郧西县保安团向十五旅前卫部队开枪射击。四十四团团团长黄德魁当即命令两个连分头从两侧山坯攀登陡崖展开攻势，冲上山顶将其击退。十五旅部队一鼓作气，通过二天门和三天门，进入陕南镇安的店垭子、米粮川地区，与豫鄂陕边区第一军分区部队会合。经过短暂的休整后，部队继续西进，徒涉乾佑河，通过柞水至旬阳的大道，经木王坪、文家庙、甘岔河，到达宁陕县东江口。与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长柞工委取得联系。

9月24日，中原局决定十五旅归建部队即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成立第五军分区，以展开镇柞以西地区的游击战争。随即以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的名义正式作出了第一军分区与第五军分区地域划分和干部配备的决定：自西安、柞水、镇安、旬阳一线之东为第一军分区，此线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以南，川陕公路以东为第五军分区地域。由王海山任司令员，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寇惠民任参谋长，李庆柳任政治部主任。十五旅入陕归建部队整编为第三、第六、第九支队，在中共长柞工委配合下，开始投入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八、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成立

在豫鄂陕根据地开始创建之际，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奉中央命令，于1946年8月10日从陕西工委所在地旬邑县马栏出发，到陕南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他历尽艰险，在地下党和蓝洛支队接应下，于9月18日到达中原局所在地封地沟（今丹凤县大峪乡），与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等会合。

9月22日，中原军区奉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为政治委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方正平为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夏农荅为政治部副主任，魏国运为参谋处长。9月24日，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在封地沟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根据李先念8月26日提议，经中央批准汪锋任书记，文建武、陈先瑞、方正平、张树才、夏农荅、魏国运为委员。李先念在会上还宣布了豫鄂陕边区各分区的区域与干部配备，并作了重要讲话。

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诞生，以及全边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初步发展，标志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直接领导、李先念指挥创建的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9月24日，李先念，任质斌电报中共中央告：“汪锋到达此间后，我们已召开了一个区党委扩大会，宣布了区党委的正式成立，并将各项工作都做了一一研究。现陈先瑞率其在武当山地区的部队一千余人

亦已安抵此间（另有一部约五六百人仍在武当山地区活动）。除陈先瑞即回军区工作外，已决定该部即开柞水、镇安以西地区，成立一个分区，开展游击战争。至于原有四个分区的几项主要工作，多已展开。全区已建立了十四个县工委、三十余个乡公所（实为1个中心县委、16个县（工）委和县政府（办事处），50个区和数十个乡的党政组织），地方武装已扩大到二千余人（实为3000余人），粮食给养尚可维持，但被服现只解决一部，还需刘邓及陕甘宁迅速帮助。干部情绪虽未完全稳定，但此间所布置之各种工作已能日益展开，继则必逐渐稳定下来。总之，只要今后此地情况不再变得很坏，并注意将各种工作排列出轻重先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做下去，则生根立足的阶段当可迅速结束，并逐渐步入大发展及创造正规根据地的阶段。”

第四节三五九旅胜利回延安

一、中共中央批准三五九旅寻路打回陕甘宁边区

1946年8月初，中原军区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三五九旅主动撤离镇安后，即向西运动，相机分散游击。国民党唯恐三五九旅立足于镇安、柞水和宁陕地区，随即进行新的“围歼”部署：急令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和整编第

四师第九十旅一部进至陕西之石泉、汉阴、安康一线，然后向北推进；令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赶至陕西佛坪之袁家庄、西岔河和狮子坝，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赶到迷魂岭、莲花石一线，从西向东追击；令尾追之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第五十三旅和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从东面和北面继续猛追，企图逐步压缩，将三五九旅聚歼于陕西南宁之旬阳坝关隘和太山庙地区以内。

国民党军以强大的兵力构成合围纵深，给三五九旅造成严重威胁。在陕西南镇安、柞水和宁陕间的分散活动中，三五九旅旅直机关和七一八团在三官庙、月河口、金线湾，七一九团在五王，七一七团在黑山、响塘沟等地，均先后与国民党军遭遇，虽经奋力抗击将其击溃，但也均有损失。中共三五九旅党委分析了国民党后续部队不断压缩逼近等敌情，认为部队如仍按原方案就地分散活动则随时都有遭国民党军“围歼”之险，势难立足。经反复研究，确定改变行动计划，将部队分成两路行动：由徐国贤率七一七团仍在秦岭山区活动，争取在此立足，开展游击战争，吸引、牵制国民党军队；王震和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向西南出关隘，争取进至佛坪地区，以摆脱四面云集的国民党军，而后乘机向西发展，与中原军区北路军左翼部队靠拢。

三五九旅以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和旅直机关编组的主力经镇安杨泗庙、泰龙庙，于8月8日抵达董家坝。此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第四四团已尾追至泰龙庙一带，而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及宁陕县警卫队，已从关隘赶至贾家营，依凭两面山梁阵地，将前进道路封锁。当天正午，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发起攻击，因国民党军居高临下，强力阻击，战至黄昏，其主阵地累攻未克。此时，国民党军后续部队源源开进，为了不使其赢得时间，紧缩包围，三五九旅主力部队立即改变行进方向。旋经瓦房沟，连夜翻过女儿岩，后经龙王沟，从国民党军间隙中越过石泉至宁陕大道，抵达狮子坝。

8月9日凌晨，三五九旅主力从狮子坝出发，冒着倾盆大雨，强渡斜峪河，经旱坪，中午抵达汤坪。七一九团与国民党军一三五旅先头部队在汤坪附近遭遇。为了掩护旅直机关，七一九团进入汤坪河地区，又沿位水河南下。七一八团与旅直机关离开大道，改由麻庄河翻越大山，到达石泉县轩龙垭（今兴坪乡）及其附近宿营。

次日，七一八团和旅直机关从轩龙垭继续西进，然后沿堰坪河南下，到达石泉县两河街。部队稍事休息，准备过汶水河。汶水河系子午河的上游，时逢河水猛涨，不能徒涉，只得利用仅有的一只小船渡河，直到黄昏才全部到达河西。这时七一九团赶至，连夜渡河，拂晓前亦抵河西。主力渡河后，继续西进，经扇子坡、八里关，于8月13日抵达洋县华阳镇。

由徐国贤率领的七一七团在离开主力后，神速巧妙地在国民党军间隙中穿插，经过太山庙、月河，折向西南的旬阳坝方向，连续翻越大山，在两河、

新场等地与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整编第十六师第八十四旅第二五团激战，跳出包围圈。继而经月亮坪、金槽，于8月11日进抵鸡公岭。尾追的第一二三旅已由里槽赶到，与后卫二营激战，前面林子口之第八十四旅第二五一团，控制了沟口两翼山头，封锁了必经之路。这时，七一七团部队行进在一条长约5里的深山沟中，两边是断崖绝壁，无法攀登，只有从林子口冲出去才有生路。七一七团经紧张准备，开始向沟口运动，4挺重机枪猛烈射击，一营两个排在火力掩护下，冲至沟口占领两翼山头，而后抢上对面大山，迫使堵截的国民党军稍向后缩，主力乘此机会冲出沟口，夺路向北转移。经二梁沟、黑河，进关中平原。8月16日，七一七团又在嘴头镇与国民党军遭遇，经1天激战，将其甩掉，向秦岭山中转移。

在此期间，胡宗南已令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向袁家庄东南之迷魂岭、莲花石、旬阳镇一线，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进驻佛坪、西岔河、狮子坪一线阻击；令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从云盖寺方向兼程尾追；而从关口、石泉方向追击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已与三五九旅后卫部队数次接火。鉴于三五九旅面临的严重敌情和本身的困难情况，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在8月9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提议：“三五九旅确拖得很苦，该部略事休息后最好能进陕甘宁边区会师。”同日，王震在电报三五九旅被国民党军紧追等情况时，亦“请中央考虑拖回边区”。12日，王震致电中央并西北局，询问天水、室鸡、武功之线何处可以徒涉渭河等。13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渭水何处可徒涉正在调查中。并指出，只要你们能通过汉中狭窄地区到达陇南宽广地区，则北上总有办法。14日，西北局亦电复王震，提供了进入边区的路线：开进凤县、两当、徽县、成县、礼县和清水地区，然后取道天水，清水之间平凉之南或以西进入边区。15日，王震就三五九旅行军路线电报中央并西北局：决向凤（县）、留（坝）间前进，相机进入两当、徽县地区，再经宝（鸡）、天（水）间过渭水北上。并提出，三五九旅留陕南或北上，我是否带百余去找李、任、文、巩（德芳），或随三五九旅北上，均请电示。中央军委于20日电示王震：你们若能在文武、成康、陇南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发展西北，配合全国斗争均有重大意义。如若不能，则按你们的布置行动。边区已准备3个团相机接援。三五九旅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根据敌情严重、粮食匮乏，无法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决定由王震和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等率七一八团、七一九团，由副旅长徐国贤等率七一七团，北返陕甘宁边区。

二、越过川陕公路、渭河和陇海铁路

1946年8月中旬，蒋介石、胡宗南对第三五九旅将寻路打回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似有察觉，立即以川陕公路为封锁线，重新拟定了“围歼”部署：一面令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第二十八旅和整编第十六师第十二旅配合从南郑向北之整编第九十师，沿川陕公路加紧东进；一面令尾追之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整编第九十师第五十三、第六十一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第六十四旅和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火速前进，企图一举将三五九旅歼灭在川陕公路以东地区。

三五九旅旅直和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在华阳镇进行了短暂休整，安置了一批伤病员，筹措了三天的干粮。8月15日凌晨，尾追的国民党军从八里关、茅坪分两路逼近华阳镇，三五九旅主力以逸待劳将其击溃，而后主动撤离华阳镇，向二郎坝开进。当部队进至大牛岭时，尾追的国民党军亦已跟进，七

一八团二营六连即在山头筑起临时工事进行阻击。是日夜晚，当国民党军疲惫不堪地爬上山时，六连以全部火力一齐射击，当场毙伤其 100 余人。三五九旅主力部队因得到充分休息，给养充实，即采取迅速行动，连续几天翻越几百里无人烟的荒山丛林，经官山子、宽坪松牛河、江口山城子，于 8 月 18 日抵达川陕公路以东 50 余公里的黄牛铺与糟梁峪之间，准备通过川陕公路。

8 月 19 日，三五九旅主力向川陕公路运动，当行至凤县河口、罗家坪时，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和第二十八旅一个团堵截。三五九旅先头部队一个冲锋将国民党军阵地冲破，而后强行军从五里庙通过川陕公路。这时，国民党军也奉命向五里庙开进，其先头部队发现三五九旅后卫部队尚未通过，马上埋伏于公路两侧。当三五九旅后卫部队开过时，国民党军突然发起袭击，并将机抢夺去。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三五九旅留在公路两面山梁上的警戒部队立即用火力封锁了道路，截断了国民党军的增援；后卫部队则用刺刀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战士葛庆增脚掌腐烂化脓，走路都很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勇猛地夺回了机枪。国民党军不敢久战，仓皇溃逃。三五九旅在过川陕公路中，遭到较大损失，100 余名伤病员被俘。

三五九旅部队通过川陕公路后，拟在隘口一带宿营，因国民党军穷追而至，旅部决定，趁其还来不及调兵控制渭河和布防陇海铁路之机，进至渭水平原。部队急行军于 8 月 20 日晚上抢占东岔河与何家渡口，连夜北渡渭河，并迅速越过陇海铁路，于 8 月 21 日到达陇县的赤沙镇。8 月 22 日，中央军委电告王震：“已渡渭河甚慰。已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你们。”

三五九旅另一路行进的七一七团，从嘴头镇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后，向北疾进，经长沟门、魏马坪，也于 8 月 20 日巧妙地通过川陕公路，抵达甘肃徽县龙王庙的景峰坝。

三、突破西兰公路与泾河。重返陕甘宁边区

第三五九旅主力接连冲破国民党军的数次围追堵击计划，进入渭水平原，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胡宗南即下令将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和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车运到陇县至平凉和陇县至云山镇的公路两侧堵截；同时急令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第一二三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和整编第三师新一旅等沿西兰公路、泾河以南地区，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层层设防，以期在这一地区将三五九旅歼灭。

三五九旅主力北上路程更加艰难。1946 年 8 月 22 日，部队从陇县赤沙镇出发，向八渡镇前进，在桃园子地区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先头部队遭遇。三五九旅部队且战且走，向西绕道松林垭，黄昏后甩掉了尾追的国民党军。当夜，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在崎岖山间小路急行军，午夜时分抵达大底村。次日拂晓，国民党军又从八渡镇开来攻击大底村，三五九旅进行坚决抗击后，改道西进。在这次战斗中，七一九团被截断，后经当地群众协助，请一位老人带路，攀登高山陡崖，继用绑带结成长绳顺崖而下，通过一条几乎无人走过的小路，绕过大底村，在石庄子与主力会合。而后部队继续前进，抵达陇（县）清

（水）交界的温家梁、昌口河。

8 月 24 日，部队经百家店、杨家店、准备取道甘肃清水县马鹿镇西进。此时，国民党军已先期占领马鹿镇，并凭险固守。三五九旅强攻未能奏效，当即绕过该镇前进。旋经上下寨，进入连绵 20 多公里的一片荒山，战士们冒雨在荆棘中艰难行进。25

日，部队赶到陇县关山老爷庙时，与从固关赶来堵击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第四三一团遭遇。前卫七一九团迅速投入战斗，旅直与七一八团进入一片竹林之中，摆脱国民党军，继经花园磨、唐家河、上官镇，到达刘家沟。8月26日拂晓，部队经保家山、刘家山绕过上官镇。在木耳河、百家岭又与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第四三一团遭遇，上官镇的第四三一团也从左侧山梁向这里运动。三五九旅主力再次处于国民党军的夹击威胁中，部队当即绕道杨家沟、桂家沟将其甩脱，经峰山通过平宝公路，再经王家庄、史家庄、寇家河、红岩湾、杨家坪到达西刘家。然后避开平凉及其以西的国民党军的堵击，向东北方向的灵台西娘娘庙、上良镇前进。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已令警三旅、新四旅组成左、右两翼兵团，由彭德怀指挥，分别向径川、长武方向出击，以迎接三五九旅回返陕甘宁边区，并命令警一旅向铜川、耀县方向活动，牵制由西安源源而来的国民党军。

兄弟部队出击迎接，给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以极大鼓舞。8月28日，部队由陕西陇县上良镇出发，以急行军取什子道、西邻子，中午到达离西兰公路上的瓦云寺约10公里的地方。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尾追而至，并与后卫部队交火，前面瓦云寺和西兰公路上各要点已被整编第三十六师所部控制，形势万分危急。王震挺身而出，大声说：“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他一面命令七一九团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一面亲率七一八团集中全部轻重机枪，收集所有的弹药，向正面的国民党军猛烈扫射，从中央突破其封锁。七一八团迅猛冲锋，国民党军退守村庄。三五九旅占领公路，并跑步通过公路。然后穿过青纱帐，涉渡径河，连夜急行军，经独店、朱成、亭口，于8月29日抵达宁县屯子镇，与陕甘宁边区策应部队警三旅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对三五九旅主力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非常欣慰，即于当日向三五九旅发出贺电：“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三五九旅另一路行进到甘肃徽县龙王庙景峰坝的七一七团，继续向两当方向前进，于8月23日在西河强渡嘉陵江，连夜通过凤（县）成（县）公路。他们在两当地区的胡家山甩掉车运尾追的国民党军。旋以急行军，于8月26日黄昏在水天与跑马泉之间渡过渭河，越过陇海路。而后继续疾进，经关山、刘家店、华亭，于8月30日从平凉以西突破西兰公路。9月1日上午，在狂风暴雨中，部队闯过国民党军在朱家原、孟家塬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从镇原县进入陕甘宁边区。

三五九旅旅部与七一八团、七一九团进入边区后，中共中央指示其部“即在陇东适当地点休整”，在警三旅的掩护下，部队于8月30日从屯子镇出发，经太平镇，于9月5日到达庆阳休整。9月8日，徐国贤率七一七团抵达庆阳与主力会师。

四、延安人民欢迎三五九旅胜利返回。王震发表谈话

第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受到党政军民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1946年9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边区保安司令王世泰向三五九旅发出慰问电，并派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前往陇东，代表边区党政军民对三五九旅表示欢迎和慰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亦分别于9月3日、4日给三五九旅发出慰问电。新华社记者也在9月2日发表述评，高度评价三五

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使蒋介石‘消灭匪军有生力量’的计划根本破产，这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光辉胜利。”

三五九旅抵达庆阳那天，中共陇东地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党政军领导专程到城外迎接，部队所经之地群众都主动给战士们戴光荣花，献上瓜果食物和一杯杯香醇的美酒。在部队休整期间，许多机关、团体和群众都自发前来慰问，地委与军分区专门为三五九旅抽调了一批被服和物资。

经过 10 天休整，三五九旅旅部决定由七一八团、旅直组成第一梯队，由七一七团、七一九团组成第二梯队，向延安进发。9 月 16 日，部队从庆阳出发，经过 11 天的行程，于 27 日胜利返回延安。延安党政军民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绵延数公里，锣鼓喧天，载歌载舞，人群里欢声笑语不绝，气氛空前热烈。三五九旅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胜利返回了延安，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三五九旅胜利返回延安大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看望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三五九旅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了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中共中央还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名义，在王家坪礼堂宴请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延安评剧团、延安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鲁迅艺术剧团分别给部队进行慰问演出。中央军委、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保卫处、中共延安地委的领导同志，亦分别到三五九旅慰问，使该旅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10 月 3 日，王震在延安发表了题为《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讲话。他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军区，并以李先念将军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围攻合击点。中原部队为了生存，被迫自卫。在李先念将军的指挥下，经过抗击后，实行坚决英勇的突围战。现在皮定均所率的一纵一旅早已到达苏皖解放区，三五九旅和十三旅一部也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其余的部队仍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继续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王震在列举了中原部队胜利突围的战斗历程后庄严宣布：“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五、十三旅一部打回延安

在中原军区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三五九旅西进的过程中，北路军左翼部队第十三旅一部在与左翼部队主力失去联系后，当机立断地按照既定计划，寻道西进，打回延安。

1946 年 7 月 19 日，当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在商南赵川进行阻击战时，李先念命令十三旅政治委员杨焕民率领十三旅警卫连（由原警卫营缩编）和三十九团担任后卫，其任务是待中原局、军区机关和部队主力安全通过这一地区后，掩护四十五团从前坡岭、佛爷岭撤离阵地，而后随主力跟进。李先念估计到敌情的严重性，指示杨焕民。倘若部队被国民党军截断，应独立行动，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军，并尽一切努力打回延安。

7 月 20 日上午，北路军左翼部队主力已全部安全通过赵川地区，向商南

梁家坟、白鲁础一带进发，在赵川前坡岭、佛爷岭阻击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团，激战 16 个小时后，亦奉命撤离阵地。杨焕民和十三旅副旅长卜万科立即率领后卫部队循主力跟进，当进至黄家垭子时，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等会合。这时，原被阻于赵川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从右侧高地横插下来，也向梁家坟、白鲁础方向尾追。周志坚、杨焕民、卜万科所率部队虽未被其发现，但前进道路已被截断。他们行至白浪一带时，考虑到在没有电台、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如继续西进，一定会同追踪的国民党军主力遭遇，因此决定先由三十九团团长江炳伦率团直和一营沿主力突围方向搜索前进，寻找主力，要一部电台回来，以便联络；其余部队则在此地大山间机动游击，待机归队。但在赵炳伦率部出发不久，国民党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过来，部队被迫折回秦家漫附近，向郧西、漫川关方向转进。赵炳伦所率三十九团团直及一营于 8 月初与北路军左翼主力会合。

周志坚，杨焕民和卜万科率部在鄂陕交界的郧西大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部队极度疲劳，而且国民党军竭力围堵，此时若不及时决断行动方针，部队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争取主动，他们根据军区首长此前向杨焕民下达任务时所指示的“尽一切努力打回延安”的方针，研究部队绕道湖北境内，进入郧西西面大山，机动灵活地突破国民党军纵深包围的行动方案。然而，国民党军追兵赶到，又将山上、山下两部拦腰截断。周志坚率领山下的三十九团第二营，向汉水方向运动；杨焕民、卜万科率领山上的三十九团第三营和旅警卫连，向郧西西面大山转进。

进入郧西大山的杨焕民、卜万科所率部队，经过一天门，进抵二天门宿营时，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包围袭击。该部奋力突围，七连遭到较大损失。为摆脱国民党军，杨焕民和卜万科决定向山阳、镇安一带前进。当部队进到山阳县以南地区时，得悉三五九旅不久前从这里经过，朝镇安方向开去，即以急行军跟进。8 月 10 日，该部抵达镇安东南 30 公里处时，得悉三五九旅早在一周前撤出镇安县城西去，镇安县城复被国民党军盘踞。他们当机立断，绕过县城，向西北方向转移，沿三五九旅行进路线跟踪前进。

9 月初，部队从宁陕以北之东江口与旬阳坝之间渡过子午河，随即转向正北进入秦岭太白山与首阳山之间地区。在途经东江口附近时，顺道打掉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部队进入秦岭山区后，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主力的追堵，但其地方团队凭借熟悉地形、民情的优势，将出山所有道路全部封锁起来，并组织“猎户队”满山活动，寻觅突围部队踪迹。杨焕民和卜万科只得率部在深山密林中与国民党军周旋，并沿荒无人烟的悬崖峭壁向秦岭北坡运动。该部到达北坡后，将所有人员重新整编成两个连，利用茂密山林作掩护，使部队得到暂时休息，同时派出便衣侦察周至县与武功县南北的地形敌情，以选择出山路口。

据侦察得知，胡宗南部整编第五十一、第五十三、第六十一等 6 个师在咸阳以西至宝鸡一线布防，其中整编六十一师布防周至县东西一线，凡重要道路、渡口、车站都有重兵把守，唯秦岭南山脚各小路出口处由地方团队防堵。从周至县渡渭河，过陇海铁路，到乾县中间有 100 公里大平原。平原地区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国民党封锁极为严密。乾县以西是丘陵地带，再往北是麟游、灵台，属山地高原区，相对而言空隙较多。杨焕民、卜万科和部队营、连干部，根据以上情况，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渡渭河，直接北进到边区，只需 7 至 10 天就可到达，但这里是胡宗南部封锁边区的重点区，有陷

入其合围之危险；二是从周至县西北渡渭河，绕至武功县以西 15 公里左右越过陇海路，向西北经乾县、麟游、灵台、泾川，从甘肃东部进入边区，虽需 20 多天，但国民党军的兵力相对较弱，地形也便于机动。经过分析比较，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行动，同时，为防部队被国民党军打散，指定部队渡渭河后在乾县以西的临平镇会合。

出发前，杨焕民向部队作了紧急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部队经过轻装，带上干粮，即由太白山以北翻越秦岭，到达马召镇以南山地，而后经过两天行军，部队进抵周至县以南山坡，以突袭行动，消灭山口的国民党守军，顺利出山。在当地群众的向导下，又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抵达周至、扶风、武功三县交界的杨陵渡口，准备涉渡渭河。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暴涨，河宽约 2.5 公里，国民党保安大队凭借天险在河西设防。部队迅速进行徒涉编组，并集中了 4 挺轻机枪加强先头部队火力。午夜，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涉渡渭河。一到对岸，4 挺轻机枪一齐向封锁渡口的国民党军开火，在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奋力冲锋，与敌拼刺刀。封锁渡口的国民党军在慌乱中溃散。部队冲过堤岸，又从国民党军的碉堡底下冲过陇海铁路封锁线。在渡渭河战斗中，八连与部队失去联系。这支神速向西挺进的部队使国民党军非常恐慌，胡宗南急忙从乾县调 3 个团到泾河一带的麟游、灵台地区封锁交通要道。部队只好白天隐蔽，夜间行军，神出鬼没地在国民党军之间穿插。他们经灵台，进至泾川西 10 公里处，穿过国民党军西兰公路封锁线，接着徒涉泾河，然后经过三天两夜的强行军，跋涉 150 余公里，于 9 月 12 日凌晨顺利地闯过国民党军黑河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驿马关。9 月 14 日，在中共陇东地委和部队的接护下，杨焕民和卜万科率部抵达庆阳，经过休整，于 9 月底胜利回到延安。

第五节 豫鄂陕边区开展反“清剿”斗争。

根据地巩固发展

一、中原局制定反“清剿”斗争的方针和作战原则

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北路军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西京日报》刊载《李先念应离开陕境》的社论，惊呼：“陕南及鄂西北，山岭盘结，正是共军一个理想的根据地。这地区，若任其盘踞，则关中即受威胁，川北亦有被窥伺的可能。”刘峙、胡宗南为扑灭燎原的革命烈火，将西追第三五九旅和东调开封的部分国民党军陆续调回豫鄂陕边区，连同原有部队，共5个正规旅、11个保安团计5万人以上的兵力，对豫鄂陕边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清剿”。

1946年9月初，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第六十四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第二十四旅主力，在当地保安团的配合下，从镇安、山阳及其附近地区，首先向豫鄂陕边区的第一、第三军分区发动“清剿”；随之，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开抵洛南，和保安团一起，对豫鄂陕边区的第二、第四军分区实行“清剿”。国民党军占据城镇，控制川道，在一些重要的山垭道口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并以团、营为单位，在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分散行动，对新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及武装进行突袭合围。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残杀革命干部，进行反共宣传，威胁群众，组织或恢复反动保甲，加强反动统治，企图以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将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

中原局认真分析了根据地斗争的形势。针对国民党军“清剿”部队内部矛盾重重、难于协同，正规部队与保安团配合不力等弱点，以及中原军区北路军已基本消除疲劳，初步建立了一些乡保政权和地方游击队，得到大部分群众支持，并可能取得兄弟解放区的有力配合等优势，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于9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反“清剿”部署》。其基本原则是，采取分散游击为主的方针，同时集中1000人左右的主力部队，控制于适当地区，机动灵活地配合各分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的软弱部分；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保卫新政权，稳定地方武装及群众情绪，同时以一部分队伍积极向外线发展游击战争；作战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及保安团，但在有利条件下，亦可集中一定兵力，歼灭以营为单位分散之正规军；在近期集中一部主力，重点击破率先“清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9月2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复李、任、文：“完全同意你们计划”，并指示“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你们一般应避免这些正规军，专门打保安团”。9月4日，中原局又发出《作战的指导方针》，就反“清剿”作战的对象、策略、战术等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指示，强调“打击的对象，以保安团及乡保武装为主”；“对保安团及乡保武装，必须正确掌握运用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策略”，“尤应设法加紧建立统战工作及内线工作”；“采取各种伏击战法，于沟峪、狭道、隘路歼敌”，“或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施行潜进合击的战法”，“还可采取小部队正面与敌接触，拉住敌人，以主力迂回到敌后，猛烈攻击而歼灭之”。要求部队准确掌握情况，熟悉地形，抓住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9月10日，中原局向各分区通报了豫鄂陕边的国民党军情况，并就反“清剿”斗争及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其他有关问题发出了重要指示。其主要内容是：

(一)用各种办法在边区党和部队中继续加强创建根据地的动员与教育,号召全体同志为党中央赋予的新的战略使命而斗争,同时加强对地方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斗争的水平,树立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二)以积极的、有计划的军事进攻与统一战线相结合,肃清或收编国民党地方武装,在有利条件下坚决消灭负责“清剿”及控制据点的保安团,在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分区向镇安、柞水以西地区发展,二分区向洛南、蓝田以北地区发展,三分区向南化塘、商南及其以东地区发展,四分区向洛宁、嵩山地区发展。(三)各分区应迅速在控制地区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在政权已建立起来的地区,除大力帮助部队解决被服给养外,应即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秋收,并由此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及民兵自卫队。(四)继续扩大地方武装,已建立起的武装,应加强政治工作,各分区应抽调出一批中下级干部,经训练后派到地方武装中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巩固部队,应付敌人的残酷“清剿”。(五)加强统战工作,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广泛建立反胡(宗南)反刘(峙)的统一战线。

二、积极进行反“清剿”。豫鄂陕边区行署成立

豫鄂陕边区各军分区部队,根据中原局发出的关于反“清剿”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反“清剿”斗争。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正式成立后,继续按照中原局的指示,组织领导了这一斗争。

第四军分区旗开得胜。9月8日,四分区集中第七、第八团,兵分南北两路,将增援卢氏“清剿”的国民党河南第十区保安第一团包围于卢氏杜关镇。9日凌晨攻击开始,保安一团凭借高墙坚垒顽抗,四分区部队英勇冲锋,八团率先从镇西北突破保安团防御阵地,冲入镇内与其进行巷战。接着,担任镇东主攻的七团九连、五连也破寨入镇,与保安一团展开肉搏。经数小时激战,四分区部队占领杜关镇,歼保安一团大部,毙伤50余人,生俘团长高茂斋以下3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枝。战斗中,担任主攻指挥的七团九连副连长黄明国及5名战士英勇牺牲。9月10日,四分区部队乘胜进击,又在洛宁县上戈镇击溃卢氏、洛宁、陕县三县保安团1300余人的联合“清剿”,并毙伤俘敌120余人,缴获步枪80枝,轻机枪2挺。四分区反“清剿”斗争首战告捷,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及时表彰,9月16日,毛泽东拟电指示中原局“传令嘉奖”。

其他军分区亦捷报频传。第一军分区部队面对四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重点“清剿”,以及镇安米粮川、大坪、青铜关、上下茅坪等部分根据地失落的严重局面,“坚持县不离县,乡不离乡”,英勇地与国民党军“清剿”部队展开斗争。9月上旬,中共商山蓝工委所属部队突袭国民党上秦乡公所,活捉乡长以下6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枝,子弹1000余发。镇郃旬支队也出击旬阳县冷水河,击溃该地保安队,缴枪100余枝。为进一步壮大声势,打击国民党军的气焰,9月25日,一分区领导率一、三支队及镇旬游击大队共600余人攻打镇安县城。攻城部队兵分三路先后占领镇安城东关和北面的坡垭子。国民党镇安县保警队及一个营的正规军共1000余人,在国民党镇安县县长孙俊伯带领下望风而逃,退至虹化亭,城内仅留少数人抵抗。一分区部队从东、北夹击,毙伤守军10余人,俘40余人,继8月2日三五九旅解放镇安城之后第二次解放镇安城。部队进城后,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还缴获一些布匹,解决了部分秋冬被服。当天下午,一分区部队主动撤出县城。10月上旬,一分区一支队在山阳西北的两河口击

溃国民党山阳县大队两个中队的进犯，毙伤其一部；嗣后在柞水凤凰嘴奇袭国民党柞水县保安团一个中队，歼保安团团长江坤山以下数十人。又在镇安三里岗、东台岭一带，与进攻的国民党军激战3小时，将其打退。10月下旬，商山蓝工委所属部队捣毁国民党蓝田县自卫团团长江效仁的老巢草坪，俘大队长以下20余人；11月上旬，在镇安杨斜北湾村全歼国民党红岩寺警察局局长潘清亚以下50余人。

第三军分区部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有计划地伏击、奔袭、迂回等战术，重点消灭保安团和反动保甲武装；适当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时机地歼灭小股正规部队，有选择地袭击国民党占领的城镇，扰乱其部署。9月上旬，三分区主力与进攻山阳以东高坝店的国民党第一四四旅第四三团及保安团激战5日，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重大创伤。9月16日三分区主力一部又攻打商南县保安团赵川炮楼，毙伤国民党军数十名。9月22日，郧山支队出其不意，一举攻占山阳重镇漫川关。10月，郧商支队配合分区主力再次攻打赵川炮楼，俘国民党军连长以下170人，毙12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95枝。随后，回兵西进，攻克山阳照川镇，全歼守军两个中队，毙其10余人，生俘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多枝。10月中旬，国民党军西荆公路剿共总司令白青云，指挥两个保安团“清剿”商山县。分区司令员周光策亲率一支队、郧商县大队、郧山支队、商山支队主动迎击，于武关河口歼保安团一个连，摧毁武关至商南县城附近公路沿线碉堡数座，缴获长短枪100余枝，白青云率部狼狈逃回城中，闭城死守，不敢出城一步。10月21日夜，分区政治部主任许道琦率郧山支队一、二大队奔袭夹河关国民党军的仓库，缴获棉衣1600余套，为部队解决了部分冬衣。10月下旬，郧商支队和四十五团一个营于山阳县圪塔峪伏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3个运输连，缴获机枪10余挺，步枪200多枝和一批军服军粮，之后，该部连续作战，奔袭郧西瓜子岭祖师店，歼灭郧西保安团两个中队，毙其20余人，俘150余人，缴获机枪4挺，长短枪160余枝。为扰乱国民党军的部署，粉碎其“清剿”，三分区还于11月间集中兵力发起了对国民党一些重要城镇的攻击：月初，分区主力和一部分县支队围攻山阳县城；上旬，分区主力一部攻打并解放了旬阳；中旬，郧商支队、商山支队和四十五团捣毁了郧西县城外围的一些据点，歼国民党驻军和保安团各一部；下旬，分区主力以及郧商支队、商山支队攻打商南县城，毙守军100余人。

国民党军在对豫鄂陕边区第一、第三军分区进行重点“清剿”的同时，从洛南、潼关等地抽调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并纠集邓县、内乡、嵩县、卢氏等13县20余个保安团，向第二、第四军分区发动大规模“清剿”，并先后攻占卢氏的大岭头、官道口、杜关、官坡、兰草等地。二、四分区根据中原局反“清剿”斗争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坚持避强击弱的原则，以消灭国民党地方团队为主要作战目标，以伏击、袭击为主要战术，以团为作战单位，主力适时集中，进行英勇的反“清剿”斗争。同时，为加强反“清剿”的军事力量，豫鄂陕军区决定，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夏世厚率原三十七团二营和两个游击队中队，到第四军分区协同作战。

二、四分区部队协同展开反“清剿”作战的第一个较大战斗，是在灵宝西南的透山伏击国民党陕州独立旅。该独立旅共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全部俄械装备。10月上旬，二、四分区部队主力隐蔽于寨子南面的大山上，派侦察连和警卫连袭击陕州独立旅，引诱其主力。当陕州独立旅进入包围圈

后，二、四分区部队居高临下，一齐开火，激战一天一夜，毙伤俘该独立旅正副团长以下 300 余人，缴获山炮 1 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透山战斗后，黄林、闵学胜，夏世厚等率领四分区主力和二分区部队一部，乘胜出击。11 月 14 日，四分区部队一个团奔袭沙河街，击溃保安团两个营，俘其大部。15 日，四分区八团一部从营子涉过洛河，进卜峪，占领横涧街东面高地；另一部从龙驹过洛河，迂回到横涧街西南高地，将内乡 1 个保安团包围，经一小时激战，毙伤保安团 20 余人，俘其 200 余人，该保安团残部弃寨南逃。11 月 16 日，二、四分区部队攻打驻守双槐树号称“老虎团”的内乡县靳绍华保安团。为彻底消灭该团，二、四分区主力一部首先奔袭驻扎在洪河的保安团，打掉了靳绍华的一颗“虎牙”，而后占据有利地形，向双槐树发动攻击，经两小时战斗，全歼所谓“老虎团”，毙伤该保安团 120 余人，俘其 200 余人。靳绍华丢盔弃甲，带着几名残兵败将，逃向五里川。

经透山、沙河、横涧、双槐树几次战斗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如惊弓之鸟，节节败退。二、四分区部队军威大振，越打越猛。11 月 17 日，二、四分区部队在五里川击溃国民党正规部队第八十四旅第二五二团，缴获迫击炮 2 门，轻重机枪 5 挺，步枪 147 枝，俘营长以下官兵 138 人，毙团长以下官兵 100 余人。18 日，又在朱阳关击溃从内乡增援的两个保安团，俘其 300 余人。战斗中保安团一名团长受重伤，另一名团长在仓皇逃窜时掉下山沟摔死。随后部队紧追保安团残部至西峡县黄沙、桑坪一带，又毙副团长一名。四分区部队和二分区一部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将国民党伏牛山 13 县联防指挥部及其所属保安团全部赶出卢氏县境，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四分区的“清剿”。

与此同时，第二军分区留守部队在分区辖区内积极打击“清剿”的国民党军。二十二支队（蓝洛支队）在阎山、铁炉沟等地重创国民党保三团和第八十四旅一部后，又于 10 月 19 日在蓝田县汤龙庙以少胜多，歼保五团 5 个连，生俘其 100 余人，缴获机枪 12 挺，步枪 200 余枝，子弹 1 万余发。此役，进一步威慑了国民党军，振奋了群众，并从此打通了陇南与关中地下党控制区的联系。10 月 21 日，二十二支队在蓝田厚子镇东南的花园歼国民党保安团 1 个大队，俘其 200 余人，缴获步枪、机枪 171 枝（挺），子弹 1 万余发。29 日，在张家坪许家庙附近截击国民党军车多辆，缴获棉衣 2000 余套。11 月中旬，二十二支队又主动出击，破坏黑龙口至秦岭段西荆公路，使国民党交通中断 10 天。二十一、二十三支队，也在洛南、华阴、灵室、卢氏、商县、龙驹寨等地，积极打击国民党“清剿”部队，直接保卫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及豫鄂陕军区首脑机关的安全。中央军委曾于 10 月 23 日给予表扬：“二分区几次胜利意义甚大，望传令嘉奖。”

此间，奉命从鄂西北调至陕南，并组建豫鄂陕军区第五军分区的十五旅主力，也投入了反“清剿”的斗争。10 月 16 日，五分区部队一举攻克宁陕重镇东江口，全歼国民党 1 个区中队，捣毁碉堡 10 座，并破坏了该镇的通讯设施。随后，主力分成三支，分别在宁陕、镇安、柞水、佛坪、周至、洋县、城固等地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一部周旋。五分区部队在豫鄂陕边区的西南前哨，牵制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其他分区的反“清剿”斗争。

豫鄂陕边区在第一次反“清剿”斗争中，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反“清剿”的方针和原则，在战术运用上避强击弱，充分利用国民党“清

剿”部队指挥多头、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弱点，指战员们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据不完全统计，在9、10、11月3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豫鄂陕边区共进行较大战斗20余次，毙伤俘国民党军团长以下官兵1500余人，缴获迫击炮5门，轻重机枪38挺，长短枪1000余枝，子弹10余万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国民党镇安县县长赵文彬、柞水县县长周梦飞等因“放弃职守”罪被撤职查办。国民党蓝田县参议会在呈陕西省参议会报告中说，李先念入陕境，盘踞秦岭，如虎负隅，如蛟得水，“是星火成燎原，不可向迤，遑言扑灭”。国民党陕西省四区（即商洛地区）保安司令部参谋曹健生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最近四区各县之奸匪与土共合股，大者二三千，小者数百，迄今未能击溃一股，以致愈剿愈多”，“如不增派劲旅痛剿，被奸匪蚕食鲸吞，势必演成陕北局面”。由此可见豫鄂陕边区反“清剿”斗争的成功。

豫鄂陕边区在进行反“清剿”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积极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9月24日封地沟会议之后，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又于10月上旬在洛南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召开边区党委会议，在会前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斗争形势，具体讨论了李先念离开根据地前的各项指示，就建设正规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对进一步建立健全边区党政军组织机构、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加强统一战线

工作、改善公粮征收和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安排部署，并调整了各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成员。调整后各地委和分区的领导成员是：第一地委由吴世安、萧元礼、胡达明、曾广泰、曾馄等5人组成，萧元礼为地委书记，吴世安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地委由刘庚、巩德芳、夏世厚、秋宏、邹顺华、魏景昌、薛兴军等7人组成，刘庚为地委书记，巩德芳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地委由王力、周光策、齐勇、丁先国、余益庵、许道请、吴皓等7人组成，王力为地委书记，周光策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第四地委由黄林为书记，闵学胜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地委由汤成功为书记，王海山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这次会议，还号召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在豫鄂陕边敌后坚持斗争的重大意义，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努力完成中共中央，中原局赋予的战略重任。

在封地沟会议和上庄坪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豫鄂陕边区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根据地，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根据上庄坪会议精神，豫鄂陕边区党委进一步健全了各级政权组织，10月19日，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由汪锋兼行政公署主任，陈守一任

行署秘书长。同时各分区相应成立专署，分别由周季方、薛兴军、余益庵、张旺午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专署专员，第五分区设立行署办事处，陈任远担任主任，从而完善了边区党、政、军组织。此外，一分区又建立了中共红岩县委、县政府（徐达三任书记兼县长）、茅坪工委（高振华任书记）；二分区又建立

了蓝（田）洛（南）县委（尹省三任书记）和县政府（王知德任县长）；

五分区也建立了东江口中心县委（李震远任书记）和中心县政府（陈任远任县长）。

地方武装大发展。边区党委把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根据地的基础建设加以对待，并于12月12日发出《关于游击队的发展与整理的决定》，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应特别教育指战员尊重、爱护游击队，并对游击队的组织发展、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问题作出了指示。各分区认真执行边区党委的指示，大力发展地方武装，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增强地方武装的干部配备之外，还十分注意让正规部队帮助地方武装进行军事训练。打仗时正规部队在前，游击队在后，缴获的战利品则首先武装游击队。这样大大地促进了地方武装的发展，到12月底，全边区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发展到近5000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财政供给得到改善。根据地的发展需要供给作保障，豫鄂陕边区党委认真总结前期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适时改进公粮的征收办法，开展减租减息工作。10月11日，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征收公粮的指示》，指出：“应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尽可能使之适合累进税政策，使公粮之负担主要放在大户身上”；“在基本地区可发动群众，或由政府方面组织评议会、座谈会，吸收各阶层群众及公正人士参加，采取民主方式公众评议”。同时指出：要“宣传我党减租交租政策，在群众条件高涨下，可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同时向政府保证交租”。这些政策，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10月23日，中央军委电复文建武、汪锋：“区党委征粮办法甚好”。并指示将此办法速告鄂西北区党委参考。正如中央充分肯定的那样，豫鄂陕边区党委的这些政策，在实施中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减租减息工作开展后，一些条件成熟的区、乡，纷纷成立“双减”委员会，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的进行“二五”减租，有的进行“四六”减租，减息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群众的热情都很高，效果也很好。由于有正确的政策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整个边区的财政给养得到了改善，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为此后粉碎国民党更大规模的“围剿”打下了基础。

此外，豫鄂陕边区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也均有新的发展。

三、中原局设在延安，继续领导突围各部及根据地的斗争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王树声并文建武、汪锋：“关于中原局领导机构，由于中原局很多同志生病，为顺利指导长江、黄河、渭水间整个工作起见，已调他们陆续来延，拟在延安设立中原局。”此前，郑位三、陈少敏经中央同意，离队化装先后于10月24日和10月26日抵达延安。李先念、任质斌在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该区党政军主要工作全面展开后，奉中央之命于10月下旬回到延安。戴季英由陕南游击队护送转关中，经关中地下党掩护抵达延安。中原局设在延安后，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等继续领导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杨焕民、

卜万科所率打回延安的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原局机关警卫连。

此时，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艰苦作战，已消灭国民党正规军折合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计29.8万余人。解放战争的战局，已开始出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国民党军为继续保持其攻势，从后方抽调了16个旅到内战前线，企图扭转战局。因此，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队，对于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大

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迅速实现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1月9日，中原局向豫鄂陕和鄂西北区党委发出指示，明确指出：“你们留在蒋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有重大战略价值。目前在配合全国作战上，仍牵制敌人10多个旅，将来更有极大发展前途。”同时，中原局指示豫鄂陕和鄂西北区党委，在思想上与组织上要有应付严重情况的准备；要放手开展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解决财经困难，发展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应根据各个不同的地区与情况，定出工作中心与步骤，利用每一时机放手进行创造与巩固根据地的

工作；在军事上要有计划地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包围歼灭反动地方武装；要大胆地切实地向外扩展游击阵地。中原局还高度重视重组与坚持原鄂豫边地区的游击战争，于11月13日发出转给派往与留在原中原解放区之部队的电报，深刻地指出：“全国

内战必大打下去，我重组与坚持原鄂豫边地区的游击战争，以待时机大发展，在战略上是有特殊意义的。必须鼓励与教育全体党员及战士，坚决与蒋介石作艰苦英勇的斗争。只有如此，前途才是光明的。”

中原局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重组与坚持原地区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后一阶段对根据地建设工作、反“清剿”斗争和其他有关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直接指导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根据地以及在中原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其他各支部队的工作。

在延安期间，中原局还于1947年1月24日召开会议，回顾和总结以往的工作，进一步研究豫鄂陕根据地今后的工作意见。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原部队对和平民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是党的一支力量，中国人民的一支力量，一个战略单位，今天和以后都要起战略作用。中原部队在外线作战，今天已经起了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的作用小。鼓励中原部队继续战斗。

四、野战纵队组成。东进豫西作战

国民党军对豫鄂陕根据地的第一次“清剿”遭到失败后，从1946年11月下旬开始到12月底，又先后调集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以谢辅三为总指挥，对豫鄂陕边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为其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扫除后顾之忧。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第八十三、第十旅，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以及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自旬阳、郧西由南向北压缩；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第六十四旅及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由西向东压

152

缩；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一四四旅、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等自陇海路由北向南转东向西压缩。国民党军在“清剿”中采取分区“清剿”，反复“扫荡”，步步推进的战术，在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安插据点，修筑碉堡，组织保甲，恢复旧政权，实行联防，严密封锁；其手段是实行法西斯恐怖政策，强迫移民，并村筑寨，坚壁清野，捕杀革命干部，威胁群众，打击进步人士，并大肆抢掠粮食物资，封锁交通集镇，下令对豫鄂陕边区实行3个月的经济封锁。11月25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一四四旅各一部在陕西保安七团及地方保警队的配合下，对豫鄂陕军区第二军分区之灞龙店、青岗坪、厚子镇一带进行残酷“清剿”，并将中原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队的会师地留仙坪

附近之苗沟以及灞龙庙周围 5 里所有大小沟道民房全部烧光，使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国民党军企图通过上述手段，隔离豫鄂陕军区部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将其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领导边区全体军民，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国民党军的烧房并村暴行，边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及时于 12 月 1 日发出《关于解决群众食宿的意见》，动员党政军干部战士在群众中进行慰问，表明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决心。同时，政府组织募捐，向富户贷款，救济无吃断炊的群众；军队帮助人民搭草棚，解决住宿问题，以实际行动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军的仇恨。对于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边区党委和军区亦采取了相应对策，领导群众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组织大小商人设法到国民党军占领区办货，开辟新的贸易交换场，发动群众通过多余渠道代为购物，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地方士绅组织合法的反封锁斗争。

在军事上，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注意整理、巩固部队，增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同时，根据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剿”的严重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12 月 11 日，边区党委和军区作出《关于建设野战支队的决定》，集中各分区武装力量打击国民党军。为分散国民党军“清剿”的兵力，边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组织野战纵队东进豫西之南召、鲁山地区，争取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引诱国民党军东顾，将其引到根据地外线，配合根据地内线的反“清剿”斗争。1947 年 1 月上旬，豫鄂陕军区调集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主力以及部分干部正式组建野战纵队，由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兼政委，夏世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翁可业任政治部主任，王全国任副主任。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汪锋随军行动，实施指挥。这一野战纵队（为便于同后来由陈先瑞、韩东山组织领导的野战纵队相区别，以下均将“黄方纵队”称为“第一野战纵队”），下辖第五支队（原四十五团主力）、第六支队（原三十七团一部）、第七支队（原三十九团、军区警卫团各一部）、第八支队（四分区八团）、第九支队（二分区二十一支队）、第十支队（军区直属机关），共 6 个支队，5000 余人。

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后，于 1 月 14 日在卢氏五里川召开誓师大会。会上，文建武、汪锋作了形势及野战纵队任务的报告，黄林就东进作战具体战术问题讲了话。会后，部队即向豫西南南召、鲁山地区挺进。16 日，野战纵队在内乡县西北之桑坪、唐营和蛮子营等地，一举击溃国民党内乡、西峡县保安八团两个营、一团 1 个营和二团全部，俘国民党保安团副营长以下 100 余人，毙伤其数十人，缴获步枪 130 余枝，轻机枪 11 挺。17 日，野战纵队挥师栾川县。18 日，在进军栾川途中，五支队于三官庙击溃阻击的国民党军一个营，俘该营大部，为大军直取栾川扫清了道路。当晚，野战纵队主力强攻栾川城，炸开西城门，守军仓皇溃逃。野战纵队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俘国民党军 20 余人，缴获电台 1 部，解放了栾川城。随后，野战纵队展开扫清栾川城外围之国民党军的战斗。19 日，六支队支队长邹顺华率所部击溃庙子镇守军两个保安大队。20 日，黄林司令员率主力一部攻克南山核桃凹寨，缴获一批弹药和物资。22 日，野战纵队全体指战员满怀胜利的喜悦，在架川、西河、七里坪一带渡过了 1947 年的春节，群众杀猪宰羊，慰问部队。春节后，部队于 1 月 24 日兵分两路东进。当日，黄林率六、七支队攻打合峪寨，因无重火器和爆破器材，攻至深夜不克，遂于拂晓前撤出战斗，转打旧县。25 日，野战纵

队主力一部在夏世厚副司令员的率领下攻打栾川潭头镇，连战三昼夜，给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守军沉重打击。28日，国民党援兵逼近，野战纵队遂于五更撤出战斗，继续东进。在攻打潭头镇的同时，野战纵队主力另一部于26日攻克位于潭头镇东南的汤营寨，27日又攻克嵩县大章街。29日，野战纵队到达大章西北的杨湾宿营。31日进入伊川县小白街，当晚与从洛阳方向开来的国民党一个正规团和保安团一部激战。战斗持续到2月2日，国民党军伤亡惨重，野战纵队亦付出较大代价。战后，野战纵队经东沟、小铺油房，于2月4日进抵鲁山县土门、瓦屋街一带。

第一野战纵队的组建及其横扫豫西的作战，鼓舞了豫鄂陕边区军民的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在此期间，根据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四分区又建立了中共卢（氏）灵（宝）洛（南）中心县委和中心县政府（由张难任书记，陈韧任县长）、卢灵县委和县政府（由郭纶任书记，王英先任县长）、栾川县委和县政府（由何文钦任书记，陈剑虹任县长）。至此，豫鄂陕边区先后建立的中心县与县级党政组织分别增至：3个中心县委、2个中心县政府；21个县（工）委、20个县政府（办事处）；累计有24个县。同时，还先后建立了59个区、129个乡级党政组织。此外，9月初建立的郟（县）均（县）县政府后曾划归三分区，7月下旬建立的长（安）柞（水）工委后由五分区领导，均未计入上述24个县之中。

五、为配合东进而向西发展

在第一野战纵队东进发起豫西作战之前，豫鄂陕军区于1946年12月23日发出《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方针》，指出：为使内外线作战有机地配合与分散国民党兵力，争取外线部队作战时间，各分区在内线之部队由陈（先瑞）韩（东山）统一计划，组成几个作战单位，以便在内线积极打击国民党军。

1947年1月7日，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又明确指示第一、第五军分区：主力应立即经柞水南北进到东江口、宁陕之线以西或以东，积极活动，牵制国民党军，诱其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

根据边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陈先瑞、韩东山在卢氏五里川主持召开了部分军分区和支队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根据地内线反“清剿”工作。会议要求各分区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统一认识和行动，同时将所有人员都编成战斗组织，在根据地内积极打击国民党军。第二军分区蓝洛支队，一度东进至河南卢氏、官坡、兰草等地，第一野战纵队东进后，他们主动西返，并沿途作战，策应野战纵队东进。2月9日，蓝洛支队与第三军分区一部，主动出击盘踞在商县北宽坪的陕保七团一部及一个保安大队，经数小时激战，俘其处长以下4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长短枪170余枝，子弹万余发。第三军分区机关及郟商、商山、郟山支队各一部，积极在所辖地区活动，先后于山阳湘河埡、南小河等地袭击国民党保安部队。第四军分区洛北支队和卢灵洛游击大队，以机动灵活的行动，转战于洛河西岸，于1月下旬在洛南西峪河击溃国民党保安团一部后，2月初又在灵宝黑山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一部激战竟日，之后又紧紧拖住其不放，有力地支援了第一野战纵队在豫西的作战。

一、五分区部队，接到边区党委和军区关于主力西进牵敌的指示后，立即采取措施：一分区主力从山阳龙山向西南方向积极行动，牵制国民党军。他们先经杨家斜、凤凰嘴到镇安七里峡、米粮川、熨斗滩，继而从镇安到旬阳，再到安康、宁陕，接着翻越积雪二三尺的秦岭，经库峪进入关中，后又

走蓝田、洛南、丹凤一线，返回到山阳。全体指战员不畏天寒地冻，不怕饥饿疲劳，连续转战 30 多天，平均每天作战 3 至 5 次。五分区部队分为两路行动：分区机关和三支队以东江口为中心，转战于镇（安）柞（水）宁（陕）地区；六、九支队在佛坪、周至，洋县、城固等地大范围游击。一、五分区部队克服艰难困苦，与十倍于己之敌周旋，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配合了第一野战纵队东进豫西作战及尔后北渡黄河的行动。

第六节 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

一、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批准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

1947年2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到第8个月。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奋战，取得了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6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71万人的辉煌战果。国民党军在其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到严重挫折后，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抽调兵力加强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企图实施重点进攻，消灭山东和陕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扭转战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正确分析战争形势，于1947年2月1日向全党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的攻势虽然仍在继续，但比较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对延安的进攻部署，确定了陕北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国民党军在延安以北地区周旋，陷其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

在豫鄂陕边区，第一野战纵队的东进及其豫西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清剿”的国民党军，使其更为恐慌。国民党军竭力调兵东顾，企图“围歼”第一野战纵队。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整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四旅和第一三五旅先后开进豫西；第八绥靖公署也移至河南内乡西峡口，指挥豫西各保安团配合主力进行“围剿”。1947年2月4日，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5日，电报中原局并中共中央：由于敌情异常严重，主力留此坚持几个月意义虽然很大，但因我们目前的处境及本身力量均有很大困难，为了保存骨干力量，一致认为主力应撤至黄河以北休整，待机南返，暂留地方武装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请示可否率野战纵队及二、四军分区部队和机关干部共5000人北渡黄河到太岳。6日，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并郑位三、李先念：“为使保存这支主力不致打坍，便于长期坚持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为此提议主力北渡休整，留当地游击队坚持此间斗争，主力待机南返”。

鉴于豫鄂陕军区部队战略牵制任务已基本完成，同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全国战略反攻的到来，中央军委批准了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休整的计划。2月10日，中央军委电复文（建武）汪（锋）：“你们决心北渡，甚好。但需作充分准备，战胜敌人堵击、截击”，“要有战胜困难、战胜危险的充分准备，才能胜利到达太岳”。并对北渡的路线、方案等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

二、豫鄂陕军区主力分批北渡黄河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豫鄂陕军区主力积极投入北渡黄河的准备工作。第一野战纵队抓紧在原地进行休整，部队轻装，非战斗人员进行编队分组。1947年2月14日，文建武、汪锋电报中央军委、中原局并太岳军区：决定分两批北渡黄河，第一批由文、汪亲率军直及黄（林）方（正平）纵队，定于20日在济源，垣曲之间渡（黄）河；第二批由陈先瑞、韩东山组织根据地内线坚持部队，相机北渡黄河。同时，豫鄂陕军区还将此情况通告了率部在内线坚持的韩东山、陈先瑞等。

第一野战纵队经充分准备之后，于2月中旬从鲁山县的土门瓦屋街和嵩

县车村等地出发。为迷惑国民党军，他们一路以“之”字形路线行进，经汝阳、临汝、伊川、宜阳直奔陇海铁路。当部队运动至洛阳以西之新安县境内时，为迅速安全地通过陇海路，第一野战纵队兵分两路开进：一路由文建武、汪锋率领，经义马关过铁路；一路由黄林、方正平率领经铁门镇过铁路。由于准备充分，两路均迅速、安全地通过了陇海铁路，于2月20日先后到达新安县刘皇岭地区。此时，太岳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派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准备船只，南渡黄河，接护第一野战纵队北渡。在太岳部队的掩护下，豫鄂陕军区主力第一野战纵队经过半天抢渡，全部到达黄河北岸的大岳解放区，并于3月1日到达山西阳城，3月5日抵达山西晋城休整。

第一野战纵队北渡后，太岳军区四纵十二旅曾留下部分部队控制黄河南岸渡口，准备接应豫鄂陕军区第二批北渡部队，因国民党第八十三旅两个团和两个保安团从洛阳开至，部队遂撤至黄河北岸一线，并控制渡口，准备船只，相机接渡。

此时，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还在第一野战纵队准备北渡时，国民党军的正规军在保安团配合下，就以数倍的兵力对豫鄂陕边区内线坚持部队，采取分进合击、夜间偷袭和伏击等手段，实行残酷的“清剿”。第一野战纵队北渡后，国民党军更加猖狂地进行大规模带毁灭性的“围剿”；同时加强经济封锁，移民并村，大肆捕杀干部战士和群众积极分子，致使豫鄂陕边区内线坚持部队的处境困难。内线部队得知第一野战纵队北渡后，又一时思想波动，北渡心情迫切。陈先瑞、韩东山根据豫鄂陕边区党委的指示，一面安定部队思想，鼓舞斗志，一面组织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收拢分散的各支部队。

2月中下旬，豫鄂陕军区第一、第四军分区部分部队和军区、行署机关，以及一些分区的干部共1000余人，先期会合于卢氏木桐沟一带。经请示中央同意，决定已会合的部队先行北渡黄河，尚未会合的部队由王海山、汤成功负责组织收拢，再相机北渡。当陈先瑞、韩东山率领先期会合部队沿第一野战纵队北渡路线进入黄河南岸地区时，发现国民党军第八十三旅主力及3个保安团冒充太岳军区接渡部队在南岸渡口设伏，陈、韩又当即确定：以先头部队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迅速沿原路线返回伏牛山，继续收拢和整理部队，待机渡河。

在根据地内线坚持的其他部队和地方干部，亦先后会合并进入伏牛山地区。2月底和3月初，第二军分区蓝洛支队、第三军分区机关、原第十三旅三十八团一部和商山、郟山支队主力以及其他一些小部队和干部，先后与陈先瑞、韩东山所部会合。3月6日，王海山、汤成功率领第五军分区部队一部及一个干部队进入洛宁，在熊耳山西麓的一条山沟里与陈、韩部队会合。至此，在豫鄂陕根据地内线坚持的原中原突围部队基本上全部会合。

当天，部队召开了有支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正式宣布组成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由陈先瑞任司令员，韩东山任政委，王海山为副司令员，汤成功为副政委，赖春风为副参谋长，曾焜为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第一、第四、第七3个支队和一个干部大队，共3000余人。会议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在思想上作好北渡与北渡不成继续坚持豫鄂陕边游击斗争的两手准备。会后，第二野战纵队为迷惑国民党军，先向西

到官坡、木桐沟一带活动，而后秘密向北靠近黄河，同时加强与中央军委、中原局和大岳部队的联系，积极准备北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第

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非常重视。早在第一野战纵队渡过黄河的第二天（即2月21日），中央军委就曾电示文、汪并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注意与陈韩联络，保障陈韩纵队安全北渡”。3月11日，毛泽东又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陈（赓）谢（富治）王（新亭）韩（钧）：“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部队（指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3月1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文建武、汪锋，询问“是否已派人接护陈韩过河”。在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后，3月14日，中原局电告陈、韩，指示第二野战纵队20日北渡，届时太岳军区将派部队接应。

第二野战纵队于3月15日拂晓从嵩县老道沟出发，徒涉伊河，进入熊耳山南麓。当晚，国民党军1个营在保安团配合下，偷袭野战纵队宿营地被击溃。第二天，野战纵队翻越熊耳山，渡过淇河，下午，又在木柴关与国民党军1个保安大队遭遇，前卫七支队将其击溃。17日，第二野战纵队涉过洛河，下午到达韩城以西的麦村附近时，又遭国民党军第八十三旅第二四八团一部及保安团4个大队阻击。野战纵队首长分析认为，国民党军很可能察觉到野纵北渡意图，先纠集小股部队不时袭扰，迟滞野纵北上，以争取时间，在陇海路上布置大规模的截击。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野战纵队首长决定，集中全部力量，击溃国民党军的阻击，争取时间向陇海路挺进。同时，电台与中共中央和太岳部队联系，改变原定时间，提前北渡。

3月17日下午5时许，第二野战纵队第一、第四、第七支队同时向麦村附近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集中机枪火力控制着阵地前沿的一段开阔地。野战纵队以第一支队在正面吸引国民党军火力，第四、第七支队从左右两翼向国民党军阵地实行包抄，一举攻克该阵地，毙伤俘国民党军300余人，击毁汽车1辆，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第二野战纵队连夜急行军，于18时拂晓前赶至陇海铁路渑池和新安之间的义马车站附近。第七支队一部将车站守军1个交警中队包围，掩护纵队主力跨过了陇海铁路。当野战纵队全部登上铁路北侧的一座高山时，国民党青年军两个连赶来阻击，很快被野战纵队击溃。这时，一列运兵的军车从洛阳方向驶来，国民党军慌忙下车，沿铁路一线散开，摆出“堵击”架势。恰逢两架国民党飞机飞至，误以为是第二野战纵队正在过路，一阵狂轰滥炸，致使铁路两边国民党军死伤惨重。

3月18日中午，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主力到达新安县杨河口，与奉命南渡黄河接应的大岳军区部队四纵十二旅先头营会合。当晚，纵队到达黄河南岸的西沃镇渡口，太岳部队已备好船只，并在渡口附近布置了警戒。在太岳部队的掩护下，第二野战纵队3000余名干部战士，满怀胜利的喜悦，于3月19日上午全部渡过黄河。部队在阳城经短期休整后，于3月下旬开赴山西晋城，与先期到达的豫鄂陕军区第一野战纵队胜利会合。

三、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成立，坚持豫鄂陕边区的斗争

在第一野战纵队北渡黄河之前，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于1947年2月5日成立了中共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以刘庚、巩德芳、王力、薛兴军、赖春风为工委委员，刘庚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巩德芳任指挥部司令员，赖春风任参谋长，在豫鄂陕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北渡黄河后，统一指挥和领导边区的斗争（其中刘庚、赖春风后奉命北渡黄河），巩德芳、王力等于2月中旬在花园岭天桥山（今属丹凤县）召开会议，对主力北渡后根据地

内坚持斗争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布置。会后，巩德芳、王力分赴丹江北岸和南岸，组织指挥留下的干部和游击队积极坚持斗争。

3月中旬第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时，由于时间紧迫通讯联络困难，豫鄂陕边区后方医院和四分区卢灵洛中心县委、县政府，洛北支队及其他分区的部分干部战士未能及时收拢。他们先后自动组织起来，在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与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斗争。

中共卢灵洛中心县委、县政府率领机关干部和洛北支队，在主力北渡后，同二分区一部合并，与国民党军周旋于灵宝县黑山一带，后转至卢氏深山老林地区。四分区干部熊松柏、祝铭等6人，执行任务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黑山一带，于2月中下旬成立了中共卢灵洛工作委员会，熊松柏任书记，祝铭任副书记，分头负责卢氏、洛南、灵宝等县的工作。该工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积极发展党员，秘密发动群众，并通过统战工作搞武器弹药，获取情报，安置伤员，使工委有了立足之地。

在双槐树后方医院养伤的商山支队支队长罗孟刚、洛北支队副支队长毛凯和原河南军区情报科科长葛天敏等人，同后方医院院长张开祥、政委陈纪有一道，将伤病、医护、警卫人员13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游击支队，转战于卢氏县的淇河、胭脂河和商南县的两岔河、七盘磨、曹营等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以野菜、野果充饥，以柴草生火御寒，与国民党军进行了1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4月初，在卢氏县五里川建立了中共豫陕工委（即商山工委），罗孟刚任书记，毛凯任副书记。并决定成立陕南支队，罗孟刚任支队长，陈纪有任政委，赖鹏任副支队长，毛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大队，共400余人。不久，卢灵洛工委副书记祝铭等在卢氏县毛河与豫陕工委会合。为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斗争，工委和支队研究决定向山高、林深、路险的商南县七里盘磨地区转移。为站稳脚跟，工委和支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经工委和支队批准，罗孟刚、陈纪有与当地群众和开明绅士王天荣、屈万富等5人结拜为“山盟海誓”的兄弟。结拜后的这5位群众和绅士，积极协助工委工作，在商县、洛南、卢氏3县的15股国民党地方武装联合搜山时，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及时给工委送情报，帮助部队转移、隐蔽。并在部队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为部队筹集了4000余斤粮食。核工委、支队亦时刻不忘贫苦群众，即使部队生活再困难，也要挤出粮食、布匹救济他们。同时，部队还主动出击，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一次，陈纪有带领10余名支队战士夜袭国民党前坪乡公所，并向被俘的保安队员宣传革命道理，教育他们改恶从善。椿树沟有一个姓吕的恶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游击队员们抓获了这个恶霸，将其当众处决。

陕南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率领游击队昼伏夜出，在长坪公路一带神出鬼没地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在日益艰难的斗争中，巩德芳积劳成疾，但他坚信“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胜利一定要到来”。“商洛一定要红起来”！他带病坚持领导游击队继续与国民党军斗争。3月23日，巩德芳终因缺医少药，劳累过度而溘然长逝，年仅38岁。巩德芳牺牲后，由于根据地形势更加恶化，陕南工委副书记、指挥部副政委王力转入隐蔽指挥。这一时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还有一分区商山蓝工委书记谢华率领的十五支队一部，二分区蔡兴运部，三分区谭道鹏部和张奎部、叶茂荣部等。王力写信联络各部，要求“组织精干力量，坚持斗争，等到大军到来。”在王力等领导下，各部游击队与罗孟刚等部互相策应，组成小分队，在西荆公路以及柞水、商县的

秦岭山中，不断偷袭、截击国民党军和乡保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对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工作非常关心。1947年三四月间，汪锋派原陕南游击队大队长田申荣和其侄田勇胜，从山西晋城返回商洛，传达全国革命形势和有关精神，商定根据地的下段工作：或坚持斗争，准备迎接大反攻；或转移到晋城休整学习。6月22日，田申荣等于商县会峪青棉沟见到了王力，传达了汪锋的指示。王力等经研究决定：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迎接主力反攻。并决定重新组织和扩大武装，开展斗争。随后，以蔡兴运部为基础，组建了商洛游击队，蔡兴运、田

申荣任正副队长。商洛游击队在王力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税、抗丁工作；动员贫苦青年参加游击队。同时，他们还主动出击，捣毁了国民党留仙坪乡公所。游击队的影响日益扩大。8月，商洛游击队转至丹江以南地区，集中谭道鹏、张奎领导的游击队，又开始同国民党军进行半公开的游击斗争。

四、晋城休整，北渡部队改编为第十二纵队

豫鄂陕军区主力于1947年二三月间分批北渡黄河抵达山西晋城后，立即进行休整工作。太岳军区党政军民，对豫鄂陕军区部队给予热烈欢迎和殷切关怀，使指战员们受到很大鼓舞。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以12个旅的兵力为第一梯队，于3月13日开始北犯延安。中共中央为将胡宗南部吸引在陕甘宁边区而分别加以打击消灭，支援其他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设在延安的中原局，亦随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转移至晋绥解放区工作。

为加强对豫鄂陕军区北渡部队休整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原局领导成员先后前往山西晋城。4月14日，李先念、陈少敏、戴季英、刘子久等，率领辗转到达延安的中原军区部分干部战士400余人，从晋绥解放区动身，绕太原北到五台地区，再过正太路到太行，于5月23日抵达晋城。此前，任质斌已于5月初先期到达晋城，调查了解豫鄂陕军区北渡部队的有关情况；郑位三亦率180余人，于5月12日抵达晋城，并于5月17日召集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

鉴于豫鄂陕军区北渡部队一些干部中存在着消极情绪等问题，为加强团结，提高部队素质，增强战斗意志，准备迎接战略进攻，中原局决定在晋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通称“高干会议”。会前，中共中央特于5月28日打电报慰问中原军区全体指战员，在充分肯定中原军区各部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后说：“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指示已到晋城的部队：“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困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5月29日，“高干会议”正式开幕。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等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查总结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工作；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指示，介绍当时全国各个战场胜利的斗争形势，以及太行、太岳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和群众参军参战的情况等。在总结工作的问题上，由于当时中原局部分领导对中原突围及坚持中原敌后斗争的巨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只看到丧失根据地和部队减员的一面，这就助长了部分干部思想上本已存在的相互埋怨、相互指责的情绪，因而会议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7月17日，中央军委电示郑位三、李先念：“五师（指豫鄂陕军区部队）之会议应早日结束，迅即先行整训。”8

月1日，晋城“高干会议”闭幕。

在此期间，豫鄂陕军区部队进行了补充、组训和整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豫鄂陕军区部队的补充，整训工作极为重视。早在4月15日，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城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文、汪部7000人是原五师的精华。你们应当作自己建制部队一样给予积极帮助。中原局郑、李诸同志希望你们补充该部一批新兵及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望召文、汪征询情况，给以整训的指示，并商定补充计划。4月23日，毛泽东又将李先念22日关于补充部队的电报批转给晋冀鲁豫军区。在晋冀鲁豫军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豫鄂陕军区主力的补充、整训工作顺利进行，先后补充了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1000余人，以及大量枪支弹药，部队曾一度恢复突围前的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四旅、第十五旅的番号。

在抓紧整顿干部思想和补充组训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的同时，李先念等一面指挥仍在中原敌后坚持斗争的部队，为反攻中原作战略准备，提出了“联络和集中中原地区零散部队的原则”，要求已经立住脚跟的部队要坚持，“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情况是会好转的，前途是光明的”，强调必须认真依靠群众；一面又将《转战敌后原中原军区部队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中央作出战略进攻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二年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了战略进攻的伟大决策，并将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将实施战略突击的任务，交给了晋冀鲁豫野战军。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同时，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7月1日发起鲁西南战役，接着自8月7日起开始南征，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投入战略进攻，解放中原河山，经过补充、整训后的豫鄂陕军区主力8300余人，奉命于7月下旬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因病未到职，后由刘建勋担任），韩东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绍文任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以原中原军区二纵十三旅及十五旅四十五团一部为基础改编为三十四旅，原十三旅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团；以原豫鄂陕军区四、五分区部队为基础改编为三十五旅，原四分区之七团、五分区三支队和六支队（原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四分区之八团依次改编为三十五旅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团，另纵队直辖一个警卫团和一个教导大队。由500多名陕南籍干部、战士于4月在晋城组建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与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合编为第三十八军教导团。任命汪锋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陈先瑞为第三十八军副军长。8月5日，李先念率领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开始了反攻中原的胜利进军。

第四章

中原军区南路军、江汉军区部队突围。 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转至外线作战

第一节南路军挥师突进武当山

一、与十五旅会合，阳平口受阻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根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关于分路突围的部署，除第一旅担任掩护任务、原地抗击后向东行动之外，纵队领导机关和第二、第三旅共 9000 余人，组成南路军，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和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副政治委员刘子久、参谋长张才干、政治部主任吕振球率领下，于 1946 年 6 月 24 日晚，即开始在各驻防地区秘密集结。第二旅从河南光山的望城岗、余家大湾等地出发，向纵队驻地泼陂河方向靠拢；第三旅将第七团防御阵地移交给第一旅后，迅速在河南经扶（今新县）的浒湾、大熊湾地区集结待命，该旅奉命担任纵队前卫的部队已先期向宣化店方向前进。6 月 25 日，王树声等率南路军分别从泼陂河、浒湾和砖桥驻地出发，冒着急风暴雨，踏上泥泞的西进征途，迅速向宣化店地区靠拢。当时的行军序列是，第三旅为第一梯队，第二旅为第二梯队，纵队领导和机关直属队在第三旅后面跟进。

与此同时，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直和第四十三团在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陈先瑞率领下，奉命从河南罗山的定远店、南岳山驻地出发，向西南汪洋店、阳平口（今属湖北大悟县）方向挺进，等待接应第一纵队，以保障南路军的北翼安全。另外，第十五旅在平汉路西还有第四十四团，担负接应主力西越平汉线的任务。第十五旅旅直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共 4000 余人。

6 月 26 日拂晓，国民党军悍然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其中，第五绥靖区司令孙震指挥的整编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五、第一二七旅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附独一团，分别由北面 and 东面向白雀园地区进犯，矛头指向宋家畝、泼陂河；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指挥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及第三十四旅第一 一团，由南面沿沙窝南侧至经扶之线向北进犯，主要矛头直指泼陂河，企图从东、北，南三面合围“聚歼”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于泼陂河地区。南路军按照中原军区分路进行突围的部署，以快速的机动，抢在国民党军的部署之前，跳出其合围，于 26 日晚进抵宣化店以南地区，前卫部队则沿宣化店南之吕王城向马家集、阳平口方向挺进。这时，第十五旅旅直和四十三团，亦抵达汪洋店西南、阳平口东北地区，准备接应与掩护南路军。

6 月 27 日，国民党察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向西突围的行动后，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命令：“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十五师在夏店、阳平口、大新店、三里城、仙人崖、东双河之线，对共军加强包围封锁，主力分置铁路线上及铁路以东各要点，堵击共军向西突围；整编第七十五师路西清剿任务暂行停止，第六旅以一部留置平汉路西监视共军，主力限 6 月 30 日前到达广水集结待命；整编第七十二师即与共军保持接触，跟踪西追。”27 日下午，第十五旅四十三团进抵汪洋店以南地区时，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遭遇。经一昼夜激战，第十五旅四十三团乘夜幕撤出战斗，向西南方向转进。南路军原计划于 27 日与第十五旅会合，由于国民党军阻击，加之暴雨倾盆，道路泥泞，延误了一天，直至 28 日下午两部才于阳平口东北地区会合。至此，第十五旅旅直和第四十三团加

入了南路军的战斗行列，担任右翼，向西挺进。

6月28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严令各部：“平汉路东共军第一、二纵队主力，逐渐由宣化店向西移动，似有突越平汉路向西撤退企图。希飭各部严密包围、封锁、监视、搜索，不得使其逃去。否则由各该地区指挥官负责。共军如继续西进，各部队应组织跟踪、堵击，务必在平汉铁路东予以歼灭之。”

6月29日，当中原军区南路军行进至阳平口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截击。该旅五五四团抢先占领了阳平口一线的隘口要道，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同时，第一九九旅全部由北向南压，分路实行截击；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亦由东北方向尾追。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南路军领导研究决定，甩开当面阻击之敌，向西南绕道王家店，越过平汉铁路，全速西进。当即命令第二旅第四团由后卫改为前卫，务必于29日黄昏前赶到王家店；第三旅第八团和第二旅第五团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南路军主力突过平汉铁路。下午3时，南路军指战员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绕过阳平口一线之敌，向王家店疾进。

二、激战王家店，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

中原军区南路军的西进行动，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为加强王家店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到广水以南之杨家寨、二郎店附近展开；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第五五四团由广水进至东新店向南阻击；并令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协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封锁孝感王家店至肖家港间的铁路线防堵；担任预备队的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及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欠第三营）速由应山南下，增援第三十八团作战；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由夏店、蔡店出动，协同整编第六十六师进行尾追；整编第十一师由汉口向孝感方向增援；同时，令驻汉口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调驻明港的铁甲列车南下增援，企图以空地立体火力，将中原军区南路军“围歼”于平汉铁路以东地区。

王家店地区，丘陵起伏，平汉铁路从两山丘之间蜿蜒而过；沿铁路东侧，是一条由北向南的澧水河，河两岸是一片开阔地。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两个团、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枪先占领了铁路沿线高地，在路东磨山高地上，布置了迫击炮阵地，在王家店车站南北一线构筑了数十座坚固碉堡。其炮兵火力和机枪阵地形成交叉火网，严密封锁了西越平汉线的前进道路。1946年6月29日黄昏，当中原军区南路军抵达王家店以东约20里的小河溪、何家大湾一线时，即遭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和第六旅的顽强堵击。王树声当即命令第一纵队第二旅第四团再次改为后卫，迅速抢占路东垄家畈西北之大米山高地，掩护南路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6月30日凌晨，担任纵队后卫的第二旅第五团和第三旅第八团，亦先后抵达王家店以东的小河溪地区，部队做好了西越平汉线的一切准备。

6月30日上午，南路军召开旅领导干部会议，决定黄昏前兵分两路纵队，向王家店至卫家店铁路沿线前进。从傍晚开始，南路军即进行冲越平汉铁路封锁线的战斗。为配合南路军作战，阻击国民党增援部队，驻守在路西赵家棚、桑树店一带的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1个营和江汉军区第一团第三营炸毁了花园附近的铁桥。当日晚，第二旅第五团（欠三营）和第六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和掩护下，歼灭了驻守在卫家店车站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团一部，于

当夜从卫家店的北侧顺利地越过平汉铁路。接着，第三旅大部在闵学胜、张力雄指挥下，摧毁多座碉堡，亦冲开一个缺口，从王家店北侧越过平汉铁路。与此同时，第一纵队机关在警卫团和第四、第七团各1个营及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的掩护下，经过连夜的行军作战，于7月1日清晨进抵王家店附近。这时天已大亮，国民党军加强了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命令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第二营及野战炮营第二连从广水乘铁甲列车向王家店地区开进；铁路东侧磨山之炮兵阵地向南路军进行拦阻轰击；整编第十一师也由孝感方向赶来增援，从侧翼猛扑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冲开的突破口，又重新合拢了起来，南路军被截成两段。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和未过铁路的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在国民党军密集火力封锁下，被压在路东丘陵和田畈地带，情况异常危急。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南路军领导号召指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摧毁敌碉堡，冲过铁路就是胜利！刘昌毅指挥第一纵队警卫团和第三旅第七团击溃当面阻击之敌，并以第七团一、三营及警卫团1个营为北翼，第二旅第四团两个营为南翼，向王家店铁路沿线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第七团三营指战员在王家店车站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连续摧毁5座明碉暗堡，歼灭国民党守军1个连。第七团一营指战员，堵击铁路上的铁甲列车，使之动弹不得。与此同时，第二旅第四团向王家店南侧分两路发起钳形冲击，先后摧毁3座碉堡，歼灭国民党守军1个加强排。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南路军摧毁数十座碉堡，毙伤俘国民党军500余人，终于在王家店铁路沿线撕开了一条长达1公里宽的突破口，使纵队机关和未过路的部队迅速通过铁路。至此，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达半年之久的平汉铁路封锁线被彻底冲垮了。

三、奋战流水沟、雅口，强渡襄河

国民党军企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于平汉路东的计划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斥责刘峙“指挥不力”，“饬令查办”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和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为防堵南路军西渡襄河，刘峙于1946年7月2日电令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以主力一部，仍担任信阳至花园间铁路守备，并与平汉路西之一部，在现地竭力堵击共军西进，整编第六十六师及整编第七十五师，各以主力蹑踪向吴家店、大洪山地区猛烈追击。”周岩根据刘峙电令，即部署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第一八五旅向赵家棚、寿山、大洪山、吴家店、茅茨畈地区跟踪追击；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经洛阳店向大洪山、茅茨畈一线前进，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速用汽车由京山经钟祥运至宜城附近，扼守转斗湾至欧家庙间襄河沿岸诸要点，控制船只渡口，企图在12日前将南路军“歼灭”在襄河以东地区。南路军和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于7月1日下午越过平汉铁路后，当日黄昏抵达安陆东北之赵家棚、大鹤山一带，与原在路西接应的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会合。部队在赵家棚地区休整一天后，继续向西挺进，于7月3日下午进抵应山西南之寿山地区。这时，接到中原局电示：“敌人拟于厉山至天河口一线合击我军，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由于连日大雨，河水猛涨，府河不能徒涉，部队乃绕道经大邦店、马坪、浙河，于7月6日到达随县西北之安居。前卫部队先集团泅渡，其余部队架设浮桥于7日下午渡过府河。第一纵队在安居时，接到中原局转中央军委5日电，指出：“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牵制大量敌人。”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的电示，第一纵队决定抢渡襄

河，向武当山挺进。第二纵队第十五旅原计划过铁路后，于唐河以南的祁仪镇归还建制，后因随枣方向敌情严重，仍随一纵行动。7月8日下午，南路军到达茅茨畷地区。因连日阴雨行军作战，干部战士极度疲劳，第一纵队领导决定“休息一天，10日继续西进。”并电告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决心抢渡襄河（万一不可能北上），请江汉军区部队控制船只及渡口，待我军到达（后由于电台联络波长呼号已毁，未与江汉部队联系上）。9日，接中原局电示：“现敌已组成3个追击队，每队约3个团。一纵应由安居迅速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将来作第二步计划，此为上策。”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由吴家店向茅茨畷方向追击，第一八五旅向兴隆集方向前进，第一九九旅第五九五团抵达大邦店地区；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于平林西渡府河，到达六房咀、大洪山主峰一线，配合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由东南方向尾追；整编第三师已集结在枣阳县城，拟于9日与整编第四十一师会合，防中原军区南路军北进，企图在12日前“围歼”南路军于襄河以东地区。

7月9日中午，王树声命令第一纵队第二旅四团担任前卫，立即向襄河东岸流水沟前进，抢占渡口，控制船只；第三旅八团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渡河。前卫四团立即出发，经过急行军，于10日上午到达流水沟渡口，并派出侦察排沿河搜寻船只，准备抢渡襄河。经再三寻找，仅找到7只木船，由于船少人多，水深流急，不少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急流中泅渡，于10日晚全部渡过襄河。11日凌晨，第三旅七团和第十五旅四十四团亦先后赶到襄河东岸流水沟和雅口地区，七团三营和四十四团1个营连夜抢渡襄河。

7月11日，南路军继续在流水沟、雅口地区组织抢渡。当第三旅七团（欠三营）在流水沟渡河之际，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从襄河西岸岛口赶来堵击；已过襄河的前卫第二旅四团在璞河垸地区与敌遭遇，当即展开激战，将其击溃。然而，由于船只实在太少，过河速度太慢，加之不断有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和俯冲扫射，国民党军又前堵后追，封锁襄河，南路军大部被阻于河东，处于背水一战的困境。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南路军领导果断决定，由刘昌毅、张才干和王海山、陈先瑞分别指挥所属部队从流水沟和雅口渡河。并令已渡河的第二旅四团和第三旅七团、第十五旅四十四团各1个营，分别占领璞河垸、余家垸、牛坊湾、郭海营、茅草洲、郑家集等一线阵地，坚决阻击岛口、宜城方向之敌；命令第三旅旅长闵学胜率第三旅八团并指挥第二旅六团两个营，在河东流水沟一带展开，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纵队主力过河。当时，空中地面、襄河两岸，枪炮声、轰炸声、吼叫声响成一片。在河东流水沟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在闵学胜指挥下，以不到两个团的兵力，与数倍之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顽强地阻击国民党军的多次疯狂进攻，取得了流水沟阻击战的胜利。在河东雅口地区的部队，在王海山指挥下，强渡襄河，担任掩护的四十四团一营，与国民党军拼杀，全营大部牺牲。在河东河西两岸部队的英勇阻击和沿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南路军7000余人于7月13日拂晓渡过了浪涛滚滚的襄河。

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以空中飞机和地面炮火作掩护，又重振旗鼓，企图“围歼”南路军留在东岸的部队。第三旅八团和第二旅六团指战员在流水沟一线坚守阵地，顽强地击退其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由于国民党军炮火严密封锁了襄河渡口，船只已被其完全控制，留在

河东的部队约 2500 人无法渡河；加之国民党追兵逼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形势异常危急。闵学胜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纵队领导原定计划，毅然决定先向西北突围，而后转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区。13 日夜，闵学胜率部迅速撤出阵地，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按计划转道北上，后于 8 月初进至洛南五里川、庚家河地区，与黄林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会合。担任后卫的第二旅六团二营完成阻击任务后，与主力失去联系，由该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孙宗林和二营营长罗金科率领转入大洪山地区活动，后与黄民伟、杨洪先率领的江汉支队会合，编入江汉支队第二大队。在雅口地区未过河的第十五旅四十三团一部及旅直、警卫营一部 1000 余人大部被打散，一部由四十三团副团长吴茂金率领转入桐柏山区，后与宁淮、张波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会合。

四、石花街破阻截，挺进武当山

中原军区南路军主力强渡襄河天险后，在宜城西南的璞河垸、孔家湾一带，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之堵击，随即兵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经宜城西南之孔家湾、林家店、李家垸、刘猴集，向南漳之安家集、报信坡方向前进；一路经宜城之胡家岗、高观铺、雷家河，向南漳重镇武安方向前进。

坐阵襄阳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得知南路军主力越过襄河天险后，急令第一八五旅和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向南漳方向前进，协同第十六旅予以“堵歼”。1946 年 7 月 14 日，蒋介石电令周岩：“对南漳之共军穷追猛击，勿使脱逃。”同日，第一八五旅占领南漳后，向保康急进，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占领武安镇、安家集、报信坡等要点，堵击南路军西进。南路军英勇地击溃了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的疯狂堵击，并在刘猴集地区设伏痛歼尾追之第十六旅四十六团一部，于 15 日下午在报信坡会合，转道西北向谷城石花街方向挺进。

7 月 18 日，南路军由南漳北之茅坪进入谷城，经郭家峪、陈家湾、小沟口、卜家庙等地，于 20 日北渡南河，抵达谷城石花街西南地区。先期到达石花街镇之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四旅第一四五团顿时慌了手脚，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发电乞求援助。整编第六十六师宋瑞珂急令其第一八五旅五五三团由房县、保康转向谷城截击，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由南漳北之龙门集向石花街方向尾追。

7 月 21 日上午，当南路军前卫第四团进抵石花街西南之苍峪沟地区时，国民党军五五三团凭借其占据的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制高点，疯狂地进行堵击。与此同时，石花街的国民党军第一四五团，配合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对南路军后卫第七、第九团进行尾追侧击，企图前后夹击，“围歼”南路军于石花街地区。

苍峪沟，位于石花街西南 4 公里，沟长 5 公里多，两侧山峰陡峭，地势险峻，道路狭窄，特别是黑山口，乃通往武当山区的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加之当时烈日当空，骄阳似火，酷热异常，南路军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极度疲惫，许多指战员的双脚都已红肿溃烂。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树声命令：第二旅第四团坚决突破国民党军之堵截，为纵队主力开辟通路；第三旅第七团坚决阻击尾追侧击之敌，保障侧后翼安全。一声令下，前卫四团指战员不顾炎热，忘记疲劳，犹如猛虎扑向国民党军五五三团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斗中，杨劲政委负伤，二营教导员黎朝正英勇牺牲。激战竟日，第四团在第五、第四十四团的有力配合

下，于当晚9时终于拿下了黑山口，打开了通往武当山区的道路。与此同时，担任后卫的第七团与尾追侧击的国民党军第一四五团展开激战。七团指战员在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的情况下，顶着烈日，向国民党军占领的山头发起猛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第七团在第九团的紧密配合下，先后攻下了石花街外围的各主要制高点，并于黄昏前包围了石花街镇。南路军原计划当晚攻下该镇，由于前进道路已经打通，国民党军主力正尾追不舍，为避免与其决战，根据纵队领导命令，停止攻镇，继续西进。这一仗毙伤国民党军300余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1门，轻机枪3挺，步枪数10枝，战马10余匹，电台2部，弹药5箱。敌人基本上已溃不成军，失掉了战斗力。南路军化险为夷，又一次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夹击合围，取得了进军鄂西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了中央军委的电贺和表扬。

石花街战斗后，南路军和第十五旅主力分两路向武当山挺进：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和纵直机关，向西南方向，经谷城之紫金洞、财庙、官坊、沙河店，向房县青峰镇前进；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向西北方向，沿均房两县交界处，向武当山进军。

7月24日，南路军在行军途中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一纵队于25日在房县青峰镇附近召开了纵队党委会议，决定部队分散，以武当山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二节 江汉军区部队直驱川鄂陕边

一、从桑树店出发，抢渡襄河

1946年6月下旬，江汉军区部队按照中原行署副主席刘子厚传达的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和中共江汉区党委及军区紧急会议的决定，立即开始突围行动。6月30日晚，由江汉原独立第一旅参谋长邹毕兆、作战科长余曙光（现名侯建新）率领的江汉军区先遣部队出发了。7月1日黄昏，江汉军区直属机关和主力部队6000余人，在江汉军区司令员罗厚福、政治委员文敏生率领下，分别从安陆桑树店、大山头、杨家河等地出发，向襄河边挺进。当时部队的行军序列是，第三团为前卫，第一团为后卫，第二团、警卫团和军区直属队居中。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为防堵江汉军区部队西渡襄河，于7月1日电令国民党襄阳第五行政督察专署：“加强襄河防务，堵截共军西进。”7月3日，国民党宜城县政府奉襄阳第五行政督察专署“控制襄河沿岸渡口，严防共军西渡”的电令，于当日晚即开始布防，命令县保警中队和各乡公所武装，封锁襄河沿岸渡口，搜集拦截河中行船。正当国民党军忙于河防部署之际，江汉军区先遣部队以急行军飞兵疾进，于7月4日下午突进至襄河东岸，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宜城东南之流水沟乡公所，控制了渡口，搜集到大小木船100余只。与此同时，前卫三团昼夜兼程向西挺进，于5日傍晚到达流水沟，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顶风冒雨，连夜抢渡襄河，并迅速占领西岸阵地，掩护江汉军区机关和后续部队渡河。

7月6日，江汉军区部队继续组织抢渡。当时正值夏汛，河水暴涨，水深流急。为加快渡河速度，罗厚福组织指挥，调整船只，增设渡河点，分别由流水沟、余家棚两处登船，并组织熟悉水性的战士泅渡。在当地船民群众的支援下，江汉军区部队秩序井然地于当日中午顺利渡过襄河，向宜城县城疾进。国民党宜城县党部、参议会给省政府发出的电报中哀叹：“共军罗厚福部七月五日晚袭占流水沟，围缴乡公所武器，以炮轰汉水西岸，搜捕隐匿船只，乘雨强渡成功。”“于7月6日午后一时猛扑县城。”

二、连克宜城、南漳、保康、竹山，向川东北挺进

江汉军区部队于1946年7月6日渡过襄河后，在璞河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向鄂西北挺进，在川鄂陕边建立游击根据地。会后即兵分南北两翼，向武当山地区挺进。北翼由罗厚福、文敏生率第一、第二、第三团和军区机关直属队，沿公路经孙家店、白启营、古楼岗、郑家集，直插宜城县城。南翼由李人林和刘子厚率军区警卫团和地方干部团，走小道经宜城之璞河埡、孔家湾、新集等地，向南漳方向疾进。当日午后，北翼部队前卫三团突进至宜城县城以南地区时，与前来阻击的国民党宜城保警中队200余人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毙伤该中队50余人，余部向北逃窜。北翼部队于当日下午3时胜利攻克县城，当即开仓济贫，四处张贴布告，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而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得知江汉军区部队西渡襄河、攻占宜城的消息后，急令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由钟祥速向宜城方向超越追击，第四十七团车运荆门堵击。然而，江汉军区部队进展神速，当国民党军尚未赶到宜城之时，北翼部队早已经宜城的朱市，南漳的武安镇，捣毁国民党两处镇公所，歼其地方武装一部，于7月8日攻克南漳县城。南翼部队沿途击溃国民党宜城地方武装一部，亦于7月9日抵达南漳东南的安家集。

7月10日，江汉军区北翼部队在南漳县城南的洞坪召开军人大会，罗厚福，文敏生动员部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向鄂西北重镇房县挺进。正在开会期间，3架国民党飞机突然空袭，俯冲轰炸扫射，紧接着，国民党军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尾追而至。罗厚福当即命令第二团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其余部队向保康方向疾进。同日下午，江汉军区南翼部队在南漳安家集召开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李人林阐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等问题，会后部队继续向西挺进。

7月11日晚，江汉军区北翼部队经南漳的长坪、龙凤，进入保康县境。国民党保康县长和县保安大队惊恐万状，闻风而逃。北翼部队经保康的黄堡坪、土门垭等地，于12日中午时攻克保康县城。南翼部队经南漳的报信坡、果贺坪、薛家坪、翻越荆山主峰康狼山，先后攻克保康的马良坪、歇马河、欧店，渡过南河，向房县挺进。江汉军区部队连克宜城、南漳、保康等县城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堵截计划一次又一次落空，中共中央、中原局分别发电给予表彰并表示祝贺。

7月15日，江汉军区部队进入房县境内。北翼先头部队进至房县以东的榔口时，与前来堵击的国民党房县保警大队遭遇，激战竟日，毙俘其80余人，残部向青峰镇溃逃。北翼部队乘胜追击，于16日晚攻占青峰镇，后又进逼房县县城，并于18日凌晨抵达县城东郊、西郊。与此同时，南翼部队经保康的马良坪、歇马河上山，走长岭岗，到房县的高桥，进抵县城南郊，从而对房县形成包围态势。

房县，位于鄂西北之中心地带，北属武当山脉，南靠神农架林区，地势高峻，面积宽广，山峦重叠，绵亘千里，素有“千里房县”之称。房县县城是鄂西北之重镇，反动统治严密，保甲制度完善，国民党纠集了鄂西北诸县保安团队，凭借其坚固城墙和工事，进行顽抗。如攻克房县，对中原突围部队立足鄂西北，创建根据地，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经过研究，江汉军区决定攻打房县县城，坚决消灭国民党守军。

7月18日下午，罗厚福下令攻城。第三团向县城南关冲击；第一、第二团分别向东关、西关攻击；军区警卫团为预备队。经激战，第一团首先攻占城东五里之太山庙，歼国民党房县保安大队一部，继而第三、第二团先后攻下县城南关、东关和城西门外诸要点。城内国民党守军凭借其坚固工事和优良装备，负隅顽抗，江汉军区部队连攻3日未克。后据悉城内除国民党保安团队外，还有正规军1个团，另第一八五旅第五五四团正从房县北面赶来增援。为避免与敌主力作战，根据中央电令，江汉军区决定停止攻城，继续西进。

7月19日，国民党军程潜为防堵江汉军区部队进入大巴山，命令周岩：部署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及第六旅第十七团“肃清”保康及其附近地区之“共军”，并向房县以西搜索攻击；调重庆行营整编第十师第十旅1个团，到达兴山后，即取捷径向黄保山、上龛（属房县）之线前进，师主力到达巴东后，即取捷径向白河口、中坝（房县西南）前进；第一战区预定开平利、竹溪之1个加强团，即向竹山以东搜索攻击，企图“围歼”江汉军区部队于鄂西北地区。

江汉军区部队放弃攻打房县之后，即以第二团为后卫，掩护主力西进。7月20日傍晚，当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第五五四团尾追至房县汤池口附近时，第

二团指战员英勇阻击，将其击溃，完成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尾随主力向西转移。22日，江汉军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竹山县城，歼灭国民党守军1个营。江汉军区部队进城后，一方面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一方面休整部队，而后继续向川东北挺进。

三、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奉命转战襄西

1946年6月下旬，根据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江汉区党委和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江汉军区主力部队转移方案时，即对坚持原地游击战争作了紧急部署。决定成立中共江汉中心县委，并抽调江汉军区第一团第一营和京山、应城等县的地方武装组成江汉支队，由黄民伟任中心县委书记，杨洪先任支队长。

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成立后，为了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率领所属各县委、工委与各县地方武装，同国民党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集中力量打击地方土顽武装。与此同时，在武汉外围和平汉铁路沿线不断袭击、骚扰国民党军，对掩护中原军区部队突围，收容安置伤病员和掉队人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8月初，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根据中共江汉区党委的电令，除留少数地方干部和精干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外，率领各县地方干部和支队转战到襄河以西荆门、当阳、远安、南漳、宜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接到电令后，江汉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马上行动，要求各县干部和部队在3天内集合完毕，准备西渡襄河。为了坚持鄂中和大洪山地区的斗争，还决定彭友德带领20余人枪留在京(山)北大洪山一带坚持斗争；饶民太带领20余人枪留在云(梦)孝(感)地区坚持斗争；杨森堂带领20余人枪留在应城坚持斗争，董朝章带领10余人枪留在京安大山头一带坚持斗争；鄂中地下党的工作由杨祝三负责。江汉中心县委书记黄民伟临走前还对鄂中地下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8月6日，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分两路西渡襄河。一路由杨洪先率领第一大队从天门的多宝湾以南渡过襄河，向当阳、远安方向前进；一路由黄民伟、孙宗林率领第二、第三大队和机关干部从多宝湾以北渡过襄河，向荆门北山前进。吴天成所率之京、安、应、随地方干部和武装因未按时赶到集合地点，自成一队，亦随后渡过襄河。

江汉支队第一大队在渡河中比较顺利，未遭敌阻拦；后直插当阳之涪溪镇，捣毁国民党镇公所，缴获枪10余枝。第二、三大队渡过襄河后，在沙洋西北约7.5公里的一个小镇，遭整编第七十五师1个营阻击。黄民伟即带领警卫连和地方武装，集中轻、重机枪火力，从正面强攻；孙宗林、罗金科分别带领第五、第四连从左右两边冲杀。国民党军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一仗，俘国民党军10余人，击伤其营长1名，缴获机枪2挺，步枪10余枝，子弹数千发，江汉支队无一伤亡。

8月9日，黄民伟率领第二、三大队到达荆门北山，与中共北山工委王展、叶云等会合。接着，继续向南漳的东巩前进，于10日在姚家河与杨洪先、吴天成所率的部队会合。

8月11日，江汉中心县委在东巩附近的钱家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襄河以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以荆山山脉为基地，积极在荆门、当阳、远安、南漳、宜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恢复襄西工作的方针。

四、入川受阻，东返接应第一纵队

江汉军区部队攻占竹山县城后，经过短期休整，继续向竹溪、镇坪地区挺进。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闻讯，即令整编第十师第十旅速由房县九道梁和镇坪两地，向竹山、竹溪地区疾进，阻击江汉军区部队入川。

1946年7月24日，中原局电示罗厚福、文敏生：“你们自取道路，立刻进川到城口、万源及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发动游击战争。”江汉军区部队根据中原局电令，即兵分两路向川东北挺进。一路由竹山之保丰进入竹溪县境，经丰坝、水坪、黄龙、黑虎岭、三台到达换香地区；一路由竹山之田家坝进入竹溪县境，经樊亭、龙堰、回龙，广福、瓦仓到达天宝之蔡家坝地区。

7月29日，江汉军区部队抵达竹溪、镇坪地区时，收到中原局来电令其“占领两竹（竹山、竹溪）后，主力应待一纵主力到达后，而后全部入川，但（应）马上以小部兵力向镇坪、城口探进，调查路线”，并指出：“会合以后，你们应受王刘（一纵）领导。”30日，江汉军区部队到达镇坪县府所在地牛头店。根据中原局指示，立即派作战科长余曙光带一支小分队，到大巴山口子侦察敌情，准备入川。7月31日，罗厚福、文敏生致电中共中央并中原局，请示“究竟是机动选择地区打游击，还是坚决入川？”并望中央“通知四川党配合和援助我们。”8月2日，中原局电复：“进川意义甚大，使蒋不能抽兵出川，进攻我解放区，增加我党在川的影响与力量。其生存条件是有的，群众怨恨国民党的重捐重税和抽壮丁，地形便于游击战争。只要你们政策掌握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鼓励他们“向川内前进，创造川东北根据地。”

江汉军区部队根据中原局指示，立即向川东北探进，决心创造川东北根据地，以便与突围至陕南的北路军和鄂西北的南路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达成战略上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配合内线作战之目的。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第八十三旅和第十旅占领了川鄂陕三省交界的鸡心岭和八挂庙一线；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之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亦由安康开至平利、白河一线，占领各交通要道，分别将入川，入陕之路堵死。8月4日，中原局电示罗厚福、文敏生：“你们必须粉碎川军之进攻，决在镇坪、城口地区将八十三旅之进攻打退。”但由于国民党军占领的地势险要，防堵甚严，江汉军区部队数次向川东北探进，均未能奏效。8月上旬，江汉军区在镇坪牛头店中学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原局的指示，说明当时遇到的困难，研究下步的行动方案，决定暂不入川，以竹山、竹溪为基地，向川陕边游击；并于8月8日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原局。9日，中原局复电同意暂时放弃入川计划，但仍需置于武当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川鄂陕边根据地。江汉军区部队根据中原局指示，即兵分两路，在川鄂陕边开展游击。后来，由于斗争形势需要，中原局又电令江汉军区部队立即东返，接应中原军区南路军。从此，江汉军区部队与南路军开始了共同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节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与开展 反“清剿”斗争

一、根据地开始创建。冠木河战斗

当中原军区部队正在分路突围途中，中共中央即于1946年7月15日电示中原局：“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要求“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指出：“你们可南入巴山，进一步占领通南巴及川东北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王刘纵队（指一纵）则在鄂西创造根据地。”

7月19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正在向石花街挺进时，中共中央又电示一纵：“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应考虑以团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28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一纵：“你们万万不可北进。必须就地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长久打算。”24日，中央军委电贺一纵石花街战斗的伟大胜利时，对建立根据地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你们的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给正在向鄂西北进军的南路军指明了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江汉军区部队于7月18日攻打房县县城时，即计划以房县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后因房县县城未攻克，部队继续西进。22日，江汉军区部队攻占竹山县城后，即开始创建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竹山县委和竹山县民主政府，朱正传任书记，许明清任县长。8月6日，黄民伟、杨洪先率领的中共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西渡襄河后，即在襄西地区创建根据地，决定建立两个县委和行政委员会、3个工委和行政办事处：南（漳）远（安）县委，由吴天成任书记兼主任；荆（门）当（阳）远（安）县委，由王克强任书记，李正乾任主任；板桥工委，由程少康任书记，祝义亭任主任；荆钟宜工委，由廖学道任书记兼主任；北山工委，由王展任书记，刘建章任副书记兼主任。会议结束后，各县（工）委积极开展活动，打击国民党区、乡公所，消灭敌自卫队，使襄西地区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8月下旬，江汉支队第二大队和南远县大队，在南漳以南肖家堰地区，歼灭国民党南漳县保安大队，毙伤俘其1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80余枝。

南路军于7月下旬到达房县青峰镇地区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纵队党委立即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决定将第二、第三旅和第十五旅改编为民主、建国、和平3个支队，并从7月26日起，以房县为中心分散活动。第二旅活动于房县、保康、南漳、远安之间地区；第三旅活动于竹山、竹溪、房县，镇坪之间地区；第十五旅活动于房县、竹山、竹溪、白河、均县之间地区；并计划以各支队活动区域，组成3个地委，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工作。27日，中央电复：“同意你们分散建立3个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及3个地委组织”，并指出：“要有长期打算，军民打成一片，坚决依靠人民，你们就会胜利。”后来，由于敌情严重，此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8月初，当南路军抵达房县西部松香坪、阳日湾地区时，第一纵队纵直及第三旅即在两竹南部开展游击战争，第二旅在保康西南部之马桥口、阳日湾一带开展活动，并在保康官斗乡的千家坪成立了保房县委和民主政府，由孟庆延任书记，李超任县长。

南路军进入鄂西北地区分散活动后，国民党军即开始分头“追剿”。因此，南路军几乎每天都与国民党之追堵、侧击部队相遇，指战员天天跑路，赤脚行军，腿走肿了，脚磨烂了，加之无粮吃，无房住，部队极度疲劳，非战斗减员甚多。同时，国民党在此地区统治多年，保甲制度严密，通讯联络畅通，加之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又被破坏，群众还一时不明真相，这就给南路军的行动带来许多困难。

8月6日，王树声、刘子久致电中共中央并中原局：“根据敌情、地形、群众及经济等条件，在武当山边沿既不便于分散，又不能集中，实难以在此立足，建立根据地”，建议“向东发展，必要时渡襄河回大洪山活动”。7日，中原局电复：“襄河不易渡过，部队疲劳，就是回到襄东原地区，敌必将调更大的兵力进攻，孤立突出，处境将愈困难。”指示他们：“一则立即分散川鄂陕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再则会合罗文（指江汉军区）打退十四军（即整编第十师）堵击之一个旅，求得在川鄂陕边立住脚跟。”8日，中原局又电示：“如果鄂西地区难以存在大部队，提议以主力入川，创造通南巴根据地，留一部在鄂西发展游击战争。”11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中原局7日复电意见，你们不要轻易回渡襄河向东行动，必须克服困难，动员指战员坚决留在川鄂陕边广大山区创造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南路军决心继续西进，争取早日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合，在川鄂陕边建立根据地。

8月1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对南路军紧追不舍，不断袭扰。刘昌毅率一纵第三旅七团两个营，在房县西南之冠木河附近，选择险要山道两侧有利地形设伏，当国民党军四十七团一加强营进入伏击圈时，南路军设伏部队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该营仓皇失措，前临悬崖绝壁，后无退路，成了瓮中之鳖。此仗，国民党的这个加强营800余人除尾部跑掉少数人外，被一举歼灭；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15挺，美式冲锋枪13枝，步枪弹3万余发，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批。这次伏击战是南路军进入鄂西北地区以来的又一次胜仗。8月14日凌晨，第二旅四团一举攻占兴山县城。后来，第十五旅在谷城官山以东地区，歼国民党第八区专署保安大队，毙其100余人，俘其8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100余枝，电台1部，马4匹，子弹1万余发。南路军连战皆捷，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对于打开鄂西北地区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此，中央军委，中原局曾专门发电给予表彰并表示祝贺。

二、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师，鄂西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成立

1946年8月上旬，江汉军区部队在川东北经数次探进，仍未能入川后，即在两竹地区向川陕边开展游击。8月10日，江汉军区警卫团在竹溪城北之团山地区伏击国民党军，伤其20余人，俘其8人，缴获炮弹20余发，子弹1万发。8月11日，罗厚福、文敏生率江汉军区第二、第三团向房县九道梁、浦溪沟前进，盼望早日与南路军会合。8月13日，江汉军区警卫团进至竹溪西北30公里之铜钱关时，与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

十四旅第七十一团1个连遭遇，当即展开激战，将这个连大部歼灭，毙俘其70余人，缴获战防炮1门，轻机枪3挺，步枪20余枝，子弹6000余发，炮弹100余发。

8月17日，江汉军区部队根据当时无法入川的情况，决心在鄂西北创造根据地，作长期打算，并部署第一、第三、第四团分散，作为开展工作、发

展根据地的基础，留第二团、警卫团两

个团机动。第一团在兴山、宜昌地区分散，并建立中心县委，以王良为书记；第三团在两竹以南地区分散，并建立中心县委，以张谦光为书记；第四团（江汉支队）在荆当远及南漳以南地区分散，并建立中心县委，以黄民伟为书记；另建房县县委，以雷天明为书记。后来因部队奉命东返，争取早日与南路军会合，3个中心县委没有组建起来。

在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策应中原军区部队作战，向陇海路之开封至徐州段发起猛烈进攻，迫使国民党刘峙仓促调兵应战。8月18日，程潜奉蒋介石命令，调整编第七十五师即开信阳、广水间地区集结待命，第十六旅的“清剿”任务交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担任，而后开往宜昌待船运往武汉。8月22日，该师第六旅开往广水、信阳集结，第十六旅由歇马河等地出发，开往宜昌待船前往武汉。

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先后从中原战场调走9个旅的有利形势，及时电示中原局转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彻底分散，依靠民众，坚决创造根据地。”8月24日，中原局又电示一纵和江汉军区：“刘邓军南下，我整个中原部队压力减轻。鄂西敌七十五师已北调，仅只六十六师之一八五旅及川鄂陕边十四师（整编第十师）一个旅追堵你们。依此情况，你们能在当地生根立足，创造根据地。望鼓励全军，树立高度信心，完成中央委托之任务。”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增强了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鄂西北共同创建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

8月27日，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之上龛地区胜利会师。为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房县以西之狮子岩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树声、刘子久、刘昌毅、罗厚福、文敏生、吕振球等，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经中共中央9月1日批准，任命王树声为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为第一副司令员，罗厚福为第二副司令员，刘子久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政委，文敏生为第二副书记、第二副政委兼组织部长，张才干为参谋长，吕振球为政治部主任。以上成员和刘子厚均为区党委委员。

鄂西北区党委成立后，随即召开区党委第一次会议，研究确定了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并决定成立4个军分区。以竹山、竹溪、镇坪、平利、白河等地区为第一军分区（两竹分区），邹毕兆为司令员，张谦光为政治委员，下辖江汉军区警卫团及第三团；以兴山、房县、保康、宜昌等地区为第二军分区（兴房保宜分区），杨秀坤为司令员，刘健挺为政委，下辖第一纵队第二旅；以南漳、谷城、房县、保康北部及均县、郧县南部地区为第三军分区（武当分区），王海山为司令员，汤成功为政委，下辖第二纵队第十五旅及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以荆门、当阳、远安及襄南、襄北地区为第四军分区（荆当分区），李人林为司令员，刘子厚为政委，下辖江汉支队和江汉军区第一团两个营。另由第三旅第七团和江汉军区第二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军区机动部队，张秀龙为旅长，张力雄为政委。后来，军区还决定由一纵警卫连，江汉军区警卫连和一团二营组成鄂西北军区警卫团，负责军区机关的警卫任务。

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的成立，使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9月2日，鄂西北区党委给各分区发出指示，指出：“首先应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在目前情况下，我应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进行分

散的游击活动，适时休整和进行个别扩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待敌人被迫亦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清剿’之时，我再集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使我分散的小块根据地能打成一片，使游击状态的根据地能得到巩固。”还强调指出：“凡我军活动到的地区应迅速建立政权组织。为了迅速建立根据地，必须用大力培植地方武装，以便将来正规部队集中使用时，仍由地方武装在该地区坚持工作。”各分区部队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立即分散活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各分区部队分散活动和创建根据地，中共鄂西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委相继成立，由张谦光、刘健挺、汤成功、刘子厚兼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委书记。

9月上旬，为了开展两竹和房县地区的工作，第一地委决定成立两竹房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张谦光兼任书记，雷天明为县长；成立竹（山）南县委和民主政府，许明清任书记，张先浩为县长；成立房（县）西南工委和办事处，栗栖为书记，程敦秀为主任；成立竹（山）南工委和办事处，周克光为书记，刘明俊为主任；后来又成立了白（河）竹（溪）平（利）中心县委，鲁明健为书记；还成立了秦日工委和办事处，周志华为书记，吕鹏皋为主任。与此同时，第二地委决定成立兴（山）房（县）保（康）县委和民主政府，刘西为书记，袁美富为县长。后来，在南漳长坪又成立了南（漳）保（康）谷（城）宜（昌）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陈继东为书记，郭任为县长。第三地委决定成立均（县）郧（县）房（县）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王良兼任书记，胡恪恭为县长（中心县委撤消后，成立均、郧、房县委和政府，朱正传任书记，胡恪恭为县长；成立均（县）郧（县）县委和政府，彭学元任书记，王恢为县长）；成立郧（县）房（县）县委和政府，曾昌华任书记，刘浩为县长。后来在南漳的高峰麓又成立了谷（城）南（漳）襄（阳）县委和民主政府，刘仲和任书记，陈端为县长。

9月中旬，刘子厚、李人林、吴云鹏率领江汉军区部队一部和一批地方干部来到南漳荆山幸家坪，在此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在荆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宣布正式成立第四地委和第四军分区，李人林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刘子厚任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吴云鹏任副书记兼第四军分区副政委。会后，部队就地展开，在板桥、肖家堰、果贺坪一带活动。当部队进至果贺坪时，李人林奉命东返大洪山，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9月下旬，刘子厚率领一批地方干部、张才干率第二旅第四团，先后来到南漳巡检司地区，与黄民伟等领导的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会合。鉴于李人林已调离此地，鄂西北区党委决定，撤消江汉中心县委，由张才干、刘子厚、吴云鹏组成第四地委（亦称荆山地委），刘子厚仍任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张才干兼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吴云鹏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兼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吴调第五地委后由黄民伟接任第四地委组织部长兼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9月25日，第四地委在南漳县板桥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原县（工）委进行调整，组建两个中心县委：一是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由李秉范任书记，王展任副书记，下辖紫山、荆当、北山3个工委，分别由李云、李凌、刘建章任书记。二是荆（门）钟（祥）南（漳）宜（城）中心县委，由李蔺田任书记，张树林任副书记，下辖荆南宜、

板桥、南远 3 个工委，分别由廖学道、程少康、吴天成任书记。

与此同时，为了开展谷城、南漳、保康及南河两岸地区的工作，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将野战旅的江汉二团分散活动于谷城，南漳、保康地区，组成第五军分区和第五地委，由张秀龙任司令员，吴云鹏任地委书记兼政委。江汉二团为第五军分区武装，野战旅机关改为第五军分区机关，第三旅第七团归鄂西北军区直接指挥*。至此，野战旅即行撤消。第五地委成立后，原第三地委所辖之谷南襄县委，划归第五地委领导，由陈端任书记，蒲田任副书记。

10 月初，张才干在保康后坪区金斗乡东流水召开了第二旅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研究在保康、南漳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会上，张才干指示第五团团长江贤玉、副团长沈甸之各带 1 个连在保康、南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当地乡保武装，分化瓦解国民党乡保政权，建立游击根据地。会后，江贤玉带五连向保康以西的九道梁、白河口一带前进；沈甸之带七连向保康东南的黄化、永峰挺进，不久就建立了黄化乡、水峰乡民主自治政府和武工队，形成了以黄化，永峰为中心的南（漳）保（康）边游击根据地。由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后来又成立了南（漳）保（康）工委和县政府，由朱魁任书记（后江贤玉），孔晓春任县长，沈甸之任指挥长。

10 月 8 日，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鄂西北行政公署，刘子久任主任，刘子厚为副主任，张谦光、刘晋、王良、刘子厚、胥治中分别兼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专署专员。至此，鄂西北地区已建立了 5 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下辖两竹房、白竹平、南保谷宜、均郟房、荆钟南宜、荆当远 6 个中心县委和政府，以及 18 个县（工）委和 20 个县政府（办事处），100 多个区、乡政权组织，标志着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

*1946 年 9 月 18 日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刘昌毅、文敏生给中央并中原局的电报。式创立。

三、鄂西北军区部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

鄂西北军区成立后，各军分区部队积极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创建根据地，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慌。自 1946 年 9 月开始，国民党重新部署，调集两个整编师共 5 个正规旅的兵力，对鄂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分驻房县、保康一线，并控制范家垭、板桥、歇马河、马良坪、巡检司等要点；第一九九旅分布于均县、谷城、南漳一线，控制报信坡、刘猴集等要点；第十三旅分布于荆门、当阳、远安地区；整编第十师第十旅进驻竹山，其 1 个团驻竹山南、白河、两峪、水田畈等地，第八十三旅分驻竹山东北及房县以北，其第二一四团在房县城西，从而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妄图“围歼”鄂西北军区部队。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当即作了以下部署：令第一军分区江汉警卫团于竹山、竹溪地区；第三旅第七团于南漳、宜城地区；第二旅第四团于荆门、当阳地区，积极开展活动，分散国民党军兵力，配合内线部队，开展反“清剿”斗争。同时，各军分区还掌握了一至两个营的兵力，掩护县以下地方武装，以连为单位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分散开展游击战争，摧毁敌之反动政权，建立“赤色山头”、“赤色山沟”。

鄂西北军区调整部署后，各军分区部队立即行动，积极开展反“清剿”

斗争。9月19日，第三旅七团在刘昌毅率领下，翻越武当山，主动袭击均县老（河口）白（河）公路上的草店，歼灭国民党保安团1个中队1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100余枝，子弹1万余发，受到中央军委的传令嘉奖。后来，七团又攻打均县县城南关，迫使国民党守军100余人缴械投降，搞到了一批粮食、布匹、棉花和药品等，解决了部队过冬急需的部分物资。与此同时，第一军分区江汉警卫团在竹山东北之相公岭附近，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三旅二四八团30余人；第二旅四团在张才干率领下，向荆门、当阳、远安方向疾进，途中遭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阻击，四团且战且走，将其甩掉，来到南漳巡检司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集中主力“围剿”武当山区，四团趁机迅速分散游击，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接连取得胜利。

9月下旬，当国民党军发现第三旅七团是主力团后，即令第一八五旅紧追不舍，企图“全歼”。为了摆脱国民党军，争取主动，七团在老白公路以北地区三次翻越武当山，拖得国民党这个旅疲惫不堪。9月26日，七团和江汉二团一营在石花街地区马鞍山至黄山垭子一带，遭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五五三、五五四团从东西方向夹击。七团和江汉二团一营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设伏，给敌以重大杀伤，共毙伤国民党军15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步枪100余枝，子弹9000余发。

鄂西北军区部队不断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惊恐。从10月初开始，国民党纠集整编第六十六、第十师，配合整编第七十六师共6个旅、5个保安团的兵力，分头对鄂西北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清剿”。首先以整编第十师第十、第八十三旅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共9个团的兵力，以老白公路为依托，对第一军分区进行“合围”、“清剿”。国民党发动这次“清剿”的特点是：在军事上采取“棋盘战”、“穿梭战”、“分进合击”、“反复扫荡”等战术；在政治上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强化保甲制度，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等手段；在经济上到处设关卡、封锁交通，抢光粮食等，妄图把鄂西北军区部队饿死，困死在武当山区。在这种险恶形势下，鄂西北军区部队又展开了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10月中旬，第三旅第七团摆脱了国民党第一八五旅的紧追后，从武当山下来，越过老白公路，抵达襄河南岸的青山港一带。据侦察，国民党郧县保安团在此驻守，刘昌毅当即命令七团予以歼灭。一天夜晚，七团利用夜暗作掩护，突然将该保安团包围，连夜发起攻击。该团除团长带少数人逃窜外，大部分敌军缴械投降。此仗共歼保安团10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长短枪400余枝和大量弹药。特别重要的是获得一幅1/20万的鄂西北地图，解决了军区领导指挥作战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第二军分区第五团袭击了国民党兴山之平水河、保康之马桥乡公所，俘乡长以下6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枝；第四军分区第四团在南漳以南之东巩镇，歼国民党1个保安大队，共俘获100余人枪。10月下旬，第五军分区部队江汉二团在丁家营石花街以西地区，击毁国民党军满载弹药的汽车两辆，缴获炸弹10余箱；接着，又袭击了观音堂乡公所，俘其5人，缴枪5枝。

据7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鄂西北军区部队作战100余次，共毙伤国民党正规军1409人，俘其连长以下171人，毙伤国民党保安团队营长以下980人，俘其保安司令及营长以下726人，缴获山炮4门，轻重机枪46挺，长短枪1259枝，子弹2万余发，电台2部及其它物资，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其“清剿”计划又一次落空。

四、十五旅主力调离鄂西北。江汉军区一部东返大洪山，鄂豫边游击支队转战大江南北

早在 194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关于领导干部配备及组建军分区的电示中就指出：“惟陈先瑞及其所属陕南队伍，应首先至均（县）白（河）地区活动，相机开至陕南工作”。9 月 2 日，中原局电示鄂西北区党委，“建议派李人林率一团精干部队返回原地，收容整理部队，以桐柏、大洪两山为依托，坚持与发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

随着鄂西北斗争形势的发展，为调动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根据地内线的反“清剿”斗争，解决鄂西山大人稀、难以屯大兵的困难；同时，为了统一领导留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斗争的各支游击队，中原局于 9 月 6 日又电示鄂西北区党委，正式提出将第十五旅开到陕南，归还第二纵队建制，指出：“十五旅全部渡襄河进入陕南有利，但移动时仍必须留一定武装及干部维持原有工作，以后党委派部队到武当山，分别接替十五旅之任务，并重组分区机关。”9 月 8 日，中原局再次电示鄂西北区党委并报中央。指出：“鄂西山大，人烟稀少，冬衣不能解决，此地也很困难，倒不如将十五旅全部立即转移到陕南，一方面解决给养被服；一方面加强此间之力量”，“还可以返一部分力量渡襄河，东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重创大洪山新的局面，我们意见以李人林率电台一部和部队回去。”9 月 10 日，中共中央电复中原局并鄂西北区党委：“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决定将十五旅调离鄂西北，回陕南归第二纵队建制，并派李人林率江汉第一团 4 个连、1 个警卫排，1 个手枪队，带电台一部东渡襄河，重返大洪山，恢复和发展大洪山、桐柏山根据地，并视斗争形势发展，再建立一个地委和军分区，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各支游击队。

9 月中旬，王海山、陈先瑞率在鄂西北的十五旅主力第三、第六大队从武当山地区出发，北渡汉水，于下旬进入陕南，投入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第五军分区的工作。留下的第九大队由王鸿荣、曾昌华率领，在鄂西北坚持斗争，继续受鄂西北军区指挥。第十五旅奉命调陕南归第二纵队建制后，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的领导随即进行了调整，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

9 月 22 日，李人林率部从南漳以南的果贺坪出发，向东挺进，于 23 日抢占钟祥转斗湾渡口，歼灭国民党河防大队及乡公所 200 余人，然后在夜幕掩护下渡过襄河，攻占了丰乐河，接着又先后消灭了钟祥东北之张家集、客店坡，京山西南之周家畈等地之国民党乡公所及保安队共约 700 余人，进入大洪山地区。该部在京山北之已家冲与彭友德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张家集成立了中共京（山）钟（祥）随（县）县委和政府，由李冠群任书记兼军事指挥部政委，程敦秀为县长，彭友德为军事指挥长，并留下 1 个连为基干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京山西南之刘家集，又与坚持当地斗争的饶玉卿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共京（山）钟（祥）工委，由饶玉卿任书记，并留下一部分武装与游击队一起坚持大洪山的游击战争。

李人林率部东渡襄河，返回大洪山，重创根据地，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

极度惊慌。周岩一面从河南，湖北调集 14 个保安团和当地保安队，封锁险要路（渡）口，加强襄河防务；一面令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尾追该部进入钟祥地区；同时，将在鄂东地区之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调至大洪山、桐柏山地区防堵，企图将该部歼灭在大洪山、桐柏山地区。

10 月 8 日，李人林部转战至京山西南之多宝湾，冒充国民党保安第三大队前去“换防”，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取了多宝湾镇，全歼守敌一保安中队，俘敌镇长以下 200 余人枪。10 月 12 日凌晨，李人林部在天门石家河附近，遭国民党新十五旅一个团袭击。李指挥部队向北突围，继续北上。中午，在京（山）皂（市）公路之永兴镇附近，该部又遭国民党新十五旅另一个团堵击，在观音岩地区陷入重围。李人林一面命令部队阻击敌军，一面令郑怀远带 1 个连抢占高地，掩护部队突出重围，向京山北部转进。为隐蔽意图，缩小目标，该部改称“江汉游击支队”。

10 月 20 日，江汉游击支队经京山高井、安陆烟墩店，渡过府河到达寿山，再经应山转战到信阳南部的许家冲、赵家村附近，与宁淮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一部会合。而后向南行动，攻占随县澧潭镇，歼灭该镇保安队和乡公所武装。后来，该部又南下大洪山，转战随枣边，采用盘旋式的兜圈子战法，与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1 月上旬，江汉游击支队一举攻占桐柏重镇平氏，活捉民团副团长，歼其 100 余人。11 月 12 日，该部转战到随县北祝林店和新城附近时，先后与张波、牛德胜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另一部会合。从此，该部在大洪山、桐柏山区，采用兜大圈子与套小圈子相结合的战术，展开了新的斗争。

江汉游击支队与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会合后，向随（县）枣（阳）北部挺进，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鹿头镇、新市、新城、大河口等地的乡、保公所武装。11 月 18 日。当该部进至随县北约 54 公里的青苔镇时，遇国民党乡公所及保安队踞碉堡顽抗。该部采用火攻，歼灭国民党乡长以下 50 余人，缴获各种枪 30 余枝。

11 月下旬，为了统一领导与指挥，鄂西北区党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改称为“鄂豫边游击支队”，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后根据中原局指示，只能成立地委或工委，结果地委未组建，成立了鄂豫边区工委。由李人林任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钟春林任参谋长。支队下辖两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郑怀远，政委张波；第二大队大队长牛德胜（后李冠群），政委陈鲁炎（后牛德胜）。支队部设 6 个科，宁淮任作战科科长。

鄂豫边游击支队成立后，国民党军立即在随枣边组织“合围”，企图消灭这支部队。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由东向西，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由大洪山北调，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团向南防堵，湖北省保安第五、第十八大队紧密配合，企图一举“围歼”鄂豫边游击支队于随枣地区。为避开强敌，该部决定南下大洪山，同国民党军转大圈子，很快将第一九九旅吸引过来，新十五旅亦从京山、天门等地向北合围；该部又沿大洪山西麓北上。12 月 9 日，当部队进至枣阳耿家集时，与国民党乡公所武装遭遇，当即展开激战，共毙伤俘其近 100 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手枪 4 枝，步枪 30 余枝。次日，该部在枣阳西南据家湾曹家冲，又与尾追之第一九九旅第五九六团第三营展开激战，毙伤俘其营长以下 100 余人，缴获机枪 5 挺，步枪 120 余枝，子弹 2 万余发。后来，他们又越过襄（樊）花（园）公路，奇袭枣阳太平镇，俘获该镇乡公所全部人枪。

12月下旬，国民党以枣阳为中心，再次部署对鄂豫边游击支队的“合围”。第一九九旅全力从西南，新十五旅和湖北保安第五、第十八大队从东南，河南保安第一、第二团从北，分头向枣北合击，企图将鄂豫边游击支队“围歼”于枣北地区。12月20日黄昏，当该部进抵随县西北的新城附近时，与国民党随县第一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遭遇，该中队一触即溃，据险固守待援。次日，进至桃园村附近时，获悉国民党随县第二保安大队大队长曹玉靖率第五、第六中队星夜由泼潭赶到新城，会合第二中队“堵剿”。李人林决定利用桃园村附近的有利地形设伏，激战半小时，活捉曹玉靖，毙俘其250余人，并缴获机（步）枪200余（挺）枝，子弹2万余发。

桃园伏击战后，鄂豫边游击支队向豫南前进，越过桐柏山主峰，转至河南桐柏、泌阳县一带打游击。当进至天幕山地区时，遭国民党军新十五旅和信阳独立团。泌阳保安队包围。经激战，该部于12月27日跳出重围，折向西进。12月31日晚，当进至枣阳西北之杨垱时，又遭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袭击，经激战，分散突出重围，经太平、新市地区，向随北转进。1947年1月上旬，该部在随县西北之吴山店将国民党乡公所武装全歼，继而先向北进抵信阳南部大庙畝一带，后向南急进。1月16日，当部队进抵京山黑冲地区时，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工兵营和京山县保安中队前来追击。该部利用黑冲有利地形进行伏击，经激战，毙伤敌100余人，缴获轻视枪7挺，步枪30余枝。1月17

日，该部越过京（山）、钟（祥）公路，向南疾进，途中在下洋港附近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打过长江去，在江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会后，鄂豫边游击支队继续向南挺进，于1月19日拂晓抵达襄河北岸泗港渡口，在当地船民的支援下，顺利渡过襄河，直逼长江北岸。1月22日，正值春节，该部化装成国民党军奇袭江陵县郝穴镇，歼灭该镇保安中队等170余人，巧妙地渡过了天堑长江。

鄂豫边游击支队南渡长江后，先后摧毁了国民党公安县之沙厂、周家场、甘家场等乡公所，击溃公安县一保安大队的阻击，于1月24日进入湖南澧县张家厂镇。而后实行远距离奔袭，向湘鄂西挺进，于1月27日一举攻占湖南石门之暖水街，毙伤俘国民党一联防中队近100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8枝。部队在暖水街休整两天，支队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部队改称为“江南游击支队”。1月30日，该部经石门子良坪、太平街，进入湖北五峰县之清水湾，向武陵山区挺进，从而开始了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五、反“清剿”斗争失利，鄂西北军区主力南撤

1946年11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西北地区的“清剿”仍然十分严重。月初，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竹山、竹溪和南河地区，向兴山、秭归方向转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集中主力第十三、第一八五旅并指挥第十旅第二十八团，向武当山第三、第五军分区发动进攻，猖狂地由西北及北面向东南及南面压缩，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围歼”在长江、汉水之三角地带。面临这严峻的局势，鄂西北军区部队的反“清剿”斗争更加艰苦。

国民党军“清剿”的重点，首先是寻找并对准第三旅第七团，叫嚷什么“活捉刘昌毅，消灭第七团。”11月上旬，七团在均县万家坪附近，与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第五五四团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敌连续4次进攻，均被英勇的七团指战员击溃，丢下数十具尸体。11月中旬，七团和第三

军分区第九大队再次转向老白公路以北、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第十旅严密封锁老白公路各要点，在均县的娘娘山、园林山一带，对七团和九大队进行包围合击。激战竟日，七团和九大队冲出包围圈，转移到郟阳十堰镇以北茅坪地区。11月下旬，国民党军又调集第一八五旅、第十旅和第十三旅将七团和九大队包围在茅坪的马蹄山上，七团和九大队一天击退敌6次进攻，给其以重大杀伤。后由于弹药殆尽，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营教导员赵良一壮烈牺牲，九大队一连大部牺牲。此仗，毙伤国民党军140余人，俘其营长以下50余人，缴获步枪30枝，子弹49箱。傍晚，七团和九大队毅然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大胆地从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和第十师的结合部冲杀出来，出其不意地插到襄河边，转到黄龙滩，穿过老白公路，回到武当山区。当七团转移到襄河边玉皇庙一带时，国民党军又尾追而至，七团处于背水一战的困境。敌军多次发起攻击，均被七团击溃。直到天黑时，七团才撤出阵地，沿襄河边转移。

与此同时，张才干率第四军分区第四团在南漳之东巩、巡检司一带打击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队，接连取得胜利，先后歼灭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150余人，及地方保安团队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数百枝、子弹七八万发。第一军分区部队在兴山、秭归交界地区，反复与敌周旋，顽强坚持斗争，于11月上旬攻占兴山县城。11月22日晚，该部主动袭击国民党平水河乡公所，俘乡长以下40余人，缴获步枪42枝。11月25日，在秦良附近，又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三旅第二四八团一部，击毙排长以下13人，俘副连长以下27人，缴获轻机枪3挺，冲锋枪4枝，步枪20枝。第二军分区部队也在保康西南袭击了国民党欧家店、马桥乡公所，俘乡长以下25人。

12月初，由于敌情严重，继第一军分区撤出两竹地区之后，第三、第五军分区相继撤出武当山和南河地区，军区领导机关、警卫团和七团亦随之向南转移。12月上旬，军区机关，警卫团和七团1000余人，在王树声、刘子久、刘昌毅和张力雄率领下，向南疾进。当部队行至保康西南的前后坪，麻园河，翻过凤凰山、下到车峰沟一带时，埋伏在周围山头之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了前后道路。当时，军区警卫团走在前面，进入其伏击圈，军区领导机关居中，七团担任后卫，部队被包围在一条狭小的山沟里，形势万分危急。军区领导当即命令七团和警卫团边打边撤，掩护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攀登上山，突出重围。激战半日，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安全脱险，七团和警卫团边打边向山头攀登。由于坡陡，重武器无法带走，只好忍痛砸坏丢在沟内，马匹无法上山，也丢下了。直至夜暗，才冲出重围，向保康千家老林一带前进。这一仗，七团伤亡、失散100余人，后将3个营的建制缩编为两个营。

12月中旬，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继续向东南压缩，整编第十师第十旅移住房县，亦向东逼，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压到长江、襄河之三角地带，囚于极端不利的困境，然后“聚而歼之”。在这极端严峻的形势下，鄂西北军区根据敌主力南压，西北后方空虚的情况，决定采取敌进我进，分散突围之方针，当即部署：邹毕兆、张谦光率第一军分区部队向竹山、竹溪挺进，恢复两竹地区的工作；汪乃贵、王良、周凯率第三军分区部队，坚持开展武当山地区的工作；张秀龙、吴昌炽率江汉第二团主力，过南河去开展石房大路与老白公路两侧地区的工作；第二、第四军分区主要是坚持与扩大本地区的工作；三旅七团稍加休整后，开往第三军分区地区活动，并向西发展。

12月下旬，随着严冬季节的到来，鄂西北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指战员们身穿单衣，赤脚行军；山大人稀，地瘠民穷，只好以野菜充饥，雪水解渴；敌军到处“追剿”、部队不能进村，夜晚只好卧冰枕雪，露宿在荒山野林。不少干部战士冻饿成疾，由于缺医少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几个主力团，因半年连续苦战，非战斗减员情况严重。入冬以来，不少优秀干部在反“清剿”斗争中壮烈牺牲。江汉支队副支队长孙宗林、江汉军区第三团政委吴士芳、第五地委书记吴云鹏、竹南县委书记许明清、均郟房县委书记朱正传、荆当远中心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李尧阶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12月30日，中原局面对该区极端严峻的形势，及时电示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指出：“你们的处境的确艰苦，但在内战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下，鄂西游击根据地应坚决坚持，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为保存力量，仍然要彻底分散，这一地区打敌不胜，则灵活机动隐蔽的到那一地区去躲。其战术原则，在我疲兵的情况下，不轻易投入战斗，不打则已，一打多少要能取得胜利，如此才能巩固内部。”

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决定，各军分区以1/3的兵力掩护地方工作，坚持基地，转小圈子；集中2/3的兵力游击，坚决打击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分散之正规军，转大圈子。

鄂西北军区部队，根据中原局和鄂西北区党委的指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与敌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罗厚福率第一军分区部队江汉警卫团在摩天岭阻击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1个营，共毙伤该营120余人，缴获步枪25枝，冲锋枪2枝，子弹1000余发。接着，又在龙王岭歼国民党军1个连，毙伤俘其9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枝，轻机枪3挺，子弹2000余发，手榴弹100枚。第四军分区第四团在远安陈家咀地区歼国民党远安县保安大队大部，俘敌80余人，缴获步枪80余枝，子弹3万余发；接着，在远安东北之横店子地区，又歼国民党新十五旅第四十五团1个营，毙伤俘其30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枝，重机枪10余挺，六炮3门，子弹6万余发。后来，该团又在巡检司南范家泸子与国民党军新十五旅四十五团三营和宜昌保安第十六大队遭遇，歼其一部，俘连长以下6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步枪50余枝，子弹1.5万发。七团分两路行动，团长阙子清率领团直和一营返回武当山区打游击；政委何德庆率领三营在南漳、保康一带机动作战。

1947年1月上旬，当阙子清带领的七团一营到达均房谷交界的乌牛观一带时，被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五五三团包围。该团居高临下，用各种火力把七团一营压在虎头岩下的山沟里。七团一营与敌激战竟日，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部分人员被打散，有的被俘。

同一时期，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远安以北、南漳以西、保康以南的千家老林一带；在距茨苑扩1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区党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会议主要研究了保存实力和坚持鄂西北斗争的问题。会上，对部队集中还是分散问题争论激烈，最后决定将部队适当集中，组成3个支队，分别向北、西、东3个方向行动。后来因形势逼迫，部队还是分散突围。会议期间，闻悉七团在乌牛观一带遭国民党军袭击、部队被打散的消息，经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刘昌毅带领精干部队到北边去收拢被打散的部队。会议第二天，刘昌毅、胥治中即带领军区警卫团两个连和1个侦察队向北挺进，不久与何德庆带领的3个连会合，后来又会合了张力雄、

张秀龙、汪乃贵等带领的第三、第五军分区的和江汉部队各一部共 1000 余人，转战到保康城南康家山一带。

2 月上旬，国民党察知鄂西北军区这支 1000 余人的部队的行踪后，便扩大包围圈，集中兵力堵截。6 日，整编第六十六师集中主力第一八五、第十三旅共 4 个团 1 个营的兵力，将该部围困在保康以南方圆 30 公里的康家山上。这里地势险要，沟深坡陡，当时正下大雪，敌以 1 个加强连扼守江家山顶，居高临下，并依仗其优势兵力，围而不攻，逼该部投降。张秀龙带领江汉二团 1 个营和侦察队，趁敌尚未合拢之机，先行突围。其他部队刚从两山之间沟底通过，准备占据制高点时，被敌拦腰切断，形势异常危急。刘昌毅一面指挥部分兵力在正面迷惑敌人，一面命令七团三营七连从侧翼迂回，攻占制高点。七连在王挺基连长带领下，利用晨雾攀上峭崖，用仅有的 5 枚手榴弹和 5 挺轻机枪，一举全歼国民党军扼守在江家山顶的加强连，并缴获其通讯联络信号。先头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并利用其联络信号，以假乱真，边走边打，直到傍晚才冲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千家老林挺进。张力雄等率一部在小山头上战斗一整天，击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想方设法寻找突围路线。幸好在突围途中遇见山上拣木耳的母子俩，向她俩讲明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后，妈妈即叫儿子带路，从半山坡穿过一条崎岖羊肠小道，摸黑走了一整夜，才从敌夹缝中突出包围圈。鄂西北军区这支 1000 余人的部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有七八百人胜利突出重围。然而，该部亦付出较大代价，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与上级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原江汉二团政委陈继东被俘后英勇牺牲。

由于鄂西北地区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后南撤到荆当远地区，与第四军分区会合。

六、老观窝紧急会议，主力转至外线作战

鄂西北军区主力南撤后，部队因半年多连续苦战，减员甚多，国民党军的“清剿”更加严重。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留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二是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主力转至外线作战，转大圈子。

早在 1946 年 12 月 11 日，中原局就曾电示王树声、刘子久：如鄂西北地区过小，而部队过大，可多抽一部兵力去陕南，或选择有利时机，派兵一部渡江，去湘鄂西地区开辟江南的游击战场。12 月 31 日，中原局又电示鄂西北区党委：为了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请你们考虑，可否分一部分队伍和干部（每次一二百人），秘密地渡过襄河以东，回到鄂中及豫南地区活动；留一部在鄂西北分散坚持。中原局两次电示，为鄂西北军区指明了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方向。同时，李人林部东渡襄河，转战大江南北，打大圈子，又为军区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47 年 2 月 4 日，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汪氏祠（今茅坪场区老观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张才千、刘子厚等。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鄂西北地区的形势，一致认为，自中原军区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突围到鄂西北以来，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牵制了大量敌人不能北调，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根据鄂西北地区山大人稀、地瘠民穷、大部队难以生存等情况。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继续牵制敌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决定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斗争外，鄂西北军

区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敌人打大圈子。会议还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报请中央同意后，化装转移去华北解放区。

鄂西北区党委的决定和部署，报请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后，立即开始行动。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即起程，在荆门北山地下党的护送下，经汉口、驻马店、安阳，安全转移到华北解放区，王树声则暂缓几天，待有关布置就绪后，再化装转移。

老观窝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鄂西北根据地日益缩小、反“清剿”斗争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对于鄂西北军区部队摆脱困境，扭转战局，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援全国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并为准备战略反攻中原创造成有利条件，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节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南渡长江， 另一部东进受挫

一、奇袭古老背，巧渡长江

老观窝紧急会议后，鄂西北军区将转移到荆当远地区的军区警卫团、江汉部队各一部，以及中共荆当远、荆钟南宜中心县委的武装，分别编入第四团和第五团。四团领导不变，五团改由杨洪先任团长，舒烈光任政委。并决定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干率领四团、五团南渡长江，与李人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会合，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

1947年2月8日，张才干致电李人林，询问江南情况和渡江地点。李即复电：“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2月9日，张才干电令杨秀坤、刘健挺率五团向四团靠拢，并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涪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之古老背镇渡江，到江南会合。后来，五团因部队疲劳，稍事休息，未能兼程赶到，错过渡江机会，于2月中旬在钟祥以南的石牌渡过襄河，向东挺进。

2月12日，王树声、张才干同四团领导王定烈、杨劲等在老观窝研究决定，王树声立即动身化装转移，张才干即率部南渡长江。次日凌晨，王树声经中共中央批准，即由王展、章惠民等护送至北山，隐蔽20多天后，由地下党安琳生（现名余秉襄）负责护送，化装转移至苏北解放区。临行前，他还派地下交通给刘昌毅送去一封信，通报有关情况。

2月13日傍晚，张才干率四团、军区警卫团一部共1200余人，向南挺进。为摆脱敌人，先向东佯动，造成欲突过襄（樊）、沙（市）公路向襄河以东游击态势。当行进至当阳以北之观音寺附近时，突然改变行军方向，挥师西南，昼夜兼程70公里，甩掉尾追之敌，抵达当阳西南之龙泉铺，在鸦雀岭以东冲过汉（口）宜（昌）公路，于2月14日黄昏抵达长江渡口古老背（今獠亭）镇。据了解，该镇无国民党正规军，只有镇公所二三十人枪，且毫无战斗准备。该部侦察队乔装成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便衣队”，大摇大摆地闯进镇公所，一枪未发就解除了镇公所全部武装。该镇镇长唯命是从，立即备船数十只，仅用了两个小时，千余人的英雄劲旅便浩浩荡荡地胜利渡过天堑长江。

张才干率部渡过长江后，抵达江南之红花套，连夜从鄢家沱渡过清江，于2月15日凌晨宿营于南岸坪。2月20日，进至长阳白果坪区下洞坪之左阁寺时，遭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九大队堵截。敌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凭借险隘阻击。张才干率部以第九中队正面佯攻，第四、第五中队从右翼迂回到敌人屁股后面，前后夹击，攻上制高点，毙伤俘其10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枝，该保安大队大队长邱士贵（又称邱老虎）带10余名残兵狼狈逃窜，跌下悬崖受重伤。此战是张才干部进入江南以来的首次胜仗，给国民党以极大震动。2月21日傍晚，该部在五峰县湾潭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第九十八团遭遇。战斗打响后，向西采花台、茶坵一带转移，当晚在茶坵宿营，并进行休整。次日，敌尾追而来，该部当即派出4个中队选好伏击阵地，给国民党军前卫营以狠狠打击，毙俘其40余人。战斗结束后，该部向红渔坪方向前进。

二、红渔坪会师，江南游击纵队成立

张才干率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南渡长江后，立即通过电台联系先期过江的李人林部。1947年2月15日，孤军转战至湘鄂西的江南游击支队抵达鹤

峰县西南地区时，得知张才干已率部渡过长江的喜讯，全体指战员欣喜若狂，李人林决定立即向东靠拢，迎接兄弟部队。张才干部在茶坵休整时，与李人林部电台联系，确定会合地点在五峰县红渔坪，立即沿山间崎岖小道向红渔坪挺进。

2月23日，张才干率部攀登12.5公里的高山，先期到达红渔坪；24日与李人林所率的江南游击支队胜利会师。红渔坪。地势险峻，群山环绕，绝壁矗立，长约1.5公里，宽约0.5公里，住有100多户人家，进出只有东西两条小道，原为红二方面军后方医院所在地，群众基础好。两支部队会师后，指战员们欢欣鼓舞，热泪盈眶，山区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张才干、李人林决定利用此天然屏障和有利条件，对部队进行休整。经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批准，两支部队会合后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并成立党委，由张才干（化名张健）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下辖两个支队：江南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由钟春林任支队长，郑怀远任副支队长，宁淮任参谋长，张波任政治处主任；第四团改编为第四支队，由王定烈任支队长，杨劲任政委，刘绍堂任副支队长，常志义任参谋长，李心清任政治处主任。全纵队共1600余人。

江南游击纵队成立后，纵队党委随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下步行动。一致认为，湘鄂西是贺龙曾经活动过的苏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掀起过强大的革命风暴，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据传，在湘鄂边还有两支“民变”武装，经常与国民党军作战，一支的首领是彭春荣（又称“彭叫驴子”）；另一支的首领是瞿伯阶，活动在永顺和龙山地区。如能联系上，则可壮大湘鄂西的反蒋力量，对开展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有利。会上还分析了敌情：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第一九九旅各一部已尾追而来；原守备在武昌、岳阳一线之整编第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已由津市、石门西进扑来；原部署在湘鄂川黔边之整编第五十六师第一六三、第一六四旅和新十七旅正由西南向北进逼；还有国民党湘鄂两省保安团队配合正规军，形成合围之势。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会议确定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有利则打，不利则走”的作战方针，并决定兵分两路，在湘鄂川黔边继续转大圈子，同时寻找彭、瞿两部“民变”武装，相机歼敌。

三、兵分两路，转战湘鄂川黔边

1947年3月6日，江南游击纵队分两路向湘西龙山、永顺、桑植、大庸地区前进。李人林率第一支队，先向西南，经湖北宣恩、咸丰、来凤县境，越湘鄂边界，进入湖南的龙山南部，向永顺方向前进；张才干率纵队机关和第四支队，经湖北建始、恩施、宣恩、来凤县境，进入湖南的龙山北部，转战桑植、大庸、永顺地区。两支部队，犹如双龙夺珠，交相穿插，互为策应。沿途击溃国民党军多次堵击，消灭了30多个国民党区、乡公所及其武装。同时，探听彭、瞿两支“民变”武装的下落。

3月10日，李人林率第一支队到达龙山洗车河以南30里的塔家洞，当即电告张才干，建议两路部队在永顺东南会合后，集中向东南行动，路线可走澧水以南、沅水以北，然后再向北行动，到石门、慈利、五峰、长阳、松滋、枝江、宜都、公安等地活动。3月11日，张才干率第四支队摆脱国民党整编第五十六师第一六三、第一六四旅4个团和湖北两个保安大队的堵击后，转战到达龙山、桑植、永顺地区，沿途继续寻找彭、瞿二部。经再三探

听，得知彭春荣部早已溃散与瞿伯阶部合股，潜入贵州深山，无法继续寻找。因此，部队继续向东南挺进。

江南游击纵队在湘鄂川黔边沿途一面宣传群众，一面寻机歼敌，不断扩大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以标语、传单和群众

集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策与主张，充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反动罪行，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当地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经过宣传，群众见这支部

队纪律严明，便纷纷主动接近，并积极当向导，送情报，慰问伤病员。

第四支队有一位女宣传干事梁桂华，是抗战胜利前夕，由

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后方输送到中原解放区参军的大学生之一，她

从中原突围到坚持鄂西北斗争，直至挺进江南，走到哪里就把大标语写到哪里，不知疲倦地战斗在宣传工作的第一线，深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四、挥师东进，大堰垱、磨岗隘战斗

1947年3月25日，江南游击纵队第一、第四支队在湖南沅陵县沅水以北之大窝坪再次会合。时值3月下旬，江南天气逐渐转暖，春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过江后因不停地走，体力减弱，伤病员逐渐增多，指战员衣服破烂不堪，既无单衣和雨具，又无钱买粮，经费和服装已成为当时部队的主要困难，根据这种情况，纵队党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挥师东进，直逼津市、澧县，威胁湘西重镇常德，到比较富庶的洞庭湖滨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衣食困难。部队会合后休整两天，张才干向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主动撤出延安的指示，分析全

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进一步阐明了纵队的任务。李人林号召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定胜利信心，积极行动，捕捉战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经过形势教育，部队倍受鼓舞，于3月27日

出发，先向东，再转北，经慈利的溪口、江垭、九溪，象耳桥、庄塌，到石门的磨岗隘，进入澧县境内，向湘西重镇常德方向挺进。

4月上旬，江南游击纵队胜利渡过澧水、澧水，于5日到达澧县西北之王家厂，直扑大堰垱。4月6日，正当部队在镇上宣传形势，按合理负担向商贾筹款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三旅第九十八团1个营向大堰垱发动袭击。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在郑怀远指挥下，与该营展开激战，将其击溃；第二大队趁机迂回敌后，予以夹击，给其以重大杀伤。此仗，共毙伤该营营长以下官兵60余人，俘其副连长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六炮3门，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80余枝，子弹2万余发。与此同时，前来增援之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团一部，亦被第四支队击溃。

大堰垱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第三十三旅第九十九团始终跟踪尾追江南游击纵队，但一直保持20余公里的距离，追而不击。江南游击纵队曾两次设伏，诱敌深入，均未奏效。另据情报，该旅九十八、九十九团（欠一营）、湖北省保安第八、第九两个大队和湖南省保安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九4个大队，由湖南军管区司令王育玖统一指挥，正“围攻”扑来。江南游击纵队采取转大圈子的战术，先向北进入湖北松滋县境，再向西到宜都、长阳、五峰山地、丘陵地带游击，继而折向南至湖南石门县境，弄得敌人晕头转向，4月中旬，当该部第二次进抵湖南石门县月亮坪时，附近的磨岗隘镇已被国

国民党军先期占领。湖南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两个大队 800 余人，正从石门县城赶来配合九十九团堵截。江南游击纵队党委研究决定，集中全部兵力，歼灭国民党湖南保警总队，当即选择有利地形设伏。等了一天，敌人仍在磨岗隘地区停止不前，纵队党委决定主动袭击。4 月 20 日凌晨，江南游击纵队沿渫水而下，迅速接近磨岗隘地区，采取攻其不备、猛打猛冲、速战速决战术，由第四支队担任主攻，第一支队一大队担任警戒，二大队负责阻击。上午 8 时，战斗打响，第四支队在火力掩护下，直冲山冈，将守军切成两段，敌阵势顿时混乱，纷纷逃窜，缴械投降。王育瑛率数十人乘小船渡渫水溃逃。经 3 个小时激战，歼灭该总队两个大队，共毙伤俘其 8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25 挺，长短枪 210 枝，手榴弹 512 枚，子弹 10 万余发及大量军用物资。当天下午，纵队在磨岗隘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策主张，并开仓济贫，深受群众欢迎。所俘人员经教育释放，当场有近 500 人自愿参加江南游击纵队。这是继大堰埡战斗大捷后的又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大堰埡、磨岗隘两次战斗大捷，粉碎了江南国民党军最大的一次“堵防”、“清剿”计划。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惊呼江南游击纵队是“南朝天下的疙瘩！”湘鄂川三省当局和武汉行辕急忙调兵遣将，令第三十二旅跟踪尾追。江南游击纵队向湖北五峰方向转移。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江南游击纵队应是一支武装宣传队”的指示，该部除打仗外，还注意宣传群众，扩大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纵队根据党的斗争方针、政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卖国，争取独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二是否认国民党与美国间出卖中国主权之一切卖国条约，支援江南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三是废除国民党政府扰民害民的兵伕粮款及一切苛捐杂税，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四是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使主佃双方都有饭吃；保护私人企业的正当盈利，提高工人生活待遇，使劳资双方都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五是实行公买公卖，发展贸易自由；税收则采取轻税政策，使商人有钱可赚。六是保护学校及一切教育事业，提高教职员待遇，使学生有书读和研究学术自由。七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一切宗教团体与会门组织之特殊教仪与习惯，并保护公益与救济事业之活动。八是除少数卖国贼及汉奸分子外，保障各阶层人民之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并一致团结起来，实行地方自治，建立江南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九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地方政府与各种武装，本军均愿与之合作。十是凡在战斗中放下武器者，不论官兵，本军决不伤害，并予优待。

江南游击纵队每到一地，就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十大纲领》，起了很好的作用。纵队党委还要求部队严明纪律，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策主张。广大指战员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粮打惜条，吃菜留下菜金，借物归还原处，损物给予赔偿，并实行开仓济贫，拯救饥饿的人民群众。由于江南游击纵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赢得了江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在敌情严重和物资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江南人民慷慨解囊募捐、送粮食和布匹，冒着生命危险带路、送情报，短短时间就募捐现洋 1 万元，全纵队每人一套单衣，一把雨伞。江南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相助，是该部得以生存并接连打

胜仗的重要原因。

江南游击纵队在江南近3个月的斗争中，转战湘鄂川黔边20多个县，行程约1750公里，共作战10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它不仅牵制了国民党4个正规旅和6个保安大队的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的作战，而且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

五、主力一部东进，七里坪受挫

张才千率鄂西北军区第四团和军区警卫团一部南渡长江后，杨秀坤、刘健挺率鄂西北军区第五团和江汉部队一部共800余人，于1947年2月中旬东渡襄河，沿长江向东挺进。原计划在沙市北面过江，后了解到国民党沿江防守甚严，无法渡江，该部

即调转方向，向北直插大洪山、桐柏山区，准备经伏牛山、淅池、新安一带，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后因敌沿途堵击，杨、刘部即转向东，准备由信阳插到周口，再转到豫皖苏解放区。当部队进至信阳南部白庙子附近的一座大山上时，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国民党军顺山脊连续冲杀，反复争夺主阵地，杨秀坤、刘健挺指挥五团英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从上午

一直鏖战到黄昏，毙伤国民党军数十人，然而五团亦伤亡100余人，团政委舒烈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五团在白庙子战斗受挫后，旋即转战到平汉铁路，沿淮河向东挺进。3月下旬，在安徽金家寨附近，又与敌遭遇。经过浴血奋战，五团终因敌众我寡而溃散，被迫顺原路返回。4月上旬，当部队到达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以北郭家河附近一条狭长山谷时，又遭国民党光山县保安团伏击。该团以密集的火力将狭谷封锁，并向五团蜂拥冲来。杨秀坤带病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战斗，与敌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这次战斗，五团损失惨重，伤亡300余人，被打散100多人，电台遗失，杨秀坤与刘健挺亦失去了联络。战后，杨秀坤收拢失散的部队，乘隙向东转移。当该部抵达立煌县北面的西渡山准备过淮河时，敌人闻讯赶来，结果部队又被打散。至4月中下旬，该部只剩下二三十人。由于电台遗失，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杨秀坤、刘斌、张树林、漆汉臣等，在麻城杨高山召开紧急会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散转移，能走的化装走，不能走的就地隐蔽，等主力部队来后再归队。会后，刘斌、张树林和漆汉臣回到洪湖老家打游击。杨秀坤只身赴武汉，在地下党交通员萧凯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经南京、上海，抵达山东解放区，后分配到太岳军区工作。

刘健挺在七里坪以北郭家河地区遭敌伏击后，带领30余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艰难跋涉，向东进入皖西地区。经立煌县进至霍山县文家店，决定分散转移，并伺机寻找部队。后来，刘健挺返回老家霍山县夏铺桥镇，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第五节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回师大别山

一、东渡襄河。驰骋皖西

1947年2月中旬，康家山战斗结束后，刘昌毅等迅速收拢部队，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从保康千家老林出发，经保康的堰湾、大平和南漳的长坪、板桥，转移到荆门、当阳、远安的结合部山区，继续同敌人周旋。由于这一地区物产比较丰富，筹集粮食和物资较为容易，部队生活得到改善，加之气候逐渐变暖，指战员的体质有所好转。但是，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仍集中兵力紧追不舍，部队经常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中。

2月下旬，刘昌毅收到了王树声在临行前派地下交通送给他的一封信。王树声在信中传达了老观窝紧急会议的精神，并告之，经中央批准，我和刘子久等人即日化装北返，张才干已率四团和军区警卫团一部南渡长江找李人林部，今后你同党中央直接联系。现在敌人集中全力对付你，日后如何行动，由你自定。根据王树声信中所说的精神，刘昌毅和张秀龙、张力雄、汪乃贵、胥治中、胡鹏飞等旅领导，于3月中旬召开了紧急会议，对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今后行动方向作了研究。一致认为：大别山是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较好，目前是国民党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为摆脱四面围追堵截之敌，会议决定：再渡襄河，回师大别山。为便于指挥，将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各辖3个连）、1个干部队和1个侦察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胡鹏飞，政委何德庆，由第七团3个连组成；第二大队大队长孔令甫，政委梁诚，由江汉部队和军区警卫团等单位组成；干部队由郭任、石磊负责；侦察队由孟文彬、余曙光负责。

襄河是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军企图借此阻止鄂西北军区部队东渡，因而加强了对襄河两岸的防守，控制了沿河大小船只。4月中旬，刘昌毅率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从当阳东北之周家畷出发，以一昼夜9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于17日晚抵达钟祥县石碑镇附近的襄河边渡口。当时河边一只船也没有，侦察连找来了一位老渔翁，这位老人的独子不久前因送杨秀坤部第五团过河时被国民党杀害。当他听说渡河的部队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时，立即用他隐藏的一只小木划子，载着两名作战勇敢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趁夜幕划向对岸，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地弄到1条船。部队很快渡过1个连，将对岸国民党1个保安中队全部缴械，并夺来6条大船，赶在敌追兵到来之前，将集结于西岸的部队全部安全渡过襄河。

部队过河后，在敌人前堵后追的险恶形势下，刘昌毅等指挥部队边走边打，冲破敌多次堵击，经京山、随县、安陆、应山等地，向大别山挺进。经三四天行军作战，部队在武胜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当进至大悟河时，遭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十团在对岸占据山头疯狂阻击。刘昌毅当即命令第一大队迅猛冲过去，攻占山头，掩护部队前进。第一大队冒着敌人火力冲过大悟河，向其所占高地发起猛攻，敌人仓皇溃逃。该部顺利渡过大悟河，向东疾进。当进抵黄安县七里坪以北郭家河地区时，遇到了第五团被打散的部分人员，当即收容归队。

4月底，刘昌毅等率部转战到安徽立煌县南的吊桥崖地区，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十团又紧追不舍。这里群山环绕，一条溪流横贯狭窄山谷。刘昌毅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设伏。具体部署是：以弹药较多的两个警卫连为火力队，第一大队为突击队，第二大队在山右侧准备石块圆木，侦察队对该

地区实施封锁。午后，当湖北保安第十团进入伏击圈时，一阵猛烈的枪弹、手榴弹和无数石块圆木突然倾泻而下，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第一大队指战员，如猛虎下山，扑向敌阵，不到1个小时，仅以轻伤1名战士的代价大获全胜。此仗，歼灭该保安团两个营，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3挺，各种枪支250枝，子弹数万发、美式电台一部和大批军用物资。由于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补充，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向着开辟皖西根据地的征途进军。几天后，部队行至安徽霍山县漫水河、岳西大岗岭一带时，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十团1个营及英山县保安自卫中队再次尾追而来。刘昌毅命令第一、第二大队摆成“口袋阵”，待敌进入伏击圈时，两路部队迅猛夹击，仅20分钟就结束战斗，又歼敌一部，其余狼狈溃逃。此仗，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00余枝，子弹万余发。

刘昌毅等率领的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初到皖西，连战皆捷，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解决了部队自鄂西北转战以来弹药不足、物资奇缺的困难，进一步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部队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四方，群众纷纷传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二、皖西人民自卫军成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在刘昌毅率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进入皖西之前，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员熊作芳率300余人于1946年8月先期到达皖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在该地区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扩大了中共皖西工委组织，扩编了皖西支队，发展了皖西游击根据地。熊作芳于1947年3月中旬离开皖西，前往中共中央华东局。

1947年5月上旬，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率领的皖西支队，在潜山县大佛寺与刘昌毅部会合，部队转移到潜山县后冲休整，并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双方介绍了情况，研究了坚持和发展皖西斗争的若干问题，并决定实行统一领导，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及临时指挥部，由刘昌毅任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张秀龙、汪乃贵、张力雄等旅领导，经华东局同意，派地下党负责护送，化装转移到苏北根据地，后奉命留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工作。皖西人民自卫军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原第七团组成，大队长胡鹏飞，政委何德庆；第二大队由原江汉部队等组成，大队长孔令甫，政委梁诚；第三大队由皖西支队组成，大队长钟大湖，政委张伟群。后冲会议解决了党和部队在皖西地区的统一领导问题，为进一步坚持皖西斗争，创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皖西人民自卫军成立后，确定了以皖西地区为重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的方针，随即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主动出击，扩大游击根据地。他们以皖西工委活动地区为基本区，将第二大队配置在岳（西）、霍（山）地区；第三大队保留于舒（城）、桐（城）等地；并以第一大队作为机动作战的拳头，主要活动于潜（山）、怀（宁）、太（湖）、岳（西）各县。皖西人民自卫军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抓住国民党地方武装各自保存实力的弱点，采取先近后远，先内后外的战术，首先将游击根据地中对人民自卫军发展阻力大，对群众危害大的敌据点拔掉，巩固和发展了皖西根据地。

5月下旬，皖西人民自卫军连续攻克潜山源潭铺、痘姆等国民党重要据点，给敌以沉重打击。当时，痘姆驻有国民党潜山县自卫中队1个分队，阻碍着皖西工委与潜太县委之间的联系，刘昌毅命令第二大队1个连拔掉这颗

“钉子”，结果只用了20多分钟就将痘姆守军30余人聚歼，缴获步枪30余枝。痘姆袭击战的胜利，震慑了驻黄柏之敌，他们主动来信表示今后决不干涉皖西人民自卫军的军事行动。源潭铺是国民党粮库的重要基地，囤粮十几万斤，由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派兵守护。当时正值青黄不接，部队和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渡过夏荒，刘昌毅、桂林栖研究决定，兵分两路攻打源潭铺粮库。经过激战，国民党守军弃枪溃逃，部队当即开仓济贫。这一仗，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夏荒，也解决了部队的吃粮困难。接着，皖西人民自卫军又攻打桐城县芦镇关与舒城县毛坦厂等国民党军重要据点。当时芦镇关集中了国民党许多战备物资，有两个保安中队守护，刘昌毅、桂林栖当即决定用3个连的兵力攻打该镇，经过短促交锋，全歼敌1个保安中队，并缴获不少物资。接着，攻打舒城毛坦厂，又缴获了20多部缝纫机，为后来部队缝制夏服冬装提供了物质条件。

6月上旬，皖西人民自卫军继续攻打怀宁县石牌镇。该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夺取石牌，可直接威胁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安庆。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1个连和保安队，在此守护，戒备森严。一天夜里，第一大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将石牌守军团团围困，趁集束手榴弹爆炸的硝烟，用人梯送战士越墙进入镇内，于第二天拂晓前结束战斗。此战，毙伤俘敌数十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枝及大量军用物资。

自7月中旬至8月初，皖西人民自卫军以第一大队为主，第二、第三大队配合，向山外实施机动作战，由潜山一直打到宿松县境，攻克望江县城，相继在石牌（第二次）、项岭、王家岭、野人寨、黄泥岗等地与敌作战，均获胜利。同时，将岳西县国民党区、乡公所全部拔除。8月上旬，据侦察员报告，大湖县徐家桥有国民党大批布匹，正集中船只运往安庆。刘昌毅、桂林栖立即从各连挑选一批精干勇士组成一支突击队，全速向徐家桥奔袭。经50公里急行军，于当晚突袭徐家桥，打得敌人不知所措，在船上的跳水逃命，在岸上的纷纷躲藏，缴获了几百匹布，给指战员每人做了两套夏装。

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皖西人民自卫军又实行了统一整编，在原3个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3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一大队及新组建的潜山、怀宁两个县大队组成，支队长胡鹏飞，政委何德庆，副政委刘秀山，参谋长张有道，下辖4个大队；第二支队由原二大队和新发展的游击队组成，支队长孔令甫，政委梁诚；第三支队由原三大队组成，支队长钟大湖，政委张伟群。3个支队分别活动在六安、霍山、岳西、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宿松、怀宁等县。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后来又以第一支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三十七团，下辖3个营。

8月下旬，皖西人民自卫军拔除国民党岳西县清真、五河、石榜3个据点之后，进至储家冲休整。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1个营纠集岳西、潜山县保安大队共600余人，分兵三路对皖西人民自卫军进行偷袭。刘昌毅、桂林栖迅速组织指挥部队迎战，接连打退敌3次进攻。后来又派兵一部，从正面杀开一条血路，穿插至敌背后，抢占了200米外的制高点，使敌腹背受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伤敌2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枝，子弹数万发。截至8月底，皖西人民自卫军作战50余次，毙伤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200余件和大批军用物资。

三、皖西根据地的扩大

皖西人民自卫军连战皆捷，使皖西地区形势大为改观，根据地不断巩固

和扩大。据 1947 年 8 月统计，皖西游击根据地由原只有潜山县源潭、槎水、黄柏等几个乡，已扩大到岳西县五河、太湖县黄泥岗纵横 100 余公里、连接成片的 20 多个乡。中共皖西工委亦由原下属 3 个县委（岳北、潜太、舒六）、两个工委（桐庐、庐北），发展到 3 个分工委：第一分工委，书记何德庆兼（后为李唐），下辖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等县；第二分工委，书记张伟群兼，下辖桐城、舒城、庐江等县；第三分工委，书记梁诚兼（后为郭万夫），下辖六安、霍山、霍丘、肥西等县。皖西人民自卫军在主动打击敌人的同时，还派出大批干部和若干小分队，到各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先后成立了潜山、怀宁、太湖、望江等县大队。有的县还建立了由乡小队、区中队、县大队构成的三级地方武装力量体制，成为配合主力作战、保卫新生民主政权的骨干力量。

1947 年 8 月底，皖西人民自卫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胜利会师。从此，皖西人民自卫军投入了恢复和发展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第六节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 江南游击纵队渡江北返

一、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原地坚持斗争

1947年2月老观窝紧急会议后，鄂西北军区部队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罗厚福、吕振球、吴昌炽等率领的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及各支游击队800余人，仍坚持在鄂西北的崇山峻岭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这些部队主要是：由罗厚福、吕振球、吴昌炽率领的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江汉警卫团第一营和第三团1个营，共约500人，主要活动在房县以南、保康以西、远安以北的广大地区；由江贤玉、沈甸之率领的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加上江汉部队一部，共100余人，主要活动在保康以南千家老林一带地区；由曾昌华、王鸿荣率领的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第九大队近100人，主要活动在南漳板桥地区；由黄民伟率领的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地方武装50余人和区县以上干部20余人，主要活动在南漳、远安、保康地区。此外，还有长坪游击大队，李庙游击队、肖堰游击队、南保宜自卫大队，薛坪游击队、漳南人民自卫大队、襄南游击支队、洪山游击支队、鄂西北独立支队、荆当远游击大队、荆南游击队、谷南襄武工队等，分散隐蔽在鄂西北广大地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此时，鄂西北正值严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多数指战员身穿单衣，赤脚行军，日日夜夜驰骋转战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国民党每天把部队撒开，逐山逐沟“清剿”，发现山林里有留

下坚持斗争的部队与游击队的痕迹，即穷追不舍，直至放火烧

山；发现群众家里曾住过伤病员，就乱杀无辜，杀一儆百。为了割断鄂西北军区留在原地坚持的部队与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大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有些地方甚至把全村的老百姓集中关在一两间房子里锁起来。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清剿”，坚持原地斗争的部队不得不躲藏在崇山峻岭的密林中，有时甚至一两天都难得吃上一顿饭，忍饥挨饿，常以野果，葛根充饥。但广大指战员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鄂西北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他们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一有机会就搞掉国民党几个乡公所和乡保队，歼灭其分散小股部

队，摧毁其反动基层政权，并寻机袭击国民党的仓库，解决部队

的冬衣与粮食等补给困难；他们还组织部队炸桥梁、割电线，破坏敌交通和通信设施，不断地给国民党制造困难。

2月中旬，罗厚福、吕振球、吴昌炽率领江汉警卫团300余人，在兴山、秭归交界处与原江汉军区第三团参谋长袁春田率领

的1个营200余人会合。2月16日，该部在房县南之马桥，沙子岭阻击国民党第一八五旅1个营，毙伤其30余人。翌日，罗厚福又率部在大小螺溪、仙人崖、石人崖一带突破敌人的合围

圈；转移途中，当部队正在做饭时，又被国民党第一八五旅1个

团包围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罗厚福急中生智，当即命令警卫团

一营，分路齐头并进，攻占仙人崖、石人崖，掩护主力向后沟突

围。一连的勇士们在攻占仙人崖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有5名伤员

拉响自己的手榴弹冲入敌群，与其同归于尽。经过半小时

的激烈战斗，毙伤敌80余人，自己伤亡30余人。部队冲出包围

圈后，又穿过莽莽森林，攀登悬崖陡壁，其间，少数指战员堕下悬崖致残或牺牲，还有 200 余人迷路失散。

2 月下旬，罗厚福率部转战到兴山之龙口河，击溃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 1 个连的阻击，毙伤其 30 余人。接着，在兴山、秭归交界处朱市垭，召开团营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研究下步行动方案。为了减轻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的压力，决定挥师西进，以牵制国民党军。会议结束后，罗厚福即率部西进，当进至远安之土地垭时，遭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 1 个连的阻击，经激战，毙伤俘其 5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 挺，冲锋枪 1 枝，步枪 20 余枝，子弹 2000 余发，手榴弹 50 枚。后来，部队行进到兴山之店子垭时，又被国民党第一九九旅 1 个营包围，罗厚福指挥部队英勇出击，将其击溃，毙伤其 30 余人，缴获步枪 10 余枝。

罗厚福、吕振球、吴昌炽所率部队在坚持鄂西北斗争中，除打击国民党正规军外，还寻机摧毁国民党反动基层政权，歼灭国民党地方乡保武装，先后袭击了房县境内的范家垭、中坝、九道梁、盘山河、阳日湾、高坪、津水河；竹山县境内的水田坝、白河口，保康县境内的歇马河、李坪、后坪、欧家店、百峰寺、两峪、马良坪、马桥、店子垭；南漳县境内的通城河；远安县境内的苟家垭；兴山县境内的雾渡河等共 22 个乡公所。其中，有 7 个乡公所的武装被全歼；15 个乡公所的武装大部被歼；并烧毁了乡公所碉堡 10 余座。他们还将中坝、苟家垭、白河口等地国民党的粮食仓库打开济贫，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5 月上旬，坚持鄂西北斗争的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在江贤玉、沈甸之带领下，袭击了国民党保康县金斗乡保安队，毙伤其 10 余人；接着，歼灭了国民党南漳县驻在长坪村的保安大队 1 个排；在长坪东南马槽垭，又歼灭国民党保康县 1 个保安中队，毙伤俘其保安大队长以下数十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数 10 枝。后来，在龟坪又歼灭国民党明阳乡保安队 60 余人。

5 月中旬，谷南襄武工队，在南漳县安家集遭国民党第一五三旅突然袭击。武工队在麦地里与其先头部队展开了肉搏战，全歼该旅尖兵排，俘其 10 余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接着，武工队又在谷城县南庙滩渡过襄河，埋伏在老白公路旁，截获国民党 3 辆汽车和一批军用物资，并活捉了 1 个班的守车兵。

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坚持原地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在这段异常艰苦与残酷的斗争中，又有不少优秀领导干部英勇献身。2 月 10 日，房县县委书记兼县长雷天明，在兴山县棒子树岭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于房县榔口。2 月下旬，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张谦光率部在兴山县大小螺溪和敌人遭遇，激战三昼夜，他带领 1 个警卫班，掩护主力分头冲出重围，最后因弹药消耗殆尽，与警卫员一起转战到平水河一带，身中两弹，不幸被俘，被敌杀害。3 月 1 日，谷南襄县县委副书记蒲田在阎坪老街战斗中牺牲。5 月 20 日，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王展，在荆门市观音乡香山榔树店子战斗中英勇牺牲。

二、江南游击纵队洋溪北渡，偏头岩会师

194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军委电示中原局：“据张才干、李人林电，江南敌情较紧，拟到江北行动。我们意见该部以保存为原则，目前，鄂西、鄂中、鄂东、豫西、陕南、皖西广大地区，敌正规军甚少，回旋余地甚大，必要时并可渡河与文（建武）汪（锋）部会合体整一个时期。因此，允许张（才

千)、李(人林)部北开,并联系与会合鄂西北、鄂中、陕南各地难于立足之部队,开至豫西,相机北渡为宜。”

5月1日,江南游击纵队党委在松滋县刘家场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转战江南的斗争情况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近三个月来,纵队在政治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取得了江南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拥护和支持,使部队得以生存,并接连打胜仗;在军事上,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从而保存了自己,牵制和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鉴于目前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纵队党委决定部队即刻北渡,重返鄂西北,与坚持当地斗争的罗厚福等部会合。

5月2日拂晓,江南游击纵队在张才干、李人林的率领下,从刘家场出发,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手段,歼灭和击溃国民党枝江县两个保安中队,直逼长江南岸渡口——洋溪,并连夜乘船在洋溪上游之石鼓渡过长江,宿营于北岸焦岩子一带。紧接着,纵队一枪未发,解放了枝江县董市。部队在此休整了两天,于6日出发,向鄂西北地区挺进。8日至9日,纵队又连续攻克国民党远安县河口及南漳县巡检司3座碉堡,捣毁其乡公所,俘获其60余人枪。

江南游击纵队浩浩荡荡地重返鄂西北,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这个地区顽强坚持斗争的指战员。5月中旬,张才干、李人林所率纵队,在南漳县东巩西南之偏头岩,与罗厚福、吴昌炽等率领的坚持鄂西北斗争的部队胜利会合。接着,在薛坪和千家老林一带,又先后与曾昌华、王鸿荣、黄民伟、张绍武、江贤玉、沈甸之等率领的各支部队会合。战友重逢,个个欢喜若狂,热情拥抱,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江南游击纵队的指战员,为在鄂西北坚持斗争付出巨大代价的战友们所深深感动,坚持原地斗争的指战员,回顾在武当山区渡过的最艰苦的日日夜夜,现在鄂西北军区主力又重新会合了,个个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胜利信心。

三、改编中原游击纵队,东进豫皖苏解放区

1947年5月下旬,江南游击纵队与坚持鄂西北斗争的各支部队会合后,改编为“中原游击纵队”,由张才干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厚福任副司令员,李人林任副政委,吴昌炽任参谋长,李心清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3个支队,约3000人,第一支队支队长钟春林,政治委员黄民伟;第二支队支队长张绍武,政委邝铁;第四支队支队长王定烈,政治委员杨劲。从此,他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中原游击纵队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收拢分散坚持斗争的人员。李人林率第一、第二支队走东路,经南漳的东巩,荆门的栗溪、仙居,宜城的刘猴集到南漳的安家集,武安集、报信坡一带。当行至南漳安家集地区时,发现山上有国民党军,据侦察是整编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第一支队第二中队主动出击,激战两个多小时,歼其1个哨班。张才干率纵队机关和第四支队走西路,经南漳的巡检司、峡口,保康的店垭子、马良坪、歇马河、重阳坪,到南漳的板桥、四方坪、乾溪、肖家堰一带。当进至歇马河以东界垭地区时,消灭敌1个排哨。

这时,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游击纵队党委决定,主力全部撤离鄂西北,东进豫皖苏解放区。5月23日,3个支队在南漳之薛家坪集中,先急速北上,于5月26日从谷城东南的庙滩渡过襄河,穿过豫南平原,经新野、唐河、泌阳县境,向豫皖苏

解放区挺进。至此，创造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全部撤出，标志着这一根据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5月29日，中原游击纵队进到泌阳县南毕店村寨时，遭国民党泌阳县保安大队阻截。第四支队当即勇猛反击，一举将该保安大队全歼，毙俘其副队长以下3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炮弹40余发，重机枪2挺和一部分枪支弹药。接着，纵队进入桐柏山区，于6月3日在确山、信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沿途在项城县水寨等地遇国民党保安团队拦截，第四支队即从正面攻击，突破其前沿阵地；第一支队则从两侧迂回包围，将国民党保安团队200余人全歼。

四、与豫皖苏军区会台，改编中原独立旅

1947年6月12日，中原游击纵队在豫东睢县以南的平岗地区，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吴芝圃部胜利会合。经过短期休整，中原游击纵队于6月24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原独立旅”，张才干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厚福任副旅长，李人林任副政委，吴昌炽任参谋长，李心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四团。第一团由原第一、第二支队合并组成，团长钟春林，政委邝铁；第四团由原第四支队组成，团长王定烈，政委杨劲。同时，将整编下来的干部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60余人，编为“干部大队”，由余孝礼任大队长、黄民伟任政委，在豫皖苏军区领导下，参加地方土改工作。后来，李先念决定干部大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南下，重返江汉后，由江汉区党委分配工作。

中原独立旅成立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迅速纠集正规军和保安团队共14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合击：第一八三旅由西南方向之太康；第一五三旅由北面方向之睢县；交警第二总队和保安第一、第二团由东面方向之龙集、付集一带；第十一旅第三十三团及交警第十七总队由南面方向之淮阳等地区，一起向中原独立旅猛扑过来。豫皖苏军区党委根据“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决定中原独立旅和军区独立旅，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战机，歼灭敌人。

6月24日，中原独立旅和军区独立旅，由原墙集一带出发，连续行军50余公里，于当夜进至安徽省阜阳城近郊。6月25日拂晓，中原独立旅第一团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自南城门东侧越过护城河，架梯登上城墙，把国民党军防御阵地撕开一条口子，并向两翼发展，迫使其守军溃散而逃，从而一举攻下阜阳县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吴芝圃等领导到中原独立旅驻地进行慰问，并对干部作了形势报告。接着，该旅又运用奔袭、奇袭等战术手段，10天内连克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河南省的鹿邑、扶沟、西华、鄢陵、柘城等7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枝，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合围聚歼”计划。

为了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作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豫皖苏军区及时提出了“加强夺取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积极作战，牵制敌人”的作战方针。在豫皖苏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中原独立旅和军区部队一道，横扫豫皖土顽，于7月20日解放了西华、漯河之间沙河北岸的逍遥镇。接着，中原独立旅与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奉命对周口之敌发起总攻。周口地处淮阳、西华、商水三县交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分南北两城，中贯沙河，有大桥相连，国民党防守严密，桥北头筑有碉堡，沿河挖有堑壕、掩体，守军为交警第十七总队两个大队6个中队及4个县属中队，共1000余人。中

原独立旅第四团在军区独立旅的密切配合下，在南镇桥边沿岸对敌发起猛攻，同时，利用五六条小船，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组织部队渡河；军区独立旅亦发起进攻，部队很快突入城内。经过一昼夜浴血奋战，终于将周口之国民党军全部歼灭，共毙伤其 180 余人，俘其 850 余人，缴获九 火箭筒 4 具，轻重机枪 32 挺和卡宾枪、冲锋枪、步枪 700 余枝，弹药 6 万余发及大批粮食、布匹。

8 月 16 日，刘伯承、邓小平和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亲临拓城玄武镇中原独立旅驻地，布置和交待作战任务，决定将中原独立旅划归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作为直属独立旅，成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一支战略牵制部队。从此，该旅投入了全国战略进攻的战斗行列，重返中原，向大别山挺进。

第五章第一纵队第一旅掩护主力突围。

东进苏皖解放区

第一节以白雀园为中心牵制国民党军，

掩护主力西进

一、机动兵力，迷惑和阻击国民党军

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其中，整编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五、第一二七旅由光山出动，于卧龙台、附流店一线，向泼陂河附近及其以北、以东地区进攻；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附独立一团由商城出动，于附流店、大冲、双门栏一线向白雀园、泼陂河进攻；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第一 一团由经扶（今新县）、七里坪出动，于双门栏、西河、经扶一线，进攻重点指向泼陂河。另外，整编第五十八师新十旅正由阜阳向商城集结，亦准备围攻泼陂河地区。

以白雀园为中心的泼陂河地区，位于中原解放区东部，是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的驻地。该地区为丘陵地带，南北宽约30公里，东西纵深25公里，是中原军区主力西进的侧后屏障，也是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的进攻重点地区之一。泼陂河以东的白雀园，为第一纵队第一旅的驻地。该旅3个团，突围前约6000人，其所辖防区，东至余集，西至砖桥，南至沙窝，北至双轮河，是中原解放区的东大门。

突围前，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在旅党委和团以上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上反复强调，突围行动成功的关键：一是要以部分兵力积极行动，吸引住敌人，保证旅主力有行动自由；二是整个突围行动要迅速，隐蔽，任何迟缓或暴露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三是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做好艰苦行军作战的准备。会后，全旅在皮定均和徐子荣政委的率领下，抓紧时机，进行紧张的临战准备工作。各部队迅速传达旅党委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讲清面临的敌情和突围的重大意义，讲清突围作战的艰苦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从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坚定了突围必胜的信念，把旅党委的决心化为全旅指战员的统一行动。各团加紧备战，进行轻装，补充干粮。一线部队在西余集、沙窝和双轮河加修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部署部分兵力白天向东佯动，以迷惑敌人，隐蔽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企图和部署。

6月26日上午，各路国民党军压缩包围圈，以少量兵力作试探性进攻。第一旅按既定部署，各团主力集结待命，前沿留部分兵力，利用工事、山丘、沟壑、稻田、河流等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抗击、引诱和迷惑敌人。国民党军在第一旅的阻击下行动迟缓，当得知第一纵队主力已向宣化店方向移动，下午遂将进攻重点移向白雀园附近地区，并加强攻势，从东、南、北三面向第一旅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将第一旅“一举歼灭”于白雀园地区，继而向西进攻宣化店，合击中原军区主力。南面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以新十二旅主力沿周家河（沙窝南侧）、宋家畝，向白雀园、泼陂河进攻；第三十四旅逐段向黄土岗、福田河、小界岭推进，准备截击一旅于商城、两路口之间向东南突围，以策应新十三旅的作战。第一旅第二团一部在沙窝地区与其展开激战。东面国民党第一七四旅对第一旅第一团西余集防御阵地频繁发起攻击，担任阵地阻击任务的一团三营指战员以密集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将敌击退。为了牵制和迟滞国民党军，掩护中原军区主力西进，第一旅除坚守阵地的部队英勇抗击外，还以部分兵力东西佯动，以迷惑敌人。至傍晚，国民党

军在一旅掩护部队的顽强阻击下，未能越雷池一步。人夜后，一旅前沿部队奉命撤离阵地，利用夜暗和大雨，撤向白雀园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占领前沿阵地后，得意洋洋。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第一旅临危不乱，果断决定向西佯动。旅主力连夜冒雨向西南走出 15 公里，绕了一个大圈子，又转回位于白雀园西南 6 公里的刘家山（冲）隐蔽起来。

二、潜藏刘家山（冲）

6 月 26 日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防中原军区主力西进，电令整编第七十二师“即跟匪踪西进，务与匪保持接触，不得使其逃去”。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于 6 月 27 日部署整编第七十二师以 1 个团控制河口镇保持机动，主力“即跟匪踪西进”。此时，整编第七十二师与整编第四十七师在浚陂河会师，使第一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国民党军为首先“搜剿”并肃清白雀园的第一旅，而后进攻宣化店，令新十三旅一方面在西面严密封锁浚陂河至经扶的公路，切断第一旅与主力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东面联络第一七四旅，推进至余家集、沙窝、宋家畈之线，严防第一旅向东南突围；同时令第三十四旅以 1 个团置于大路铺，1 个团置于三河口，策应各方作战。当日晚，新十三旅进抵汴湾至经扶一线；第三十四旅进抵福田河、大河铺南侧地区；第一七四旅进抵卧龙台、张家店、浚陂河地区，策应新十三旅作战。国民党军东线主要兵力被第一旅掩护部队牵制在浚陂河以东地区，而第一旅主力则潜藏在刘家山（冲），陷于国民党军的重围之中，处境危殆。

刘家山（冲）是一块狭小的丘陵地带，树木茂密，东靠演（川）麻（城）公路，南临商（城）经（扶）公路。国民党新十

三旅占领沙窝后，就控制了这一地区，但他们料想不到，在这两条公路交叉处的小小山林中，竟会潜藏着一支数千人马的部队。第一旅主力在刘家山（冲）一带的各个山头布置了警戒，设了了望哨，严密封锁消息。指战员们在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冒着

大雨潜藏在刘家山（冲）的丛林中，忍饥挨饿，保持肃静，高度警惕，严守纪律，不暴露目标。国民党军新十三旅攻占沙窝后，继续向白雀园、余家集一线推进，途经刘家山（冲）时，虽与第

一旅主力近在咫尺，却毫无察觉。与此同时，第一旅少数部队继续袭扰抗击国民党军，于 6 月 27 日夜全部撤回刘家山（冲）地区。

第二节向苏皖解放区挺进

一、跨越潢麻公路，强越大牛山

1946年6月28日，刘峙察知中原军区主力向西转移的行动

后，饬令各部“严密包围、封锁、监视、搜索”，组织部队“跟踪、堵击”，“务必在乎汉路东予以歼灭。”为此，国民党军调整部署：整编第四十七师（附第一七四旅）占领龙升镇、卧龙台、蔡

家大凹之线，重点沿竹竿河以东地区指向宣化店东北；整编第七

十二师新十三旅攻占蔡家大凹至槐树店之线，重点指向宣化店以东，第三十四旅迅开经扶控制机动使用。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遂

电令整编七十二师，以1个团守备麻城、宋埠各要点，以一部占领泼泼河、经扶之线，与第一七四旅共同阻击中原军区回身向东

突围的部队；主力集结于夏店、河口镇、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间地区，保持机动，对宣化店、吕王城一带积极侦察搜索。国

民党军不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的去向，继续以新十三旅、第一七四旅对白雀园、余家集及其以北地区进行“搜剿”，以求将第一旅“彻底肃清”后转向宋家畝、沙窝地区集结，策应向西作战。

同一天，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决定，乘国民党军主力西移，而当面之敌又在白雀园以东以北进行“清剿”之际，跳出其合围，向东挺进。清晨，全旅从刘家山（冲）出发，出敌不意，向西南疾进，避开了新十三旅在沙窝至余家集一线的堵击，楔入周家山以西阵地，于九龙山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跳到新十三旅的背后，当夜宿营于经扶东南之易家田铺。为了不失时机地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围，旅领导当晚决定：于翌日突破演（川）麻（城）公路封锁线。

6月29日拂晓，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得知：“共军第一旅”“由白雀园进抵易家田铺”，急令新十二旅第三十九团一部沿宋家畝、周家河向西南追击；第三十七团一部由甘家塘、中途店向东南攻击，协同由福田河、大河铺南侧地区向西北进攻的第三十四旅第一一团，合击第一旅于易家田铺地区。然而，第一旅于6月29日凌晨突然90度大转弯，经张店，直插正东黄土岗、福田河之间的演（川）麻（城）公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敌封锁线，使国民党军的合击计划落空。

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二师得知第一旅向东南突围后，又于6月29日下午3时急令新十三旅第三十九团一部衔尾追击，第三十四旅第一一团以一部进击五里山北端地区，主力进击黄土岗附近，堵击第一旅。当其主力向黄土岗推进时，第一旅如离弦之箭，向东疾进。旅先遣侦察队化装成整编七十二师谍报队，智取旗杆店，俘国民党军24人，缴枪21枝。

6月30日，第一旅进抵河南省商城县境内的瓦西坪，准备翻越大牛山。大牛山高耸入云，层峦叠嶂，上下近百里，系鄂豫皖三省边境重要的天险要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一天然险阻，堵歼第一旅于瓦西坪地区。为此，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第一一团的1个营已抢占瓦西坪以南高地进行截击；立煌（今金寨）县保安团和商城县保安团亦分别占据了瓦西坪西南侧和西北侧高地，对第一旅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国民党军第一一团的后续增援部队也已从三河口方向赶来。

第一旅刚进入瓦西坪，突遭国民党军的袭击。如不能迅速粉碎其堵击，就有被“围歼”的危险。旅领导决心，以担任前卫的第一团杀开一条血路，

掩护全旅强越大牛山。旅长皮定均命令第一团团团长王诚汉：“动作要快要猛，像撕布一样撕开一条口子！”政委徐子荣号召指战员：“抢过大牛山，向党的生日献礼！”第一团以前卫第三营担任攻击任务，夺取右翼高地。第三营由第七连担任主攻，第九连担任助攻，第八连为预备队。

第一旅第一团曾被豫西人民被誉为“老虎团”，具有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尤其擅长远距离山地奔袭作战。攻击开始后，战士们忘掉了疲劳、饥饿和病伤，动作迅猛地冲进密林，杀上山冈。山上国民党守军凭借有利地形，轻重机枪疯狂扫射，企图阻挡第一旅部队前进。担任主攻的一团三营七连抽了20名战士组成突击班，每人配备5枚手榴弹，在全连机枪的掩护下，向山上高地发起勇猛冲击。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这一凌厉攻势，溃败而逃。

第一旅第一团攻取高地后，国民党军又以密集火力掩护，发起反扑。该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待国民党军进至半山腰时，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将其击退。不久，国民党军又改变战术，以部分兵力正面冲击，另以一部由西侧高地向第一团阵地右翼迂回，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团在依托阵地顽强抗击的同时，以1个连的兵力向迂回之敌猛烈冲击，又将其击退。此战，歼灭国民党军约1个连。在第一团掩护下，旅直和第二，第三团沿着撕开的血路，强越大牛山。此时，大雨滂沱，全山为云雾笼罩，使国民党军失去目标而无法追击。第一旅冒着大雨连夜急行军，经艰苦攀登，于7月1日晚越过大牛山。

大牛山一战，不仅使第一旅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脱离险境，而且甩掉国民党的追兵，为在吴家店休整创造了条件。

7月3日，第一旅进抵立煌县吴家店。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地处大别山腹地，地形隐蔽；且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交通阻塞，国民党军难以追击。7月4日，旅党委在吴家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前一段突围作战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行动。会议认为，前段突围行动是成功的，运用了欲东先西、避实击虚的战术，突出了重围，保存了自己，部队损失不大。但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行军作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指战员疲劳已极，伤病员骤增。旅领导决定利用吴家店的有利条件，部队休整3天，恢复体力，安置伤病员，筹集粮草等物资，查明敌情，然后趁国民党后方空虚及其对一旅情况不明之际，全旅迅速跳出大别山，横跨皖中平原，向苏皖解放区挺进。会后，各团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做好行军作战的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同时，将不便行动的伤病员寄留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在吴家店群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下，部队伤病员得到了很好的护理和治疗。一旅又很快找到了国民党的粮食仓库，当即开仓济贫，把大部分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百姓，一部分作为部队给养，解决了燃眉之急。当日，中原局将第一旅到达吴家店的情况电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该旅数日来，未与你们联系上，请令电台注意联络，并告东边情况。”第一旅电台亦多次与中央联系，但一直未通。

第一旅经过休整，部队体力有所恢复，而且给每人配发了一双布鞋、两双草鞋和5天的干粮，并大体查明了敌情。为便于下一步行军作战，旅领导决定干部战士进一步轻装，各级指挥员随前卫部队行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定下决心，掌握部队，指挥战斗。7月7日，第一旅在罪靠淫雨中，沿漫水河、黄林庙，继续向东进发，穿越大别山。

二、突破青风岭。抢渡磨子潭

国民党反动派为防止中原军区部队向东突围，早在1946年5月就部署整

编第四十八师，预先设置了3个“堵击区”，作二线配置：“六（安）立（煌）堵击区”为第一线，由第一七四旅扼守；“巢（县）合（肥）堵击区”和“庐（江）舒（城）堵击区”为第二线，分别由第一三八旅和第一七六旅守备。此外，国民党还将整编第五十八师新十旅调往阜阳，将伪军孙良诚部以改编为名调往寿县，归第八绥靖区指挥，再加上地方武装4个独立团，防堵兵力大大加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翻越大牛山后，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即令第一七六旅第五二八团指挥保二团1个大队，由合肥开往吴家店、长岭关方向进行堵击。国民党得知第一旅进抵吴家店后，又令第五二七团星夜赶赴立煌县以南的南庄畝堵击。

大别山区，山大人稀，土地贫瘠，漫水河弯弯曲曲漫流在深山密林中，部队在行军途中几乎不见人烟。露天宿营，虽仲夏时节，但夜凉似深秋，薄衣不胜寒。白日行军，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溪流遍布。部队每日要翻越三四座上下均达5至10公里的大山，徒涉十几道河流，鞋子很快就磨破了。战士们赤足行军作战，双脚被鳞岬的山石碰破、磨烂，每走一步钻心地痛。但是，这一切都阻挡不住第一旅的前进步伐。全旅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疾速向东挺进，进入霍山县大化坪。

国民党第八绥靖区判断进入大化坪的第一旅为单独向东突围的部队，遂集中两个旅8个团的兵力，重新调整堵击部署：第一七四旅由浚陂河东调立煌县归建，向东“追剿”；第一七六旅第五二七团开往南庄畝，独四团开往立煌东南5公里的枣子河，第五二八团及保二团留立煌附近“清剿”，独五团开往岳西方向侦察作战，企图将第一旅“围歼”于大别山区。

7月10日，第一旅在青风岭遭国民党安徽省挺进纵队第二团堵击。青风岭，山势陡峭，林木茂密。南面是高耸入云、险峻异常的天柱山，人马无法通行；北面是飞流直下的愣河支流，水势湍急，深不可测。当第一旅前卫第二团抵达青风岭时，国民党挺进纵队第二团已由霍山县赶来，抢先占领了育风岭主峰，严密封锁了前进道路。第一旅前卫第二团飞速抢占青风岭主峰北坡一座小山丘，隔一凹地与其对峙。国民党守军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上山的唯一通道。旅领导当即命令第二团发起攻击，坚决拿下青风岭，保障全旅通过。在团长钟发生、政委张春森的指挥下，第二团以第二营担任主攻，第一营侧攻，向青风岭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第二营第四、第六连指战员攀上几丈高的峭壁，穿过没有道路的灌木丛林，用绑腿吊上悬岩，用柴刀，刺刀辟出一条通道，登上了青风岭右翼的一座高峰。同时，第一营第一、第二连向青风岭左翼迂回发起冲锋。战士们冲上山顶，与国民党守军展开白刃格斗。经两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攻下青风岭，并乘胜追击5公里，毙国民党军200余人，俘其19人。从而打开了通向磨子潭的道路。

磨子潭是大别山东唾门户，位于淠河西岸，山陡水急，地势险要，三座大山屏风般壁立对岸。第一旅到达磨子潭时，从敌人电话中了解到，整编第四十八师一部正朝磨子潭方向赶来截击。旅领导决心抢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渡过磨子潭，遂命令第三团先派出一个营，用仅有的5只小船渡河去担任警戒，并命令工兵排立即收集材料，赶搭浮桥，全旅部队随时准备渡河。

午夜，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骤至，淠河暴涨。第三团在第一营过河后，其余部队随即跟进过河，迅速占领对岸制高点并严密警戒。卫兵排因水深流急，三次架桥未成。旅领导当机立断，徒涉过河。为加快渡河速度，在访问群众调查徒涉点的同时，派出骑兵通信员传今后卫警戒的第二团火速

跟上。

渡河组织工作刚刚就绪，驻六安之国民党军第一七六旅第五二七团派出的1个营，已抢先占据了河东岸大山金鸡岭，与第一旅先期渡河担任警戒的第三团第一营展开激战。在团长曹玉清、政委黎光的指挥下，三团一营指战员英勇抗击，将其击退，牢牢控制着渡河登陆点。凌晨，第一团及旅直在河东第三团的掩护下，于磨子潭东南交叉处抓紧徒涉抢渡。国民党军以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封锁河面，渡河部队利用夜暗大雨的掩护，奋勇向对岸徒涉。登上东岸后，相继向金鸡岭发起攻击，将敌压缩到金鸡岭北侧高地上。担任后卫的第二团从范家场出发，强行军20余里，于拂晓赶到磨子潭漯河渡口。国民党军又以迫击炮等猛烈火力拦阻第二团渡河。在第一、第三团的全力掩护下，第二团于略靠下游处选择渡河点，在急流中分三路强渡。由于水深流急，10余人被急流卷走。在这次强渡磨子潭的战斗中，第三团第三连被敌切断，与主力失去联系，后被鄂东独立第二旅第五团收编。

抢渡磨子潭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歼灭第一旅于大别山区的计划彻底失败，第一旅突破了穿越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

三、横穿皖中平原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抢渡磨子潭后，即向东南方向机动。当得知国民党军正从桐城方向而来时，旅领导当即决定调头北进，将其甩掉。1946年7月13日，旅先遣侦察队以奇袭手段攻占大别山东麓出口处毛坦厂，歼其民团局20余人，从而打开了进入皖中平原的大门。

皖中平原，交通便利，河流纵横，城镇林立，合（肥）叶（家集）公路、淮南路等交通干线，横贯其间，有利于国民党军的机动作战和封锁阻击。当日中午，旅党委在毛坦厂北山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分析敌情，决定以坚决、果敢、神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部署就绪之前，连续5昼夜急行军，横穿皖中千里平原。会后，各部队进行紧急动员。皮定均、徐子荣代表旅党委号召全旅指战员咬紧牙关，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和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夺取向东突围的最后胜利。为保证完成任务，部队实行彻底轻装，每个干部、战士除身穿单军装，携带自己的武器弹药外，把所有的炊事担子、公文箱子、走肿了蹄子的牲口和个人用品全部清理掉。为加快行军速度，保证全旅安全通过皖中平原，还组织了一支精干的侦察队，由旅作战科长许德厚和保卫科长莱真指挥，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前面收集情报，探察道路等，以保障部队的行动方向和安全。

7月13日晚，月光如洗。第一旅的队伍如同一股铁流，从大别山倾泻而下，抢过河，川，向合、叶公路方向挺进。7月15日拂晓，第一旅主力抵达合、叶公路上的官亭镇。由于该镇只有少数地方民团把守，第三团前卫第一营巧取官亭镇，由伪军改编的地方民团100余人在睡梦中便当了俘虏。由于该路段国民党无重兵把守，全旅于当日中午顺利地通过合、叶公路，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第一旅沿途击退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多次袭扰和阻击，于7月16日夜绕过国民党之刘高集据点，夺取吴山庙，与旅先遣侦察队会合。第一团前卫第九连化装成国民党军，奇袭吴山庙，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国民党寿县裸安队，俘其30余人。据侦察队报告，国民党正强征民伕在淮南路两侧抢修工事。旅领导当即决定，连夜抢越淮南路，进入定远地区。正当旅领导研究行动计划时，中共淮南区党委派出的联络员赶到，第一旅终于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地下党的同志向旅领导详细介绍了周围的敌情、地形和

道路情况，并留下一名向导。第一旅连夜急行军向淮南路进发。

为了尽快跨过皖中平原，部队昼夜兼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时间做饭和宿营。指战员们渴了喝一口冷水，饿了啃一口干粮，行军途中只要一休息就会随地睡熟。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极度的疲劳和饥渴，神速地向东挺进。7月17日凌晨，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三八旅1个团分两路赶来堵击。第一旅以强行军速度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经下塘集越过淮南路，抵达定远县朱家湾地区，又一次将国民党军甩在后面。

定远地区，原是新四军第二师的根据地。当地群众对第一旅关怀备至，地下党也大力协助。一路上，由于地下党的宣传和组织，每到一地，群众都烧好饭，准备好开水，派好向导，修好道路、桥梁。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一旅加快行军速度，顺利通过定远地区，于7月19日中午到达红心铺。这里距津浦铁路只有20多公里，跨过津浦路就是苏皖解放区了。

四，冲过津浦路，胜利进入苏皖解放区

1946年7月18日，国民党以整编第七、第四十八、第六十九、第二十八，第五十六师共12个旅的兵力，自徐州、夹沟、固镇地区分三路进攻淮北津浦路东解放区。国民党重兵屯集于津浦路，沿线的明光、管店、三界和张八岭等大小车站都驻有正规军。他们利用日军留下的碉堡、工事和护路沟，防守极严。为阻止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越过津浦路，国民党第八绥靖区命令整编第七师第一七二旅第五一五、第五一四团各两个营协助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三八旅于明光、滁县之间进行堵截。

第一旅党委在定远之红心铺附近一片稀疏的松林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心不情一切代价，于翌晨6时以前，从明光与管店之间突过津浦铁路。这时，第二团俘获了国民党整编第七师的两个便衣侦察人员，获悉：该师一部已从明光出动，南下定远，企图阻截。根据敌情变化，旅领导当机立断，改变行军路线，折向东南，于张八岭以北、张老营车站以南的石门山附近冲过津浦路。接着召开各团领导干部会议，部署行动计划，并对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命令第二团派两个连掩护旅主力前进，全旅编成两个行军纵队：以旅直、第一、第三团为右路纵队，第二团为左路纵队，立即出发向津浦路挺进。

7月20日凌晨，全旅到达津浦路边，两路纵队会合前进。当时部队的行军序列是：第二团为前卫，第三团和旅直居中，第一团担任后卫。先头部队一到铁路边，立即填平护路沟，为后续部队垫路。第二、第三团和旅直以神速、秘密的行动，顺利地通过铁路，占领路东高地掩护后卫过路，随即向两端放出警戒，并派出工兵分两头在路基上埋炸药，以防国民党军利用铁路赶来截击。当后卫第一团过路时，天已透亮。这时，国民党一满载部队的装甲列车从滁县方向赶来截击；铁路两侧碉堡内的国民党军也以轻重机枪疯狂扫射，配合军用列车冲击，将第一团截为两段。与此同时，北面之明光、管店和南面之滁县等地的国民党军，又分五路出动，企图从两翼钳击。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三团截住滁县方向之敌，第二团堵击明光、管店之敌，工兵即点燃炸药，阻止装甲列车前进，全旅的迫击炮集中轰击国民党的车站据点，掩护第一团冲越津浦路。第一团指战员从铁路两侧勇猛跃上路基，攀上列车，将集束手榴弹塞进车内，使国民党军遭到重大杀伤，向明光方向仓皇逃去。经过近3个小时激战，第一旅终于在上午10时左右全部越过津浦铁路。

第一旅越过津浦路后，为防国民党军截击，迅速收拢部队，强行军先行抢占三界东北的一座高山。第一团迅速控制了老嘉山以西的制高点，掩护全

旅继续前进。淮南军区部队亦积极行动。当部队行进至中嘉山附近时，与前来接应的淮南军区嘉山支队胜利会师。

自中原突围以来，第一纵队第一旅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越高山、攀峭壁、涉险滩、跨平原，一路斩关夺隘，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历时 24 天，经过 23 次大小战斗，行程 750 余公里，除掉队、失散、伤亡外，保存了约 5000 人的主要力量，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

当第一旅指战员进至盱眙县的仇集、梅花岗地区时，受到解放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人民群众在家

门口摆上茶水和香烟，儿童团挥舞着彩旗，墙壁上贴满红色的标语，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到来。不少群众担着猪肉、米面和蔬菜，带着烟酒，慰劳部队指战员。老乡们热情地为部队打扫房子，烧水洗澡，妇女们争着为战士们洗衣服。在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

下，第一旅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7 月 21 日，中央军委电示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望帮助第一旅“休整若干天”。第一旅派方升普副旅长前往淮安华中军

区司令部报到，受到张鼎丞，邓子恢、脸代远等军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22 日，华中军区将第一旅胜利突围的情况电报中共中央：“中原军区挺进第一旅（即第一纵队第一旅）于 20

日越津浦路，已安全抵达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我已令淮南军区慰劳，并解决其物质困难。”

7 月底，国民党军向淮南军区发动进攻。第一旅经盱眙县马坝、蒋坝，横渡洪泽湖，进驻洪泽县高良涧、顺河集地区，其任务转入休息、总结、整顿、补充。首先恢复体力，然后进行突围总结、思想教育、调整组织、补充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8 月 1 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转皮定均、徐子荣：“得悉你们已安抵苏皖解放区，甚慰。你们今后可即改属苏皖军区（即华

中军区）建制并坚决接受他们指挥。”8 月 22 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领导致电华中军区转皮定均、徐子荣、方升普、郭林祥并转全旅指战员，高度评价了第一纵队第一旅的突围胜利，指出：“你们创造和平坚持中原斗争，以英勇模范的行动，冲破蒋军围剿，安全到解放区，这是中国人民的大胜利，晋冀鲁豫全区军民特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决定你们列入华中军区建制，更重大的任务还在前面，望你们在华中分局及军区领导下，争取新的更大胜利。”此后，第一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在华中军区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战斗。

第六章鄂东独立第二旅掩护主力突围。

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

第一节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分路突向冶溪河

一、接替宣化店警备任务，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突围

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于突围前在礼山（今大悟）吕王城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出全旅保证完成掩护任务和各团分路突围的具体部署后，立即投入行动。1946年6月26日凌晨，旅政治委员张体学令警卫营派一个排以“换防”为名，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了警卫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的特殊任务。旅长吴诚忠即带领参谋人员到佛塔山阵地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动员指战员一定要守住阵地，掩护主力向西突围。

佛塔山，位于礼山与黄安（今红安）交界的河口镇东北面约7.5公里，是宣化店地区的南大门，中原军区的甫线前哨阵地，停战期间一直是国民党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点。这里驻守着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经常在这一地区制造摩擦，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曾多次来到这里进行调处、视察。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企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于宣化店地区。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五旅主力一部从河口出动，向独二旅佛塔山阵地猛烈进攻。坚守佛塔山阵地的四团二营指战员，深知佛塔山阻击战，直接关系到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安危，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誓与敌决一死战”。在团政委萧德明指挥下，二营指战员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强攻，坚守3天3夜，共毙伤国民党军200余人。与此同时，张体学率警卫部队坚守在宣化店，执行着特殊的使命。

宣化店镇，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从1946年1月上旬起，就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镇西竹竿河边的学校住着执行军事停战调处任务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6月26日晚，为了迷惑美、蒋代表，中原军区特地邀请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全体人员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李先念司令员由张体学陪同，仍在宣化店街头散步。美、蒋代表看到宣化店依然如此宁静，毫不在意，然而，中原军区主力正在“演习”的名义下向西挺进，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警卫部队亦于当日午夜隐蔽地撤离了宣化店。

6月27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师、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进抵卧龙台、张家店、泼陂河地区；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进抵符湾至经扶地区；新十五旅进抵杨家湾、蔡店地区；第三十四旅进抵福田河、大河铺南侧地区，步步向宣化店紧逼。28日，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突然要求会见李先念将军。张体学机智地通过中共代表任仕舜向美方说明：“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29日，为继续迷惑驻宣化店的美、蒋代表，张体学决定调第六团第一营赶到宣化店，加强警卫任务，部队照常出操、唱歌，似乎一切都如往常。

29日下午，正当中原军区主力准备当晚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平汉铁路封锁线时，宣化店则在举行宴会，招待三十二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当美、蒋代表频频举杯时，张体学郑重宣布：“国民党军向我发动进攻，李先念将军已卒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使美、蒋代表目瞪口呆。

接着，张体学来到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向该处主任吴显忠（中共地下党员）握手告别，然后率旅警卫排和六团一营两个连迅速撤离宣化店。

六团一营营长马启春带领的另两个连，担负着护送三十二执行小组的任务，撤离较晚。当时，美、蒋代表迟迟不走，故意拖延时间。马启春机智地命令部队在宣化店后山上开枪打炮，制造紧张气氛，吓得美、蒋代表急忙钻进汽车向武汉方向开去。马启春将三十二执行小组护送上车后，于当日晚撤离了宣化店。

坚守佛塔山阵地的四团二营指战员亦于6月29日晚撤离阵地，向东进发。

二、分路向东挺进，全旅会师冶溪河

当国民党察觉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行动后，一面密令各部在平汉铁路以东跟踪、堵击，一面围攻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6月29日，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根据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电令，部署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在蒋家大地至槐树店一线“围剿”，重点指向宣化店以东；新十五旅即占领槐树店，经河口镇一线，重点指向吕王城。鄂东独二旅处于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

按照原定计划，独二旅6000余人于6月29日晚分三路向东突围。一路是旅部和第四团，由旅长吴诚忠，副旅长何耀榜、副政委熊作芳率领，从吕王城出发，经华家河、郭家河、檀树岗，向麻城乘马岗方向突围；一路是第五团和旅干部大队，由团长彭超、政委汪进先，大队长黄宏伸率领，从（黄）陂（黄）安南出发，经八里湾、宋埠、白果镇，向罗田三里贩、滕家堡方向突围；一路是第六团（欠第一营）由团长石建金、政委黄世德率领，分别从四姑墩、郭家河出发，向麻城以北方向突围。旅政委张体学率领的警卫排和第六团第一营两个连，完成掩护任务后，从宣化店出发，经卡房、郭家河，亦向麻城以北方向突围。

独二旅第四团于6月29日晚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从前沿阵地撤下来，同旅部一道，向东大山方向运动。沿途经高山岗、豆腐铺、京子沟到郭家河。6月30日夜宿箭厂河以南土门一带，部队又进一步轻装。7月1日行军前，部队集合，熊作芳讲了话。他指出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动员干部战士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奋力东进，向华中主力部队靠拢。会后，部队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道路，向麻城以北方向疾进。

7月1日，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电令整编第七十二师以1个旅的兵力，“肃清新洲、宋埠间及麻城双庙关、两河口间之共军。”国民党军利用举水大涨，在麻城以北地区设置一道封锁线，堵截独二旅东进。当独二旅旅直及第四团行进到麻城乘马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新十三旅两个团堵击。第四团第一、第二营在吴诚忠和团政委萧德明的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何耀榜、熊作芳率旅直和第四团第三营紧紧跟上。后发现国民党军封锁甚紧，加之连日大雨，举水猛涨，不能徒涉，部队即向东北方向转移，撤至麻城林店以东高地。当日晚，张体学率警卫排及第六团第一营两个连亦赶到林店，与吴诚忠、何耀榜、熊作芳等所率旅部和第四团会合，随即召开旅党委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一致认为，当前敌情严重，如不及时突围出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决定部队立即向东北方向行动，绕道麻城以北黄土岗与福田河之间，突肢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会后，部队连夜冒雨急行军。

7月2日拂晓，当第四团进至黄土岗以西一带时，与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1个营遭遇。第四团前卫第一营迅速抢占高地，与之展开激战，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毙伤敌50余人，俘其10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枝。这是独二旅在突围途中的第一个胜仗，士气大振。后来，因国民党军后续部队上来增援，第四团边打边走，于黄昏时向西后撤到潢川至麻城公路以西高地集结待命。

当日晚，独二旅党委与第四团领导一起召开紧急会议。鉴于（黄）安麻（城）经（扶）地区狭小，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封锁甚严，旅直及第四团三次强突均未成功，会议决定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行动。由旅政治部主任余潜和团长张海彪带第四团第一营，从宋埠以北隐蔽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线，经黄冈、罗田、英山到冶溪河；团政委萧德明和旅作战科长石寿堂带第四团第二营从未埠以南隐蔽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线，经黄冈、罗田、英山到冶溪河；团副政委郑锋带第四团第三营沿土门拗绕道八里湾，经黄冈、浣水、蕲春北部到冶溪河。张体学、吴诚忠等旅领导率警卫营、第六团第一营两个连和部分机关干部，由范店向东，绕道福田河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线，经罗田、英山到冶溪河。

会后，独二旅旅直和第四团各营分头按预定方向前进。旅部这一路于7月4日拂晓前顺利通过福田河，渡过举水，进入罗田山区。第四团第一营因沿途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一部阻击，转入麻城歧（亭）宋（埠）公路以西地区，后绕道八里湾，转向肢安南与马启春带领的第六团第一营两个连会合，随即分开行动。第四

团第二营掩护一营撤出阵地后，在麻城黄土岗以西地区与国民党军周旋了3天，于7月6日与折回的一营会合，当一营过河遭国民党军

阻击时，萧德明即令二营四连掩护，使一营顺利渡过举水。傍晚，二营也渡过举水，经（黄）冈北向罗田、英山挺进。第四团三营于7月3日拂晓进抵黄安桃花冲以南地区，隐蔽一天后，从八里湾向东进发，通过新（洲）麻（城）公路，进入黄冈山区。余潜和原地委组织部长赵辛初中途随马启春行动，白天在山林中隐蔽，晚上徒涉举水，亦顺利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线。

与此同时，独二旅第五团在彭超、汪进先率领下，于6月29日从陂安南出发，经急行军于当日晚到达黄安八里湾。第二天，穿越歧（亭）宋（埠）公路时，在石屋山附近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约两个团阻击。担任前卫的三营九连，利用坟地与敌展开激战，掩护团主力迅速冲过公路，于当日下午到达宋埠附近。宋埠是麻城县重镇，镇内驻有国民党军，该镇以北有个碉堡，驻的是地方国民党自卫队，把守着宋埠河。为渡河东进，五团避开宋埠，选择在该镇以北渡河。团领导一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派人给国民党自卫队头目送信。该自卫队慑于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声威，未敢轻举妄动。第五团顺利地渡过举水，经白果镇、罗田三里贩、黄冈庙，向滕家堡方向疾进。独二旅第六团（欠一营）在石建金、黄世德率领下，分别从四姑墩、郭家河出发后，昼夜急行军，向麻城以北方向疾进。由于进展神速，抢在国民党军封锁及山洪暴发之前，于6月30日在福田河附近顺利渡过举水，向罗田方向疾进。

当国民党得知独二旅已突破封锁线，向罗田滕家堡方向突围的消息后，

急忙调兵遣将，接连电令第六绥靖区，竭尽全力，围追堵截，企图“围歼”独二旅于滕家堡地区。7月9日，程潜电令周岩：“罗田附近之共军由傅翼师长并指挥一六九旅负责歼灭”。周岩当即令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傅翼：“限5日内追歼净尽”。7月12日，程潜又电令周岩：“一六九旅兼程进击英山、罗田，傅师长派三十四旅一个营挺进滕家堡，肃清该地区之共军。”7月13日，傅翼即令三十四旅沿平斗山向木子店、滕家堡方向开进；新十三旅、一六九旅向叶家河方向追击，协同整编第五十八师“围歼”独二旅。7月14日，蒋介石电令周岩：“对罗田之共军穷追猛击，勿使脱逃”，并提出：“加紧清乡，组织民众，以地方武力协助国军，分区扫荡，务于最短时期内彻底肃清”。然而，独二旅却冲破了国民党军一道道防线，粉碎其一次次围追堵截，继续向东挺进。

独二旅旅直和第四团自分路突围渡过举水后，一部于7月11日进抵罗田滕家堡与第五团会合，7月14日，当部队进至罗田与英山交界处时，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一部尾追堵击。第四团三营指战员英勇抗击，将敌击退，继续东进。7月16日，旅直大部和四团三营进抵蕲（春）英（山）岳（西）太（湖）地区。

独二旅第五团渡过举水河后，在平湖地区击退国民党罗田一自卫中队的阻击，继而袭击了河铺乡公所，于7月11日进抵滕家堡。该镇国民党保安队望风而逃，后来五团找到了国民党的粮仓，当即开仓济贫，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继续东进。当第五团进至英山杨柳湾时，又遭国民党1个保安中队堵击。敌龟缩在碉堡内顽抗，五团指战员即用棉絮包着稻草和干辣椒点燃后塞进碉堡内，熏得敌人难以抵抗，乖乖地缴械投降。战后，第五团继续向东挺进，于7月16日到达蕲（春）英（山）岳（西）太（湖）边地区，与旅直大部和第四团三营会合。

独二旅第六团（欠第一营）渡过举水后，经龟山尾、木子店向罗田、英山方向前进。途中，第六团三营主动向国民党罗田大河岸乡公所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国民党1个自卫中队，俘其20余人，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部队在大河岸休整两天后，继续东进。当向南迂回到蕲春、浠水边之三角山地区时，又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约1个团阻击。第六团趁敌尚未形成合围之机，边打边走，迅速摆脱了国民党军，向岳（西）太（湖）边挺进。

7月17日，独二旅第五，第六团和旅直大部、第四团第三营，在岳西、太湖边境的冶溪河胜利会师。第四团第一、第二营和旅直一部，以及马启春带领的第六团第一营两个连亦先后赶到冶溪河。在完成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及主力转移之任务，和自身突围的这段时间里，独二旅部队的伤亡并不多，惟非战斗减员约500人，而国民党军企图“围歼”鄂东独二旅的如意算盘，却一次又一次落空了。

第二节 停止东进，艰苦转战大别山区

一、冶溪河会议，部署鄂皖边游击战争

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各团于1946年7月17日在冶溪河地区会师后，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指战员极度疲劳，加之少数部队尚未到达，计划休整一两天，继续东进，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旅党委连夜召开有各团团、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继续东进事宜。7月18日上午，收到华中局复电：祝贺你们胜利突围，苏中打了个胜仗，欢迎你们早日来会合。

7月18日下午，独二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亦称“冶溪河会议”，布置继续东进计划。当张体学正在讲话时，忽接中共中央电示：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的决定，对于刚刚突出国民党军重围而脱离险境的独二旅指战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坚持大别山斗争，就意味着要再一次闯进国民党军的包围圈里去与敌周旋。这不仅要有顾全大局的无私情怀，而且要有藐视困难和战胜强敌的勇气。他们毫不犹豫地坚决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

当天晚上，旅党委研究确定：在蕲（春）太（湖）岳（西）边境地区争取短暂的休整，整理部队，处理干部，进行精简，布置鄂皖边境地区的游击战争。并将这一决定立即电报中原局转中共中央。7月19日，中共中央电复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你们各部在玉珠畈*会合，甚慰。你们决定在太（湖）岳

*玉珠畈位于安徽省太湖、岳西边境，与冶溪河相距很近，当时独二旅旅部驻在玉珠畈。（西）边境休息，整理精简部队，布置鄂皖边境地区的游击战争，均很正确。望紧紧依靠群众，必要时将部队以团、营、连分散，以能打民团及打一连一营之顽军为标准，巧妙地对付敌人，注意部队纪律，到处帮助人民，在鄂皖边建立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为统一领导与指挥鄂皖边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原局决定，以独二旅党委为基础，组建中共鄂皖地委，由张体学任书记，吴诚忠、熊作芳、何耀榜任副书记，余潜、刘名榜、赵辛初（组织部长）、易鹏、林桂华为委员，独二旅党委随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除原部署留易鹏、黄宏伸在鄂皖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外，决定派熊作芳到皖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开展皖西地区的游击战争；赵辛初、漆少川到黄冈，开展（黄）冈麻（城）地区的游击战争；余潜因腿伤到蕲（春）北隐蔽治疗；李继开（旅参谋长）随熊作芳到皖西后化装转移。还决定将第四、第五、第六团改称第四、第五、第六支队，第四支队，由康洪山任支队长，萧德明任政委，下辖四、七两个小团，由秦大进、贺导海分任团长，冯一鸣（现名冯益民）、郑铎分任政委；第五支队，由彭超任支队长，汪进先任政委，下辖五、八两个小团，由潘继义、谢挺分任团长，杨信义、李东成分任政委；第六支队，由石建金任支队长，黄世德任政委，下辖六、九两个小团，由陈国卿、汤楚英分任团长，钟铁夫任六团政委；原新四军第七师派到宣化店执行任务的沿江团第三营第七连，改称鄂皖边独立游击大队，张有道任大队长。吴诚忠、张体学、何耀榜等旅领导分别率领支队或小团分散活动。

冶溪河会议是独二旅在东进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个转折点。它为独二旅留在大别山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援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7月19日晚，独二旅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体学传达了中共中央的

指示和旅党委的决定，要求各团在天明前必须离开冶溪河。7月20日拂晓，独二旅旅直和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从冶溪河出发，各部按照旅党委决定精神，开始分头行动。

二、激战九节沟、来榜河，跳出包围圈

国民党得知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各部在冶溪河地区会合的消息后，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对独二旅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46年7月18日，程潜奉蒋介石关于鄂东之张体学部“应由第四十八与第七十二两师负责清剿”的手令，命令第六绥靖区部署整编第七十二师：以第三十四旅并指挥新十三旅主力，由罗田南下，限7月底“肃清”宿松、太湖、罗田、英山边区及广济、浠水、黄梅、黄冈间之共军；以新十五旅并指挥新十三旅之一部于7月底“肃清”罗山、礼山、黄安、经扶、麻城间之共军。当独二旅团以上干部会议刚结束时，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三十四旅已由英山东北之金家铺、新铺，分三路向冶溪河合击；新十三旅一部置于英山、蕲春边境，分散控制各主要村镇；新十三旅另一部及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四旅作为机动，新十五旅调至罗田地区集结；另以整编第四十八师1个团配合两个保安团，在立煌（今金寨）、霍山、岳西边境严密封锁各险要道口，企图将独二旅一举“围歼”于鄂皖边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独二旅趁合围圈尚未形成之机，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由于独二旅主力预先离开冶溪河，向岳西东北方向转移，国民党军分进合击的计划破产。

7月21日，当独二旅旅直和第四、第五支队进至岳西门坎岭九节沟地区时，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两个团分三路猛扑过来，企图趁独二旅主力立足未稳之际“围歼”于九节沟地区。吴诚忠、张体学当即命令第四支队担任后卫，抢占有利地形，予以阻击。第四支队第一、第三营（仍为原第四团所属的营建制）指战员迅速上山，抢占制高点，英勇击退敌三次强攻。旅直和第五支队边打边走，突出重围，安全转移。此仗，激战7个小时，毙伤国民党军三四百人，这是独二旅反“围剿”中的一次大胜仗。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独二旅指战员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信心。

九节沟战斗后，第五支队留在岳西一带坚持斗争，旅直和第四支队继续向霍山方向转移。当进至霍山境内来榜河一带时，又遭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两个团阻击。国民党军采取“尖刀式”打法，直插独二旅旅部，企图先吃掉旅指挥机关。当时，旅部正在发电报，情况非常危急，旅领导当即命令第四支队从侧翼反击，警卫营插向敌后进击。经过3小时激战，给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以很大杀伤，并将其击溃。旅直和第四支队在夜幕的掩护下转移到鹞落坪。担任掩护的1个连掉队，后来返回到冶溪河地区。

与此同时，第六支队向蕲春、黄梅、广济、英山方向前进。当进至蕲春、浠水交界的三角山地区时，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新十三旅一部阻击。第六支队猛打猛冲，将敌击溃，然后向蕲春方向转移。

国民党反动派“围歼”独二旅的计划失败后，并不甘心。7月25日，蒋介石电令程潜：张体学部“由夏威司令官统一指挥整编四十八师及整编七十二师一个旅，不分地区负责清剿。”7月27日，国民党军新十三旅经蕲春之张家塆、弥陀寺向宿松、太湖尾追独二旅。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第六支队决定留一部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打游击，主力向潜山、岳西、桐城边境之皖山、土地岭地区转移。7月28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进驻蕲春刘公河、

乌铺潭、滕云庙等地设防。独二旅旅直及第四、第五支队为了保存力量，避敌锋芒，向太湖、宿松方向转移，于7月底先后与原新四军第二师路西独立营两个连和第七师沿江团第三营第七连200余人会合。为统一领导与指挥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争，经中央军委7月31日批示，华中二师两个连、七师留桐西游击队和大别山各游击队，由中共鄂皖地委统一领导与指挥。8月初，独二旅旅直及第四、第五支队，经昼夜行军，来到太湖大竹岭。第六支队辗转回到蕲春以北地区。至此，国民党军企图于7月底“围剿”独二旅的计划又宣告破产。

三、主力分散游击，与国民党军反复周旋

1946年8月上旬，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在太湖大竹岭召开旅直和第四、第五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冶溪河会议精神。会上，旅领导分别讲了话，阐明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增强大家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会议根据当时敌情，决定兵分三路，由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各带一路行动。第六支队到达蕲春以北地区后，亦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以营为单位（仍按原第六团所属的3个营建制）分散活动：一营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二营到罗田、英山地区；三营到黄冈、麻城地区；支队部随一营行动，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从此，独二旅各支队分散活动，在鄂豫皖边地区与国民党军反复周旋，渡过了斗争极其艰苦、环境极端险恶的日日夜夜。

8月9日清晨，吴诚忠率第四支队两个营从大竹岭出发，经陈汉沟南的罗汉山，向蕲春，广济方向前进，一路上不断遭国民党军阻击，于8月中旬到达广济十八堡。张体学、何耀榜率第五

支队和第四支队的1个营，向南行动，顺利地进至太湖西南之二郎河边，然后取道黄梅北望江山前进，于8月中旬抵达岳西鹞落坪、榆化冲一带。熊作芳率旅警卫营一部、新四军第二师1个连

及第七师1个班，还有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共300余人，于8月9日晚离开大竹岭，向桐城、潜山方向转移。第二天拂晓，当该部进至大竹岭东南一山口处，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八师一部遭遇。熊作芳当即命令警卫连副指导员张凯辉带1个排从左侧迂回上山，在丛林中开辟了一条通道，使部队隐蔽转移。警卫营二连在后面掩护，被国民党军截断，部队被打散，电台被打坏，只少数人员辗转返回鄂东。熊作芳率200余人继续向东疾进，当部队到达太湖薛义河时，河面又遭国民党军封锁。在腹背受敌的危急情况下；熊作芳当机立断，命令1个排强行渡河，迅速抢占河对岸制高点，用机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部队顺利地渡过薛义河，于8月13日到达潜山后冲，先后与原新四军第二、第七师留下的部队和游击队领导人刘海燕、钟大湖、张伟群等（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到华中局汇报未回）会合。从此，在皖西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独二旅分散活动后，国民党军则由集中“追剿”改为分散“清剿”，并“以绝对优势兵力配合地方保安团队，形成重层包围，逐步紧缩，由外向内”，企图对独二旅予以各个击破。国民党军还到处修碉堡，安据点，设游动哨、“递步哨”，扼守交通要道，同时强化基层反动政权，严厉推行保甲制度，大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制造“无人区”。还采取粮食封锁、米中下毒等恶毒手段，妄图割断与破坏独二旅各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独二旅，地下党和游击队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当时，粮食、衣服、弹药的

补给和伤病员的治疗与安置，均成了大问题。部队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以野菜、树叶充饥；晚上没有地方住，就钻山洞，搭草棚，在深山荒野露宿；伤病员缺医少药，靠自采中草药治疗，伤口溃烂，只有盐水消毒。战士们忍饥挨饿，赤脚行军，有时一天转移数次，行军50多公里，腿走肿了，脚掌磨烂了，仍坚持爬山涉水，唱着革命歌谣。尽管环境如此艰苦，斗争如此残酷，指战员和游击队员仍斗志旺盛，情绪饱满，充满着胜利信心。但是，由于每天处于行军作战中，部队极度疲劳，掉队生病者甚多，仅半个月，非战斗减员近1000人，不少干部、战士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中英勇牺牲。

面对严峻的形势，张体学于8月11日电报中共中央并中原局、华中局：“敌决心歼灭独二旅。我决心：一是集中两个团主力，东征到苏皖；二是在大别山坚持，在思想上精神上准备作最严重最危险的斗争。”8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在大别山准备长期坚持斗争的方针，这对华北、苏北斗争配合上，将来发展中原区，均有重大战略意义。望克服困难，团结同志，依靠群众，完成这一光荣任务。”8月17日，张体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独二旅决心坚持大别山斗争，“不论情况如何严重，不会全部失败，总可以保存小部力量，作未来发展。”

8月中下旬，独二旅各支队和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机动灵活地在其夹缝中穿插，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使国民党军无可奈何。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傅翼因“进剿不力”被撤职。8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大举向岳西鹞落坪、榆化冲一带进攻，独二旅第五支队奋起抗击。战后，两个小团分别向英山、罗田方向转移。吴诚忠率领第四支队到达广济十八堡后，亦分两路，向蕲春、英山方向转移。8月21日，第六支队一部400余人到达黄冈铁冶地区，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特务营和黄冈自卫中队阻击，双方展开激战，敌特务营营长和自卫中队中队长被打伤。第五支队在鹞落坪、榆化冲一带战斗后，小五团由汪进先率领，边打边走，向西转移。8月下旬，当部队进至蕲春将军山时，与敌遭遇，展开激战。这一仗打得很残酷，小五团伤亡300余人，不少人掉队失散。汪进先因病转移到黄梅隐蔽治疗，后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剩下的少数部队辗转战斗，最后到了经扶、黄安交界的东西大山。小八团由何耀榜、彭超带领，向英山方向转移，在陶家河与张体学率领的第四支队一部会合，后分路向西挺进。易鹏、黄宏伸领导的鄂皖边武装力量，抓住国民党“清剿”的重点在山区，而沿江沿湖地区相对比较缓和的机会，留少量部队在山区坚持斗争，先后派干部带领小部队到沿江沿湖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坚持山上斗争的人员白天隐蔽，晚上活动，有时为了跳出国民党军之包围圈，一日数移，行军50余公里。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也不得不承认，共军“装备简单，行动迅速，善长游击战及短促战斗，并熟悉夜间动作，飘忽无定，使我军追剿困难”。

9月初，张体学率第四、第五支队各一部辗转到了广济十八堡，与易鹏、黄宏伸等会合。根据中央军委8月24日复电：“同意你卒主力一部至罗（山）商（城）经（扶）行动”，以及9月3日李先念电示：“派黄世德率一支精干部队，带电台到桐柏、大洪两山及京（山）应（山）云（梦）天（门）汉（川）等地，以便与所有零散部队取得联系”的指示精神，张体学决定向西行动。临走前，部署易鹏、黄宏伸率部队攻打广济县城、掩护独二旅主力西进。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鄂东独二旅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程潜于8月31日电令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杨文琼，以主力及配属一七四旅先于独二旅外围，以营为单位构成战略据点，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务期“围剿”独二旅于英山南北地区。9月1日，整编第七十二师部署新十三旅，配属一七四旅、保安四团“围歼”僧塔寺、英山间共军之主力；三十四旅、保安五团与一二旅1个营“清剿”英山、黄梅、广济间之共军；黄梅、宿松、太湖、潜山、岳西、霍山、立煌、浠水、广济等县以地方武力及配合之保安团队，守备各主要交通线，形成第二道包围圈。并令在9月4日前完成各战略据点之占领与控制，5日晨开始围攻，9月10日前彻底“歼灭”英山南北地区之共军，否则，“团长以上主官定予处分”，“若突破第二道包围圈，经过各地县长以下各行政长官均应严惩”。整编第四十八师得知独二旅主力一部向西转移后，亦分别在蕲春、黄梅、广济及浠水、罗田、英山设立“三县联防指挥部”，设置三道包围圈，扬言“三个月内全歼鄂皖边共军”。9月4日，程潜又电令第六绥靖区，成立“鄂豫皖三省边区清乡指挥部”，下设3个“清剿区”，由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杨文琼、鄂二区专员蔡文宿分别兼任“第一清剿区”正副司令，负责平汉铁路以东鄂豫皖边地区之“清剿”。限令其务必要“一个月内全歼鄂豫皖边共军”，否则“清剿区司令以下、营长以上暨保安大队长，统应一律严惩”。在国民党武汉行营一再严令下，整编第七十二师等部慌忙调兵遣将，到处修筑碉堡，严密封锁各主要交通要道，企图对独二旅进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各县保安团队配合区、乡自卫队空舍清野，勒令山上群众下山并村，扬言“通共者统统杀头”。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自卫队还到处搜山烧山，把粮食抢光藏光，妄图把独二旅指战员困死、饿死在山上。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独二旅和地下党、游击队与敌展开了殊死斗争。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林桂华就是在这段时间身负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的。当时林桂华带着16名手枪队员出去活动，在黄冈但店区贺拗许家社被国民党县大队包围。他命令手枪队长带队突围，自己在后面掩护，不幸中弹负伤，后被国民党县大队抓去，押解到武汉行营。在狱中，国民党软硬兼施，逼他自首，林桂华坚强不屈，拒医绝食，后英勇牺牲。9月上旬，小八团进到英山尖及朱家山地区，遭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一部四面包围，形势异常危急。支队领导当即命令九连迅速夺取制高点，将敌击退。小八团沿着九连冲开的通道突围，很快冲出了包围圈，与此同时，张体学所率第四支队一部进至大月山、观音山一带，遭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二师新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夹击，激战4小时，将敌击溃，继续西进。吴诚忠所率第四支队另一部转移到英山牛头冲，遭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1个团前后夹击，部队被冲散。吴诚忠带领100余人，白天隐蔽，夜间行动，因遭敌不断阻击，他未能跟上部队，只身回到立煌老家隐蔽，后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萧德明带领第四支队一部冲出包围圈后，与黄世德、马友才会合。

9月5日晚，萧德明、黄世德、马友才率部队从将军山来到蕲春乌沙贩女儿寨宿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第一二团跟踪尾追。翌日拂晓，指战员们还在睡觉，被该团包围。在这危急关头，黄世德带1个连向敌发起冲击，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残暴的国民党反动派，割下他的头挂在张家塆树上“示众”。萧德明、马友才冲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后，与冯一鸣会合。后来，各支队会合的部队约七八百人，相继来到蕲春桐山冲。张体学即召集

全体人员大会，再次说明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意义，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战斗，争取胜利。

正当独二旅处境极端困难时，中央军委于9月6日电示张体学：“现在皖东方面敌情较轻，如你处立脚十分困难时，可留一部在当地分散游击，你率主力向东取皮（定均）徐（子荣）路线去华中解放区。”当时，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霍山、立煌、岳西、太湖、桐城一线，东进华中亦相当困难；加之长期行军打仗，部队极度疲劳，难以再远距离行军作战，遂决定部队继续西进。

9月中旬，张体学率第四支队一部急行军，经蕲春、浠水、黄冈向西疾进，沿途不断遭国民党军阻击、侧击、追击，于9月17日到达黄陂木兰山地区。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即令新十三旅两个团跟踪穷追；新十五旅两个营于大小悟山、东西大山堵击。9月19日，第四支队一部进入大小悟山地区时，被尾追之新十三旅三十九团咬上；又遭新十五旅四十五团侧击、堵击。张体学率部冲出重围后，于9月20日晚抵达黄安南两道桥。这时，新十三旅三十九团一营前卫连又尾追上来；第四支队一部与敌展开激战，将敌击溃，伤、俘敌数人，缴获步枪2枝，子弹6箱，随后向经扶方向转移。

与此同时，何耀榜、彭超所率之第五支队一部约二三百人，雨夜行军至罗田与麻城交界的大山时，误入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他们利用晨雾分散隐蔽突围，何耀榜、彭超带手枪班20余人，绕过敌人的岗哨，突出重围，渡过举水，经黄安七里坪到达东西大山，不久与刘名榜会合。萧德明、冯一鸣，马友才等率100余人抵达浠水汪岗，分乘三条船夜渡上巴河，部队大部失散；余部约30人，经黄冈大崎山，西渡举水，亦辗转到了东西大山、与何耀榜、刘名榜会合。这时，平汉路西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为

了与鄂东独二旅取得联系，在张波、宁淮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经宣化店、高山岗、豆腐铺到达东西大山，先后与刘名榜、何耀榜、萧德明等会合。战友重逢，格外亲切，队伍扩大了，指

战员们情绪很高，在天台山、老君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一七六旅及经扶保安团打了一仗，给敌人以很大杀伤，还

袭击了一些乡公所，歼灭乡保队数十人，缴步枪20余枝。

9月21日，张体学再次请示中共中央并中原局：“我部处境非常困难，久于大别山，可能全部失败，如开华中去，部队难于再继续远距离行军作战，沿途亦可能被敌歼灭或拖垮、追垮，坚

持与走，请中央详示。”中央军委于当日电复：“如十分困难，可到

大洪、桐柏二山活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体学决定与敌

“兜圈子”，继续西进，于9月24日抵达经扶东17.5公里之西高

山地区，25日进至八里畈、张家田铺附近地区。国民党军新十

三旅三十九团、商城自卫队和经扶保安大队跟踪追击、侧击，均

被击退。9月2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命令新十三旅，

除留一部于黄安七里坪、郭家河、礼山一带外，主力积极与豫九

区协力“围歼”张体学部。随着敌情的变化，张体学当机立断，放

弃了西进计划，率部重返大别山腹地，继续与敌周旋。

四、主力大部受挫，派代表赴南京汇报

从1946年9月底10月初，国民党军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

对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和游击队展开了第三次“围剿”。9月24日，

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长兼“第一清剿区”司令杨文琮奉程潜电令，部署在“清剿区”内成立4个分区，任命王景宋、祝顺锬、杨本固、江涛兼任一、二、三、四分区司令，指挥所属部队及辖区保安团队，对独二旅、游击队进行“分区清剿”。国民党在加紧军事“清剿”的同时，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妄图把独二旅和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深山荒野。面对残酷复杂的恶劣环境，独二旅指战员和游击队员毫不气馁，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白天隐蔽，晚上活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10月上旬，张体学、郑铎各率第四、第五支队各一部在经扶胡家坪一带击退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和新十三旅的阻走后，经麻城、罗田、英山等地，于中旬到达稀水境内的大灵山，与石建金、汤楚英等带领的第六支队一部会合。张体学当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斗争形势，研究下步行动。为了继续完成战略牵制任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部队向西行动，与转战鄂中的李人林部会合。为便于统一领导与指挥，将各支部队整编为独二旅新四团，由汤楚英任团长，郑铎任政委，石建金调旅部任参谋长。下辖5个连队，共400余人。新四团成立后，休整一天，即从大灵山出发，经下田铺、仰天窝等地向西挺进。10月14日，当部队进至罗田观音山、骆驼坳地区时，发现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第一一团紧跟尾追。张体学当即命令汤楚英带一、四连和特务连迅速占领骆驼坳附近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转移。当国民党军扑来时，新四团的3个连奋勇冲杀，毙伤敌数十人。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调头就跑。

骆驼坳战斗后，新四团继续向严家坳、大崎山、象棋山方向转移，通过歧（亭）宋（埠）公路，经八里湾，于10月下旬抵达黄陂王家河。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闻讯，令新十三旅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前堵后追，两面夹击，企图把新四团“围歼”在黄陂、孝感交界的滑石冲地区。张体学果断地命令郑铎带一、二、三连迅速占领周家大湾后山制高点，向矿山转移；汤楚英带四连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经一天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次冲锋，于当日夜晚突出重围，此次战斗，旅机要科长失踪，密码丢失，电台被迫封存。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转移到黄安两道桥。新十三旅紧跟尾追，驻黄安县城的国民党军亦赶来截击。张体学令汤楚英带两个连在紫云寨地区设伏，国民党川军一个连毫无警觉，大摇大摆地走来。当敌人钻进“口袋”时，埋伏着的指战员犹如猛虎扑上前去，一举将其全歼，击毙该连连长，俘其60余人，缴获步机枪40余挺（枝），子弹30余箱，这是新四团成立以来主动设伏出击的一次大胜仗。

10月23日，中共中央曾再次电示张体学：“为保存精华，望你率数百人相机入大洪山与李人林部会合，休息一时期，或至桐柏山相机转豫鄂陕边区。”后因西线敌情严重，程潜已部署整编第七十二师等主力在麻城、经扶、礼山、黄安、应城、应山、安陆、京山及襄河东岸等地防堵甚严，新四团遂决定返回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10月底，张体学率新四团30余人又回到广济十八堡，再次与易鹏、黄宏伸会合。独二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反复与敌周旋，主力受到很大损失。到11月上旬，独二旅加上原新四军第二、七师留下的部队和游击队，以及一批地方干部，总共还有约1000人。这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力量，二三十人一股，分布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完全便衣化。

鉴于独二旅大部分主力已失，处境极端困难，张体学在广济十八堡张婆岩与赵辛初、易鹏研究决定，派广济干仕区区委书记干淑斌化妆赴南京，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独二旅情况，请示下一步行动。11月6日，干淑斌秘密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周听后对独二旅的处境十分关心，当即将干淑斌汇报的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并中原局，指出：独二旅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是完全值得的，应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斗争。11月8日，中原局电报周恩来转干淑斌：“完全同意张部分散，以便依靠群众和统一战线，求得生存，以待时机为基本方针。”11月22日，张体学再次派程全去南京向董必武汇报独二旅情况。董必武听后，又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电报中共中央及李先念、任质斌，指出：大别山是战略要地，大别山游击战争要继续坚持，要想办法保存革命种子，以待将来之发展，张体学将部队安置好后来（南）京。11月24日，李先念、任质斌对张体学部的今后斗争问题致电董必武，指出：“大别山的游击战争，原则上仍要决心坚持。依靠大别山的群众及统战关系，谨慎地处理问题，是可能留一部分种子，以待时机成熟时，仍能起重大作用。但吴诚忠、张体学应立即离队到解放区。”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原局的这些指示，使正在顽强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独二旅指战员和地下党、游击队，受到很大鼓舞，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12月中旬，张体学、赵辛初在化妆转移之前，对鄂皖边的斗争作了部署，并代表中共鄂皖地委宣布正式组建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由易鹏任书记。1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张体学、赵辛初由马启春、贺导海、邹一清、刘君等带1个班护送到安徽宿松附近，通过社会关系化妆转移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又经北平转赴延安。独二旅留下的骨干力量和各支游击队，仍在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第三节 分片坚持鄂豫皖边游击战争

一、皖西地区

1946年12月中旬，张体学等离开鄂东后，留在大别山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有：熊作芳、桂林栖领导的中共皖西工委及地方武装；易鹏、黄宏伸领导的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及地方武装；何耀榜、刘名榜领导的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及地方武装；漆少川、程鹤鸣领导的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及地方武装。这4个中心县（工）委，犹如四面红旗飘扬在绵亘千里的大别山上，而且握有人数不等的武装力量，少的百八十人，多的四五百人。此外，还有陂孝礼游击队等零星武装，总数约1000人，他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紧紧依靠大别山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坚持武装斗争，始终屹立在大别山区。1947年春，国民党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整编第七十二师奉命调平汉铁路沿线及路西担任守备任务，留在鄂豫皖边的还有整编第四十八师和一些保安团队。在敌情稍为缓和的形势下，各片游击队趁机主动出击，消灭国民党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打击首恶分子，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在皖西地区，熊作芳带领的鄂东独立第二旅一部和一批地方干部与原新四军第二、第七师留下的部队和当地游击队会合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由熊作芳代表中共鄂皖地委统一指挥这一地区的部队和游击队。他们利用原来的工作基础，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共产党的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点和比较隐蔽的活动点，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乡、保人员保持中立，或暗中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使皖西游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了与张体学取得联系，熊作芳曾于9月下旬派张有道带3名侦察员到鄂皖边，经10多天寻找，未打听到独二旅的消息，又辗转返回皖西。12月上旬，熊作芳亲率警卫排、手枪班，侦察班及机关干部50余人，到鄂东蕲春、英山一带找张体学，由程一湘带1个连护送到皖山，结果仍未打听到独二旅的去向。返回途中，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一部袭击，未受大的损失。12月中旬，为了统一领导与指挥在皖西的原新四军第二、第五、第七师的部队和游击队，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仍称皖西支队，由钟大湖任支队长，桂林栖任政委，张伟群任副政委，程一湘任政治处主任（同时增补为皖西工委委员）。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英存秀，教导员刘健民；第二大队大队长张有道，教导员张国平；第三大队大队长杨震，副教导员高明源。

1947年1月上旬，皖西工委派程一湘去华中局汇报情况（程去后被留下另行分配工作）。皖西支队各大队在各自活动地区，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1月下旬，第二大队夜袭怀宁县三桥镇，打死国民党高等法院推事程克强和1名中队长，消灭了乡公所自卫队，缴获长短枪30余枝。2月下旬，张有道又带领第二大队下山，在桐城白门头公路上打伏击，击毙国民党军怀（宁）太（湖）师管区中将司令张凌云以下6名将校军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文件，这对国民党震动极大。

2月下旬，桂林栖带1个警卫排和20余名干部从苏北回到皖西，先后召开支队领导和各大队长、县委书记会议，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通报了独二旅在鄂东、豫南坚持游击战争，后由于敌众我寡，主力大部损失，张体学已化装转移的情况，传达了华东局国区工作部曾希圣部长的指示，决定留熊作芳继续在皖西工作，并以熊作芳、桂林栖为主，扩大工委组

织。新的中共皖西工委，以熊作芳、桂林栖、钟大湖、张伟群、滕野翔、刘秀山、王进臣、张有道、杨震为委员。下辖3个县委、两个工委：岳北县委，由滕野翔任书记；潜太县委，由刘秀山任书记；舒六县委，由王进臣任书记；桐庐工委，由余平任书记；庐北工委，由张家英任书记。同时，皖西支队也扩编了两个大队：第四大队，由黄抑强任大队长，宋平任教导员；第五大队，由姚守永任大队长。从此，皖西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皖西工委所控制的地区发展到27个乡。

3月中旬，中共皖西工委商定，由熊作芳去华东局请示汇报工作。他带着警卫员舒成友，由秘密交通员何东初带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乘海轮到山东日照县十字坡，会见了曾希圣，受到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的接见。当熊作芳准备从原路返回皖西时，因先期动身的秘密交通员和两名译电员被捕，熊作芳转道邯郸、冶陶到了山西晋城。熊作芳离开皖西不久，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等率部东渡襄河，回师大别山，转战到了皖西，会合钟大湖、桂林栖领导的皖西支队，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使皖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二、鄂皖边地区

中原突围后，易鹏，黄宏伸留在鄂皖边坚持游击战争时就有3个县委：中共蕲（春）太（湖）英（山）浠（水）边县委，由钟子恕任书记；中共蕲（春）宿（松）太（湖）边县委，由黄再兴任书记；中共浠（水）蕲（春）英（山）罗（田）边县委，由徐协农任书记，于保诚、李壁东任第二、第三书记。还建立了中共广济干仕区委，由干淑斌任书记，干鹤任副书记。1946年12月中旬，以易鹏任书记的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成立后，紧紧依靠大别山的基本群众，渡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

1947年春，当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不断遭到打击，被迫从鄂东抽调部队增援，因而鄂东敌情日渐缓和时，鄂皖边中心县委及其所率武装力量，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出击。1月上旬，他们先后消灭了蕲（春）北田家桥乡、蕲（春）东莲花庵乡的自卫队，破坏了国民党的通讯联络，搞到了一部分经费。接着，又在黄梅高山区梅水山，与国民党县自卫队展开激战。当时大雪纷飞，敌人踏着雪迹跟踪而来，游击队果断出击，该自卫队丢下4具尸体，抬着伤员仓皇逃遁。而后他们又长途奔袭了广济郑公塔乡自卫队，缴获步枪30余枝；包围袭击了驻栗木桥的国民党黄梅县政府警备队，缴获步枪6枝。

1947年3月，鄂皖边中心县委在广济四望山竹林湾召开各县负责人会议，讨论调整充实中心县委领导机构和建立工委及军事指挥机构等问题。会议决定由易鹏、黄宏伸、郑重、邹一清、张凤林、何启、孙超为中心县委委员，易鹏为书记，邹一清为副书记。建立鄂皖边中心县军事指挥部，由黄宏伸任指挥长，易鹏兼任政委，孙超为副指挥长，郑重为副政委。不久，王兴发回到了鄂皖边，又增补为中心县委委员兼军事指挥部副指挥长。中心县委下辖3个工委：黄（梅）广（济）边工委，由邹一清兼任书记，蔡琼任副书记，马启春任游击总队长；广济工委，由鲁岱任书记，贺导海任游击总队长；蕲南工委，由何启任书记，姚广顺任游击总队长。从此，中心县委领导的约500人的地方武装和一批地方干部，成了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4月中旬，黄广边游击总队100余人，突然从广济武穴附近横渡长江，挺进鄂南、赣北，沿途摧毁了国民党乡保武装多股。5月中旬，鄂皖边中心

县委派孙超带1个排到皖西，与皖西工委互通情况，皖西工委即调营级干部胡运德到鄂皖边工作。这时，又建立了两个工委：蕪（春）宿（松）太（湖）边工委，由胡运德任书记兼游击总队长（下辖蕪东、张家塆、檀林河3个区委）；黄（梅）宿（松）边工委，由余土均任书记。6月上旬，鄂皖边中心县根据形势的发展，抓住战机，部署各县游击武装主动出击，在蕪春、黄梅、广济地区，袭击了许多国民党乡公所自卫队。广济游击总队夜袭了高家新铺乡自卫队，接着袭击仓头埠乡自卫队，缴获步枪6枝，手枪1枝及部分弹药。7月中旬，黄广边游击总队袭击了黄梅王家河乡自卫队，歼其1个班。黄宿边游击总队夜袭了广济花桥乡自卫队，缴获长短枪30余枝。8月中旬，鄂皖边中心县军事指挥部和黄广边游击总队运用夜间奔袭战术，一举攻占广济龙坪，摧毁国民党碉堡2座，俘其排长以下40余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枝。不久，鄂皖边中心县军事指挥部又袭击了蕪春白水畈乡自卫队，俘其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枝。这一连串的主动出击，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8月下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鄂皖边中心县军事指挥部派手枪队刘君、张民权两人，前去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取得联系。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在蕪春胡家凉亭亲切接见了鄂皖边中心县委书记易鹏和指挥长黄宏伸。鄂皖边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先后投入了战略进攻的滚滚洪流。

三、罗礼经光地区

中原突围前夕，中原局决定在罗礼经光地区重组中心县委，刘名榜任书记，萧先发、邱进敏、徐锡煌为委员。突围后，何耀榜、彭超、萧德明、冯一鸣，马友才等率部先后到达东西大山与刘名榜会合，调整了中心县委，由何耀榜任第一书记，刘名榜任书记，增补萧德明、马友才为委员。

1946年深秋初冬，国民党调集1个正规旅，纠集4个保安团和乡保武装近万人，将东西大山分割成许多小块，然后用“梳篦战术”，逐个山头进行搜捕。国民党在加紧军事“清剿”的同时，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还一面下“通缉令”，用重金悬赏捉拿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人，一面又用卑鄙手段，派人送“委任状”，妄图用高官厚禄来诱降；尤其狠毒的是他们带着叛徒，冒充游击队员，深更半夜到处敲门，基本群众和“堡垒户”一时难辨真伪，往往上当。国民党如此残酷的“清剿”，使地下党和游击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游击队员们在深山荒野，给养严重缺乏，有时连野菜，树叶也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夜晚寒气袭人，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只好拣些柴火取暖。游击队员们蓝天当被，大地当床，睡在荒山野林，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中心县委委员萧先发，就是在带领游击队员踏雪下山筹粮时，不幸从悬崖摔进深谷，身负重伤后牺牲的。面对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剿”，中心县委确定彻底分散，进行隐蔽斗争，终于渡过了严冬季节。

1947年春，国民党正规军逐渐调离豫南、鄂东，形势日趋缓和。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研究决定，各县游击队统一行动，下山出击，变被动为主动。1月上旬，邱进敏带领5名游击队员，从西大山出发，直插黄安七里坪，在郭家河下店与七里坪交界的蚂蚱口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他们先抓了1个俘虏，得知后面还有国民党军3个连长带1个排押运物资。邱进敏立即在路旁设伏，当押运货物的国民党军进入伏击区时，游击队员们勇猛扑去，当场击

毙其走在前面的两名士兵，余部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溃逃。这一仗，缴获了国民党军1个营全月的薪饷（共900多万元法币）和一批药品。同时，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各县统一行动，处决了一批叛徒、敌探和反动保长。散会的当天晚上，各县立即行动，杀掉了罪大恶极的叛徒叶道强、敌探叶成凯、联保主任胡华山、民团队长张忠汝等。何耀榜还利用敌设赌唱戏之机，镇压了经扶县参议员、恶霸地主杜定廉。中心县委的这一行动，使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游击队员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激怒了国民党县长李建刚和保安团长黄古儒。他们派保安团到处逮捕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的家属，妄图迫使游击队屈服。何耀榜等亦通过各条渠道向敌传话、送信，严正警告李建刚和黄古儒：“如果你们杀我1个家属，我们就以牙还牙。”国民党慑于游击队的声威，不得不将逮捕的家属全部释放。何耀榜等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量争取一些开明人士和中立的保甲长，使有的保甲成了两面政权，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2月中旬，何耀榜不顾严重腿伤，带领20余名游击队员下山，到宣化店以西地区活动。他一面做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乡保甲长保持中立；一面镇压极少数民愤极大的乡保长。经过一段工作，有的国民党乡保长不敢公开与游击队为敌，有的保甲政权实际上被地下党控制，为游击队筹粮食、开路条、送情报、养伤员。何耀榜在宣化店周围活动了1个多月，于4月初返回天台山潘家河一带与刘名榜会合。不久，中心县委在天台上鸡公寨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调整充实中心县委的领导机构和成立军事指挥部等问题。会议决定何耀榜任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为副书记，增补彭超为中心县委委员，徐锡煌兼任中心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中心县委下辖3个县委：经光县委，书记邱进敏，副书记冯一鸣；罗礼县委，书记萧德明，副书记马友才；黄安县委，书记彭超。从此，罗礼经光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4月下旬，在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之时，由于和上级党及其他地方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加之根据地经济比较困难，中心县委研究决定，旅萧德明带10余人去找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漆少川。一是和他们接头，并找刘敏与鄂皖边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二是筹集一些经费。萧德明到黄冈后，向漆少川通报了情况，并筹得经费约四五百万元法币。后来由于敌情严重，未找到刘敏又返回东西大山。7月，正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再次决定派萧德明、彭超等去黄冈找漆少川通报情况并筹款。不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萧德明、彭超等留在黄冈坚持斗争。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进入经扶，邱进敏、冯一鸣带领游击队在陡山河岗店与第六纵队先头部队会合。9月初，第六纵队第十七旅与何耀榜、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在黄安七里坪会合。从此，活跃在东西大山的各县游击队，又汇入了战略进攻的战斗行列。

四、冈麻罗英地区

早在中原突围前，以林桂华为书记的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就领导几支手枪队，在大崎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中原突围后，反共老手、国民党黄冈县长朱怀冰叫嚷“在3个月内消灭黄冈的共党”。他纠集裸安团队，配合正规军，到处修碉堡、设路卡、安“递步哨”，对游击队进行毁灭性的“清剿”。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中心县委领导的几支手枪队转入隐蔽斗争。11月下旬，

漆少川率独二旅第六团一部来到黄冈，与隐蔽在贾庙区的中心县委副书记程鹤鸣及委员漆先庭取得了联系。鉴于中心县委书记林桂华牺牲等情况，决定重组黄冈中心县委，由漆少川任书记，程鹤鸣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增补刘敏、廖鹏为委员（后来，钟子恕转战到了黄冈，增补为中心县委副书记）。中心县委下辖两个县委：（黄）冈麻（城）边县委，由程鹤鸣负责；罗（田）英（山）边县委，由刘敏、廖鹏负责。还有1个手枪队，由梅建明、余汉卿、曹建亭先后任队长。另有两个直辖区：贾庙区，由林伯平任区长；三庙河区，由欧少伦任区长。在新的中心县委领导下，冈麻罗英地区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

1947年1月中旬，漆少川在黄冈孙家冲开会，决定对手枪队进行整训，加强组织纪律，要求人人“造窝”，提出“黄鹰不打窝下食”的口号，跳到外围活动，以减轻游击根据地的压力。会议结束后，手枪队分三路到外围活动：一路由曹建亭带领，到（黄）冈罗（田）边地区；另一路由余汉卿带领，到（黄）冈麻（城）边地区；还有一路由梅建明带领，到（黄）冈西地区，漆少川、漆先庭跟梅建明一起活动。从此，冈麻罗英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

1947年春，国民党正规军开始撤离大崎山区。黄冈中心县委抓住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利用各种机会和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解除群众顾虑，并采取统一行动，镇压了一批叛徒、特务和一贯反共的乡保长，摧毁了国民党在大崎山周围设的“递步哨”，使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一些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开始向手枪队靠拢，手枪队白天也能公开活动了。9月中旬，漆少川和萧德明带领手枪队在麻城象棋山附近的夫子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胜利会合。

此外，还有罗辛楚、陈庆朋带领的肢孝礼游击队，在大小悟山坚持武装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章中原突围的历史功绩及其经验

第一节中原部队的战略坚持、胜利突围 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

一、为部署巩固华北、华东和争取东北的战略全局赢得了时间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是中国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新四军第五师及随后由其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嵩岳）军区等主力组成的中原军区部队，在这一阶段中坚守中原解放区达10个多月之久，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所作的各种努力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为巩固华北、华东和争取东北的战略全局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地规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华东、坚持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中原解放区处于江河淮汉之间，横跨平汉铁路南段两侧，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原部队在中原解放区进行战略坚持，既把住了整个解放区的南大门，又犹如一把利剑插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脏。因为中原解放区对于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人民军队来说，是急需发挥其重要战略作用、势必首先奋力坚持的地区。守住该地区，可以扼制华中重镇武汉和平汉铁路南段，这是人民军队向南防御体系的屏障和前哨阵地，也是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战场。中原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其贯彻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和速战速决的方针，将屯积于西南地区占总兵力51%强的部队运往打内战之前线的必夺之地；同时，占领了该地区，还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中原部队坚守中原前哨阵地，则成了国民党军不可逾越的第一道障碍。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派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人民军队。至1946年6月中原突围战役前夕，蒋介石用来围攻和防堵中原人民军队的兵力就达30余万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0个多月里，中原部队坚守中原前哨阵地，以五六万人对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将其死死拖住，顽强拼搏，并在自卫作战中，毙伤俘国民党军1.5万余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再延缓进攻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进度表，从而为人民军队部署巩固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和进军东北，完成由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正是在这10个多月里，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建设重要的战略基地；及时将分散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区域的兵力集中到江北，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还调整和建立、健全了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对若干军事区域作了新的划分，并组建了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从组织上保证了人民军队的作战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的兄弟部队迅猛地扩大解放区，胜利地开展了受降工作。到1945年10

月，人民军队仅在关内（不含东北）就歼灭日伪军23万余人；
收复中小城市197座，连同原有的89座，共取得中小城市286

座；收复国土 31.5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870 余万。到 1946 年 6 月，连同东北在内，解放区面积共达 239.1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4；解放区人口约有 1.5 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3；人民军队总兵力达 120 余万，装备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与抗日战争结束时相比，人民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

中原部队在战略坚持中将大批国民党军吸引在自己周围，不仅直接阻滞了国民党以更多兵力进犯华北、华东和抢占东北，而

且有效地配合了华北、华东乃至东北人民军队的作战。自重庆谈判开始至停战命令下达前，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军民，为粉碎国民党军深入华北、打通进军东北通道的企图，对国民党军的进犯进行了坚决反击，先后举行了上党、邯郸（平汉）绥远、津浦路徐（州）济（南）段等重要战役，有力地保卫了华北和其他解放

区，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并加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谈判中的地位。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和随后组成的中原军区部队，亦于 1945 年 10 至 12 月举行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吸引与牵制了国民党军的 11 个军 24 个师及 8 个游击纵队。这既紧密地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同期发起的各个战役战斗，也起到了与上党、邯郸、绥远、津浦等重要战役同样性质的战略作用。毛泽东在此期间曾指出：“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东北及华北的胜利有极大帮助”。刘少奇当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局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

随着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又带领全党和解放区军民进一步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练兵运动，并发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相继展开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原军区部队面对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在力争合法转移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的情况下，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推迟中原内战的爆发而竭尽全力，继续进行战略坚持，从而争得了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的更为宝贵的一段时光，为兄弟解放区充分做好上述准备工作提供了时间保障。

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 10 个多月的努力，整个解放区的武装力量、物质力量和群众力量都有了较大增强，从此人民军队在战略上摆脱了被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的局面，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对其实行南北夹击的计划，奠定了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坚实基础。

二、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中原突围战役为起点，截止 1947 年 2 月，中原军区部队转战了 8 个月。这 8 个月，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艰难时期，是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粉碎其“全面进攻”的关键时刻。

中原突围战役的发起，是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其主力部队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晚主动撤离宣化店、开始举行分路突围为标志的。它作为一个战役，其结束时间，则与中原军区部队战略转移终点的选择密切相关。7 月初，当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军同时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后，适时修改了原定的关于南北两线作战计划中的南线部分，将外线出击改变为实行内线歼敌的方针；同时对正在突围中的中原军区部队之战略转移终点作了追踪决策；将原定的“转至陕甘宁边区”，改为“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

利”，并“在敌后创立根据地”。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指示，先后于7月17日至31日结束了自身的突围行动，开始执行新的战略任务。整个中原突围战役自6月26日起至7月31日止，历时36天。在36天中，仅有5万余人的中原军区部队，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一举杀出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军16个整编师32个整编旅36万余人的围追堵截。并在上百次战斗中，毙伤俘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官兵1万余人。而中原军区部队仍保存了4.4万人，取得了以1对7、以弱胜强的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革命军事部署，迟滞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当年7月15日，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名义在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的电报中深刻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国民党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等，当时也毫不掩饰地说：“李先念部企图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

中原突围战役结束后，中原军区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时调整部署，在鄂、豫、皖、川、陕等广大地区创建敌后根据地，在外线继续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经过艰苦奋战，创建了豫鄂陕和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的面积共约1.26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在根据地区域内先后建立了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及其领导的10个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含1个办事处）9个中心县委和政府，41个县（工）委和43个县政府（办事处）。这两块根据地互为犄角之势，互相策应，共同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豫鄂陕根据地的北端距陕甘宁边区只有60余公里，与晋冀鲁豫军区只隔一道黄河，可随时策应八路军主力之作战，东可随时出入中原解放区，西可以武力援助四川、甘肃两省之兵变，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此外，在鄂豫皖边大别山地区，有英勇的鄂东独二旅在坚持游击战争；在鄂豫边桐柏山地区和鄂中大洪山地区，先后有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江汉游击支队、鄂中游击支队、鄂豫边游击支队等武装在敌后积极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中原军区部队在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的7个月里，坚持在敌后创建和巩固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用不足全国人民军队总兵力1/20的部队，最多时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用以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正规军中将近1/6的兵力达32个旅，还牵制了国民党大量的地方游击纵队和保安团队。先后与国民党军作战270余次，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2万余人。

中原军区部队的军事行动，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内线作战，从而粉碎了

国民党蒋介石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彻底打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企图。正是在中原军区部队进行突围战役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大量兵力的同时，华中解放军在苏中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苏中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歼敌5.6万人的辉煌胜利，创造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首次大量歼敌的记录。陈毅

对此曾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继之，晋冀鲁豫野战军又举行了定陶战役。由

于中原军区部队抓紧时机创建新的根据地，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将对付中原军区部队本来已减到 14 个旅的兵力，又逐渐回增到 24 个旅以上。中原军区部队继续牵制

了大批国民党军，这就从战略配合上保障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其结果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 1.7 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创造了解放战争初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模范战例。就此，《解放日报》于同年 9 月 12 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的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在解放战争的头 8 个月里，全国人民军队在内外线战场紧密配合作战，共歼国民党军 71 万余人，其中正规军达 66 个旅，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平均每月歼敌 8 个旅的计划，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对于这一时期中原军区部队所起的战略作用，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于 1946 年 10 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指出：“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三、积极配合了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开展局部反攻

自 1947 年 3 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攻势受到严重挫折后，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而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但又抽调兵力，对解放区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1947 年 3 月至 6 月，山东、陕北解放区部队奋起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其他解放区陆续开始局部反攻。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豫鄂陕军区主力奉中共中央命令，于 1947 年二三月间分批北渡黄河开赴山西晋城休整，待机南返。同时，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仍留下 1000 余人的游击武装，在中共陕南工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面对国民党军烧杀抢掠、移民并村、组织保甲、恢复旧政权的疯狂反扑，在陕南人民群众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 3 个多月里，坚持陕南斗争的游击武装，共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近 700 人，牵制了国民党一部分正规军和大量保安团队。鄂西北军区的主力部队亦于 1947 年 2 月分路跳到根据地之外作战，同时留一部分部队在鄂西北坚持斗争。该军区主力一部转战到皖西后，与皖西支队会合，组成皖西人民自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发展地方武装，主动出击，于 5 月下旬连克安徽潜山县的源潭铺、痘姆，桐城县的芦镇关，舒城县的毛但厂等国民党军据点。6 月初又攻克怀宁县石牌镇，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 1 个连，缴获各种枪 100 多枝，开创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使皖西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鄂西北军区另一部主力飞越长江天堑，转战大江南北，仅在江南近 3 个月中，就作战 100 余次，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 3000 余人，牵制了国民党 4 个正规整编旅及 6 个地方保安团队。还有鄂东独二旅在大别山区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机智顽强地与敌反复周旋，灵活机动地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始终屹立在大别山区，牵制了大量敌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47 年 3 月至 6 月的 3 个多月里，上述各支部队和游

击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共作战 300 余次，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 6000 余人。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继续配合与支援了其他解放区内线部队的作战，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开展局部反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对中原军区部队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再次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总结，指出：中原军各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 30 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的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四、直接给国民党后方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原军区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并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块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和顽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的中原敌后战场，直接给国民党蒋介石的后方造成了严重威胁，有效地破坏

了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征兵、征粮等计划，直接支援了解放区正面战场的作战。

自中原突围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后，湖北、河南、陕西以及其他有关省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对中原军区部队的战略行动无不惊慌失措，纷纷向有关当局直至蒋介石告急，要求增兵，拨款之电络绎不绝。

在湖北省，国民党省政府于 1946 年 10 月 8 日电告“行政院”，据本省被李先念部“窜扰”各县报称，要求“拨款 9 亿万元救急”。全省请求补助救济款的达 40 个县。其中被列为“全县股匪窜扰最烈者”16 个县、“县境只有股匪通过而散匪扰害转烈者”19 个县、“县境内散匪滋扰者”5 个县。1946 年 12 月，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的 77 名参议员在所谓“肃清匪患”的提案中更是惊呼：李先念部本年 6 月自宣化店突围后，即“窜扰”于三、四、五、八各区县。全省 72 个县，而被“匪盘踞与扰害者已达半数，且此种匪患有主义、有组织，勿谓星星之火，实可立即燎原，若不设法根除，将演成不可收拾之局面。鄂北好匪达数万，居主动，到处袭击，迁延半载，肃清无期。距此险要地区，倘又得广大民众，则北可以窥陕豫，西可以入巴蜀、南可以袭湘粤，东可以扰武汉。此地，张献忠、李自成曾踞之以横行中原，其地势之重要，实较陕北为尤甚。”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于 12 月 30 日向“行政院”呈报这一提案时，也特别强调：“务请转恳中央，迅将本省有匪各县划为绥靖区，调派大军，以有效办法从速清剿，免匪终日益坐大，不可收拾。”1947 年 1 月，国民党武汉行辕又专电蒋介石，在追述了 1946 年 9 月“钧座代电，饬将行政院前颁冀热察绥鲁及东北九省临时紧急军政措施办法扩大适用于鄂省，足见钧座对于鄂省之匪情系与其他绥靖省区同等重视”之后，也要求将湖北省半数以上县划为绥靖区。1 月 21 日，国民党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电告湖北省保安司令部，批准将南漳、谷城、保康、郧县、郧西、均县、房县、竹山、竹溪、兴山、安陆、京山、天门、钟祥、当阳，远安、自忠（宜城）、荆门等 19 个县列入绥靖区。

在河南省，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所部张轸、于 1946 年 12 月 6 日，以特急电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内称：辖区河南信阳、桐柏、罗山、光山、经扶、商城各县，以及礼山、黄安、麻城各县，“连年遭匪蹂躏特甚”，要求立即划为绥靖区范围。政务委员会致函张轸，批准将河南省信阳、桐柏、

光山、经扶 4 县列入绥靖区。

在陕西省，国民党蓝田县参议会于 1946 年 10 月 11 日电呈省参议会，报告说：溯自李先念“股匪入陕境，盘踞秦岭，四出扰掠，如虎负隅，如蛟得水，万山重叠，沟壑交错，攻守均有余。两月以来，兹乳卵育，凶焰日炽，其势澎湃，一日千里，虽派队伍追剿而如杯水车薪，偶一接触，屡遭损失。是星火成燎原，不可向迩，遑言扑灭。”报告惊呼：“蓝城若陷，省垣如何安枕！祸迫眉睫，特电转请第一战区长官部暨省政府速派大军一部来蓝，合力围剿。”11 月 23 日，国民党洛南县参议会也向陕西省政府呈报所谓“早日消灭匪患”的提案。提案中说：“现在奸匪已布满全洛，竟成星火燎原之势，若不迅筹有效办法及早消灭，吾洛南大有赤化之危险。”“二十一乡镇岌无完整。”国民党陕西省华县参议会电呈省参议会称“本县位居陕东要冲，秦岭贯于南，陇海贯于北，地势重要，为军事必争之地。自八月上旬李先念部窜扰洛南以来，共蓄意北犯企图侵陷本县，威胁陇海交通，进而摇撼关中，尤以迭次纠众侵扰行动，观之至为明显”。国民党陕西省参议会收到此电后，于 12 月 7 日函告省政府，要求立即向华县派驻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陕西省四区（即商洛地区）保安司令部参谋曹健生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最近四区各县之奸匪与土共合股，大者二三千，小者数百，迄今未能击溃一股，以致愈剿愈多”，“如不增派劲旅痛剿，被奸匪蚕食鲸蚕，势必演成陕北局面。”

仅从国民党内部的上述来往电函中可看出：中原突围部队摆开的广阔敌后战场，特别是豫鄂陕、鄂西北这两块敌后根据地所发挥的战略基地威力，已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就连蒋介石也被搞得瞻前不能顾后，顾后不能瞻前，狼狈不堪。

五、中原突围的政治意义

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尤其是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以及豫鄂陕、鄂西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过渡阶段和解放战争初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中原地区尖锐激烈斗争的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并清楚地表明了全面内战完全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手挑起的，它应对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

在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中，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治愈创伤，重建家园的愿望，为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竭尽了各种努力，与国民党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通过了“政协协议”，在中原地区，也先后签订和达成了“罗山协议”、“吕王城协议”、“应山协议”、“汉口协议”。然而，蒋介石统治集团根本无视这些协议，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制造种种借口加以破坏和撕毁。国民党蒋介石不仅以 30 余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部队，而且不断派特务到中原解放区放火、投毒、抢劫等；还大肆进行各种诬蔑宣传，造谣中伤，破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的声誉；并在经济上对中原解放区施以严密封锁，无理捕杀中原军区的筹粮人员，严禁粮食运进解放区，企图困死、饿死中原军区部队。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争取和平的大局为重，在停战令下达后的三四个月里曾力求将主力合法转移列为上策，并就此同国民党多次进行谈判和交涉；但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拒绝这一合理要求。他们并

不满足于占领中原解放区这块地盘，还企图歼灭中原军区部队。中共中央洞察其奸，曾多次严正警告：“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全面内战的既定方针。在1946年南京谈判期间，尽管中共中央作出重大让步，蒋介石仍故意提出几项无理要求，暗中还部署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南京谈判还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的“围歼”即已开始，中原军区部队迫不得已才于当晚进行突围。7月7日，李先念在突围路上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谈话，再次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原军区穷凶极恶的“围歼”计划蓄谋已在10个月以上，使“究竟谁守约和平，谁在违约进攻”的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就使更多的人从全面内战爆发之起点——中原内战爆发的全过程中看到：是国民党蒋介石不要和平和民主，内战祸首是蒋介石，共产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从而由对国民党和美国政府抱有的某些幻想中清醒过来，把同情完全放在共产党一边。

其次，解放战争之首战的成功壮举，率先显示了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战胜国民党蒋介石的强大威力，并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打败蒋介石，这正是挽救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全面内战爆发时，对人民革命力量来说，形势确实相当严峻。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党显然占着优势。蒋介石统治集团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很重要的因素是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当时的美国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拥有强大的

经济实力，并拥有原子弹。中国的反动派以它的后台的强大来吓

唬人。一些中间派人士被反动派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国际上一些好心朋友，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忧虑。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采取坚定的立场，领导人

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并且坚信：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中原突围作为解放战争第一个战役所取得的全面胜利，意义

重大。它不仅证明了中共中央关于能够打败蒋介石之估计的正确性，而且成为用事实说话、进行广泛宣传教育的好材料。1946年7月下旬，当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

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证明了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给予正面临严重斗争的苏皖解放区军民以莫大鼓舞”。8月4日，新华社记者评论说：“蒋介石预期一鼓而荡平中共中原部队获得‘惊人胜利’，然而惊人的不是蒋的围歼，而是中共中原部队的突围。”8月29日，延安总部发言人指出：“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也是在8月，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震林给华野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说：蒋介石调集30多万人，要歼灭五师（指中原军区主力），到现在打了一个多月，第一着他在

中原就失败了。蒋介石这个大失败，引起了世界的反映，说他军事上太不行了，都说共产党真有本领。王震率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等胜利返回延安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于9月初先后致电王震，祝贺中原突围的胜利，

并欢呼“爱国的英雄主义万岁！人民自卫战争胜利万岁！”这一胜利，“证明了我党军民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是任何反动派都消灭不了的，是永远不可战胜的。”9月2日，新华社记者评论说：中原突围“使蒋介石

‘消灭匪军有生力量’的计划根本破产，这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光辉胜利。”评论还对程潜在记者招待会上所称李先念部“业已失败”等作了进一步驳斥：“事实证明，失败的不是李先念和王震，而是蒋介石和程潜自己。”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10月3日，该报再次在社论中指出：“蒋介石包围我中原军包围得铁桶相似，然而这个‘铁桶’竟是没有底的。7月初中原军全部安全突围，损失甚小。历史的铁则规定反动派必然失败，蒋介石和反动派是逃不了这一条的”。也是10月3日，王震也在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中原突围的胜利消息传到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亦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上海《文萃》周刊于1946年10月3日发表《时局新形势》的述评，阐明了南线共军在“中原突围、苏中七战七捷、定陶之战三大战役之中，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增加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并说：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突破了‘危急的一关’，使‘必败与必胜’的态势取得了保证。”10月31日《文萃》周刊又在《战局答问》中指出：“共军还有两大收获。其一，中原共军，‘放虎出柙’，未受重大折损而突围，并在陕南、川鄂边打下新地盘。其二，东北共军因关内之战获得休整机会，对东北今后战局定有重大影响。”11月14日，《文萃》周刊发表述评《战局转换的关键》，再次在评述国民党第一个战争目标是一鼓歼灭共军之主力，而4个多月来之“成就”与这一目标距离太大时说：国民党“由于兵力的不足，固然谈不到将共军‘一鼓歼灭’，甚至连‘一定到手’了的中原被围共军，也因为兵力以外的其他因素，而造成了‘放虎出柙’的结果”。

总之，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胜利，对于促进解放区军民提高和增强能够打败蒋介石的认识与信心，促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在对美、蒋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胜利，促进全国各阶层人民结成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等，均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中原突围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也是从政治上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其政治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

第二节中原部队保存下来的基本骨干力量 投入新的斗争与战略进攻中原

一、东进苏皖解放区的一纵一旅

中原突围以及创建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和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即保存了中原军区部队的基本骨干力量。他们又先后在各有关战场建树了新的功勋。东进苏皖解放区的第一纵队第一旅，是中原军区部队经突围战役后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部队，全旅仍有约 5000 人。1946 年 7 月底该旅经盱眙县马坝、蒋坝，进驻洪泽县高良涧、顺河集地区进行休整。8 月初，一纵一旅奉华中军区首长命令，主力进驻苏中之高邮、邵伯一带，配合华东主力进行“七战七捷”中的如皋、东台、泰县战场作战，胜利完成打援任务。而后，一纵一旅经过兵员补充，于 8 月下旬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9 月 15 日，十三旅奉命由高邮进入淮阴地区，参加两淮保卫战。该旅初次与号称“御林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交战，经受了国民党军在航空兵掩护下的整营、整团兵力的轮番冲击，坚守阵地 5 昼夜，毙俘国民党军团长以下 3000 余人，取得了进入华中后保卫解放区的重大胜利。10 月 19 日，十三旅奉命参加涟水保卫战，协同第四、第六纵队在废黄河北岸之桥头堡，涟水以南之顺河集、徐家荡等地反击进犯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师第一九二旅，至 11 月 1 日，奋战 14 昼夜，与友邻部队一起共歼国民党军 9000 余人，粉碎其占领涟水的企图。11 月下旬，国民党为配合苏北攻势，于东台地区集中整编第八十三、第六十五师向盐城进犯，十三旅又奉命参加盐城保卫战，至 12 月中旬，数次与国民党军激战，共毙伤其 3000 余人。12 月下旬，苏中战役告一段落，部队进至东海房山镇集结待命。

1947 年 1 月，十三旅奉命继续北上，进入山东境内。1 月下旬，该旅改番号为华东军区独立师。先后在第一纵队与第十纵队指挥下，参加了鲁南、鲁中战役和莱芜战役、鲁西南战役，转战山东，屡建功勋。

4 月底，蒋介石不甘心在莱芜、泰安战役的失败，在其向延安、山东作重点进攻的总部署下，又集中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共 13 个整编师，下辖 34 个旅，约 25 万人，沿临沂、费县、泗水、曲阜一带，向泰安、蒙阴进犯。华东野战军于 5 月 13 日发起孟良崮战役，独立师受命为前卫，切断、堵击国民党军退路，协同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作战，至 15 日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歼灭。此役，独立师俘国民党军 1000 余人，毙伤其 200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12 月下旬，在山东战场上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之后，独立师奉华东局转军委命令，转战至大别山归二野建制。该师由潍县出发，经昌邑、寿光过黄河再折向大别山挺进。当行至山东蒲台时，复得河北邯郸中央局电令到太行山归建。遂经临邑、商河、夏津、临清、丘县至邯郸。1948 年 2 月，奉命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二十七旅。先后参加了临汾战役和晋中、太平战役。

1949 年 3 月 1 日，该旅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该师先后参加了解放太原、进军西北和西南等战役战斗，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功绩。

二、重返延安的三五九旅

重返延安的第三五九旅，是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经突围转战保存下来的精锐主力之一。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该部进行了休整和兵员补充。

1946年10月，第三五九旅被编入晋绥军区第二纵队，仍沿用三五九旅番号，随即投入了新的伟大斗争。

1946年11月上旬，蒋介石为侵占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由临汾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突袭延安。为阻击胡宗南部偷袭延安，三五九旅随纵队各部立即由离石南下，进入吕梁地区，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相配合，于11月22日发起吕梁战役。12月4日，三五九旅首战攻克中阳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师第一团1700余人。12月20日，三五九旅又在晋西南蒲田至大宁地区配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六十七旅4个营。吕梁战役后，三五九旅又参加了孝（义）汾（阳）战役，为推迟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起到了极大的战略牵制作用。

1947年3月，三五九旅被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在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中，建立了新功。而后相继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为粉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攻，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三战三捷”后，为调动进攻陕北之胡宗南主力，西北野战军于5月21日突然分左、右两路转兵西移。三五九旅随左路主力到达甘肃庆阳地区之合水、华池、环县一带，参加了历时半月之久的陇东战役，以实现调动进攻陕北之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6月底，三五九旅继续北上，歼击国民党马鸿逵部第十八师，收复三边失地。后撤回安边休整。

为保障陈赓、谢富治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执行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指示，三五九旅经过近1个月的休整后，于1947年8月5日参加了榆林战役。而后，又相继参加了8月18日发起的沙家店战役，9月1日发起的岔口战役，9月29日发起的黄龙战役。12月底，部队于宜川小铅窝驱走守备黄河的国民党军，随即攀铁索冲过黄河，东渡至晋西南地区。而后，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转战大西北，屡建功勋。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三五九旅整编为步兵第五师，归属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建制。

1949年春季，第五师在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的率领下，参加了解放大关中的数次作战，解放了兴平、武功、扶风、凤翔4城。第一野战军在夏季战役中，解放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为粉碎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部的反扑，第五师于6月中旬在上村镇、韩村一线，担任在10余公里宽正面的防御作战任务，胜利地保卫了西安，掩护了华北兵团西渡黄河后在三源、西安地区集结。紧接着，又于7月中旬参加了扶眉战役。至此，关中的胡宗南部被全部肃清。

此后，第五师继续西进，执行解放陇东南的任务。七八月间，相继解放了清水、天水、甘谷、临夏、循化等数城。9月1日，第五师以精兵一部在黄河南岸循化草滩坝开辟渡口，强渡黄河成功，建立滩头阵地，为全军突破黄河天险，进抵西宁，解放甘肃全省，建立殊功。

1949年9月中旬，第五师翻越祁连山。9月25日，酒泉和平解放，在此，该部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开始了向新疆的伟大进军。

三、晋城改编的第十二纵队。中原独立旅

在山西晋城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是由中原军区第二纵队主力、第一纵队一部和河南军区部队等组成的豫鄂陕军区主力，经过了创建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等艰苦奋斗而保存下来的，被誉为“原五师的精华”。1947年8月5日，李先念率第十二纵队8300余人由晋城出发，挥师东进，准备相机南下中原，投入战略进攻。部队东进后在晋城设立留守处，由汪立波任留守处长。

第二十纵队向东疾进，士气十分高涨。8月10日，部队经河南林县，抵汤阴西北20公里之鹤壁。12日，沿汤阴安阳边界，东越平汉铁路，于13日过卫河，进入河南内黄县境。这时，陈毅、粟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经聊城、阳谷南渡黄河，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向豫皖苏边广大地区实施战略展开。8月14日，中央军委电示十二纵队挺进到聊城以南、黄河以北，接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8月17日，第十二纵队进至河南清丰地区，接到刘伯承、邓小平电示，在该地区停留整训半个月。至月底，部队结束休整，自清丰之东南地区向东北方向转进，抵达山东西部边境的观城、朝城地区。部分后续部队经长治、邯郸，走冀南，绕道至朝城地区会合。此时，第十二纵队已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9月8日，第十二纵队在华东野战军的掩护下，由山东之寿张南部的渡河点夜渡黄河，而后挥师南进。经山东梁山、郟城、鄆城、定陶等县境，于18日抵达曹县西南地区。其间在鄆城，李先念第一次见到原新四军代理军长，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他在适当的时候到第十二纵队检查指导工作，陈毅慨然允诺。9月22日，华东野战军于山东曹县以南之土山寨进行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的战斗，第十二纵队奉命阻击整编第十师的增援。第十二纵队进入阻击地区后，国民党军先后以坦克掩护，骑兵冲击，向李庄、李庄寨、诸庙店等第十二纵队既设阵地发起数次冲击，均被击退，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9月25日，第十二纵队随华东野战军由河南民权以东之兰考与内黄集车站之间跨过陇海铁路，在杞县北休息两日。

9月28日，第十二纵队奉命攻打通许县城。战斗于夜晚打响，因城高壕深，激战一夜未克。次日拂晓又发起总攻，第三十五旅第一三团挖掘地道，用炸药炸开通许城东门；继之，第一五团从北门、第一四团从西门相继攻入城内。第三十五旅部队与国民党守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上午10时才结束。这是第十二纵队在南下途中进行的首次攻城战斗，担任此任务的指战员以攻必克、战必胜的英勇气概，勇猛攻坚，取得了首战大捷，使全军士气受到极大鼓舞。是役，全歼国民党通许县城守军河南保安二团和通许保安大队，区中队武装计2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29日正逢中秋佳节，全纵队在胜利声中欢度节日。接着，部队又乘胜向河南扶沟县兼程疾进，国民党扶沟县城守军闻风弃城逃遁，该纵队于10月1日进入扶沟县城。继而经过黄泛区，于10月6日抵达淮阳东15公里的汲塚地区，奉命进行休整。

在汲塚，第十二纵队各部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进行行军总结，召开庆功大会。陈毅来到第十二纵队，在李先念的陪同下，看望了连以上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并作了重要讲话。陈毅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了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地位、作用及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他说，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处于战略孤立地位。日本一投降，蒋介石要来抢桃子，这是定了的。人家有张床摆在武汉，你李先念站在旁边，人家睡不着觉嘛！这一仗必定要打，你们必须突围，这也是定了的。如果日本投降后你们马上出发，无论向东到华东解放区还是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你们都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

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地搬出来。为什么中央没有下这个命令呢？因为这样做对全国战局不利。中央考虑的是实现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段的决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陈毅接着谈到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并且说，三大主力组成了中原军区，这就在武汉外围形成了一个拳头，铁拳，铁的！铁拳摆在蒋介石面前，这就把老蒋很大一部分兵力吸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可是，正当我们华东部队大发展的时候，先念同志的部队却受着蒋介石30万大军的包围。30万对6万，5：1，日子真难过着哩！陈毅强调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6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中原军区部队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这笔帐，有人在记帐的时候转了一个户头，转到我们华东和晋冀鲁豫部队上了，你们的功劳记在兄弟部队头上了。陈毅针对有人说中原突围是个“错误”，部队受了损失，反驳道：这种空气我也嗅到了一点，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原军区部队作了这么艰苦的战略转移，完成这么重大的战略任务，难道还不是英雄？！陈毅还说：经过中原突围的同志，是筛子精选过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颗种子，南下以后，一个人能发展成一个大队，一个战士将来要带一个排、一个连。“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我相信同志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一定会为人民再建奇功的。陈毅的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休整期间，豫皖苏军区文工团，淮阳地区

的戏班子和鹿邑剧团分别到部队进行演出慰问。经过这次休整，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0月23日，第十二纵队从汲冢出发，继续向南挺进，经杨楼、周庄、张大庄、马沿寨、韩店、范寨，于11月1日越过淮河，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信（阳）潢（川）公路封锁线，2日抵达河南光山县文殊寺与刘邓野战军主力第二十旅会师。

李先念就此电告中央。并奉刘、邓首长命令，决定部队作短暂休整。随即部队进驻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以东的秦家畈一带。11月下旬，第十二纵队奉命接护第十纵队，在信（阳）潢（川）公路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保障了第十纵队王宏坤部顺利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任务后，刘伯承、邓小平来到第十二纵队驻地光山县苏家河，看望了这支经过中原突围及转战后胜利归来的指战员，并向营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讲话。刘、邓首长指出：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同时，向十二纵队下达了进军江汉，建立根据地，在外线实行战略展开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说，这个地区是我们部队的老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刘伯承指出：你们重返江汉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消灭敌人！

在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的同时，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后改编的中原

独立旅，也奉命参加了刘邓野战军的序列。该旅是由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 and 江汉军区部队组成的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是经过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与转战大江南北等艰苦卓绝斗争后保存下来的一支劲旅，共 3000 余人。

1947 年 8 月 16 日，刘伯承，邓小平布置作战任务，决定该旅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指挥的直属独立旅，划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一支战略牵制部队。其任务是：西城平汉铁路，待机破坏国民党南北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造成大军要挺进桐柏山的假象，以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掩护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

该旅接受任务后，于 8 月 16 日黄昏由驻地出发，连续急行军，渡过汝河、洪河。8 月 20 日晚，抵达平汉铁路遂平、西平段，连夜将 10 公里长的铁路掀翻。而后，沿平汉路继续南驰，扒铁路，炸桥梁，烧粮仓，割电线，摧毁铁路沿线国民党军据点和乡公所，并在铁路东西两侧积极活动，造成主力西进的假象，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顺利地渡过洪河、汝河和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区，而后，中原独立运转道向舞阳、泌阳、新城、方城方向西进，继续迷惑国民党军。29 日晚，该旅突然调头，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东进。30 日傍晚，该旅四团奔袭朱堂店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二师三十三旅九十九团 1 个营，仅用十几分钟，将该营全歼。然后进至光山砖桥与主力会合。刘伯承，邓小平又亲临部队在排以上干部会上，对中原独立旅一年来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指示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

9 月下旬，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北部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时，蒋介石调集绝对优势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进行疯狂合击，企图乘其立足未稳而予以消灭。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合围阴谋，中原独立旅奉命担任西路反击部队的前卫。10 月 1 日，该旅与刘邓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团一起歼灭国民党经扶县 1 个保安团，俘其团长黄古儒，击毙其县长李建刚。接着，又解放了黄安县城，歼国民党 1 个保安团、毙其情报组长、军统特务高维钧，生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少将视察员邹晓轩。10 月上、中旬，该旅在长江沿江地区，先后解放了麻城之宋埠、黄冈仓子埠，新洲、团风等重镇，10 月 21 日，又在蕲春之竹瓦店歼灭国民党青年军第二三师两个营。10 月 27 日，该旅配合一纵、六纵在蕲春的高山铺地区设伏，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经过 14 小时激战，将其全歼。此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 1.26 万余人，其中中原独立旅俘国民党军 2500 人。高山铺战斗结束后，中原独立旅即开往蕲春县北部狮子口整训半个月。11 月 17 日，该旅奉命向黄安方向挺进。

12 月 6 日，在黄安县华家河，第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胜利会师，组成新的江汉军区。同时组建新的江汉区党委和行署。两部会合后李先念接见了中原独立旅连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祝贺两支劲旅会合和组建新的江汉军区。李先念回顾了中原突围的前前后后，还高度评价了中原独立旅的斗争。最后他号召大家轻装上阵，重返江汉，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彻底打倒蒋介石而团结奋斗。12 月 10 日，中共江汉区党委在大悟山北麓陈家湾召开会议。李先念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重建江汉根据地的部署、工作方针和政策作了指示。会议研究确定了重返江汉的具体部署和作战方案。

12 月 14 日，江汉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共 1.2 万余人，分 3 路从广水、花园之间西越平汉路，“打回老家去”，实施战略展开，投入了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斗争。17 日，江汉区党委、军区在随县九间房召开会议，决心以大洪山、白兆山为中心，划分洪山、鄂中、襄南 3 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仅在

半个月中，江汉军区即解放了天门、京山、潜江、钟祥、沔阳等5座县城以及广大乡村镇，建立了10个县的民主政权和军事指挥部，各军分区部队均在指定地区胜利展开。

截至1949年5月20日湖北军区成立时为止，江汉军区部队浴血奋战达1年又5个月，共作战近500次，计歼国民党军4.6万余人，创建了土地面积达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4.3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重建与巩固、发展江汉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并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作战，还为大军南下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创造了前进基地，为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皖西人民自卫军

皖西人民自卫军，是由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一部和（前）江汉军区部队组成的鄂西北军区之主力一部转战到皖西，与由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先期派赴皖西的一部、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七师留下的部队及当地游击队组成的皖西支队会合后，保存下来并有所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共4000余人。1947年8月底，皖西人民自卫军在霍山县城与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胜利会师，又作了进一步充实调整，在原3个支队的基础上，以第三纵队教导团1个营成立第四支队。

据9月29日中原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皖西人民自卫军的第一支队以原一支队为基干，结合潜（山）、太（湖）游击队，在宿松、望江、六安、太湖地区开展活动；第二支队以原二支队及三纵补充团为基干，结合舒（城）、桐（城）、岳（西）游击队，在岳西、霍山、舒城、桐城、潜山地区开展活动；第三支队，以原三支队为基干，结合庐江游击队，在庐江、无为、巢湖、桐城地区开展活动；第四支队以三纵教导团一个营为基干，向无（为）合（肥）公路发展。为配合第三纵队在皖西进行战略展开，皖西人民自卫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9月上旬，一支队由北向南，奔袭攻占岳西县城后，第三次拔除国民党军据点石牌镇，继而再次攻克望江。紧接着，乘胜直捣太湖、占领徐桥、夺取华阳，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数城，国民党宿松守军弃城西窜。至此，皖西的几座县城，全为皖西人民自卫军所攻克，共毙伤国民党军1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这一时期，在临时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皖西人民自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皖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截至9月底统计，皖西地区已建立了3个分工委、8个县政权，地方武装亦迅速发展。

10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太湖县刘家畈听取了刘昌毅、桂林栖关于皖西军政工作情况的汇报，25日，刘邓野战军司令部在刘家畈召开第三纵队和皖西人民自卫军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部署工作。刘伯承、邓小平再次对皖西人民自卫军进行了勉励。会议决定，从第三纵队抽调3个主力团，与皖西人民自卫军共同组建皖西军区，下辖一个军分区，还将原各分工委改为地委。皖西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调第三纵队任副司令员，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三十七团编入三纵七旅建制。从此，这支得以保存和发展的生力军成为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皖西军区的重要力量，又在完成战略进攻的新任务及尔后的战略决战中分别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其他部队和游击队

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部队，在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仍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分片进行游击活动，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地区。除皖西工委所率皖西支队 300 余人成为皖西人民自卫军之组成部分外，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率军事指挥部和各县游击总队约 500 人，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率军事指挥部和各县游击队，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率手枪队和各县游击队，以及其他零星武装，共约 700 人，分别于 1947 年八九月间先后与刘邓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第十八旅会合，加入战略进攻的行列，在蕲春高山铺战役中，鄂皖边中心县委领导的黄广边、黄宿边、广济、蕲南、蕲宿、太边等各游击总（大）队，在高山铺至薪东一带，设置了许多伤员安置站、医疗所，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黄冈中心县委与手枪队积极为大军收集情报，充当向导，还将储存的大量经费全部作为大军购置棉衣之用，仅一个月内，就筹集了 4 万套棉衣。在 10 月成立的中共鄂豫区党委、军区、行署以及下辖的 5 个地委、军分区、专署中，有不少是原中原军区各部队的负责同志。其中原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的主要负责人，和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各中心县委负责人，分别在各地委、军分区、专署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又为恢复和发展大别山根据地作出了新贡献。

在鄂中地区，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突围转移之后，奉命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地下党员和在突围中负伤或因其他原因返回原地的指战员，以及突围到鄂西北后又返回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的人员，先后在鄂中组织了天京潜游击支队、鄂中游击支队和京钟随县指挥部、京钟游击大队、随北游击队、随南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建立后，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斗争，不断地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1947 年 7 月上旬，鄂中游击支队夜袭国民党应城“天公逊自卫队”，拔除其碉堡，缴获轻机枝 1 挺，长枪 18 枝，手枪 12 枝，子弹 5000 余发。接着，又乘胜捣毁了国民党两河口乡公所，获长枪七八枝，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12 月，第十二纵队和中原独立旅组成新的江汉军区，西越平汉铁路，实施战略展开，重建江汉根据地，鄂中各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密切配合与支援。仅京安应地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动员组织支前民工 5500 余人，担架万副，送交军鞋 6120 双，筹集马料（粮）120 万斤，柴草 1000 多万斤。使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鄂中，很快变成了支前的基地。鄂中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京安应中心县指挥部。云孝游击支队，1948 年 4 月又改编为云孝独立营。他们在恢复与巩固，发展江汉解放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鄂西北地区，还有北山游击队、荆南游击队、荆当远游击队、襄南游击支队和洪山游击支队等；在豫鄂边地区，有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在湘鄂边地区，有湘鄂边游击支队等，坚持敌后斗争。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这些游击队，也先后于 1947 年底、1948 年初与南下主力部队会合，加入了战略进攻行列，不断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豫鄂陕地区，随着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 1947 年 8 月下旬强渡黄河后的战略展开，在晋城由豫鄂陕军

区教导团 500 余人与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合编的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在三十八军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等指挥下，亦南渡黄河，挺进豫西。9 月中旬，三十八军教导团中的陕籍干部战士，又奉命组成陕南独立团，配合主力挺进陕南。与此同时，原豫鄂陕军区留下坚持边区斗争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准备迎接南

下大军，先后于9月中下旬同晋鲁冀豫野战军四纵十三旅、三十八军十七师，陕南独立团会合，投入恢复与建立豫陕鄂根据地的斗争。11月8日，中共豫陕鄂前线工作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豫陕鄂后委，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组织的组建，直接负责建立豫陕鄂根据地。11月中旬，豫陕鄂边区行署、豫陕鄂军区后方司令部成立，下辖8个地委，行署和军分区。原豫鄂陕根据地的卢氏、灵宝等县和洛南、商县、商南等县，以及山阳、郧西、郧县、镇安、柞水等县，分别划归新的豫陕鄂边区的第一、第二、第四地委、行署和军分区管辖。原北渡黄河的陕南籍干部战士编成的部队和原留在豫鄂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部队及游击队，又在恢复与建立豫陕鄂根据地，解放整个豫陕鄂地区的斗争中，发挥了新的特殊作用。

中原军区北运的伤病员，奉命化装转移、隐蔽、撤离的人员，还有其他各种途径保存下来的人员，先后奔赴解放区的各个战场，也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新功。

第三节 中原突围与创建新 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与英明决策

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进行中原突围战役，创建豫鄂陕、鄂西北新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从根本上说，应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与英明决策。正如李先念在《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所深刻指出的：“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能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采取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方针和策略。对于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特别关注，既不断地从适应形势发展的全局需要来考虑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又不断地从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的态势来考察全局的形势发展，实事求是地在这一阶段确定了中原坚持与转移之战略方针的演变，并深刻地指出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就调兵遣将进犯中原；中共中央针锋相对，提出了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尽快实施战略转变，并决定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等三大主力会师中原，以增强中原解放区的军事力量。当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继续进攻中原部队时，中共中央又指示五师野战军及随后组建的中原军区发起了桐柏战役，并确定放弃曾在重庆谈判期间拟让步撤出中原解放区的计划，强调坚持半年至一年。中原局、中原军区为争取主动曾提议主力靠拢军部，中共中央在同意其主力东进或北上时仍指出，要留主力一部甚至有力之一部坚持中原地区的斗争；当停战和谈有了转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停止东进或北上计划时，中共中央立即复电充分肯定这是对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签订和通过，曾给了人民以一种希望，以为内战可能由此停止，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但是，蒋介石集团丝毫不顾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的渴望，蓄意吞并各解放区，致使和平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很快消失。即使在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一度偏于乐观的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中原地区同国民党斗争问题依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电示中原局“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并指出了“我们的对于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中共中央还对中原军区力求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作了指示，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了各种努力，也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与面目。1946年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接二连三地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中共中央很快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付全面内战方面。这时，毛泽东又特地向中原局，中原军区派赴延安请示行动方针的王震作了重要指示。王震于4月9日返回宣化店作了传达，使中原军区部队更加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顽强的战略坚持，并加紧进行对付突然袭击与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当获悉国民党将于5月上旬向中原发起“围歼”的情报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发表声明

和谈话，尖锐指出并阐明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这既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彻底揭露和严正警告，也使中原军区和其他各战略区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而更加提高警惕，以大力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原坚持与转移之战略方针的演变，从战略全局和中原局部的结合上，保证了党和人民在由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在国民党蒋介石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之际，面对强敌压境，是束手就擒，还是挺起胸膛迎接挑战？是软弱、退让，还是坚决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非凡的革命胆识和胆略，作了伟大的历史性选择和科学的论证，根据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原理，作出了中原突围与迎击国民党全面进攻的一系列英明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为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战争制止和粉碎反革命战争，用人民革命武装打败和消灭反革命武装，提供了胜利的保证。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给各战略区发电报：“我们必须战胜蒋军进攻”；同日专电中原军区“必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在拟定南北两线作战计划时，亦将“保障五师（指中原军区部队）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作为战略意图之一。6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时局的通报”，用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治腐败、经济欲坠、人心丧尽的虚弱本质，充分地阐明了“我党社会基础从来没有这样广大”。此前7天，即6月21日，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专电中原局，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广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并介绍了时局概况。6月23日，毛泽东又在以中央名义批准中原军区关于主力部队实施突围作战计划的电文中，对“向西突围”的方向和“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时机均作了最后选定，强调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战略转移目的。当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大举“围歼”时，中共中央于7月1日向全党全军发出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军令：“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26日围攻五师（指中原军区部队）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7月5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再次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等，肯定了正在进行的中原突围战役已取得的初步胜利，指出“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甚多。”这些战略决策和关于战局、时局的指示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清醒地分析和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所以从解放战争打响第一天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断言，“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指出中原部队不但必须战胜蒋军的“围歼”，而且是能够胜利突围的。随着斗争的发展，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和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以及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对党内指示中，对于必须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如何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等，均作了更系统的精辟论述，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些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胆识和胆略的光辉结晶，犹如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征途。

当中原军区主力突进到鄂豫皖川陕5省边境地区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连续电令中原军区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牵制大批国民党军队，指出这是“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指引着中原突围部队在莽莽秦岭和巍巍武当山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根据地，坚持与发展了中原敌后游击战争。

可以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中原部队的每个重要阶段，以至每个重大的战略行动，都及时地下达了指示和命令。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原突围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除指示西北局、陕西省工委、淮南区党委、淮南军区等派部队和干部接应中原突围部队，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进攻陇海线以引敌东调、减少中原部队的压力外，专门给中原局、中原军区、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及鄂东独二旅等部的电报即达 200 多份。在这些电报中，从决策中原突围到创建新根据地，从战略部署到具体方案，从战略战术到方针政策，都作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指示，使中原军区部队及时了解到战略全局的情况变化，确定自己正确的对策，在遇到危险的情况时，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与英明决策，是指引中原部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揭示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过渡阶段，还是在以中原突围为起点的解放战争初期，从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到中原局，中原军区都始终如一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及一系列政策与策略，特别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先后对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各项指示。广大指战员自始至终地发扬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而英勇奋战，作出了重大牺牲，这是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中原突围战役、创建新根据地和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均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

在中原解放区开始进行战略坚持的时候，新四军第五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主力组成野战军，突击开展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使这支以分散游击为主、坚持长期民族抗战的军队，很快转变为一支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拥有近 2 万野战军和 3 万余地方军的反内战的重要武装力量。它巍然屹立于中原前哨，为中共中央作出“三大主力”会师中原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五师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率先发起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这又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向五师靠拢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直接为“三大主力”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4 县交界地区胜利会师，开辟了战略基地。“三大主力”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组成中原军区时，部队又边整编边作战，进一步实现了战略转变，使中原成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作为“东道主”的原五师部队，先后抽出了 33 个整连计 4000 余人的兵力，分别补充到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甚至连十四旅的番号也撤消了。这种以革命全局需要为重，没有山头之分、门户之见的做法，为中原军区部队团结奋斗、争取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继续执行坚持中原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了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当国民党军向桐柏地区实施南北夹击时，中原军区主力东越平汉铁路，又粉碎其合击计划。在东进大别山后，曾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是继续东进或北上，还是在大别山牵制国民党军队？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反复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依然以全局利益为第一，主动作出停止东进北上，全部

留下坚守中原阵地的抉择，并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罗（山）礼（山）经

(扶)光(山)地区,又为“停战令”下达后以宣化店为

中心战略坚持争得了立足之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攻,政治诬蔑和经济封锁,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斗争的方针指示,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以及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在中原军区成立后的时间里,还紧紧抓住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一首要环节,经常不断地根据斗争形势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自己肩负的战略任务,认清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殃民的本质,从而激发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广大指战员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一连几个月过着“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合水煮”的生活。王震赴延安返回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更是下定了准备全军覆没的决心立足于打,率部顽强地继续进行战略坚持,同时也为尽量推迟中原内战的爆发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对于“非突围不可”时的战略行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自1946年4月30日即开始“先秘密计划”。进入6月后,更加紧了“准备突围作战”。在蒋介石的内战部署就绪,并已密令对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大举“围歼”的千钧一发之际,中原局、中原军区以敢于接受挑战的姿态和善于出奇制胜的谋略,对突围的方向、时机、方式等进行反复研究,提出了“只有向西突围”、“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分两个纵队”等全面构想和决断,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可行

的参考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与批准。在中原突围战役中,各路突围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命令,发扬不怕牺牲、顽强奋斗、团结一致,连续作战的精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杀出国民党军的重围,又沿途斩关夺隘,所向披靡,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先后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在各路部队四面开花、胜利突围的过程中,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再次牺牲中原部队

的局部利益,作出了有利于全局的战略转移终点的抉择,毅然指挥中原突围部队放弃原定“转至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投入创建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执行新的在外线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李先念主持创立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中共豫鄂陕、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正式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率领所属各部队为巩固扩大根据地和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行了

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尤为激烈,这两个军区的部队在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中均取得了重大胜利,也都付出了一定代价。鄂东独立第二旅完成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转移的任务后,自身突围也一举成功。当指战员们准备继续东进时,接到中共中央赋予新的战略重任的电令,就立即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并含辛茹苦,以奋力拼搏、鏖战大别、甘洒热血的壮举,谱写了牺牲局部、服从全局的

又一壮歌。

英雄的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在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中，以5万余人对国民党军30余万人；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以5万人对国民党军36万余人；在创建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和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中，以三四万人对国民党军最多时达32个旅，最少时也有14个旅和大量保安团队。在敌我双方兵力如此悬殊

的情况下，中原军区部队先后英勇作战近2000次，其中较大的战斗500余次，最后仍保存二三万人。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大量杀伤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使命。

三、各地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和兄弟部队的积极支持与有力配合

在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期间，特别是在宣化店坚持时，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中原部队指战员。中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缩衣节食、省吃俭用，帮助部队渡难关。中原各界还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各界声援、制止国民党当局的悖行。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等报道，并发表题为《为新四军第五师呼吁》等社论。中共中央派董必武由渝

飞汉，于1946年3月30日乘车抵宣化店慰问，并带来了华北、华东解放区军民节约之粮换得的3亿元（法币）赠款。正是因

为有了这些支援，帮助中原军区部队最终战胜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成功地坚持了半年之久。

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后，中原军区部队更是“得道多助”。在整

个突围战役中，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无私无畏地从多方面积极支援子弟兵，给部队当向导，送情报，筹粮筹款，收容和掩护部队伤病员及失散人员。南路军抢渡襄河时，因河水暴涨，摆渡

艰难，但雅口村的渔民，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为渡江部队撑船。渔民郑品常的妻子、儿子在撑船中，腿被炸断，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母子俩仍忍着疼痛，支撑着掌稳船舵，一直坚持将部队送到西岸，后倒在血泊中。北路军在过唐，白二河时，群众纷纷搬来门板、木桩等，学校的师生把课桌、凳子也搬来了，帮助部队搭起浮桥，使部队安全过了河。在攻打镇平县贾宋镇时，在贾宋小学任校长的原地下党员暗示工友外出挑水，开了学校通往镇外的后门，使部队顺利进入镇内，全歼守敌。抢渡丹江时，也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能够徒涉的渡江点，使部队从波涛滚滚的江水中徒步而过。各路突围部队都一样，突进到哪里，就在那里得到了援助。

在开辟新根据地和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艰难日子里，各地党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中原突围部队，掩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同志，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不仅积极接应中原军区北路军人陕，发动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部队筹粮筹款，掩护伤病员，帮助部队渡过难关，而且全力投入创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及各项工作，密切地配合中原军区北路军共同建立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后，陕南的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仍继续坚持斗争，并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中原部队留下的人员。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丹水上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

光辉篇章。他们当中，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挖心，惨绝人寰。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千名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张孝仓家是李先念住过的地方，国民党恨之入骨，枪杀了张孝仓，还踢死了他一岁半的孙子。陕南游击队的领袖巩德芳为革命劳累早逝，国民党杀害了他全家6口，还割下他的头颅悬挂树上。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和战斗在大别山、鄂中等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同样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其中荆门北山地下党组织，从1947年2月起，先后掩护了王树声等军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30余人、区营以下干部100多人，并安全转送到各个解放区。

中原军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突围途中能胜利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堵，并能成功地创建敌后根据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战略配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下，以中原突围为起点的解放战争，形成了“全国支援中原，中原支援全国”的战略格局。为了使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特别是能立足陕南和鄂西北，7月13日，华中部队进行历时45天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8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迫使国民党军从陕南和鄂西北抽调4个整编师东援。9月2日，又发起定陶战役，紧紧拖住国民党东援的部队，并歼其一部。中共陕西省工委还派人策划了岐山等地的武装起义。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得到了陕北部队的接应；一纵一旅跨入苏皖边区，也有淮南部队接应。这一切，都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原部队的战略行动。

李先念在回顾“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段历史并总结其历史经验时，除了强调“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之外，还特别指出了有“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持和配合，以及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这是全面而科学的结论。

四、对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和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思想的科学运用与丰富发展

在中原突围前后的斗争中所积累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原军区部队所进行的斗争实际进行科学的结合，即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并由此科学地运用并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与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其具体表现：

首先，中原突围的胜利，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的思想。

中原突围战役，是中原军区部队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牵制和转移，也是一次战略退却。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到中原部队军力的保存。退却与进攻一样，包含着无穷的变化，同时还体现出指挥员从被动转为主动的高超智慧。中原军区部队进行的中原突围战役，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兵力，准备反攻”的光辉思想。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为达到“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与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经反复研究后，对于中原军区主力战略转移的方向、突围时机、战略转移的方式和突围战役的作战原则，均作出了明确指示。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战斗实践证明：主力向西突围的方向，

6月26日晚开始进行突围的时机，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方式与部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留下一定兵力的正规部队作游击武装，坚持原中原解放区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都是正确的。这些均可从突围战役的胜利中得到验证。从突围方向来说，中原军区部队向西突围的总兵力有3.7万余人，突围战役结束时保存的兵力数为3.2万人，保存的人数为向西突围总人数的86.5%。从突围时机来说，如果早于1946年6月下旬离开中原解放区，则在中原进行战略坚持的时间就会缩短；迟于6月下旬转移，则面临着蒋介石阴谋制造新的“皖南事变”之危险，那时转移则要付出巨大代价。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正确决策，才使中原军区部队取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可以说，中原突围战役，由作出决策，实施突围到取得全面胜利，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的思想。

其次，中原军区部队成功地实践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突围终点的追踪决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的思想。

在战略退却和转移中，选择战略转移的终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战略转移终点的选择，毛泽东提出，一般应选在人民群众条件较好的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区。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以后准备反攻和实施反攻。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形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的终点选择有个追踪决策的过程。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严重情况，在作出北线作战部署的同时，拟定了南线着重转至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中原局、中原军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了主力于6月底“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并获得中共中央复电批准。可见突围战役前夕的决策，是以“转至陕甘宁边区”为战略转移的最终目的地的。

到7月初，当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后，及时修改了南线作战计划，确定“南线我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按照这一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向正在突围途中的中原军区部队下达了新的任务：“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协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7月15日，中共中央又电示中原局：“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这就说明中原突围战略转移的终点已由“陕甘宁边区”改为“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敌后创立根据地”了。

此时，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尚在突围途中，根据中共中央命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把战略转移的终点选定在曾是老苏区，现有游击武装活动的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并且成功地开创了新的敌后根据地。这一实践的结果证明：战略退却的终点除选择在根据地、解放区外，通过努力，选择在敌后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退却的终点也是可行的。它不仅同样可以达到准备反攻和进行反攻的目的，而且可以继续直接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

再次，中原军区部队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

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上井冈山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的方法，大多是

由点到面将几块小的根据地连成一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原突围部队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则不同，它是在退却数千里之外，大军在突进途中停顿下来，在孤悬敌后的地区创建根据地。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而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中原突围部队，又率先建立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根据地，较早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豫鄂陕、鄂西北两块敌后根据地的创建，不仅起到了继续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作用，而且为大军反攻创建了前沿基地。这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战略退却能够在敌后创建新的根据地。由此可以反证，战略进攻中也可以到外线创建根据地，刘邓野战军后来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敌人腹地创建根据地，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中原军区部队在开创豫鄂陕和鄂西北两块根据地的斗争中，还成功地积累了一些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实践了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在开展根据地武装斗争方面，两块根据地的武装根据敌情的变化，时而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分散的游击；时而化零为整，适当集中，消灭大股敌人，基本上分散的游击战方针，但必要时集中千人左右的主力部队，击破敌之较强部分。在根据地内线与外线关系的处理上，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保卫刚刚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但有时也抽出部分兵力积极向外线发展游击战争，在特殊情况下亦可将主力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敌人转大圈子，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加强敌跟踪。采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对于在敌后根据地内进行党的建设，争取和依靠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解决部队的给养，安排、使用和教育干部等各项建设工作，也都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并分别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从中原部队主力突围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隔仅一年另一个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锋芒就以不可遏止的趋势直指敌人的腹部地区。正如陈毅元帅赞叹的：“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它完整地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夺得最后胜利的光辉战略思想。

当然，在中原战略坚持、中原突围战役、创建新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但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包括所起的巨大战略作用和深远的政治影响，都是应该而且必须充分肯定的。

后 记

《中原突围史》，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即审议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由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和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合作编著的。当本书付印之时，恰好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75周年，同时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原突围50周年，我们谨以此书向党的光辉生日、向中原突围胜利50周年献礼！

在征研史料、专题立资、编纂专辑和撰写这部史书的过程中，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名誉主任率先念、王震、王首道、任质斌，审议委员会主任兼编辑委员会主任王全国、许道琦，审议委员会副主任许子威、王海山、周志刚、闵学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王群、陈明、余英、齐光、萧健章、周焕中、张学奇，陈英、赵季，“北路突围”专题指导人汪锋、方正平、夏世厚、白洛，“南路突围”专题指导人刘昌毅、张才干、李人林，“一纵一旅”专题指导人郭林祥，“独二旅”专题指导人熊作芳、余潜、易鹏，和文敏生、刘子厚、周志坚、陈先瑞、郑绍文、赵辛初、顾大椿，以及王之铎、马焰等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很重视这一工作，曾先后给予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1993年12月，我们将经过反复编修而成的《中原突围史》打印出“征求意见稿”，分送给近百位有关的老领导、老同志审阅；并于1994年先后在武汉和到广州、上海等地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1994年6月，由萧健章同志带领编辑部、编纂室一行6人赴京，请在北京的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对《中原突围史》书稿作最后的审定。6月11日上午，由任质斌同志主持，在武汉中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召开了《中原突围史》审稿座谈会，取得一致的意见。大家认为，这部史稿写得很好，反映了历史事实，写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原突围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写出了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军区部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写出了中原突围在战略和战役上的全面胜利，写出了兄弟部队，广大人民群众和地下党的大力支持，并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原突围前后时间跨度大，情况又那么复杂，能归纳到现在这个程度很不容易。这是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领导下完成的一大系统工程。审稿座谈会就对经验教训如何写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中原突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站在不同的角度应有不同的认识。写中原突围这段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再现历史、教育后代，因此应维护团结，书稿第七章只写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等。不单独写教训。大家共同希望这部书稿能尽快出版。各地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在充分肯定书稿的同时，亦提出了不少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我们又认真领会其精神，求实求是地吸收意见，对书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总之，本书得以出版，倾注了有关老领导、老同志的大量心血，可以说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编辑部征研史料、编纂室专题立资开始，我们就一直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军区政治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多方面关心；并先后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鄂豫陕3省省委党史征委会（研究室）、省档案馆、博物馆，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省军区党史办、军事志办、有关地市县党史办特别是商洛地委党史办，以及新疆军区党史办、南京军区第一八一师

军史办，广州军区第二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等单位，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军事科学出版社还及时将《中原突围史》优先列入1996年出版计划，并安排力争作为“精品图书”之一推出。在此，特一并致谢。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先后在总编辑余英、赵季、刘绍熙、李少瑜的主持下，不断将此项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曾先后任编辑部副总编辑的邹作盛、曾言、夏牧原和陈昆满，亦为此项工作的准备与上马出了力。编辑部和省军区编纂室共同组成的中原突围史课题组，承担了《中原突围史》的撰写及附件编纂的全部任务。课题组由编辑部副总编辑、研究员李少瑜任组长；由编纂室主任曾焕雄，编辑部副总编辑、编审瞿培树，编纂室副主任杨昌挥任副组长；曾言曾在编纂前期担任顾问。本书的执笔人分别是：前言——李少瑜、何光耀，第一章——沈淑均、叶青，第二章——瞿培树，第三章——李少瑜、张小泉、何光耀，第四章——曾焕雄、徐广信，朱虹、吴卫国，第五章——吕小宁，第六章——杨昌挥，第七章——李少瑜、孙少衡、张小泉。本书各附件的编纂，采取了各章执笔人参加与安排专人汇总相结合等办法，其情况分别是：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由彭剑青根据本课题组编著并由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中原突围纪事》一书作了缩编；中原军区战斗序列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序列列表，参与围攻中原军区之国民党军序列列表——由张大顺、吴卫国汇总，潘子君、叶青、何光耀参加了部分编纂工作；中原突围部队及有关根据地营以上烈士名录，县团以上干部名册——先由潘子君、叶青、张小泉，何光耀、张大顺，吴卫国进行征集和初编，中途由吴宏武作了部分补编，后由张肇俊再次汇编、谔拴生参加了此项工作；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各时期主要战役战斗战果统计表，以及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主要战斗战果一览表——先由吴卫国、孙少衡、张小泉、何光耀根据有关资料征集统计，再由孙少衡、吴卫国汇编；插图——由张绍玉、吴卫国绘制，后经瞿培树、曾焕雄修改，有的由瞿培树重绘；照片——由沈淑均收集，后何光耀参与挑选和整理文字说明。张大顺、叶青、孙少衡、张小泉还先后协助课题组正副组长做了有关工作。1993年12月打印的“征求意见稿”，由曾焕雄、瞿培树对部分章节和附件作初步通稿与阅改，由李少瑜作全书通稿；根据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审阅此稿的意见，各执笔人、编纂人作了进一步修改之后，又由李少瑜、曾焕雄、瞿培树、杨昌挥进行了全书通稿，由刘绍熙审稿。编辑部副总编辑、副编审雷河清和王廷杰、王建材、许耀文、刘桂英、倪平坟、高文举、刘飞、张巧珍、王珊、董道清、李军、雷蕾、万庆平、宋卫东、陈翀，与曾在编纂室的周希祥、杨力、王晓宁、周爱民、唐春胜、李发目以及兰兆宏和曾在编辑部的李金保、许德明、李楚芬、张安清、崔怀庆、曾欣等同志，也先后做了不少有关工作。

由于我们编研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遗误和其他不足之处，敬希指正。

编者

1995年12月

附 录
一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
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
任质斌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共产党，锻炼了中国人民，尤其还锻炼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新四军第五师，同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部队一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受了这一考验和锻炼。她，以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无法遏止、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的强大生命力，出现在中原的抗日前哨——鄂豫边区，成长壮大为一支英勇顽强、牺牲奋斗、前仆后继、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并且胜利地完成了她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一）

新四军第五师，诞生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1941年1月，早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悍然发布反革命命令，宣布取消英勇抗战的新四军番号。我党中央及时向全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紧接着，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季先念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豫鄂挺进纵队的创建和发展，是与全国性的抗战形势和鄂豫边区的有利因素分不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中华民族不甘心做亡国奴，全国人民同仇敌汽，揭竿而起，到处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1938年10至11月，我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鄂豫边区的开辟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指明了方向。鄂豫边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苏区的大部或一部，广大边区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他们一经我党号召，便挺身而出，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所有这些，都是我党我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是，这支部队成长、壮大的客观条件，有其特别艰苦的一面：

第一，五师前身的组成，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作基础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在武汉沦陷之后，由几支小部队“滚雪球”式地“滚”起来的。主要是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中共河南省委在豫南发展的抗日武装；二是鄂豫皖区党委在鄂东组织的抗日武装；三是鄂中区党委建立的抗日武装。

从1939年1月，到1940年1月，季先念、陈少敏、朱理治等同志先后从竹沟南下，深入到武汉外围敌后，会合党的各路武装，经过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的过程，统一整编了我

本文发表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的《战斗在鄂豫边区》第1辑；作者任质斌同志，当年曾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和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党在豫南、鄂东、鄂中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仅在一年内，“雪球”越“滚”越大。发展成为万人之师。正如先念同志当时在《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所说：我们在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程途上，会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 28 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还有平汉线上许金彪同志以一条枪为本钱创立起来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以 8 条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第二，处在中日战争的前线，面临敌伪顽的双方夹击

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采取了在军事上停止对正百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向对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扫荡”，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国民党也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并加紧了投降活动。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的创建，就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这支部队处于中日战争的前线，摆在我们眼前的：一百是对我军张牙的日寇和伪军，一面是对我军舞爪的国民党顽军。日寇在武汉及其外围的铁路、公路、长江沿线的城镇，经常驻有 6 个师团两个旅团的 15 万重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驻有两个师团 10 个旅团），还有 8 万多伪军供其驱使。国民党布下了第一、五、六、九等 4 个战区（1944 年重划为第一、三、五、六、九、十等 6 个战区），其中一线部队有 7 个集团军（其中有 5 个是杂牌军），19 个军、43 个师的正规军和 3 个挺进军，21 个地方游击纵队，近 40 万之众。在力量对比上，不仅敌强我弱，而且我们的武装力量处在“两大”之间，不是处在日寇封锁线上的小豆腐块里，就是处在敌伪与国民党对峙的夹缝里，周围三五十里外几乎无一处没有敌伪顽。

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给日寇以极大的威胁，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一个极大障碍。因此，从我军创建初期开始，日寇就经常对我区进行“扫荡”，并企图将我军压到顽军地区，借顽军之手消灭我军；而蒋介石则驱使我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围攻我军，并阴谋将我军挤到日伪据点附近，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这样的“三角斗争”中，在战斗频繁、环境动荡的险恶形势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第三，长期孤悬敌后，与兄弟部队相隔绝

鄂豫边区孤悬在武汉外围敌后。国民党部队占据了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隔绝了新四军第五师同华北、华中兄弟部队的直接联系，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

在漫长的岁月里，五师能同中央、军部以及其他解放区保持的唯一联系，就是空中的电波通讯。所以，除了政治上中央发电报指示，在战略上兄弟部队互相配合之外，五师从陆地上直接得到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极少，是一个长期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鄂豫边区是我党在全国各地的几大战略区之一，也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战略区。

（二）

从建军初期会合各路抗日武装，到自卫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新四军第五师始终战斗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整整坚持了 8 个年头。

同敌伪顽想“一口吃掉”这支部队的愿望相反，五师部队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拥有 3 个正规旅、3 个独立旅的 5 万雄师。此外，鄂豫边

区还组建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达 30 多万。

我们粉碎了敌伪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积极向敌后发展，开辟了纵横千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 年，新四军第五师诞生前后，我们在坚持鄂中、豫南的同时，发展了鄂东、鄂皖边和襄西。1942 年，由于敌顽夹击和“蚕食”，使我随南白兆山、天汉湖区、襄西等变成游击区，但我们却开辟了鄂南 10 县的游击根据地。1943 年，鄂东、鄂南局势紧张，我们却又发展了襄南和江南敌后大块根据地，并恢复了襄西。1944 年，五师派出了部分兵力去河南，组建了中共河南工委并开展工作，恢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发展了豫南，豫中 7 个县的新区。1945 年，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党中央派三五九旅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我们五师部队立即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扩大了湘北、鄂南等根据地，加强了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反攻日本侵略者作了实际准备。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到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的 50 多个县，解放了 9 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 1300 多万人口，建立了 7 个专区、38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一部或大部 and 伪军全部。当敌人几次西犯、北犯、南犯时，这支部队就“敌进我进”地配合正面友军作战，钳制了日寇第三、第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八独立旅团等 3 个半师团的兵力，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这支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顽军对我边区根据地的进攻。就连当时的华中“剿共”最高司令长官，对“进剿”鄂豫边区所遭受的失败也表示“实堪痛心”。我们还加强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垄断受降权利，“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消灭共产党，急令其大军从峨嵋山源源东下，以便及时赶到目的地“摘桃子”，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于是，中国又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历史序幕，就是从中原拉开的。

这时，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三大主力已经会师，组建了以季先念同志为司令员、郑位三同志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我们在日寇投降后的近一年时间内，把守着中原大门，挡住了国民党“摘桃子”的 30 余万大军。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预定计划是一年内消灭全国共产党，却被他进度表上的第一个目标——季先念、王震、王树声部队，把他的十几个整编师（军）30 余个旅（师）死死拖住，使其长驱直入晋冀鲁豫、苏皖等接二连三的进度表，都无可奈何地往后推下去。同时，为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在接受日寇投降中壮大自己，抓紧时机休整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

中原军区完成了这些战略上配合兄弟部队反内战斗争的历史重任之后，除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于 1946 年 6 月下旬毅然决然地突破了蒋军的重围，进行了数千里的“小长征”。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妄图在一年内消灭全国共产党的蒋介石，仅第一张进度表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且其预定消灭五师和中原军区主力的目标没有完成。正如当年新华社

记者关于中原突围的评论所说，我们终于“使蒋介石‘消灭匪军有生力量’的计划根本破产，这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光辉胜利。”

(三)

新四军第五师为何能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并且排除万难完成她的历史任务呢？

归结到一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以李先念同志为首的新四军第五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坚决执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

一、从领导班子到整个部队，都比较注意党的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军是党的武装，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五师在创建初期，就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1943年1月，边区全面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党政军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基本上是团结的，起了表率作用。我们还认真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一经决议便分头去办。从开始建军起，就极其重视政治委员制度，并且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建设，在团以上领导机关建立了军政委员会，连有党支部，使党的领导一直落实到连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在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中，既强调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便随时有明确的奋斗方向，又鼓励下级因地制宜，以利发挥“各自为战”的主动进攻精神，达到上下一致、团结战斗。

在部队经常分散、流动、独立作战的情况下，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各拉一帮，互相拆台，那就会直接威胁到部队的生存。因此，在部队创立的一开始就注意反对这种不良倾向。在组成豫鄂挺进纵队的初期，曾经有个人出于某种目的，企图拉拢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破坏统一指挥。当时的军政委员会及时召开专门会议，坚决揭露了这种分裂活动，批判了这种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由于我们严肃慎重地处理了这件事，维护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对后来增强五师内部的团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就再没有发生什么分裂活动了。

新四军第五师在建军过程中，是一直坚持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但这种斗争并不是无情打击，而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规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1943年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了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五师的各级干部之间，包括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新干部和老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都团结得比较好。在抗击敌伪顽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精神。边区的各级地方干部，全力支持我军与军队干部密切配合，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师整个部队的团结，表现在统一整编与会合中，无论是部队的合编，也无论是干部的调配，都能服从组织决定，不讲价钱，进行得很顺利。1945年1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同五师会合，五师立即号召机关、部队与南下支队同志亲密团结；并将中央派来的两个干部大队的绝大部分同志，分配到五师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主要职务；还及时发动了“向老大哥学

习”的运动。同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五师又抽调4个主力团，分别补充给河南（嵩岳）军区南下部队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这种搞五湖四海的团结，成为五师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利用敌伪顽的矛盾

新四军第五师一直处于敌伪顽夹击和三角斗争之中。当时，国民党对抗日是消极的，但也还未公开投降；日寇正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却有时又打它一下。新四军第五师就充分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积极做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工作；另一方面，坚持以抗日为己任，从建军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和日寇进行了余家店、公安寨、朱堂店、新街、马家冲、平坝、辛家冲等一系列战斗，并袭击了云梦城和孝感城，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本“皇军”大为震惊，汉奸伪军闻之战栗。以后又不断地以分散的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成为武汉外围和中原地区抗击日寇的一支最坚强的武装力量。但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也不过早地和日军进行决战性质的战斗。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我们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予以必要的还击。但也不是无限制地同它打，而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同时期、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致力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拆散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反投降的统一战线。

在1938至1939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周围，我党同豫南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建立了统战关系，使信南的地方顽军一度不敢对竹沟下毒手。当时的中原局和河南省委以竹沟为依托，办了许多事情，包括为鄂豫边区的开辟和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竹沟惨案”之后，我党才在全边区范围内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反顽斗争。

我军在鄂中活动的初期，利用国民党的桂系及西北军、川军等杂牌军同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广泛的争取工作，争得了五战区所属军队同我有一个短时间相安共处的局面。这就使五师赢得了创建时间，并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联合暂时同情我军抗战的地方武装，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日伪军和顽伪两面派。在我军战斗胜利的震慑下，不少伪军向我军投诚。

“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驱使桂系反共，桂系又驱使地方顽军反共，他们层层督令甚严，都企图在反共战争中消除异己。因而，在顽固派的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个时期，在鄂东的桂系势力与国民党鄂东专员、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矛盾突出；我军利用矛盾，对鄂东地方各部队，进行广泛的争取工作，以孤立桂军。当程汝怀依附桂系疯狂反共的时候，我军则采取了坚决还击程汝怀的方针，给予歼灭性的打击。其他地区的地方顽军，凡坚持向我进攻的，也都受到我军的回击。这样，就使挑起反共摩擦的蒋军嫡系部队和桂军彻底孤立了。

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利用矛盾，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在敌伪顽的夹缝里发展成长。

三、因时因地制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五师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情况瞬息多变。这就逼着这支部队的各个组成部分非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不可。若是经常一个团、一个旅行动，敌伪就要出动“扫荡”，顽军也可能来围攻。所以，这支

部队根据战略集中指挥、战役战斗分散指挥的原则，继承和发扬了红四方面军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作战传统，组织许许多多的小股部队，在半个月、20天乃至更长时间，脱离旅、团去单独活动，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1942年，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战争的需要，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除将一部分主力转化为小团之外，还在师部统一领导下划分了军分区。每一个军分区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单位，并将3个正规旅的部队划归军分区指挥。边区党委和师部规定每个军分区各个时期的作战任务、发展方向，授权各军分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各军分区对于各中心县的指挥也是如此。当全师举行较大规模战役行动时，我们又能统一指挥各军分区的行动，集中主力完成战役、战斗任务。因此，整个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撒得开”，而且“收得拢”。

擅长这种游击战争，使新四军第五师犹如雄鹰展翅，迎着狂风暴雨自由飞翔。在反“扫荡”斗争中，对大股日寇则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削弱日寇的优势；对小股日寇则化零为整，集中兵力突击敌之薄弱部分。针对日寇在“扫荡”初期、中期、末期的不同特点，我们先予前进之敌以阻滞，再相机平毁敌之新建据点，然后给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军，剪除敌寇之羽翼。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们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以游击战消耗疲惫顽军；在有利时机，我军主力或趁顽军深入时围歼于我根据地之内，或远距离奔袭歼灭增援顽军和困守碉堡之顽。由于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因而面对敌伪顽的夹击，既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又能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直到日寇投降后，为进行受降和应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适应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要求，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才组成野战兵团，又将小团扩充为大团，编为3个正规旅和3个独立旅。

四、发挥各方面干部的特长，大力培养、教育干部

发挥各方面干部的长处，是促进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五师的红军干部不多，但很注意把这些有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红军干部放到关键岗位上。团长、政委以上的，绝大部分是红军干部。“三八式”的知识分子干部，虽然开始缺乏部队战斗经验，但他们有文化知识，因而多半安排在政治工作部门当主任、副主任、科长等。有些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安排他们搞军事、后勤部门的工作。为了团结抗日，有些从国民党部队争取过来的人，也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军政机关“避短取长”，使大家的长处都能发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彼此之间，也能够取长补短，因而一般没有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在1941年6月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会后，注意了选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日常工作的锻炼，紧接着于1942年2月，在原来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正式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大量地培训政治指导员、青年工作干部和参谋、测绘、通信等工作干部。于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经过实战考验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便成批涌现。边区党委还在1944年2月开办了干部整风班，轮流抽调县、团以上干部短期离职学习。在职干部也有计划地学习整风文件，并以整风精神改进工作。所有这些，既保证了干部队伍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又使各方面干部的特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四)

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新四军第五师也并非没有失误。

1944年，当日寇发动的河南战役告一段落后，我们未集中主力向河南敌后发展，便是五师从头到尾最大的一次错误。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从延安发来了电报，明确指示五师应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党中央还作出了进军河南敌后的统一部署：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开辟豫西、加强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以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萧（县）永（城）夏（邑）宿（县）根据地，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以第五师一部由平汉铁路两侧经信罗边向北发展。同时发布了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的指示，规定了各项政策。

发展河南，华北部队需突破日寇在黄河和陇海路的封锁线；华东部队有黄泛区和广西军阻挠；五师沿平汉线北上则比较方便，而且五师部队中的河南籍干部多，熟悉河南情况。如果五师当时拿出十三旅主力3个团，十四旅1个团进军河南，河南的局面可以迅速打开，就能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态势。

可是，由于当时边区领导处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中，未能抽出主要兵力到河南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而只派出了千余人的部队进军到嵯峨山一线，因而未能同豫西嵩岳以及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的八路军打成一片，造成席卷中原的形势，改变五师孤立处境的局面。这对以后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五师以较大兵力北上和八路军打通了，在日寇投降后，就能进可以威胁武汉，退可以向华北或华东作内线转移，使五师在解放战争中避免因突围而造成的重大损失。

但是，从总的方面讲，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是对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历史。

这部历史，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奋斗写成的。

每当我们重温这部历史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就对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壮烈就义、在长期斗争中积劳病故的先烈们，寄以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悼。一切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回顾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历程，记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将激励我们更好地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发扬为人民求解放、谋利益、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继续奋斗。

（王克律、徐蓬，李少瑜整理）

二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

1945年8月

10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日本天皇裕仁于15日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12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中央局，管理现新四军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中共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嵩岳）军区。

15日毛泽东电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要求在半月时间内，集中1至2万精兵，整编四五个旅。

20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五师地区的中央局称中原局。

31日郑位三、李先念电报中共中央：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道荣（程耀德）率部5000余人已与我部合作混编。次日，中央复电郑、李：你们争取程道荣部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中下旬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在10余天反攻作战受降中，攻克小城镇12处，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

1945年9月

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4日中共中央批准五师师部和一部分主力转移到四望山机动位置。并指示着手整编一二万主力军放在手中。

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湘粤赣边北上，向五师靠拢。

10日中共中央同意河南（嵩岳）军区主力在情况严重时向南转移，向五师靠拢。

15日五师决定成立野战军，下辖3个正规旅。五师野战军17日在湖北应山之吴家大店河滩举行反内战誓师大会。

18日中共中央批准鄂豫皖边区暂设鄂东、江汉两个区党委。

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

22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电报中共中央，决定于一个月左右打一大仗。并建议与王（震）王（首道）及王（树声）戴（季英）主力，合力一战。为确立中原大局，中共中央24日电复同意此议。

25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于湖北应山县浆溪店开始执行职务。

28日鄂豫皖中央局向中共中央，上报《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于10月1日复电肯定该计划是正确的。

29日中央军委电慰已安全北渡长江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并指示他们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领导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1945年10月

1日河南军区部队开始南下。

9日中央军委电令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南进，向五师靠拢。

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

15日蒋介石密令刘峙负责“围剿”、“歼灭”王树声部。

16日中央军委电示郑位三、李先念等要求精细组织桐柏战役，大胆作

战。

17日李先念率五师野战军3个旅向桐柏地区运动。

20日五师野战军发起桐柏战役，一举解放桐柏县城，接着又连克固县、平氏两镇，歼敌1000余人。

21日五师野战军十四旅于戴家仓屋重创国民党独立第一支队戴焕章部，歼其800余人，并缴获军械库、弹药库各一座。

24日中共中央电贺五师野战军占领桐柏，并望努力扩大战果，创造新局面。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于随、枣、桐、唐4县交界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部队会合。

28日五师野战军解放枣阳县城。

30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郑位三、李先念关于三大主力会师后领导成员分工和部队合编的报告。据此，鄂豫皖中央局充实了领导力量，明确了常委分工，更名为中原中央局，同时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

月底原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挺进报》合并，成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仍称《七七报》。

1945年11月

1日蒋介石下令限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于11月内肃清”中原军区部队。

3日五师野战军解放新野县城。桐柏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此前，三大主力会师曾解放唐河县城。

9日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首道、王树声、刘子久署名发布中原军区部队整编命令。

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再攻克枣阳县城，歼国民党军2200余人。桐柏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

12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四旅将进犯之国民党军第一二七师第三八一团歼灭于湖北湖阳镇丁爬山地区。俘该团团长双宗海以下6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400余人。

28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对正在进行的桐柏战役的战略作用作了高度评价。

1945年12月

7日中原军区主力发起双沟战斗，歼国民党军1000余人。

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山东局、晋冀鲁豫局，指示他们给中原军区部队以财政援助。

14日中原军区主力发起祁仪战斗，歼国民党军1000余人。

17日鉴于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以庞大兵力向桐柏山推进，企图实行南北夹击，中原军区主力为争取主动，开始向平汉铁路东移动。桐柏战役结束。前后两个阶段共歼国民党军9000

余人。

18、19日中原军区首长先后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中原地区留游击兵团活动。中央于20日复电同意。

19日中原局国军工作部开始工作。

24日郑位三、季先念向中央军委报告中原部队东移计划。

28日中共中央通告华北、华中各部首长，准备接应和配合中原军区部队的战略转移。

第一纵队第三旅解放息县县城，歼国民党军1000余人。月底侵犯桐柏地区的国民党军，以7个师之兵力尾追东进的中原军区部队。

1946年1月

5日国共两党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国共各派1人，会同美国总统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委员会。

6日中原军区主力解放光山县城，歼国民党军400余人。

10日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最高统帅部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24时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中原军区部队恪守停战命令，主力部队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地区集结待命。

12日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占领罗山南李店地区。

14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季先念、郑位三急电中央，报告战争尚未停止、财政朝不保夕，请求中央解决本地区的停战和给养问题。

中原局决定将《七七报》改版为《七七日报》。该报至6月24日停刊，共出162期。

16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政公署由光山县南向店移驻宣化店。

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示中原局：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一方面又要坚持自卫原则，防止与打击对方的突然袭击。

19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即第五、第六战区小组，又称汉口小组）在重庆成立。

23日在第九执行小组调处下，国民党代表和中原军区代表达成《罗山协议》。

29日第九执行小组在礼山（今大悟）县吕王城与季先念会谈，达成《中原临时停战协议》。

1946年2月

1日中原局派任质斌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6日王震、任质斌等偕同第九执行小组返回汉口。

14日郑位三、季先念电告中央：中原军区紧急会议决定：拟将大部主力向北转移，留下2万人在原地坚持。

18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力争合法北移，也应作“非法”向皖东或华北转移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

20日第九执行小组抵宣化店会晤季先念，并发表会谈公报。

国民党派特务潜入中原部队驻地投毒，造成约500人中毒。

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正式成立。（同年7月改称“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

下旬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鄂东地委，代行区党委职权。

1946年3月

3日郑位三、季先念、王首道抵汉口德明饭店，准备会晤与张治中、马歇尔一道前来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周恩来，并同武汉行营商谈派设中原

军区驻汉办事处等问题。王首道拟飞北平叶剑英处报告中原地区情况并领款。

5日军事三人委员会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行由延安飞抵汉口，6日离汉飞渝。

10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应决心将主力调往皖东整编，并立即复员2万人。

上旬中原军区部队进行整编。

12日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成立。

14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王首道电告郑位三、李先念并报中共中央、周恩来：部队转移问题已遭张治中拒绝。

16日中原局召开高干会议，一致认为，当前处境极其危险，无合法转移的可能，待坚持一个月后仍不能合法转移时，只有突围。同时决定抓紧做好复员2万人，分散多余干部和严整制度、节衣缩食等方面的工作。

18日《新华日报》以《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为题，发表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处长郑绍文在重庆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

28日军事调处执行部签订协议，同意将中原部队伤病员由铁路车运至河南安阳。

国民党六十六军侵占安应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第九执行小组赴应山调处，口头达成“应山协议”。

30日董必武抵达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

本月王首道离开中原军区后，由任质斌任中原军区副政委。

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正式开学，后因形势日紧，于5月底结束。

1946年4月

3日第九执行小组赴礼山河口国民党军新十五师第四十五团团部驻地，调处该部进攻陂安南问题，因国民党代表邓为仁态度蛮横，未达成协议。

7日董必武离宣化店返汉。

9日王震返宣化店，传达3月赴延安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他时的重要指示。

上旬中原军区在宣化店召开军民万人大会。郑位三向当地人民赠送“民为邦本”的匾额。

12—17日国民党七十二军新十五师侵占陂安南解放区；六十六军十三师不断进犯应山以南解放区。

13日南京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在宣化店设立办事处。

16日为防堵中原部队向东突围，国民党第四十八军在安徽省六安设置指挥所。

29日鉴于国民党部署了11个军26个师30余万兵力“围歼”中原军区部队，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否则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30日中共中央电告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只要谈判不破裂，应依原计划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假如非突围不可时，望先秘密计划并电告突围方向。

下旬国民党军在花园、演川、商城等地设立高级指挥所。

本月中原解放区行署举办“野菜展览会”。

1946年5月

1日中共中央3次电告中原局：国民党有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中原局两次电告中共中央：如果国民党大举进攻，拟在原地打两仗，万不得已时则突围，拟向西。第一步为陕南。原地拟留万余人坚持游击战争。蒋介石、白崇禧相继到西安，策划进攻中原解放区。2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复中原局：不轻易走，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正好。一切准备工作宜快。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呼吁“酝酿中的中原大战，必须立即制止”。

5日中原军区严正声明；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不要玩火自焚。8日周恩来、王天鸣（徐永昌托病由王代）、白鲁德会同第九执行小组及新闻记者共60余人抵达宣化店视察。下午2时，在宣化店“湖北会馆”举行军事调停会议。

10日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12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三十四师一 团等部连日进攻陂安南，驻宣化店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发出第一号命令，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行动。

15日中原军区伤病员及家属740余人，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监督下，自广水乘专列北上。17日抵达安阳。

17—21日国民党军分别向桐柏、江汉、经扶、信阳等地的中原部队进攻。

21日联合国救济总署医疗队一行4人，由汉口抵达宣化店。

22日李先念就国民党违反《汉口协议》，进犯中原解放区一事，向汉口第九执行小组及驻宣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提交“宣字第6号”备忘录。

本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地区自3月至本月间陆续用各种办法将一批地方及军队干部转移到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工作或隐蔽。

国民党自4月至本月将其正规军统一整编，原军改为师，原师改为旅。

1946年6月

4日程潜在武汉召开“绥靖会议”，下达“绥靖计划”，将兵力重点集中于鄂中，“进剿”江汉军区，相机“扫荡”鄂东。

10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原局：全面内战有很快爆发之可能。

19日中共中央电告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蒋介石决定大打，你处需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争取一切可能向北；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20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突围方向、路线等行动计划。

中旬蒋介石密令程潜和刘峙：由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第六绥靖区部队，“彻底消灭中原的共军”。刘峙于6月20日下达围歼中原部队的作战计划。

21日中原局电报中共中央，请求批准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

23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长向鄂东独立第二旅领导交待接替宣化店警备及掩护主力突围等任务。

24日王树声命令第一纵队第一旅担负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

25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告中央军委：突围计划改为29日晚突过平汉铁路。

李先念、郑位三派刘子厚前往安陆桑树店，向江汉军区布置突围事宜。

王树声率一纵二、三旅自泼陂河、浒湾、砖桥等地向宣化店靠拢。

26日拂晓，国民党军悍然以宣化店地区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自此，全面内战爆发。晚，中原局、中原军区按照原计划主动撤离宣化店，开始进行中原突围战役。

28日王树声率一纵二、三旅组成的南路军，在礼山汪洋店附近与二纵十五旅旅直及四十三团会合，继续向西挺进。29日在独二旅派部护送下，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撤离宣化店。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二纵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于信阳的柳林及李家寨附近，经与敌激战，全部突过平汉铁路封锁线。

南路军行至礼山阳平口地区时，遭敌整编六十六师一八五旅阻击，决定向南绕道过平汉铁路。

一纵一旅突越敌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向东挺进。

鄂东独二旅于晚间向东突围。

30日湖北救济分署宣化店办事处离宣返汉，遗留工作由新成立的分署鄂东（第三）工作队接替。

1946年7月

1日北路军到达应山北之泉口店、浆溪店、吴家大店一线就地休整。中原局、中原军区整编干部旅并令其随三五九旅行动。

南路军及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团在绕行途中击溃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和整编七十五师各一个旅的疯狂堵击，清晨抵达孝感王家店附近，经激战，下午全部越过平汉铁路，与原在路西赵家棚地区的十五旅四十四团会合。

江汉军区部队从桑树店等地出发，经随县南柳林店向襄西挺进。

一纵一旅胜利越过大别山主峰大牛山，向东前进。

2日刘峙部署第五、第六绥靖区追堵中原突围部队。

3日中原局电示南路军西渡府河、抢渡襄河，进军武当山地区。

一纵一旅进抵立煌（今金寨）县吴家店，决定休整3天。

4日北路军越过天河口敌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

5日中央军委电示郑位三、李先念：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大量牵制敌人。

河南军区部队奉命从随（县）北出发，随北路军北翼西进。

6日北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抢占唐河渡口程家河。7日，又抢占白河渡口朱家集，掩护三五九旅主力及干部旅率先渡过唐河、白河。

江汉军区部队从宜城流水沟全部渡过襄河，在璞河埗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向鄂西北挺进，在川鄂陕边建立游击根据地。会后，部队分南北两翼向武当山进发。

7日李先念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谈话。

8日北路军主力部队胜利渡过唐河、白河，继续西进。

南路军一纵主力及十五旅（欠四十五团）下午到达茅茨畈地区，决定抢渡襄河。

9日河南军区部队占领泌阳县羊册镇，开仓济贫。

蒋介石密令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及驻关中地区的整编一师一旅，赶赴荆紫关地区，参加“堵歼”并防北路军入陕。

10 日一纵一旅前卫二团于青峰岭击溃国民党安徽省挺进纵队第二团堵击，向磨子潭挺进。

11 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北路军于师岗地区兵分左、右两翼纵队西进。

南路军一纵及十五旅主力，分别在流水沟和雅口强渡襄河。13 日凌晨，主力约 7000 人渡过襄河，继续西进；阻击部队 2500 余人因国民党军封锁严密，无法渡河，由闵学胜率领，转道北上，向伏牛山前进。

一纵一旅到达磨子潭。连夜抢渡淝河。

河南军区部队在经过方（城）南（阳）公路时，袭击国民党军用汽车队，俘其军需主任以下 100 余人。

12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刘庚赴陕南接应中原突围部队。

13 日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

王震率北路军右翼部队于 12 日围攻浙川县城，抢占荆紫关，因敌情严重，决定改变计划，枪渡丹江，南绕南化塘、鲍鱼岭向陕南挺进。下午，该部从大石桥娘娘洞等地强渡丹江。

李先念率北路军左翼部队进抵浙川丹江东岸，并组织指挥部队于当日晚从渐川城西人字坎城开始徒涉丹江。

一纵一旅抵达大别山东麓山口毛坦厂，旅党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赶在敌部署就绪前，横跨皖中平原。

河南军区部队在南召南河店击溃敌整编四十七师一二五旅 1 个团。

14 日中央军委向李先念等通报胡宗南兵力部署情况。

15 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并告王震：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电报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和困难。

蒋介石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

16 日北路军在狐子垭、鸡子岭一线歼灭阻击的国民党军 4 个排，继续沿滔河西进。

鄂东独二旅四、五两团在罗田滕家堡会合后，当日进抵蕲（春）、英（山）、岳（西）、太湖边地区。

江汉军区北翼部队于是日晚攻占房县青峰镇，之后向房县县城进逼。右翼部队亦进逼该县城。

一纵一旅与中共淮南区党委派来联络的地下党取得联系。

17 日中央军委电告中原局应考虑依靠巩德芳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建立根据地。

北路右翼部队进抵鲍鱼岭地区，遭国民党军包围，经昼夜浴血奋战，终于打破包围，进入陕南。

北路军左翼部队进抵南化塘东北之玉皇顶地区，与据险堵击的胡宗南部整编一师一旅激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此仗，歼国民党军 400 余人，突围部队伤亡 200 余人。

鄂东独二旅各团胜利会师冶溪河。翌日，中共中央电示该部停止东进，

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旅党委决定：将团部改称支队，每支队下辖 2 个小团。

18 日江汉军区部队下午开始攻打房县县城。连攻 3 日未克，后根据中共中央电令，停止攻城，继续西进。

19 日中共中央电示北路军，酌情考虑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打击民团及小部队。然后分支向豫西、川东、陇南发展，同日，电示王树声部，应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创建根据地。

中共中央电令独二旅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在鄂皖边建立根据地。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鄂皖地委。

北路军左翼部队进入陕西省商南县赵川地区，遭国民党军超前堵击。四十五团与敌激战 16 小时，完成掩护任务。

20 日北路军左翼部队在商南石柱河与国民党军整编三师一部遭遇，李先念亲率三十七团和军区警卫部队将其击溃。

一纵一旅全部越过津浦铁路，与淮南军区嘉山支队会师，胜利进入苏皖解放区。

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陆续派干部进入商洛，准备迎接中原突围部队。

21 日北路军左翼部队进军宁陕途中，于商南梁家坟椴树桠与国民党军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遭遇，将敌击溃。

南路军及十五旅主力在石花街地区突破国民党军阻截，歼敌 300 余人。

22 日江汉军区部队攻占竹山县城。

23 日中央军委电示王树声、刘子久、张才干：你们万万不可再北进，必须就地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

中原局在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等问题。

陕南游击队分队长刘占山与中原军区北路军左翼部队取得联系，并为其带路。

王震率三五九旅在山阳县马家店、小河口、石窑子一线击溃敌七十六师一四四旅四三、四三一各 1 个营的堵击。七一九团政委蒋洪钧，参谋长朱佐夫牺牲。

24 日中原局决定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休息养病，任质斌协助李先念主持工作。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就二纵主力分散行动问题电报中共中央。25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分散行动的布置。

王震率部抵达山阳僧道观大峪，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将其击溃。26 日，决定将干部旅分散行动，26 日王震即将此情况电告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并报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收容。

25 日南路军及十五旅主力进抵房县青峰镇，部署分散游击，建立根据地。从 26 日起开始分散活动。

26 日李先念率部到竹林关西南之红岩沟，决定改道北上，与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会合，以便有计划地部署陕南的游击战争。

27 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就中原停战问题在湖北老河口达成《中原临时休战协议》。

李先念率部到达毛里岗垸，与陕南游击队张青山部取得联系。

28日三五九旅在商县黑山镇部署分散活动事宜，未竟，国民党军追至，将其击退。

29日李先念在寺坪花园岭油房村会见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并商讨工作及行动问题。

中共中央电令黄林部暂在洛南、商南、芦氏一带独立自主打游击，不要西进。

30日江汉军区部队进抵镇坪牛头店，准备入川。次日，中共中央电示该部速占鸡心岭入川。

31日中央军委电示张体学：华中二师、七师留桐西的游击队和大别山所有游击队归中共鄂皖地委统一领导与指挥。

1946年8月

1日中原局电告中共中央转皮定均、徐子荣：你们到苏皖解放区后，即改属苏皖（华中）军区建制，并接受他们指挥。

2日李先念率部在留仙坪（今丹凤县）与巩德芳、刘庚等会合。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及区党委。并划分为3个军分区。

三五九旅攻占镇安县城。并决定分散游击。

3日中原局在留仙坪召开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宣布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合编，并在豫鄂陕初步划分3个军分区。

江汉军区在镇坪牛头店传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在川鄂陕边创建根据地的指示。

4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刘庚、巩德芳就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条件，向中共中央并西北局发出急电。西北局于8月11日电复：不久将有许多武装起来策应你们。

中原局对豫鄂陕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及地委的干部配备，在开初拟定的基础上又作了调整。这3个军分区及地委先后成立。

5日中央军委、中原局电示黄林部与闵学胜所率南路军一部会合，组成一个军分区。次日，黄、闵两部胜利会合，正式组成豫鄂陕边区第四军分区及地委。

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成立豫鄂陕军区和划分3个军分区。党委在汪锋到达时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一切工作均由中原局负责。此后，中央电告李先念：将陕南工作安排好后即回延安。

7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人在赴西安谈判途中被胡宗南部无理扣押，10日惨遭杀害。

9日中共中央电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大量歼灭来犯之敌，以减轻中原压力，掩护中原各部，使其立足。

王震就三五九旅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并李先念，请中央准许三五九旅回陕甘宁边区。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报中共中央亦有此议。

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铁路开封、徐州段发起进攻。

汪锋奉中共中央指示，从陕甘宁边区旬邑县马栏出发，前往豫鄂陕根据地工作。

张成台、吴先元、李其祥等5人在化装转移途中遇害。

11 日中共江汉中心县委研究在襄西建立根据地问题。

12 日中央军委指示独二旅在大别山长期坚持打游击。

13 日一纵副司令员刘昌毅指挥三旅七团于房县冠木河地区全歼敌整编七十五师十六旅四十七团 1 个加强营。

一纵二旅四团攻打兴山，翌日凌晨攻克县城。

熊作芳率独二旅一部到达潜山冲，先后与刘海燕、钟大湖、张伟群等部会合。不久，熊作芳等化装转移去华中解放区。

14 日中央军委通报，蒋介石进攻及防堵中原部队共计有 31 个旅，近有 7 个旅又 1 个团东调的情况。

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宣布老河口协定失去作用，并拒绝作任何调处。从此，国共双方关于中原战争的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17 日罗厚福、文敏生电告中原局并中共中央：目前无法入川，决定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

19 日三五九旅抢占陕西凤县东岔河渡口，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

中旬一纵一旅奉华中军区命令，配合华中野战军参加了“苏中战役”的最后一战。

22 日中原局发出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

23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通报刘、邓出击陇海战役的胜利。指出国民党从陕南、豫西南调走 7 个旅外，又从鄂西、鄂中调走 2 个旅。请告王树声、刘子久，彻底分散，依靠群众，坚决创建根据地。

24 日中原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祝贺陇海线作战的伟大胜利，并感谢对中原部队的支持。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报中共中央：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 3 人现隐蔽在巩德芳处，拟化装去延安。

26 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命令第四军分区部队向陇海路游击。

27 日郑位三、陈少敏等经中共中央同意，离队化装去延安。当日到封地沟休息养病。后于 10 月中旬启程，下旬分别返回延安。

江汉军区部队与第一纵队在房县西南的上龛地区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下设 4 个军分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28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领导干部的任命，并指示任质斌在汪锋到达、党委正式成立后，回延安休息一个时期。

31 日王震率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9 月 1 日至 4 日，多方发电向其慰问祝贺。

下旬一纵一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

194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准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干部配备及组建分区的报告。

中原局就豫鄂陕军区各军分区地境、所辖部队及干部配备发出通令。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就当时的敌情及反“清剿”斗争的部署电报中央军委。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2 日鄂西北区党委为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各军分区发出指示。

中共中央就团结全陕人民反对胡宗南问题向季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发出指示。

4 日程潜电令第六绥靖区成立“三省边区清乡指挥部”，对鄂豫皖边地区实行分区“清剿”。

8 日中央军委致电季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环境有利于你们建立根据地，望按原定计划坚决执行。

中原局电示鄂西北区党委，派李人林率一部分武装到襄（河）东、大洪山开创新局面。并将十五旅转移至陕南。

9 日豫鄂陕军区四分区部队攻占卢氏北的杜关镇，击溃国民党河南第十专署保安团。

10 日中原局向豫鄂陕边区各军分区发出关于反“清剿”及创立根据地的指示。

上旬豫鄂陕边区第三军分区山阳支队在黑沟岭（今丹凤县）截击国民党军 1 个后勤供给处。

独二旅各部相继到达斩春桐山冲。张体学鼓励大家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

11 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地委：在陕南、鄂西、鄂东对付我中原军的国民党正规军共 14 个旅，指示中原军克服困难创立根据地，牵制这 14 个旅，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

12 日汪锋在封地沟（今丹凤县）与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会面，共同研究成立边区党委和部署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陈诚抵郑州内战前线指挥部举行军事会议，重新部署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18 日鄂西北区党委电报中共中央并中原局：下决心创立鄂西北根据地，立即着手恢复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工作，并决定成立第五军分区。

19 日鄂西北军区三旅七团在江汉二团配合下攻占均县南的草店。

上中旬鄂西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及地委成

何耀榜率鄂东独二旅一部抵东西大山与刘名榜部会合。

22 日刘子厚部、张才干部先后在南漳、荆山地区与黄民伟部会合。

24 日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封地沟召开，宣布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

25 日十五旅归建部队进入镇安地区后受命建立豫鄂陕边区第五地委和军分区。

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三支队及镇旬游击大队攻克镇安县城。

26 日鄂西北军区七团和江汉二团于谷城石花街地区重创国民党军，毙伤俘敌 150 余人。

29 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欢迎三五九旅胜利返回延安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临大会，看望全体指战员。

戴季英由陕南游击队护送经华县转关中回到延安。

下旬鄂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和地委正式组建。

194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

2 日季先念、任质斌在蓝洛县厚子镇与汪锋告别，奉命回延安。

8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鄂西北行政公署，各分区相应成立行政专员公署。

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于蔡川上庄坪召开党委会议，讨论季先念临行指

示、调整各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成员。

季人林部决定称为“江汉游击支队”。

11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征收公粮的指示。

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与各专署的干部配备。

中旬张体学率四支队一部到达浠水境内的大灵山，与五、六支队各一部会合，并将各部统一整编为新四团。

鄂西北军区七团于襄河南岸青山港一带歼灭国民党郧县保安团 1000 余人。

29日豫鄂陕边区党委给所辖地委与军分区发出指示，要求集中兵力对敌各个击破，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地向前发展。

30日张体学率独二旅一部到达广济十八堡，与易鹏、黄宏伸部会合。决定派于淑斌秘密赴南京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独二旅的情况。

1946年11月

1日中央军委电示文建武、汪锋、王树声、刘子久、张体学：应鼓励全军克服困难，坚持创立根据地。

4日豫鄂陕区党委向各地委、专署，军分区下达指示，要求各级领导重视研究财政困难的解决办法，号召全区党政军为解决今冬明春的财政困难而斗争。

6日中共中央电告王树声并文建武、汪锋：决定在延安设立中原局。

于淑斌到达南京梅园新村向周恩来汇报独二旅的情况。

9日中原局电示豫鄂陕和鄂西北区党委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上旬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许道琦率郧山支队，袭击国民党第五战区后方医院夹河关金兰山被服库，缴获 1000 余套棉裤和大量被服。

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撤出竹山、竹溪和白河地区。国民党军又向武当山边缘地区的第三、第五军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季人林部先后与宁淮、张波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一部会合。

11日张体学率独二旅一部南进到英山南仙人台地区，沿途遭国民党军堵击。此间，独二旅主力已在大别山区完全便衣化，二三十人一股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12日中原局电示豫鄂陕与鄂西北军区要重视工兵建设。

13日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告文建武、汪锋：为配合延安作战，为解决本身冬衣困难，当前应集中一定力量向西安平原作积极的活动，在山地亦应集中兵力寻机消灭地方保安团队。

15日豫鄂陕区党委、军区向各地委、军分区发出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及加速豫鄂陕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奉中央军委命令，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樊执中、五十八团团长江白沙率两个半连南渡黄河。23日，到达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地龙驹镇，送来电台密码及经费 5000 万元（法币）。

17日中原局就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电示豫鄂陕、鄂西北区党委：一切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上。鄂西北军区七团和第三军分区九大队转向老白公路以北地区机动作战。

22日张体学再次派程全到南京向董必武汇报鄂东独二旅情况。董必武提议张体学将部队安置好后赴南京。

24日鄂西北区党委决定李人林部称为“鄂豫边游击支队”，后还成立了鄂豫边区工委。

25日国民党军向豫鄂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在重要街镇修筑碉堡，进行经济封锁。

27日中共中央向汪锋、文建武、张树才发出《关于敌烧房屋处理办法》的指示。

30日豫鄂陕军区提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对策。

下旬重新组建中共黄冈中心县委。

1946年12月

1日中原局电告豫鄂陕边区党委要扩大、巩固部队和根据地。

上旬国民党军集中5个正规旅和3个保安团的兵力，对鄂西北军区第三、第五军分区进行“清剿”。三、五军分区部队相继撤出武当山和南河地区，军区领导机关亦随之南移。

11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发出关于建设野战支队的决定。

中原局电示王树声、刘子久选择有利时机，派兵渡江到湘鄂西地区开辟江南游击战场。

12日豫鄂陕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游击队的发展与整理的决定。

14日张体学、赵辛初奉命化装转移至宿松，后辗转至延安。临行前，宣布组成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

15日中央军委通报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反“扫荡”战果。

豫鄂陕边区党委向中原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边区政权和地方武装建设情况。

中旬熊作芳率独二旅一部抵皖西后，与原新四军二、七师留下的部队及游击队会合，决定成立统一的领导与指挥机构，仍称皖西支队。王树声、刘子久、刘昌毅率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警卫团和三旅旅直、七团在车峰沟一带遭国民党军围困，激战后脱险。

22日国民党军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四、五团进占留仙坪。边区党、政、军机关在此之前已安全转移。

25日国民党军对豫鄂陕边区进行残酷“清剿”，第一、第五军分区机关及部队撤至三分区；二分区之蓝洛县被敌侵占。

26日中原局电示豫鄂陕边区党委，要求各分区干部团结一致，全力对敌。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做好反“清剿”准备工作的指示。

30日中原局电示鄂西北区党委，要决心坚持湖北游击战争，必要时到大洪山、桐柏山打游击。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1947年1月

1日中原局电示豫鄂陕、鄂西北区党委；必须坚持游击战争，克服一切动摇情绪。多建立分散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2日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四团在远安陈家嘴袭击国民党军远安县保安大队，歼其大部。

4日中原局给豫鄂陕军区发出反“清剿”斗争的指示。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于7日向各地委、军分区发出相应的训令。

8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决定成立野战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

上旬鄂西北区党委在千家老林附近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如何保存实

力，坚持鄂西北斗争等问题。

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和一贯与我为敌的首恶分子。

16日第一野战纵队首战击溃国民党内乡、西峡县的保二团全部、保八团的两个营及保一团1个营。

李人林率鄂豫边游击大队在京山黑冲歼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工兵营大部 and 1个保安中队。次日决定打过长江，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

18日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大约在今年5月间即可向中原出动。”

21日张水泉率部掩护豫鄂陕军区新成立的干部大队北渡黄河，经激战，除七团一部返回陇海路南外，其余全部渡河，后于2月9日抵大岳军区。

23日中央军委电示文建武、汪锋，对集中主力并打了一个胜仗表示欣慰。并指示，要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

豫鄂陕军区发出《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方针》的指示。

24日中原局在延安召开会议，总结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刘少奇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

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本月国民党武汉行辕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湖北省半数以上县市划为绥靖区。

下旬李人林部渡江进入湖南澧县、石门县境，将鄂豫边游击支队改称“江南游击支队”。

1947年2月

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在鲁山县瓦屋街开会，研究南留坚持或北渡黄河问题。中央军委、中原局挑准主力北渡，留当地游击队坚持斗争。

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鄂西北军区留少数武装就地坚持，主力分路转入外线作战。并报请中共中央同意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领导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6日鄂西北军区主力在保康西南的康家山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3昼夜，突出重围。

上旬鄂西北军区部队进行整编。

皖西支队二大队在桐城白门头公路伏击国民党军，击毙其怀（宁）太（湖）师管区中将司令张凌云等将校军官6人。

13日玉树声化装转移，前往山东解放区。

张才干率部向东佯动后挥师西南。14日晚顺利渡过长江。

20日文建武、汪锋率第一野战纵队于河南省济源、垣曲之间北渡黄河。

21日，中央军委电示文建武、汪锋；北渡后，开至高平或晋城休整两个月。

中旬杨秀坤、刘健挺率鄂西北军区五团和一批地方干部在钟祥以南的石牌附近东渡襄河。

罗厚福、吴昌炽率原江汉军区警卫团和江汉军区三团一部坚持鄂西北地区的斗争。24日张才干率部在五峰县红渔坪与李人林部会师。两部整编为江南游击纵队。

1947年3月

6日陈先瑞、韩东山奉命在河南洛宁熊耳山西侧宣布组成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

中央军委电令晋冀鲁豫部队出击陇海路。同蒲路，以挫败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计划，同时救援尚未北渡的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

上旬刘昌毅率鄂西北军区在康家山突围的主力一部转战至荆当远边山区。决定再渡襄河，回师大别山。

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决定充实中心县委领导机构，并成立中心县军事指挥部。

18日第二野战纵队全部通过陇海铁路。19日与南渡黄河接应的太岳军区部队会师后，黄昏在河南新安县曲沃镇开始北渡黄河，20日上午全部渡毕。

中旬中共皖西工委商定，派熊作芳去华东局请示汇报工作。后因情况变化，熊未返回皖西，经邯郸到达山西晋城。

23日陕南游击队领袖、豫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病逝于商县东的姜岭。

28日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在全部北渡黄河到达山西晋城后，整编为十三、十四、十五3个旅。

1947年4月

上旬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决定调整充实中心县委领导机构，并成立中心县军事指挥部。

14日季先念一行400人从晋绥解放区动身，前往太岳之晋城。

15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城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是五师的精华。你们应当作自己建制部队一样给予积极帮助并予整训。之后，可给予适当的作战任务，使其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以便将来和大军一道出河南作战。

17日刘昌毅等率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连夜于钟祥石牌镇附近渡过襄河，向大别山挺进。20日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石门县西北之磨岗隘地区全歼国民党湖南省保警第三总队的两个大队。30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全力准备反攻》的社论。下旬，何耀榜派萧德明带10余人到黄冈找漆少川联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大军即将南下，要筹粮筹款的指示。

1947年5月

月初任质斌抵达晋城。

1日江南游击纵队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相机北渡的指示，决定立即渡江北返鄂西北。次日该部奔袭国民党枝江县两个保安中队，连夜从洋溪上游石鼓地区北渡长江。

9日桂林栖率皖西支队在潜山县大佛寺与刘昌毅所率鄂西北军区主力一部会合，决定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

12日郑位三一行约180人抵达晋城，准备召开高于会、整顿部队，迎接新任务。

1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邓小平任书记的新的中原局及组成人员；任命季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20日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王展在荆门观音山牺牲。

中旬江南游击纵队先后与坚持鄂西北斗争的罗厚福等部会合。部队整编改称“中原游击纵队”。

23日季先念、陈少敏、戴季英、刘子久一行抵达晋城。

26日中原游击纵队从谷城东南的庙滩渡过襄河，进入豫南平原，向桐柏山挺进。28日中共中央致电慰问中原军区全体同志。

中原游击纵队在河南泌阳县南程店附近歼灭国民党泌阳县保安大队。

29日前中原局晋城高干会议正式开幕。

1947年6月

3日中原游击纵队从确山与信阳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南征野战军（通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2日中原游击纵队到达豫东睢县西南之平岗寨、周楼一带，与张国华、吴芝圃领导的豫皖苏军区部队胜利会合。

22日陕南游击队干部田申荣从晋城返商洛，向王力传达汪锋关于对敌斗争的指示。

24日中原游击纵队与豫皖苏军区会合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成“中原独立旅”。

1947年7月

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鲁西南战役。17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城高干会议应早日结束，迅即进行整训。

20日中原独立旅协同豫皖苏军区部队，解放西华、浑河之间的逍遥镇。

中旬刘昌毅、桂林栖率皖西人民自卫军向山外出击，实施机动作战。

25日郑位三、李先念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五师主力（即豫鄂陕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1947年8月

月初皖西人民自卫军进行整编。

1日晋城高干会议结束。

5日李先念奉中央军委电令率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参加战略进攻。

7日刘邓大军主力向南挺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11日陈赓、粟裕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进入鲁西南地区，并相机南进，经略中原。

16日刘伯承、邓小平亲临中原独立旅驻地拓城县玄武镇向该旅布置作战任务。自此，该旅参加刘邓野战军序列为直属独立旅。

17日第十二纵队奉刘、邓命令在清丰东南地区整训半月。

21日中原独立旅自本日起，连续3天在铁路东西两侧积极活动，掩护刘邓主力渡过洪河、汝河。

22日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两个师（简称“陈谢集团”）夜渡黄河，向陇海铁路进

27日刘邓野战军全部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征程。

1947年9月

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方针》的指示。

2 日刘邓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进驻黄安七里坪。次日，与罗礼经光游击队会合。

8 日第十二纵队从寿张南部夜渡黄河，挥师南下。

14 日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第三十八军一部攻克卢氏县城。17 日，该部又攻克陕县。

16 日新的中共陕南工委成立。

中旬李先念在山东环城第一次见到陈毅。李先念向陈毅汇报了情况，并请他向部队指战员作报告，陈毅慨然允诺。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漆少川和中共罗礼县委书记萧德明率部在麻城象棋山夫子河与刘邓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会合。

22 日第十二纵队参加华东野战军战斗系列作战，阻击曹县西逃之敌。

29 日第十二纵队解放河南通许县城。

下旬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野战军首长在光山县砖桥附近接见中原独立旅排以上干部。刘伯承司令员作了重要讲话。

陈谢集团决定四纵十二旅、三十八军十七师、陕南独立团分三路向龙驹寨进军。

1947 年 10 月

1 日第十二纵队解放扶沟县城。

中原独立旅配合一纵五十九团，攻克经扶（今新县）县城。

4 日中原独立旅解放黄安（今红安）县城。生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少将视察员邹晓轩。

6 日第十二纵队进抵淮阳汲冢，并就地休整。休整期间，陈毅到驻地看望该部连以上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并作了重要讲话。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12 日中原局、刘邓野战军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

15 日鄂豫军区成立。同时组建鄂豫区党委、行署。

中旬中原独立旅向长江沿岸地区挺进，连克宋埠、仓子埠、新洲、团风等国民党重要据点。在新洲，与黄麻游击大队会

24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太湖县刘家畈接见刘昌毅、桂林栖，并听取了汇报。

25 日刘邓野战军司令部在刘家畈召开第三纵队和皖西人民自卫军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部署工作，决定成立皖西军区。

26 日刘邓野战军发起高山铺战役，歼国民党军 1 个师 2 个半旅，共 1.26 万人。

1947 年 11 月

2 日第十二纵队到达河南光山县文殊寺与第一纵队第二十旅会师。

4 日陈谢集团在郊县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残部，俘其中将师长武庭麟、副师长姚兆辰。

8 日中共豫陕鄂前线工作委员会在河南南召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

11 日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在原豫鄂陕军区第三分区的配合下，攻克山阳县城，17 日攻克镇安县城，后挥师南下，解放郧西、郧县。

18日中原独立旅奉命向黄安方向前进。

豫陕鄂边区行署、豫陕鄂军区后方司令部成立。

月底第十二纵队在信、潢公路击溃敌整编第十师，掩护第十纵队进入大别山。

1947年12月

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全面围攻大别山根据地。

刘伯承、邓小平到第十二纵队驻地光山县苏家河，向营以上干部讲话，宣布中原独立旅归入十二纵建制。同时，下达了进军江汉的命令。

6日第十二纵队在黄安华家河与中原独立旅会合，重建江汉军区。并组建新的中共江汉区党委和行署。

李先念接见中原独立旅连以上干部并作重要讲话。

10日新的江汉区党委在大悟山北麓陈家湾召开会议，李先念出席并作了讲话。会议研究确定了重返江汉的具体部署和作战方针。

11日刘邓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外线配合粉碎国民党军围攻、坚持大别山的指示：决定第十、第十二纵队向平汉路西的桐柏、江汉地区展开。

13日桐柏军区成立。同时组建中共桐柏区党委和行署。

陈粟野战军、陈谢集团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作战。

14日新的江汉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从广水、花园间西越平汉铁路，投入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斗争。

三中原军区战斗序列和中共中央中原局、

中原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序列表

说明

一、本序列表是根据现有资料汇集和编写的，力图反映中原解放区党政军组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初期各个阶段的组织沿革、机构变化和领导成员任职情况，并突出反映中原军区部队的编制序列变化情况。

二、录入本序列表的时限，自1945年10月起，至1947年12月止。

三、本序列表的录取范围：党政组织下列到县级（或相当于县级）单位，部队下列到团级（或相当于团级）单位。党政军各级领导成员的职务和姓名，党政机构一般下录到地委、专署的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相当于地专级的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的任职亦收录）；部队一般下录到旅（含军分区）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直属机关一般下录到纵队（含江汉、鄂东、河南军区）的各部（处）长。少数单独作战而又颇有影响的区、营级单位（如各支游击队）和县、团级的主要领导成员，作为特例，录入本序列表内。

四、本序列表分阶段、按党政军三方面编排，即划分若干阶段，按中原军区战斗序列、中原局组织序列、中原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序列三条线分别整理编制。

五、由于当年战斗十分频繁，形势急剧变化，党政军组织、编制序列和领导成员任职情况变化很大，资料不易收齐，本序列表难免出现错漏。

